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三十二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 · · · ·

第 · · · 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三十二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主编 胡 华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开

本850x1168 1/32 印张11.375 插页9 字数254,000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精) 1-5,000

统一书号：11094·197 定价：(精)3.25元

毛泽东博览 网站编辑
www.mzdbl.cn

目 录

严朴同志传略.....	陈 云	(1)
附 严朴生平.....	严怀瑾	(5)
谭震林.....	胡良忠	(25)
郭 俊.....	郭思明 集 力	(105)
辛焕文.....	刘厚中	(116)
徐成章.....	元邦建 陈永阶	(133)
李汉藩.....	张秀斌	(154)
詹乐贫.....	冯生敏	(165)
李硕勋.....	何绵洲 李荣 罗慰年	(174)
许甦魂.....	许肖生 胡提春	(213)
蔡升熙.....	杨树荣 袁新安 曾长秋 阮烁瑶 吴兴强	(243)
胡 梓.....	谢树森 李新福	(270)
廖恩波.....	张模超	(286)
谢祥军.....	魏有豪	(306)
刘少白.....	樊润德	(312)
胡锡奎.....	中共湖北省孝感地、市委 《胡锡奎传记》编写组	(334)



严 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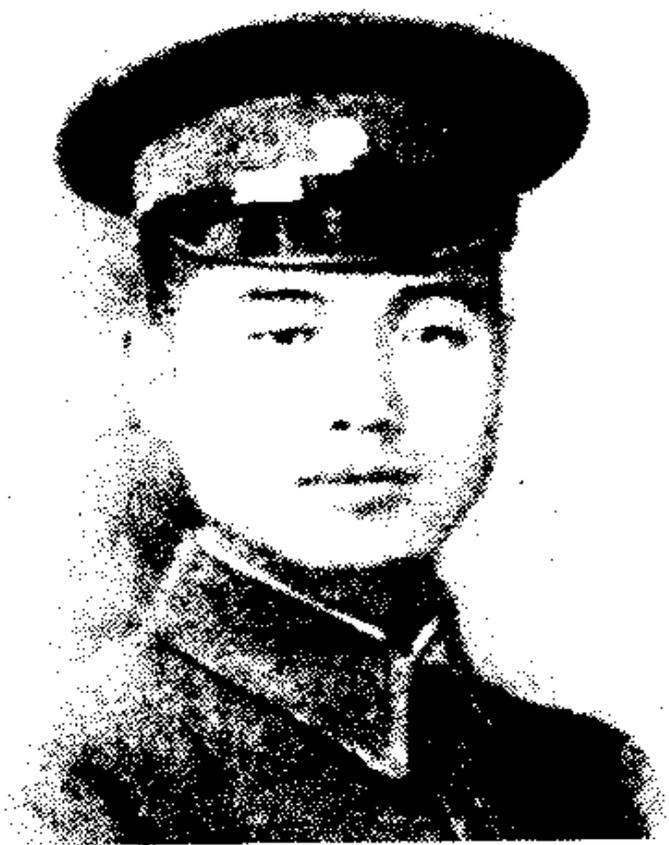
谭 震 林



郭 俊



辛 焕 文



郭 俊



徐 成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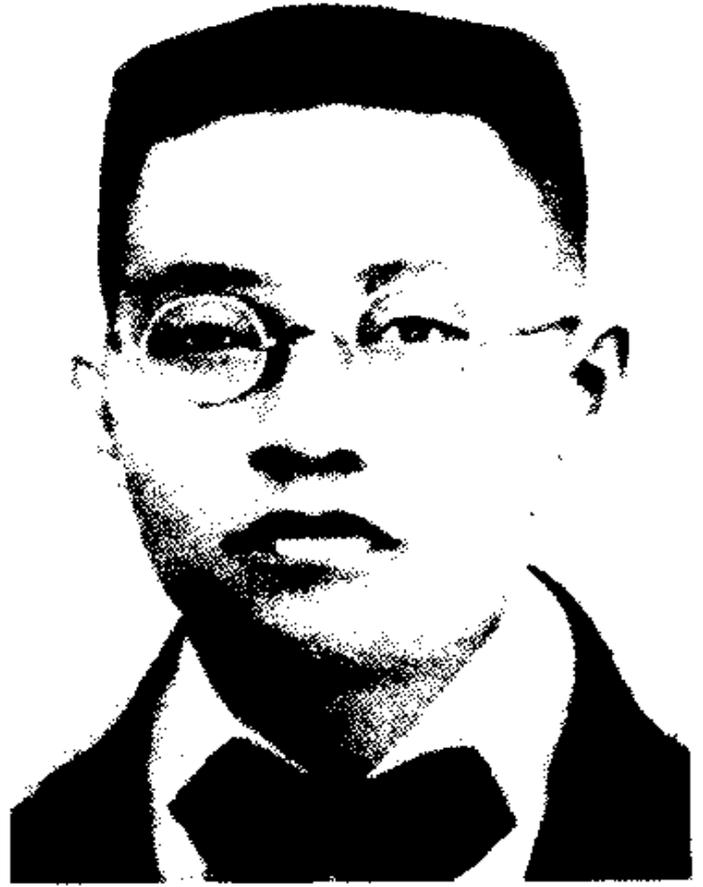
李 汉 藩



詹 乐 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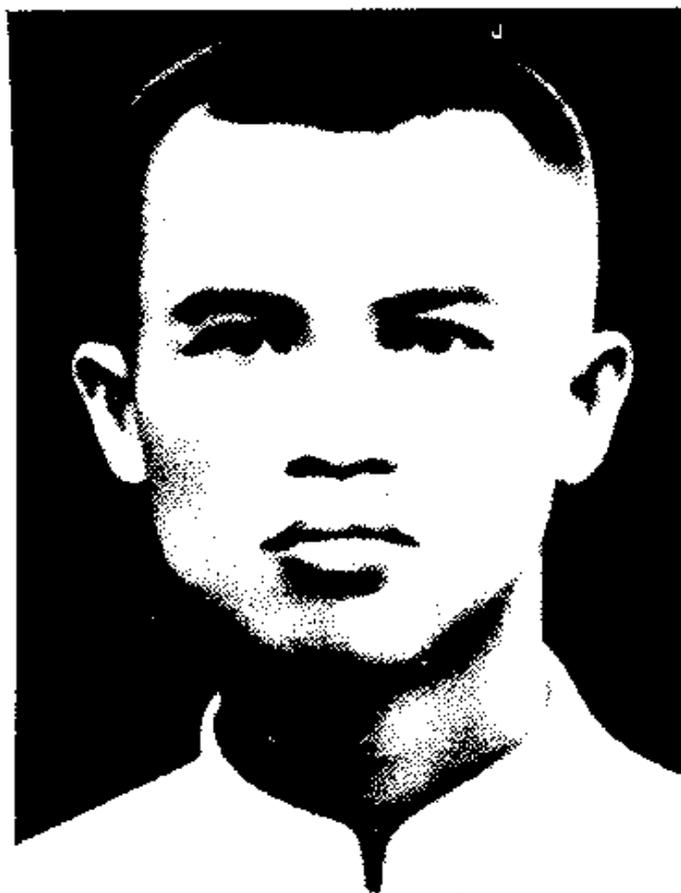
李 碩 勛



許 勳 魂



蔡 升 熙



胡 梓



廖恩波



谢祥军



刘 少 白



胡 锡 奎

说明：本卷缺辛焕文照片

严朴同志传略*

陈 云

严朴同志（又名严达人）江苏无锡人，出身于地主家庭，曾肄业上海专科师范、上海大学、南方大学。受《新青年》、《向导》及社会主义书籍的影响，参加革命活动，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前后，曾是积极参加工人学生运动者。一九二五年“五卅”游行讲演时，是最初被捕的十五人之一。当年夏，释出后，接受党的命令，回无锡进行革命活动，初任地委秘书，后任总工会总务部长，领导工人运动，并变卖自己的田产创办无锡江苏中学，严朴同志兼校长，并领导教员联合会。江苏中学成为当时无锡共产党职工与革命知识分子的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

“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无锡与其他地方一样，工会、农会和江苏中学都遭封闭，革命分子遭到严重的白色恐怖的屠杀，严朴同志即转入无锡乡村，领

*本文原载1949年6月9日《人民日报》，这次征得陈云同志同意，在本书重新刊出。同时发表严怀瑾同志的《严朴生平》，作为附录。

导农民抗租抗税的武装斗争，被任为农协委员长。由于严朴同志首先把自己的土地交给农民，不收地租，并在反对国民党的武装清乡中领导农民经历过无数次困难危险斗争，因此严朴同志取得无锡、江阴、常熟一带广大农民的拥护，农民承认他是自己的领袖。在环境最恶劣的几个月中（一九二七年冬至次年夏），敌人调集了许多军警，日夜“清剿”，四处追捕，但农民保卫严朴同志，常常是一夜之间敌人追捕好几次，但每次农民把严朴同志一村一村的安全转送，避开了追捕的敌人。严朴同志曾经是无锡农民的心自中的“神仙”。即在抗战时期，无锡农民还盼望着严朴同志回家，当时江南无锡一带的党组织就打着“严朴”的旗号，组织起抗日的武装。

由于严朴同志是无锡一带农民拥护的领袖，故他被推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会后调任松浦特委，领导松浦一带的农民运动。当他领导奉贤农民攻打反动堡垒庄家行时，严朴同志事前亲手制造了若干手榴弹，攻击时手执武器，率先冲锋。在他的英勇领导之下，终于攻下了敌人的据点，收缴了敌人的武装。一九二九年，严朴同志调任上海法南区工作，他被分配在黄包车夫中进行工会活动。严朴同志日夜与黄包车夫在一起，吃饭与黄包车夫在一起吃，晚上就与黄包车夫一起睡在路边的人行道上。由于他积极的革命活动，一九二九年秋，严朴同志在上

海法租界被捕。在被捕的四十余天中，受尽法国帝国主义的酷刑，灌了几次冷水，受了几次电刑、皮鞭、踢打不知其数，但严朴同志始终英勇不屈。由于捕房及国民党反动派不知道被捕的是赫赫有名的严朴，所以经过严朴同志的哥哥给反动派以若干贿赂之后，严朴同志即被释出。但经过这次酷刑之后，严朴同志的健康受了严重的损害。出狱不久，严朴同志调任松江中心县委并任青浦县委书记，年余后，因浙南农民斗争开展，又被调任浙南军委书记，兼红十五军政治委员，参加进攻温州之役。

一九三一年冬，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严朴同志被调到上海领导机关担任掩护机关的工作。在此期内，日夜谨慎小心于自己的工作，直到大批上海领导同志安全转入江西中央苏区之后，严朴同志才转到中央苏区工作。在中央苏区，初任新泉贸易公司工作。一九三三年福建事变时，被派驻福州为苏区商业代表。回苏区后，任国民经济部副部长。后即参加红军长征，在长征途中身体是常病的，可是当党一两次给他找到牲口代步时，他总是把牲口让给别的同志，自己拿着一根拐杖，一步一步地步行。长征到达黔北川南时，因为严朴同志身体病得无法再走了，党决定严朴同志经过川南游击队转送至重庆宜昌，担任组织交通站的工作。不久被上海党派赴苏联学习。一九三八年回国，历任延安中央组织部二科长，西安、重庆

八路军办事处秘书长、二科长等职务。日本投降后，派赴东北工作。此次奉命南下，因病留住医院，久治无效，不幸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五日十四时三十分病逝，享年五十二岁。

严朴同志一生为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忠心耿耿，二十五年如一日。在弥留时，关于个人的事情仅仅说了一句话，而其他的遗嘱全是念念不忘于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解放全中国。临终神志不清时，犹在呼喊打倒帝国主义。严朴同志遗嘱加强党内教育，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叮嘱妻女好好工作和学习。严朴同志谦虚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是始终如一的，临终十小时前尚在遗嘱中作一生工作上个别缺点的自我批评。严朴同志并嘱死后将自己的遗体请病理专家解剖研究。

严朴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很好的党员。他艰苦朴素，只知工作，不讲地位，服从组织的分配，从不在工作上讲价钱。严朴同志的死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损失。当着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就要全部胜利的时候，严朴同志死去了，但他钢铁般的意志，奋斗不屈的革命精神是永存不朽的。

附：

严朴生平

严怀瑾

(一)

严朴，字君实，又名达人。祖籍浙江桐庐，后迁江苏无锡北乡（现无锡县寨门村）。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农历三月初一），出生在一个号称百年五世同堂的封建大地主家庭。这个家庭恪守封建道德规范，得过清朝廷赐予的“惠济桑梓”匾额，立过节孝牌坊，因此曾煊赫过一时。严朴的祖父严紫封治考古学，著有清代考古学传世。

严朴出世时，家道已衰。严朴行三，上有一兄一姐。他三岁丧母，六岁丧父，同年继母亦去世，由姑母抚养。姑丈家也是大地主，对严朴很溺爱。他读书不刻苦，功课不好，但却喜爱结交朋友，也好打抱不平，济困扶危。遇到欠旱少雨的歉收年月，他常帮佃户向族长提出减租，先在家里“动干戈”。族长、叔伯等长辈咒骂他为“逆子”、“妖魔”。他毫不畏惧，更亲笔起草“减租万民禀帖”，鼓动各村租种严义庄^①和他老

^①义庄是中国旧时封建大家族为加强宗法统洽秩序而设立的田庄。

某些豪强地主为攫取族权，控制本族成员，常从搜刮来的大量田产中拨出一些田地作为族产，除祭祀外，又办学堂或资助读书应举，培养本族士子；也给本族的贫困孤寡一些小恩小惠，以笼络人心，博取声誉。其规模较小者，称为仓厅。

家田地的佃农签上姓名或打上手印，递交给乡、图^①，逼使乡董、图董们不得不带着帐房先生到田头查看灾情，斟酌减租。为此，乡董、图董们一提起严朴，便深恶痛绝，咬牙切齿；家族中人更骂他是“吃里爬外的败家精”，以他“不堪继承祖业”为由，将他父亲的一份遗产，交由族长、他的四伯掌管，不许他过问。而北乡各村的佃户们，则对他夸赞不已，称他是“好心肠的三少爷”。

一九一五年冬，严朴与同邑八士桥过瑛（字挺芳）结婚。

科举废除后，山村的落后地主家庭不主张子孙读新学。因此，严朴娶亲之后，他的四伯便不许他再去上学了。但是，他不愿待在封建家庭当少爷，遂到本邑大宋巷小学任教。

(二)

五四运动后，严朴感到必须继续读书。于是他挣脱家庭的约束，辞去小学教师职务，考入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学习。

一九二二年，因反对思想顽固的校长吴梦非及教务长刘质本，同时要求组织学生会，严朴被学校开除。他怕长辈训斥，又怕族中人见笑，不敢回老家，浪迹上海。

第一次奉直战争后，吴佩孚打了胜仗。投机家陈南强想办学致富，于是，请吴佩孚为校董，江亢虎为名誉校长，陈南强自任校长，在上海开办上海专科学校，大登招生广告。海内报名者千余人，投考者七百余人，严朴考入该校。入学以后，大失所望，同学们选派代表到南京请江亢虎到沪，改组全校教职

^①旧时的基层行政组织。清南方各省县以下设乡，乡以下设图。乡有乡董（亦称乡长），图有图董（亦称图长），总管一乡一图之事。

员，驱逐陈南强。学校易名为南方大学，江亢虎任校长。

同年，由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主办的上海大学成立。

严朴仍留南方大学，读国学专修系。他爱慕恽代英、瞿秋白的声名才学，常到上海大学去旁听功课，接受新思想，受到许多教益。他还认识了进步同学宋瘦竹，两人一起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同时精读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文本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办的《劳动界》，思想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一九二三年，严朴由徐伟、方闻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被分配做学生工作和工会工作。

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严朴与无锡旅沪学生安剑平、糜文浩（均为上海大学学生）等，发起组织中国孤星社，聘请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为名誉会长。二月五日，中国孤星社编印的《孤星》旬刊创刊，孙中山为其封面题签。孤星社和《孤星》旬刊的宗旨是：宣传反帝、反封建，介绍新思想，团结进步青年；在无锡、苏州、常州等地发展组织。

一月二十九日，无锡旅沪学生秦邦宪、王启周等十四人发起组织锡社，创办《无锡评论》，与《孤星》旬刊相呼应。

八月十七日，中国孤星社无锡社员召开第一次常会，决定无锡的孤星社社员全体加入锡社。由严朴出资创办的《孤星》旬刊，只办了几期，因经费不能维持，也与《无锡评论》合并。

南方大学校址在沪西，是工人区域。为了与工人取得更好联系，严朴创办了工人夜校，教工人识字，向工人进行启蒙教育，并劝导工人组织工会，团结起来，为保卫自身生存而斗

争。与此同时，他还办平民夜校，招收工人区里弄文盲、工厂工人家属、商店小学徒及失学小青年为学员，教他（她）们认字，并讲解时事。两种学校办得生气勃勃，学员们要求夜校在寒假、暑假也不停课。

一九二五年，由张佐臣、徐伟、方闻介绍，严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二月，上海小纱渡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由于无法忍受日本资本家的残酷苛待而罢工。组织上指派严朴利用这一事件去鼓动杨树浦一带各纱厂工人响应罢工。这次罢工在工人领袖邓中夏和刘华领导下，得到相当胜利。严朴从中也初步懂得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的伟大意义。

四月间，福州发生了军阀政府的陆战队、警察队向手无寸铁的数千学生开枪的流血事件。接着，日本帝国主义演出青岛惨案。严朴对此义愤填膺，忧心忡忡。他经过向恽代英请教，从理论上懂得了什么是“帝国主义”，同时也认清了南方大学校长江亢虎的资产阶级右派面目，江亢虎所标榜的“新社会主义”，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有害说教。

此时，江亢虎还到处发表演说，阻止罢工、罢课。他说：“罢工、罢课这些方法只能偶用于‘五四’，不能经常作为法宝”。严朴等进步同学，遂暗中酝酿逐江运动。这一行动曾狠狠地打击了江亢虎的追随者陈志华、汪剑余等的反动叫嚣。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各校学生为抗议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工人和无理逮捕学生而举行演讲宣传。南方大学的队伍还未出公共租界，在小菜场附近，就遭到预先埋伏在那里的全副武装的英国帝国主义巡捕的阻挠和袭击，严朴等十五人被捕，押送到公共租界巡捕房，当天先后被保释。严朴等四人

是由江亢虎保出的。回到学校，他挨了江亢虎的一顿训斥：“这是第二次到巡捕房保你了！闹风潮搞运动君称行家里手，但学生的本分是读书，……得通知你家长，我江某负不起责任！”此前，严朴曾因募捐援助苏俄饥荒，误进了一白俄住宅。宅主人诬称严朴妨碍治安，把他扭进巡捕房。那一次，也是由江亢虎亲自到巡捕房保出的。

江亢虎果然将严朴两次坐“西牢”的事通知了严府。族长认为他玷辱门庭，丢名败姓，决定把这个“祸殃根”开除出族。严朴对此毫不介意，反而认为从此摆脱了封建家庭的羁绊，可以放开手足闹革命了。

(三)

一九二五年夏天，严朴从南方大学国学专修系毕业。

一九二六年，中共江浙区委决定派大批党团员到各自的家乡开展革命工作。严朴回到故乡无锡。与严朴同到无锡的，还有张佐臣、叶学纯、高教之、干如嫦四个外省同志。

严朴既已出族，无法回寨门老家。他便把同志们安顿在城中严氏试馆^①住了下来。

此时，严朴的族兄严筱兰，受民族资本家荣德生聘为西席，并兼任荣巷大公图书馆^②馆长。严朴通过这位族兄，在大

^①严氏试馆是严义庄公产，在前清科举考试时代，是严姓应试弟子进城住宿的地方。科举废后，严氏试馆改称严氏公寓，凡严姓子弟进城办事，可免费住宿。

^②大公图书馆，地址在无锡荣巷，是民族资本家荣德生的私人图书馆。该馆1914年动工，1916年建成，可藏图书20万卷，有许多质量较高的善本书。荣德生逝世后，大公图书馆及全部藏书都捐赠国家。

公图书馆当了馆员，挣点收入，维持大家生活。

同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共江浙区委决定张佐臣任党的无锡独支书记。其后，通过职工会的帮助，叶学纯等都有了安排。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七日，中共无锡地委成立，张佐臣任地委书记，严朴任地委秘书。

为了更有利地开展无锡地区的革命工作，中共江浙区委决定，要严朴在无锡县城创办一所学校，作为进行革命活动和举行集会的场所，同时掩护外地在无锡做革命工作的同志。

创办学校首先要筹集经费，组织上要严朴全权负责。经过多方努力，校址选在无锡南门上塘街十三号邹宅，但得先付“顶首”^①大洋一千元，全部费用合计至少得四五千大洋。严朴与四伯父的书童阿培商量，从四伯父钱柜中偷出严朴父亲名下的一部分田单，抵押了大洋四千元，满足了办学的需要。事后，他又资助阿培潜回祖籍营口。

七月十三日，无锡各报刊刊登出私立江苏中学招生广告。学校先只招初一学生，设甲乙两班；后增办高小，招收五、六年级学生；教员大部分是严朴南方大学的同学。这些教员中，有的对革命并不关心，当他们知道校长严朴是国民党员时，更是忐忑不安。因为军阀孙传芳曾通令各校教职员和学生：“不准加入任何党系，已加入者即日脱离，如有阳奉阴违，一经查出，教职员辞退，学生除名。”这件事对于他们是谈虎色变的。严朴心中明白，凡召开党的有关会议，总是小心提防着他们。寒假时，严朴辞退了这些人，又从他领导的无锡

^①顶首即押租。

教员联合会中挑选了一些志同道合的进步同仁到学校义务授课，每月只发车马费不给薪水。张佐臣也被公开聘请为教员。这样，学校教职员都是协力同心的战友，对外只需提防孙传芳的暗探，对内却无需操那份闲心了。

学校发挥了她预期的良好作用。无锡县委许多重要会议都在这里召开，在这里做出决定，见之行动；秘密的工会、农会在这里组成，还在教师联合会里发展了党，团员……。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学校被国民党反动派抄封。

(四)

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无锡总工会秘密成立，共产党员秦起为委员长，张中元为副委员长，张佐臣、严朴、周愚人等四十三人为委员。三月四日，无锡县农民协会秘密成立，安友石为主席，杭杲人（后变节）、严寿鹤、陈荣轩、张俊、钱子祥等为委员。三月二十一日，北伐军进入无锡。次日，十万群众在火车站广场举行盛大的军民联欢会。随即，无锡县总工会在城中崇安寺大雄宝殿公开办公，山门口挂起大幅横标，斗大的红字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秦起仍为县总工会委员长，严朴为总务部部长。与此同时，县农民协会也在城内八儿巷恒善堂公开办公。

三月底，中共无锡地委通过国民党无锡县党部，领导五千余人在景云市游行示威，要求惩办土豪劣绅。三月三十日，西北乡万安市附近几十个村镇的农民三千余人，荷锄执耙要求斗争占有土地三万余亩，恶毒赛如虎狼的石塘湾孙氏地主集团，并公审市总董大地主孙霖甫等。县长秦效鲁在群众的强大压力

下，被迫当场提笔，写了“立提孙霖甫、孙屏东、孙济如、孙辰初到署，交付民众公判”的条谕。

形势十分令人振奋。党组织派党团员纷纷下乡发动农民起来与封建地主斗争，口号是：“打倒土豪劣绅！减租减息！没收大斗、大斛、大秤！开仓放赈解决贫苦佃户春荒！”

广大被压迫的贫苦农民行动起来了。他们在四乡逮捕土豪劣绅，送县政府究办。

严朴率领一群农会干部，随身带着标准秤，标准斛，还有大小不等的木块和轻重不同的秤锤及铁环……，回到老家寨门。总甲在前村后巷边敲锣边喊道：“三少爷回老家了！佃户们到寨门新街茶馆店开会啰，有斗的带斗，有秤的带秤，严义庄收租要改用新斗新秤啦！”

一时间，茶馆挤得水泄不通。严朴站在板凳上讲话：“乡亲们！我回来是革大秤、大斗、大斛的命！革命先要从我严义庄、严拥书堂革起！”“地主的大斛是蝎，大秤是蛇，它们千百年来吸干了佃户们的鲜血！”“今后佃户交租一律用新秤、新斗、新斛；义庄、仓厅若仍用老秤、老斗，便是犯了农民协会的王法；对那些犯王法的老财，农友们可以毫不留情打倒他们！”

经过当场校正，凡不合标准的大斗、大斛，都在斗底、斛底钉上大小不等的木块。严朴带着“验讫”字样的烙铁，请铁匠铺老师傅在炉火里烧得通红，凡是合乎标准的斗、斛，当众都烙下印记。严朴还宣布：“严义庄、严拥书堂及各镇、各村地主仓厅收租，一律用铁纽秤，老式的麻绳纽秤发‘呆’，每箩稻多一二斤毫不在乎，今后一律废止，不得用，用了犯法。义庄、仓厅用的老秤全部上缴农会。”话毕，农家各自校正，

该换秤锤的挑着换，该加铁环的请铁匠铺帮着焊接。

一石激起千层浪。严义庄开了头，其他乡里的农民协会敢于理直气壮出来惩治黑心财主的大斗、大斛、大秤了。无锡城内农民协会里关满了豪绅恶霸，农会大院里大秤堆积如山。

此时，蒋介石正阴谋背叛革命。他到处雇用工贼、流氓，破坏工农运动，屠杀共产党人。四月八日，驻无锡的北伐军军长赖世璜，公开发出“制止暴动”的反动布告，分别张贴在总工会、县农协会门口。

严朴预感到时局将有突然变化，而要应付不测，手头必须备有一笔现款。他以为老家寨门离城远，消息闭塞，族长四伯已被农民的革命行动吓得心惊胆战，六神无主。此刻正是回家索款的最好时机。于是，他连夜赶回老家，要四伯退还他父亲的遗产——田单和地契，并提出要变卖祖产。四伯和其他长辈一致反对，连办江苏中学时家里丢失田单的老帐也翻腾出来。他们死死咬住一条家规不放：“十五世祖留下的貽燕堂祖产，只能添进，不能卖出，后辈不肖要卖祖产，只能在五服之内易主，卖给外姓万万不能。”还说：“卖掉祖产，你妻儿老小要吃要喝哪来？”经严朴力争，最后允许他将十六亩四分近基好田按八折市价，转卖给他的三伯，得现款二千五百元。

严朴回城后得上海方面确信，知道无锡国民党右派头子邹广恒到上海，和吴稚晖、缪斌（第一军党代表）、杨翰西（无锡大地主、大资本家；因害怕农民斗争逃避在上海租界）一起，积极准备反共。杨翰西当场拿出八千元支票一张交与邹广恒，作为反共经费，并说：“如赖世璜的力量不够，无锡一千

名商团都有枪枝弹药，可以协助。”

四月九日，以秦效鲁为首的无锡县政府，把各地农民协会送交县府究办的土豪劣绅全部释放，并在县城庇护起来。这批土豪劣绅马上投入赖世璜怀抱，沆瀣一气，与革命工农为敌。

严朴随即召开江苏中学教职员工集会，讲解时局的严重性，说明学校可能会遭毒手。他还给一部分穷苦的教职员工发了遣散费或分给部分校产，叮嘱他们：“时局如进一步恶化，立即离校疏散，走得越远越好，不要吃眼前亏。”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十四日深夜，无锡反动头子邹广恒，按照蒋介石、吴稚晖事先策划，伙同米业商团头子杨祖钰等，率领商团武装和一批流氓，伪装工人，暗藏手枪、手榴弹，突然攻击无锡县总工会。赖世璜部积极配合，把无锡城团团围住，封锁各城门，并派兵设哨断绝城乡水陆交通，使所有城外各工厂救援队无法入城。

秦起、严朴等率领工人纠察队员留守崇安寺大雄宝殿，切断电源，依仗大雄宝殿坚实山门及丈五高墙奋勇抵抗。敌人曾两次冲开山门，均被工人纠察队拚命顶住。敌人改变战法，登上消防队长梯，从墙头向大雄宝殿山门内乱掷手榴弹。纠察队员们只有木棍，被炸得骨肉横飞，血流满地，山门终被敌人冲开。秦起等四同志头部受伤，被蜂拥而入的敌兵逮捕。严朴炸伤左脚，仍沉着应战，率领剩余的纠察队员在暗中转入后院，架人梯次第爬上院墙，翻身跳进一条陋巷，幸得一户穷人热情相助，大家洗脸换去血衣转入无锡公园，再由园林工人搭救，始分别脱险。

与无锡总工会同时被袭击并捣毁的，还有《民国日报》^①馆。第二天清晨，反革命分子又捣毁无锡县农民协会，并抄封了私立江苏中学。

白色恐怖笼罩无锡。无锡地区的党组织和工会、农会都被迫转入地下。严朴回到无锡东北乡群众基础最好的白丹山地区。

为营救秦起，他曾转恳许彝庭大律师，向他的老同学，也是严府老佃户的儿子缪斌，赠送变卖祖产所得的大洋一千元。但是，白花花银子成了“肉包子打狗”，秦起还是被反动派秘密处死了。严朴闻讯，十分悲痛，特遣其族侄严振山进城，帮助秦家料理后事并抚恤秦起的老母。

四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无锡县市党部举行联席会议，成立清党委员会，开始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规模公开屠杀和镇压。但人民没有被吓倒，地下烈火仍在四乡燃烧，革命工农准备积蓄力量，东山再起。

(五)

党的“八七”会议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

^①1927年春的无锡《民国日报》，名义上由国民党无锡县党部发行，实际上是在中共无锡县委领导下的一张党的外围报纸，社长冯耕庸，总编辑章子文。在孙传芳驻锡部队未撤走前，以四开篇幅秘密发行；北伐军到达无锡后公开发行，每日出对开版一张，大张旗鼓地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印销数量由数百猛增到七千份，除销无锡外，遍及邻县宜兴、溧阳、江阴、常熟。

时的最主要任务。

十月中旬，中共无锡县委在安镇钱梗上召开秋收暴动的筹备会议，省委特派员夏霖、严朴、杭杲人、乔心泉、孙选、高文华等出席。会上，夏霖传达了中央和省委关于秋收起义的决定及其重要意义。由于认识不一，会议争论很激烈，最后决定：城内工人积极配合乡下农民，举行秋收起义，起义日期待定。会后不久，王飞（省委派到无锡搞工人运动的）及无锡工会的负责干部共六人，被敌人逮捕。

王飞是江阴人，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叛党，出卖了工人秘密组织及秋收起义计划。于是，大批国民党军队开往农村，封锁了交通要道、重要集镇和水陆码头，并四出派兵抓人。安镇附近百余村庄，几乎村村有人被抓。党的各区委之间的联系已无法打通。

在这关键时刻，城区县委机关连续遭到破坏。十月二十三日，县委书记王津民（即孙选、孙逊群）为研究部署秋收起义事宜，在无锡北门外惠农桥七十三号（怡泰翻砂厂，县委和地下工会机关）楼上召集秘密会议，不幸被敌发觉，于深夜被捕。接着，县委工人部部长张杏春，县农民协会组织委员严寿鹤、蔡大圻，交通员邵杏泉等负责秋收起义的领导人，都相继被捕；城区地下工会也遭到严重破坏，使起义的准备工作遭到意外打击，增加了困难。

十一月一日，在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宜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暴动。四日，中共江苏省委农委书记王若飞到无锡检查农民秋收暴动的准备工作，并派省委委员夏霖常驻无锡，代表省委领导无锡秋收起义。

反动派由于宜兴起义，加强了对无锡的防务。赖世璜的正

规军和县公安局、商团、水巡队、警备队等三千人以上的反动武装以及大地主组织的“自卫团”，凶神恶煞般地控制着城乡各地。

然而，秋收暴动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严朴、杭杲人在东北乡与农协会骨干分子分头动员农民组织革命军，动员小学教员、店员写传单标语，动员铁匠日夜赶制梭镖、大刀；动员妇女缝制红旗、红领带、红袖套，还草拟了《农民革命军政治委员会布告》、《无锡农民革命军布告》、《农民革命委员会告民众书》和《农民革命军宣言》等文件。严朴还想尽千方百计，用现大洋高价向商团、水巡队和国民党开小差的下级军官秘密购买了一些手枪和子弹。

令人兴奋的是群众的斗志极高，连贫农家的老太太都行动起来，假扮做娶媳妇、嫁女儿，纷纷去镇上购买彩色纸和红绸、红布，把东北乡各镇京货店、纸马店的红绸、红布及彩纸抢购一空。但由于参加起义的人多，所需红绸、红布，还远远不够。

因为起义之日要求戚墅堰电厂停止供给无锡县城电源的事还未最后谈妥；因为有六枝盒子炮和三百发子弹的货款必须预付；加上要购买所缺红绸、红布，严朴决定乔装打扮，冒充严拥书堂的“四老爷”进城。城里最大的懋纶绸布庄是他嫂子娘家开的，严氏公寓早安排下接应的人。进城那天，严朴身边配备得力助手扮做帐房、书童、船夫、脚夫，加上那阔绰的大灯船和船头悬挂的“拥书堂严府”的大红灯笼，使巡游在运河里的水巡队侧目而视。严朴就这样深入虎穴，干净利索地完成了三件任务，又平安返回东北乡。

十一月九日是无锡农民举行秋收起义的日子。那天上午，

青、壮年农协会会员数千人，手持锄、耙、大刀、梭镖、鸟枪、火铳、勾镰枪……集合在南石园举行誓师大会，当场推举严朴为农民委员会委员长，杭杲人为农民革命军总司令，并决定以白丹山为农民革命委员会公署，安镇为农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大会上宣布了临时军律、军法，发给各队红旗，所有参加暴动者均系红领带，凡大刀、梭镖、铜锣、火铳上都系红绸，队长及各级领导者还外加红套袖。

入夜，皓月当空，澄天如海。手持各样武器的农民分五路行动，陆续向指定地点集合。晚九时整，手枪声、火铳声划破静寂，总攻开始了！安镇周围四面八方火把无数，农民军鸣锣开道，并点燃起空火油箱里放的百子鞭炮助阵，向着封建大地主的义庄、仓厅、院宅进攻，不到两小时便攻下了安镇、秦水渠、东湖塘、乔家巷等十三个村镇。农民军镇压了恶霸、反共地痞，焚毁了秦氏义庄、乔氏仓厅；土豪、恶霸家的田单、地契、租簿、帐本、算盘、秤、斗、斛……都在烈火中化为灰烬。义庄、仓厅的积谷存粮，分发给佃农。

这次暴动原来报名参加的农民约一万三千余人，总进攻开始以后，没有报名的人也纷纷拿起锄头、铁耙赶来参加，实际人数不下两万人。

起义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未能攻克无锡县城。

十一月十日开始，反动派进行疯狂报复与镇压。从宜兴调来的一团兵力和大部分水巡队进驻东亭、安镇、严家桥等六个重镇，在鸿山架设了炮位。敌人在农村滥杀、滥捕，放火烧房、烧农具，宰杀猪狗牛羊，搞得鸡犬不宁；在城区实行戒严，敲门打户到处搜捕共产党人、革命群众及同情党的知识分子。十一日，夏霖和共青团无锡县委书记乔沁泉（张子庭）在

城内堵家弄一号不幸被捕。十三日，夏霖、王津民（孙选）、张杏春、乔沁泉、严寿鹤、蔡大沂、邵杏泉等七同志，在无锡南校场被杀害。残忍成性的反动派把废止已久的斩首酷刑恢复，特地将清朝末年的刽子手找来行刑。敌人还做了七个铁丝笼，将七烈士的头颅在东、南、西、北四城及光复门等处“示众”三天。

面对这种严重局面，党不得不发出暂时隐蔽的指令。

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二八年夏，环境最为恶劣。敌人由“杀一儆百”的毒辣手段，改为“擒贼先擒王”的新花招。严朴的处境极其艰难。反动派为了捉住严朴，许下重金悬赏，无锡县政府的赏格是五千大洋，江苏省政府又加了三千，变城八千大洋，连交一张严朴的相片，也给赏一百至二百元。当局用“画容图形”的办法，到处张贴告示，并严令图、甲限期缉拿。然而，严朴在贫苦农民中有很高的威望，他们舍着身家性命保护他，把他藏匿在枯井、荒坟、古庙……。任凭反动军警对他们怎样捆绑吊打，直至烧毁房屋，也没有一个人吐露丝毫真情。

一九二八年早春，严朴的家产全部被没收，住房被查封。

四月下旬，中共澄锡虞三县联席会议在常熟虞山联珠洞召开。出席的除严朴外，还有无锡代表杭果人，江阴代表茅学勤、陈叔璇，常熟代表朱文元、石楚才等。会议就三县武装斗争相互配合问题进行了讨论。

不久，接省委廖慕群（何梦雄）来信，通知严朴到上海。严朴遂离开家乡无锡。六月上旬，他随何叔衡一起由上海取道大连、哈尔滨，然后出国去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六)

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结束后，严朴奉党的指示，在莫斯科与杨殷等十三人，学习制造土手榴弹及烈性爆炸药的配方和技术。同年秋，他返回上海。

十月初，中共松浦特委成立，辖松江、金山、青浦、奉贤、南汇、川沙、嘉定、崇明、太仓、宝山十县。江苏省委书记大盛（李富春）分配严朴到松浦特委任常委。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严朴、茅学勤、蒋云和奉贤县委刘晓、唐一新等，领导奉贤武装农民数千人举行了庄行暴动。暴动准备期间，严朴亲自制造了许多土手榴弹。暴动那天晚上，佩带有红领带标记的农民，兵分两路，高举中国共产党党旗，依靠几支步枪和土手榴弹、假机枪（空火油箱里装鞭炮），顺利地缴了警察局、商团、保卫团的三十余支长短枪，占领了庄行镇，把从地主、豪绅家里搜出的田单、契约、借据等当众烧毁。几天后，敌人调来大批正规部队镇压，农民武装被迫分散隐蔽，一部分向天目山方向撤退。庄行镇重新被敌人占领，暴动失败。

一九二九夏，党组织派严朴、杭杲人去莫斯科学习。严朴到海参崴以后，医生检查说他“身体不合格”，不允许他去莫斯科。于是，他又折回上海，被分配到党中央第一次开办的上海训练班学习，两月后毕业。严朴要求到最基层工作。罗迈（李维汉）分配他到法南区，在黄包车夫中进行革命活动。

一九二九年秋，由于叛徒告密，严朴在法南区荣仁里二十一号被捕。这里是奉贤县委秘密接头的地点，表面上是个鞋子

作坊。在被捕的四十余天中，他受尽法帝国主义的酷刑：脚镣，手铐，三脚吊，老虎凳，电刑，水刑……几次死而复苏。铮铮铁骨，顽强不屈。

法帝国主义在严朴身上逼不出任何东西，最后以共产党嫌疑犯判决：找保释放，永远驱逐出法租界。严朴的哥哥严启明送贿赂五百大洋，严朴得释。

出狱后不久，党派严朴到松江，任松江中心县委书记兼青浦县委书记。

同年十一月十八日，严朴出席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在上海龙华路外日晖桥泉漳中学召开，会期九天。大会在李维汉主持下，一致通过以周恩来、徐锡根、赵容（康生）、李维汉、王克全、吴国治、孟济平、徐炳根、陈资平、顾作霖等组成大会主席团，王克全为大会秘书长。李立三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结论》，严朴被选为检察委员。

严朴在松江工作一年有余，因浙南农民斗争开展，又被调任浙南军委书记，兼红十五军政治委员，参加进攻温州之役。

温州之役，得不偿失。严朴随军队退至玉环，整顿训练部队。因患病吐血，不得不回到上海，在白克路宝隆医院求治。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顾顺章叛变以后，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严朴被调到上海领导机关，担任掩护机关的工作。环境险恶，他的工作十分艰苦，仍很好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一九三三年严朴离开上海，转中央苏区工作。

一九三四年十月，严朴抱病参加长征。到达黔北川南时，他已病得无法再向前走。党决定由川南游击队把他转送到重

庆、宜昌，担任组织交通站工作。

一九三五年秋末，严朴与潘汉年由上海乘船赴苏联。到达莫斯科时，正值十月革命节。那天晚上，他第二次见到斯大林（第一次在一九二八年六月）。

不久，严朴进列宁学院第二班学习，改名李达，任党史研究室主任。一九三八年春毕业，同年三月回到延安。

（七）

严朴是党的“七大”代表。一九四五年四月，他在延安出席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抗日战争胜利后，党派他到东北，在哈尔滨工作。

一九四九年早春，党中央从东北调一批军级干部入关，准备解放华东、华中、华南。严朴奉命入关到北平，因旧病复发，不得不住进医院。

周恩来、朱德、陈云、董必武、邓颖超、安子文等对他的病情十分关切。陈云在百忙之中，还嘱咐严朴女儿：“每天都给我写个病情报告，只三五十字，让我知道病情变化。”

今年春天，久旱不雨。重病卧床的严朴，每早睁开眼第一句话总是问：“夜间下了雨没有？”“现在是什么节气？”“天不下雨，棉花能不能下种？今年麦子长势怎样？”每次打针，他都向护士打听针药价钱，打听民食市价。还常叮嘱护士：“天旱不下雨，不要为我多花钱，老百姓收一粒米不容易！”第三次大吐血后，他竟拒绝在他身上用贵重药物，说：“大军要过江，前方打仗要用药。”

在病中，他每天早餐后，便催女儿到街上买报，然后读给

他听。当女儿把无锡解放的消息读给他听的时候，他热泪直流，双唇颤抖着，一字一句叮嘱女儿：“帮我写封信回去，向故乡父老兄弟们致贺致敬！……二十年前，当我在无锡、江阴、常熟、宜兴一带搞革命活动时，他们对我的爱护是无微不至的。”“告诉江南亲爱的老乡们，二十年前和他们一起跟反革命作殊死斗争的老伙伴，快要回去了！”

严朴住院五十五天，医治无效，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五日去世。死后解剖遗体，才知是胰腺癌。按照他的遗嘱，他的内脏由专家制成了标本，供医科大学教学、科研之用，遗体被安葬在北平西郊万安公墓。后经周恩来批准，无锡人民在惠山为严朴建立了衣冠冢。

一九四九年六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云撰写的《严朴同志传略》。六月十二日举行安葬仪式。中共中央送的挽词上写着：“严朴同志忠心耿耿，埋头工作，艰苦朴素，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陈云在墓前讲话，说：“严朴同志参加革命二十五年，被捕过三次，在敌人面前勇敢，在人民面前低头。生活刻苦朴素，做工作从不考虑自己……值得全体党员学习。”林伯渠讲话说：“严朴同志从不计较任何物质条件和待遇，总是十分乐观地热情工作。他严于律己，忠诚待人，十分顾全大局，他是旧知识分子改造了的典型，值得全中国进步的男女老少来学习。”

这样一位把毕生精力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战士，在他病逝二十年后发生的那场给党和国家造成灾难的动乱里，仍然受到恶毒的攻击。一九六八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派出所谓“罪行调查团”，到南京、上海、无锡市、无锡县，威胁利诱当地群众诬陷严朴。但人民是最公正、最无畏的。当所谓

“罪行调查团”来到白丹山时，老农们举起锄头、铁耙向他们冲来，吓得一帮人抱头鼠窜，狼狈而逃。

然而，严朴的墓碑，还是统统被砸碎了。江青一伙还扬言要挖坟、鞭尸、抛骨。严朴的外孙写信，向周恩来、邓颖超求救。——周恩来在重病中接到求救信，十分气愤。他举起笔，颤颤抖抖地写了近三百字的批示：“严朴同志是好党员，好同志，我与他共事二十年，我深知他。……三少爷毁家闹革命，尽人皆知。”

一九七三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北京市委遵照周恩来批示，将严朴遗骨火化，骨灰存八宝山革命公墓。

附 严朴生平主要参考资料：

1. 1922—1928年《申报》、《新闻报》、《锡报》、《新无锡》、无锡《民国日报》。
2. 《人民日报》、《无锡年鉴》、《无锡概览》。
3. 严朴自传、严朴履历表两份（1940年、1942年）。
4. 《江苏革命斗争史纪略》、《江苏农民运动档案史料选编》、《无锡文史资料》、《无锡县志·大事记》等有关记述。
5. 访问吴亮平、匡亚明、管文蔚、徐迈进、严启明、严慰苍、华洪涛、安剑平、蒋欧芬及杭杲人、过望春的记录。
6. 严学熙：《严朴同志革命故事》。

谭震林

胡良志

风雨中成长

谭震林，乳名喜仔，学名喜起。参加革命后，曾用过林俊、梅城、卓林等名。一九〇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出生于湖南攸县珍珠巷谭家老当铺。

谭震林的祖辈原籍江西省太和县。有一年，江西发生特大灾荒，人口成批地迁入湖南攸县，谭氏一家也随之迁来。先住攸县皇图岭谭家村，清乾隆年间移至攸县城内。此后，祖辈各代都是到县公署粮房当职员，管理粮册，靠领取微薄俸薪生活。到他父亲谭端开时，才没有再当职员，而是在一家锌矿当了会计师。由于家庭人口多，生活仍然过得相当拮据。母亲胡润秀，是个秉性善良、勤劳贤淑的家庭妇女。谭震林兄妹八人，他排行第三。

谭震林九岁才开始读私塾。念的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之类的启蒙教材。到他十二岁时，父亲被矿山老板辞退，家境更加困难，不但无力继续供他们兄妹读书，而且不得不将谭家老当铺的屋出租，全家搬到城南河边水月楼老姑母家借居。为了找生活的出路，父母忍痛把谭震林的五弟

和七弟送给了人家，让他和两个哥哥及妹妹去当帮工、学徒。大哥谭福元进一家香店学做线香的手艺，二哥谭寿林进一家豆豉坊学做豆豉，妹妹谭银娥去卖水烟，他自己进了攸县“太成堂”古书铺当学徒。

“太成堂”古书铺，只有很狭小的门面，两层楼的瓦房，上下只有两间，楼上放货，楼下是门市兼作坊，摆了些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还有些纸、墨、笔、砚。谭震林由父亲带着进了这家古书铺，给穿长袍的老板磕了头，拜了师傅。就这样，他开始了学徒生活。

学徒生活低贱，劳作繁重。每天早上，老板还没起床，谭震林就要同另外两个学徒把屋子打扫干净，抹好桌子，刷净痰盂。老板起床后，他们三人忙着替老板装烟袋，打洗脸水，忙着替老板娘烧饭，洗衣服，抱孩子。老板或老板娘稍不顺心，他们就要挨打受骂。头两年什么也不能学，只是替老板家做义务工，老板除每天管饭，吃点青菜豆腐，加上每月四两肉外，一个钱的报酬也不给。两年后，当谭震林开始学着打算盘、学着打那敬鬼神的纸钱的时候，老板病死了，店铺也关门了。他只好背着行李回家。在这两年中，他虽然没有学到什么手艺，可学会了照管自己的生活，初步养成了勤劳的习惯。

不久，父母又托人把谭震林介绍到离家九十里的茶陵县城，在“徐文元”书店里学手艺。在这里，他除了照旧做着抹桌子、扫地、烧饭、抱孩子等杂事外，先后学会了木板印刷技术和装订技术。那时候，想要学点手艺的确不容易，主要不是靠别人教，而是靠自己看，自己做，自己从做中摸索和积累经验。书店里每个学徒每天的劳作都是很繁重。但不论累得怎样腰酸手痛，每天拿着墨刷子，坐在木板面前，必须印完三千张

纸，否则老板是不会让休息的。装订工作也很重，一把切纸刀就有四五斤，拿起来切纸，要求又快又齐又光，做起来很累人。谭震林就是在这样繁重的体力劳动中，逐步锻炼成为一个比较熟练的印刷徒工。四年后，他“出师”了，老板留他在书店当工人，工资很少，第一年每一个月只能拿一吊钱，可总比过去不拿钱要强，因此心里很高兴。第二年，每个月拿到两吊钱，以后逐渐增多，拿到了四吊钱一个月，这已是很不错的了。那时，有的人在外面做工做了一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最多才不过拿八块钱，除自己生活以外，很难养活全家老小。谭震林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在旧社会中，求得职业是不容易的，想养活一家老小更不容易。”^①

“徐文元”书店当时在茶陵是一家比较大的书店，藏书也较多。谭震林过去常常为自己书念得太少而苦恼，现在面前有这么多的书，恨不得一下子把它全吃进自己的肚里去。他白天在店里干活，晚上就偷偷从书架上把书拿下来，在煤油灯下贪婪地读到深夜，第二天一早，又悄悄地把书放回原书架上，如没有看完，第二天晚上再接着看。他看书的时候，十分小心，保持书本的清洁，不使书发生一点折皱损伤，以免老板发觉。他用这种办法不间断地读完了《水浒》、《三国演义》、《七侠五义》、《西游记》、《洪秀全传》等大量书籍，学到了许多文学和历史知识，开阔了眼界，晓得了农民是怎样一次又一次地反抗统治者，豪侠义士是怎样劫富济贫、锄奸灭害许多故事。他尤其推崇洪秀全敢于推翻清王朝的壮举，曾幼稚地想，如果现在也有个洪秀全的人物出来该多好啊！就可以领着穷人把这个万恶的社会也翻过底朝天。

^① 《学徒生活回忆》，载1957年5月10日《人民日报》。

谭震林常被书店老板派出去收帐。当时附近几个县土匪猖獗，经常发生拦路抢劫的事情。因此，他每次出去收帐时，总要和隔壁邮局的一个邮差结伴行走。因为这位邮差曾告诉他，在路上只要按照他的吩咐办，叫坐就坐，叫走则走，无论遇到什么人，由他招呼，就能保证沿途的安全。后来他才知道，这个邮差为了生活，同沿途的土匪都有联系。这件事使他感到那动乱社会的复杂关系。

湖南农村许多地方可以造纸。谭震林经常替老板到乡下去买纸，有机会接触造纸工人。他亲眼看到他们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吃糠咽菜的悲惨生活，每个人都有一部苦难的家史，这就加深了他对旧社会的憎恨，也初步产生了怎样铲除这种社会不平的念头。

有一次，一家书店的老板娘动手打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这个老工人在店里几十年了，店老板还是他从小抱着长大的。这件事在店员中引起公愤，店员们联合起来向老板和老板娘进行斗争，抗议他们虐待工人，一连罢工了三天工，最后迫使老板和老板娘向老工人赔礼。这件事使谭震林受到启发，只要工人团结起来，老板也是不敢随便欺负工人的。

一九二三年，谭震林曾被路过茶陵的湘军第五军陈嘉佑的部队抓去当使，替他们挑了好几个月的担子。这段经历，使他有幸看到旧军队里的许多腐败现象：如军官欺压打骂士兵，奸淫妇女，抢夺老百姓的财物，以及当官的之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更增加了他对黑暗社会的认识，因而改造社会的思想也日益强烈。

一九二五年冬，中国共产党湖南区委派遣潘鹏举到攸县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经过多方考察，首批发展余来、谭志

道、刘谭豪三人入党，并派他们到长沙一个党训班学习，然后回攸县积极从事党的秘密活动，在从事工农运动的优秀青年中发展党员。这时，谭震林正在刻字店里搞印刷、装订记录本和帐本，挣钱糊口。刻字店的左对面是所小学，右对面是个衙门，常有一些文告和本子要印刷和装订。因此，他也常到小学校去走走，逐渐结识了余来。两人志趣相投，经常在一起谈古论今。他尤其喜欢听余来讲中国社会腐败的状况，讲孙中山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而后来怎样被袁世凯等人窃取了胜利果实，讲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讲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讲中国青年一代的责任。他认真地阅读着余来拿给他的《共产主义ABC》、《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有一次，他问余来说：干革命就我们两个行吗？余来回答说：当然不行！现在干革命的人多得很。不但小学有，中学也有，工人中有，农民中也有，中国有，外国也有。这样多的人干革命，难道还怕不成功吗^①？他听后觉得心里热乎乎的，下决心跟着共产党，为穷苦人打天下。从此，他根据党的部署，积极从事书纸行业工人的串连、组织工作，把这部分工人逐步集合到党的旗帜之下，为攸县尔后革命的发展打下了群众基础^②。

一九二六年六月初，北伐军叶挺独立团在湖南涿田一带击溃了粤军谢文炳、唐福山部队后，乘胜追击，准备进攻攸县。这时，连接涑水两岸的浮桥，已被驻攸县地区的吴佩孚的部队

① 《谭震林的回忆》录，谭震林生前多次回顾历史的谈话记录，现存葛慧敏处。

② 《攸县史志通讯》第3期，攸县党史办公室1983年10月15日编。

拆掉，企图阻止叶挺独立团进攻。在攸县党组织领导之下，谭震林组织群众，积极参与带路和架浮桥，配合北伐军的行动，使叶挺独立团顺利地攻占了攸县。参加这次战斗的周士弟后来回忆说：“此次战斗，有农民在敌人后面袭击敌人，与独立团配合作战，是取得战斗胜利的因素之一。”“这一带工人、农民、学生运动都有基础，我们有了依靠。”^①这次战斗使谭震林更加受到了锻炼。他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经余来介绍，这年十月十二日，他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②，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第一次大革命的前期和中期，国共合作建立了统一战线，党的多数活动是以国民党的名义进行的。为了工作之便，党组织允许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因此，中共攸县支部帮助国民党成立了攸县县党部，余来当选为国民党攸县县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委，谭震林任县总工会干事、工人纠察队队长^③。当时，行使县级政权最高权力机关为公法团体联席会议。各公法团体的领导人多为共产党员或国民党左派，所以县长召集联席会议时，中共攸县支部提出的主张和方案，联席会议往往一致通过，这有利于党领导攸县人民进行捍卫人民权益的斗争。一九二六年冬，攸县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军阀何键派人在攸县县城买了一批粮食，准备运到湖北去，并派一名排长带领一个班来押运。县城群众坚决反对把粮食运走。他们说，你们把粮食运走，我们吃饭怎么办啊！要求把粮食留下。负责押运的排长逞凶开枪，打死了两名群众。这一下激怒了更多的群众，大家

① 《军队政治工作史资料》第1册，解放军政治学院1983年编。

②③ 《谭震林简历表》，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把这个班团团围了起来，缴了他们的械，排长吓得跑回县政府里去躲起来。于是群众又把县政府包围起来，要求交出肇事的凶手。谭震林和其他几个人在党支部的授意下，作为群众代表去见县长，对县长提出四点要求：第一，粮食不能运走。粮食如果运走，你县长也休想当下去。第二，被打死的人要隆重安葬。要求按照文庙只有状元来才开大门的规矩，把死者当状元对待，从文庙正门抬进去，把棺材停在那里。第三，县长要亲自给被害者披麻带孝。第四，给被害者家属发抚恤金。如果不答应以上条件就不撤走^①。在群众压力下，在县公法团体大多数领导人的支持下，县长只好答应了这些条件。第二件事，是在北伐战争的胜利鼓舞下，东乡农民在斗争土豪劣绅的时候打死了一个恶霸，这怎么处理呢？农民协会就派了五个农民进城到县政府去自首，说这恶霸是他们打死的。县政府把这五个农民关了起来。党支部知道这件事后，就通过农民协会、总工会动员了一万多人把县政府包围起来，派谭震林等人为代表去跟县长进行说理斗争。谭震林对县长说，打倒土豪劣绅是国民党代表大会宣布的，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嘱，你县政府为什么不遵守？农民打死的是一个地主，而且又是一个恶霸，这个恶霸平时不知害死了多少人，他对人民欠下的血债难道还少吗？打死他一个，同他欠下的血债相比，是偿还不了的。今天你把这五个人都关了起来是不公道的。把他们关起来，他们家里生产怎么办？要不要种地？吃饭怎么办？他警告县长说，现在不同过去了，现在是北伐时期，如果你要坚决与农民作对，农民可以把你推翻^②。县长无言可答，又怕群众造他的反，只好把这五个

^{①②} 《谭震林的回忆》。

人放了。这两次斗争，使谭震林深深感觉到在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所显示的伟大力量。

第一个红色政权的工农兵政府主席

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使攸县同全省各地一样，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时，谭震林正带领一个宣传队在北乡（横山、坪阳庙、丫家桥一带）进行第二期北伐的宣传。听说事变发生后，他立即率队返回攸县。但县城已被反动军队占领，无法进城，上级领导也联系不上，他只好将宣传队解散，只身跑到长沙找党组织，没接上关系，又去武汉，仍未找到熟人。他从武汉回到攸县，到县郊一打听，敌人搜捕正紧，无法立足，于是转到茶陵，试探性地进了“徐文元”书店。徐老板只知道他是做工会工作的，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还讲点情义，让他留下来继续做工，但规定两条，一是不能再做工会工作；二是只能在后面干印刷装订的活，不要在前面柜台露面。为了防止县衙门查夜，晚上还要他睡在纸堆里面，隐蔽起来。

一九二七年九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为了扩大工农革命军的政治影响，并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于十月上旬，派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政治部主任宛希先，率领二、三连，从宁冈古城出发，前往湘东酃县、安仁、茶陵一带活动。工农革命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进茶陵县城，杀了县长，砸开监狱，救出了八十多名被押的农运、工运干部和无辜群众，并开仓赈济群众。当天，工农革命军就撤出茶陵，临走的时候，张贴了革命标语、布告，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布告的署名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

郭亮”。其实，郭亮没有任团长，也不在这支部队里，因为他在群众中影响比较大，毛泽东指示用他的名字发布告。

几个月来，谭震林因找不到党，陷于彷徨苦闷之中。这天，他再也捺不住了，出门看个究竟，可惜迟了一步，工农革命军已经渡过涑水开走了。不过，当他看到布告上署的“郭亮”这个名字时，惊讶得几乎要叫出声来。他知道，郭亮是共产党员、湖南省工会的委员长，坚强的革命者。“郭亮”这个名字的出现，对他来说，犹如在漫长的黑夜里看到一盏明灯。当天晚上，他辗转不能入睡，心想：“郭亮还在，也就是党还在，党的军队还在，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说‘共产党已经被斩尽杀绝’，这不过是骗人的鬼话。”他相信党的军队有一天还要打到茶陵来的，他准备继续投入革命战斗。

这一天终于来了！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指示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团部率领第一营又一次打进茶陵城，谭震林一看自己的队伍来了，心里异常激动，马上去找宛希先接头，问自己该怎么办？宛希先对他说：你是工人嘛，先把工会搞起来①！

谭震林按照宛希先的吩咐，在群众中公开了自己的身分。他凭借人熟地熟的有利条件，积极认真地进行串连，不几天就集拢了一批工运骨干，很快就筹备成立了茶陵县总工会，大家公推他担任茶陵县总工会主席。总工会设在江西会馆。不久，茶陵县城的店员工会、学徒工会、缝纫工会、铁业工会、磨（豆腐）工会等，都在县总工会的指导下相继成立。他还与正在山区的中共茶陵县委取得联系，敦请县委搬进城，着手恢复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工作。

①胡涤非：《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建立前后》，载《井冈山的武装割据》，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

在县总工会成立的同时，在一团团长陈皓、副团长韩昌剑等人的操纵下，成立了一个“县人民委员会”，并从部队指派一个叫谭梓生的人当县长。这个县政府成立后，只是在旧县公署的衙门前挂起了一块“人民委员会”的新牌子，但仍沿袭旧政权的一套办事制度，如新县长由大队人马簇拥着吹吹打打到县署走马上任；每天依旧升堂审案，收税催粮，旧官吏仍然在县衙门进进出出。有一天，中瑶乡农民捉住转移钱财的劣绅陈老三，押送到“县人民委员会”，正碰上醉醺醺的陈皓从里面出来。他喝骂群众不讲规矩，不成体统，斥责战士把门不严，强迫农民退下台阶，然后叫人打鼓升堂。陈皓坐在案桌前的太师椅上，开口就问：“谁是主告？谁是被告？”农民群众听不懂这话，半天回答不上。而劣绅陈老三却抢着申诉：“鄙人只有田产一百九十亩，他们要打我的土豪，望大人开恩。”陈皓拿起惊堂木在案桌上一拍，厉声说“一百九十亩，没上两百，是小地主嘛。小地主抓来干什么！不能动小地主。动了他们，他们会完全倒向大地主一边去。”随即起身拂袖而去。农民们个个气鼓鼓的，把陈老三拖了就走。大伙边走边说：“这个政府换汤不换药，我们找宛希先去。”①宛希先肯定了他们揪斗陈老三是革命行动，要求制裁陈老三也是对的，嘱咐他们可以监押陈老三，开展揭发和斗争。农民们十分满意地回乡了。

宛希先写了一封信，把上述情况汇报给毛泽东，请示今后办法。毛泽东在回信中说，由部队派县长是不对的。不能按国民党那一套办。指示立即撤销县长制，充分发动群众，建立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工农兵政府。毛泽东还说，靠商会派款

①胡涤非：《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建立前后》。

也是不对的，要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要保护商店、保护邮局、保护学校、保护医院，等等。

宛希先接信后立即召集茶陵县委、总工会和农会负责人开会，宣读毛泽东的来信，组织大家讨论成立工农兵政府的问题。经过协商，各个组织都选出了自己的代表：工人代表谭震林，农民代表李炳荣，士兵代表陈士渠。当讨论到政府主席人选时，三位代表你推我，我推你。宛希先见谦让不下，便对谭震林说：“不要推了。我看你既然是工人代表，你就来当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吧！”^①宛希先一提议，大伙都表示赞同，这样就确定谭震林为政府的主要领导人。

十一月二十八日，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在洣江书院操坪召开。谭震林在大会上讲话，公布了由三名工、农、兵代表签署的《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布告》，号召全县人民恢复农会、工会，举行暴动，打倒土豪劣绅，报仇雪恨。

工农兵政府成立后，谭震林同政府的其他委员一起商议，决定立即派出政府人员、工会会员和士兵组成的工作队下乡，广泛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在工作队的指导下，乡村各地掀起了加入农会、打土豪分田地的高潮。在中瑶，乡农会会员由几十人猛增到两百人，并建立了赤卫队、妇女协会、儿童团；在船舫、尹宁万、谭家望把原先的乡赤卫队发展成区赤卫队，带领农民会员打了土豪谭二如、谭克昌、谭保英等；马江、湖口、界首、高陇、秩堂、严尧等地群众的革命热情，也都十分高涨。不久，在全县范围内建立了八个区政权。

^①胡涤非：《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建立前后》。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后不几天，毛泽东指示宛希先送给茶陵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五支枪，建立和发展茶陵地方武装。谭震林等立即组织一支纠察队，给每个队员发一个袖章，除正常工作外，夜里都集中起来，负责联络和维护城里的秩序。在纠察队的带动下，乡村里的赤卫队、暴动队纷纷建立和发展起来；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也相继建立。工农革命军一面打仗消灭敌人；一面打土豪筹款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使得茶陵遍地梭镖，漫天红旗，形成了比大革命时更为高涨的革命热潮。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建立，使敌人恨之入骨，扬言要把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扼杀掉。在大地主谭绍绪、罗兆鹏的策划下，在高陇纠合地主武装三百余人枪，由腰陂向茶陵县城进发，集结在茶陵对河定宁寺的山上。谭震林立即组织工人纠察队、赤卫大队，紧密配合工农革命军消灭敌人。他指挥纠察队、赤卫队一部埋伏在定宁寺敌人的右翼，一部涉过高陇河，迂回敌人左翼。等正面工农革命军与敌人打响后，埋伏在左、右两翼的纠察队、赤卫队突然杀出，毙敌二十余名，缴获了二十多支步枪，粉碎了敌人第一次进攻。战后，工农兵政府在涑江书院召开了盛大的祝捷大会，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壮大革命声势。

这支反动地主武装失败后，残敌又联合湘东保安团团团长罗定，兵分两路再次进攻茶陵。谭震林立即组织工人纠察队、赤卫大队，配合工农革命军奋起抗敌，先是集中兵力击溃谭绍绪、罗兆鹏的地主武装，然后把主力扎在营盘岭上，居高临下，锁住了洪沙庙的隘口，控制了罗定从攸县进攻茶陵的要道。谭震林指挥各乡赶来支援的农民自卫军，在四处山头布置疑兵，又用

杉树做“炮”，当敌人兵临茶陵时，山头四处号声响起，我军一齐出击，给敌人一个猛袭，终于战败了顽敌，杀敌百余名，缴枪百余支。工农兵政府召开的第二次祝捷大会更加热烈，各乡送来了许多慰劳品，犒赏参战人员。两次战斗的胜利，有力地保卫了新生的革命政权。

茶陵县建立第一个工农兵政府的实践，一方面为把工农革命军建设成为一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提供了经验。（如十二月底毛泽东在耒市总结茶陵战斗经验时，提出的革命军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三大任务）；另一方面也为如何建立工农兵革命政权提供了经验。所以后来遂川、永新等县工农兵政府的建立都搞得比较顺利和成功。

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而积极工作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下旬，湘桂军阀混战结束，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扑灭茶陵的革命火焰，派湘敌第八军吴尚一个加强团包围了茶陵县。工农革命军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谭震林除调茶陵游击队配合工农革命军作战外，还组织工人纠察队和赤卫队负责送弹药、运伤员。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工农革命军决定主动撤出战斗时，谭震林又组织鞭炮工人，用制作的特殊鞭炮，夜晚在山上四处点放，制造进攻假象，掩护工农革命军顺利地撤退。

工农革命军南撤到湖口时，在部队往什么方向开进的问题上，宛希先与团长陈皓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宛希先认为部队要往东回宁冈、井冈山进行休整，陈皓则花言巧语，用到大

县、湘南扩大影响、扩大地盘谎话，掩盖他投敌叛变的阴谋。在这场斗争中，随后率工人纠察队和赤卫队赶到湖口的谭震林，坚决支持了宛希先的主张。后来，毛泽东也亲自赶到湖口，揭穿了陈皓一伙的真面目，使工农革命军顺利返回井冈山，谭震林也跟着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到井冈山后，发现茶陵县委的人没有上山。毛泽东说，茶陵还是要管，于是指定谭震林负责茶陵县的工作^①。谭震林立即带领一部分人到靠近宁冈、永新的九陇山活动，并派人下山去了解情况。由于敌人对茶陵县搜查、封锁得很严，派去的人有的被杀，有的下落不明，工作做不进去。谭震林把这个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指示，没有武装不要下去活动。谭震林说，从这件事体会到，没有武装就没有活动的余地^②。毛泽东听后笑着对他说，你也赞成要有武装啊！你是第一个赞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人^③。

一九二八年五月，为了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健全组织，加强对土地革命的领导。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谭震林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第一届特委委员。这次会议讨论了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和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等问题。根据会议的精神，五月下旬在宁冈茅坪苍边村成立了边界最高政府机关——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由谭震林负责土地部工作^④。

谭震林担任土地部负责人后，首先，他请示特委和边界政府批准，决定在县、区、乡都普遍设立土地委员会，领导各地

①②③ 《谭震林的回忆》。

④ 《井冈山斗争史稿》第74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5月版。

分田。各级土地委员会，由各地召开工农兵代表会选举产生，一般由贫雇农代表五至七人组成，工农兵政府讨论分配土地问题时，由土地委员会先进行研究，提出具体方案。其次，确定了分配土地的原则。在总结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以乡为单位分配，作为分田的主要原则。在乡的范围內，实行“男女老幼，一律平分”。原则上是谁种那几丘田，多了的交政府分给他人，少了的按规定补足。好田差田适当搭配，山林由政府管理使用，农民需用时，须经政府批准。

当时，边界各地分田的方法很不一致。为了摸索具体的分配方法，经边界工农兵政府批准，谭震林于六月到永新县小江区担任区委书记，同当地的干部、群众一起进行调查研究，最后认为分田大体上要经过这样一些步骤：一是召开群众大会。在群众大会上，要讲清田是农民开垦的，地主要是农民种田养活的。因此，田应归开垦的主人，归种田的劳动者，只有这样，农民才能翻身解放。在大会上要当众烧掉田契和高利贷债约，农民才会真正相信宣传的道理。二是清查田亩。由土地委员会出面，组织贫雇农到各家各户调查登记，在此基础上计划出土地的总数、各种等级的田亩数和人数。三是分配土地。按土地部确定的分配原则，土地委员会和有关人员进行研究，提出分配方案。四是宣布分配结果。分田方案提出后，召开群众大会通过，然后贴榜公布各户分田数。五是插牌。按照分田结果，在竹牌、木牌上写上地名、亩数、分给谁等字样，然后插在田头上。

开始分配时，有的贫雇农胆子小，牌子插到田里还不敢要。谭震林就对他们说，这个地区是苏维埃的地区，共产党的地区，如果国民党反动派来了，所有的人必须离开，如果不离

开，就有通敌的嫌疑，就要受到应有的惩处^①。后来，国民党来了，群众都离开了，只有一个富农没有离开，敌人走后，这个富农受到了应有的惩处。胆小的贫雇农一看，这真是共产党的地区，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对分给他的土地就敢要了。

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永新县城主持召开了特委、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研究分兵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地方武装等问题。谭震林代表小江区委参加了会议。会后，他被调到永新县城区，担任城区党委书记，领导城区人民开展革命斗争。一个多月后，根据特委的指示，他回到了井冈山。

一九二八年九月，湘赣边界特委代理书记杨开明生病，由“谭震林代理书记”^②。为了总结一年来根据地斗争的经验和确定边界党的任务，十月十四日，在宁冈县步云山召开了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讨论了如何巩固根据地及土地问题，通过了《井冈山土地法》，还讨论了《工会组织法》和整顿党的组织等问题。大会选举谭震林为第二届特委书记^③。大会确定边界党的中心任务，是准备打破敌人的第三次“会剿”，进一步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会后，谭震林在茅坪特委机关，为发动井冈山群众，迎击敌人的重兵“会剿”，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日夜操劳。

为了把地方党组织建设好，谭震林领导特委机关开办了短期党员训练班。在党员训练班里，他和特委其他领导同志给大家讲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幸福的党，是领导穷人闹革命的党，是领导穷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让工人、农民坐天下的党。还

① 《谭震林的回忆》。

②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5页、76页。

讲阶级和阶级斗争，讲地主是怎样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又是如何支持地主阶级、代表地主阶级的。他还要求大家斗争要坚决，革命要彻底，要不靠天，不靠地，不靠泥菩萨，要靠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自己；并强调要遵守党的纪律，对党和人民，对革命事业要绝对忠诚。对于如何处理好边界各县的土客籍人之间的矛盾，他非常强调要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原来边界各县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恨非常深，有时甚至发生激烈的械斗。客籍人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人所欺，素无政治权利。尤为严重的是一九二八年边界“八月失败”以后，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到宁冈、茅坪，肆意欺负客籍人，因此，客籍人对土籍人更加仇恨。十月，红军打败白军，回到宁冈、茅坪。客籍人感到出气的日子到了。一天，茅坪的客籍人聚众到五里路远的茶源去抓土籍豪绅尹其中，尹其中不在，就把尹的小老婆“茶子壳”及村里的土籍群众四十多人抓起来，弄到茅坪要求袁文才杀掉。这四十多人一听要杀他们，纷纷哭号起来。哭声惊醒了正躺在床上养病的谭震林，他连忙翻身起来，扶着拐杖走出房门，问是怎么回事。当他知道事情的原委后，他一面叫人给这四十多人松绑。一面教育大家要摆脱豪绅地主阶级的影响和宗族主义的思想束缚，不论土客籍人，都不要记前仇，要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国民党反动派，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过教育，客籍群众高高兴兴地把这四十多个土籍人送回了茶源。后来，在保卫井冈山的战斗中，土客籍人都能互相支持，共同打击敌人。

十一月六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井冈山根据地重新组

织了以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宋乔生、毛科文五人组成的前敌委员会；谭震林兼任组织科长^①。不久，前委组织工农工作委员会，由谭震林任主任^②。十二月，根据前委和特委的决定，正式颁布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井冈山土地法》。

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打破了敌人重重围困，离开井冈山，经过赣南，向闽西挺进，开始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进军。为了加强对沿途群众工作的领导，前委决定湘赣边界特委的工作由邓乾元等负责，谭震林则带领前委工农工作委员会随部队一起行动。部队每进驻一个新的地点，他就和工农工作委员会的同志积极开展群众工作。

五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第二次进军闽西，特别重视发展闽西地方武装和创建主力红军的工作。六月上旬，红军由上杭白砂到达旧县时，红四军前委决定将长汀赤卫队和永定湖雷、溪南游击队，与一部地方部队编成红四军第四纵队。六月中旬，在连城县新泉，由朱德军长传达了红四军前委的决定，正式成立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部、政治部，并决定从主力红军中选派一些有经验，有能力的政治、军事干部去加强四纵队。谭震林就是被选派到四纵队去的干部之一。四纵队组成后，他任中共四纵队委员会书记兼四纵队政治部主任。一次，毛泽东问他：你们这个纵队能打仗么？他回答说：很难说，但是一定有勇敢的人，一定也有不敢打仗的人，到了那时，

① 《曾志的回忆》（1983年12月10日），存中共永新县委党史办公室。

② 《王紫峰的回忆》（1973年4月26日），存中共宁冈县委党史办公室。

把勇敢的提拔起来当干部，把不勇敢的撤下来，这不就解决了么^①。毛泽东听后微笑着点点头，表示同意。为了加强党对这支武装的领导，他按照毛泽东在红四军的办法，在干部和士兵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在各级建立了党的组织，大队建立了支部，支队成立了支队委，纵队成立了纵队委。在健全组织的基础上，他十分重视对党员的思想教育，曾组织政治部编印一本《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小册子，发给每个党员，要求认真学习，切实做到。他很注意政治工作的针对性，经常深入基层连队和干部战士谈心，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例如，四纵队主要成分都是来自苦大仇深的闽西子弟兵，且经受了一九二八年武装暴动和一九二九年斗争的锻炼，但文化普遍较低，妨碍着思想觉悟的进一步提高。为了改变这一情况，他和政治机关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规定每个基层干部和战士行军时在背包上都挂一块板子，板子上每次写四个字，边行军边认字，认识后还要利用休息时间进行讨论，弄清字里讲的是什么道理，在实际中怎样使用。字每周换一次，在换字时，还要轮流对上周学习的内容进行总结。这样既提高了文化水平，同时也提高了思想觉悟，一举两得。又如，四纵队中有个干部对红四军关于要保护商业、发展经济的规定不理解，观念淡薄，随便没收商人的东西，使商店关门，在工商界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他知道这件事后，对这个干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给了必要的处分，使这个干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由于采取了上述这些有力措施，四纵队的精神面貌很快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战斗力也有了明显的提高，成为巩固和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一支劲旅。在做好部

^① 《谭震林的回忆》。

队政治工作的同时，他还非常注意发动群众的工作。一九二九年九月，四纵队进攻上杭以前，他组织部队广泛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在发动群众中，他发现白砂地区的妇女在动员丈夫参军参战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认为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要政治部及时总结，并指示部队在发动群众中要普遍建立妇女会，以便把广大妇女动员起来，发挥她们在动员青年参军参战中的重要作用。由于他在四纵队政治工作作出了显著的成绩，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五日，福建省委派往四纵队进行考察的谢巡视员在向省委的报告中有这样叙述：谭震林是“四军配来的，过去在湖南做过工会工作，后随四军到各地参加地方工作，是一店员工人，工作能力不错。”^①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日，为了进一步总结闽西的革命斗争经验和确定以后的斗争方针，更好地领导闽西人民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经红四军前委建议，闽西特委在上杭蛟洋召开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红四军前委指派毛泽东、谭震林、江华、蔡协民、曾志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大会经过民主协商，选举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十五人为特委委员^②。大会以后，谭震林同闽西的其他领导人一道，深入基层，指导建党、建政和分配土地的工作，把闽西红色政权波浪式地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

十二月初，红四军前委决定对全军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军事整训。谭震林等奉命率四纵队抵达连城新泉参加整训。同月下旬，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古田曙光小学召开，他出

①《闽西党史资料》历史文件之三，存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

②孔永松：《闽西革命根据地简史》，1983年编，存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

席了这次大会。会后，他在四纵队传达贯彻了古田会议的精神，并组织部队认真学习了大会通过的《决议》。

一九三〇年二月六日至九日，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六军军委在吉安陂头召开联席会议，总结一九二九年的工作，并提出新形势下的新任务。这次会议决定将红四军前委扩大为四、五、六军及赣西南、闽西、湘赣边等赤区的斗争指导机关。谭震林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前委委员^①。

随着工农武装和主力红军的迅速扩大，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展，迫切需要大批有经验的、经过专门训练的军事和政治干部。为此，一九三〇年五月在龙岩建立了闽西红军学校，谭震林任校长，邓子恢任政委。红军学校第一期招生二百人，第二期招生八百人。它的建立，为培养军事、政治干部，壮大革命武装，提高红军军政素质，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九三〇年六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第三次入闽。六月中旬，红四军在汀州进行整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闽西地方军主力红十二军正式编入红一军团的建制，谭震林被任命为红十二军政治委员^②。八月二十三日，中国工农红军一、三军团于湖南浏阳永和镇胜利会师，组成红一方面军。他又被选为中共第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委员^③。九月十二日，红一方面军前委命令全军“占领萍（乡）、攸（县）、醴（陵）、株（州）等处待机”^④，并布置各军用十二天时

① 《前委通知》第1号，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526页。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第2分册上册，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1982年12月编。

③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5月版。

④ 《攸县史志通讯》第3期，1983年10月15日编。

间，帮助地方恢复党、团组织，建立政权和赤卫队及筹款等工作。

按照前委的部署，谭震林于十四日，率红十二军由株州起程，经醴陵向攸县进攻。十七日占领攸县县城。部队进城前，国民党军队散布谣言，吓唬群众。于是群众纷纷四处出走。部队进城后，为了安定民心，立即召开了群众大会。谭震林热情地对大家说：乡亲们，大家不要相信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我们是共产党，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为广大人民办事的。我们这次来攸县，要为革命烈士报仇，要革反动派和大土豪劣绅的命，要为大家办几件事情。希望大家不要怕，不要逃跑，跑了的要回来，照常做工，照常做生意^①。台下的听众觉得这个给他们讲话的人很面熟。他们看看相貌，听听声音，不禁惊喜地说，“那不是咱们的喜仔吗？！”“是的，真的是喜仔”。“喜仔回来了”，人们心里充满着喜悦。自马日事变后，攸县党的主要领导人余米和二百名工农干部，先后被湘东保安司令罗定杀害了，当大家听说谭震林跟毛泽东上了井冈山，还当了红军领导人，于是盼望他能早日带兵回来，为人民报仇、出气。现在，喜仔果然回来了，乡亲们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散会以后，大家把他围在中间，问长问短。有的问：“喜仔这些年走了那些地方？”有的问：“这次回来了还走不走？”还有的问：“红军里头还要不要人？”他一一作了回答^②。喜仔回来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外出躲避的乡亲们也纷纷回来，攸县呈现了一派节日的气氛。

谭震林回到家乡的第二天，帮助攸县重新建立了工农革命

①② 《谭乐春等的回忆》，现存中共攸县县委党史办公室。

政权。他把县内各秘密革命组织联合起来，结成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揭开土地革命的斗争序幕。接着，他又把县内的赤卫队员召集起来，组成一支有三十多人的赤卫队，指定工农革命委员会委员周里仁担任队长，胡畏担任政治指导员，并从部队拨了两支步枪，一批梭镖、大刀给赤卫队，指示部队帮助赤卫队进行扩建。在十二军的帮助下，赤卫队很快发展到了一百六十多人。他还帮助工农革命政权镇压了反革命。红十二军回攸县前反革命的头面人物已经逃走，但是还隐藏着一些杀害革命者的歹徒。如厨师尹明德，曾多次向敌人密报谭震林从井冈山派回攸县的人，使这些人都惨遭杀害。这次红十二军一进城，群众就向谭震林揭发了尹明德的罪行。经过审讯，尹承认自己的罪行。他立即命令把尹枪毙，并在布告中昭示：“为保卫革命利益，特予严惩，以儆效尤。”

为了解决红军给养的困难，谭震林在攸县期间，要求部队打土豪，筹款子。他把部队派到东、南、西、北四乡，与当地群众一起评议，谁个土豪多出款，谁个土豪少出款，经大家评议后，作出定夺，使筹款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但也有极个别的土豪抗拒捐款，部队就点燃他家的房子，当熊熊大火燃烧时，藏在房顶上的银元纷纷滚落下来。土豪吓得面如土色，围观的群众，无不拍手称快，高喊“烧得好！”他在攸县还动员了数十名贫苦青年参加了红军。红十二军撤离后，国民党军队重新占领攸县，地主反动武装乘机对无辜群众和红军亲属进行肆意残害。谭震林的家里，除四弟被迫外逃，父亲和大哥、二哥、五弟都惨遭不幸。反动武装杀害了他们，还不准掩埋尸体。后来，还是一位老太太冒着生命危险将尸体掩埋起来。谭震林知道这件事后，对老太太感激不尽。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蒋介石调集十一个师又两个旅，共十万兵力，以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分兵八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在这次反“围剿”中，谭震林和罗炳辉一起，根据毛泽东和朱德的战略部署，率领红十二军担任从左右侧迂回攻击张辉瓒部的任务，对全歼张辉瓒师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十二军又奉命从正面经南团、林池向东韶逃敌攻击前进，同兄弟部队一起击溃了谭道源师。

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以赣西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为主体组成中央苏区。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苏区中央局在赣南成立，谭震林被指定为中央局委员^①。第二次反“围剿”开始前，毛泽东在建宁溪口驻地先后写了三封信给谭震林和闽赣边界领导人。在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八日的信中，毛泽东指示说：“十二军中心任务应不是筹款，而是建立深入宁化、石城、长汀三县的工作。”“以两个月（七、八两月）为限期分完田，建立地方武装、地方临时政权和临时党部，把这四个问题真正的解决，使雩、瑞、石、宁、会、汀六县连成一片，这是我们的中心任务”^②。在六月三十日的信中，毛泽东说：

“昨信说十二军筹款不是主要任务，宁化、石城、长汀三县群众工作才是主要任务，现在看来筹款和群众工作同样是主要任务。”“震林、炳辉、谭政三同志应不在一块，每人专任指导一处，同时需兼巡视一处或二处，每隔十天集合各军委机关开

^①孔永松：《闽西革命根据地简史》，1980年8月编，存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

^②《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第201—205页，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

一次会，震林同志一人普遍地出去巡视，不专任一处亦可。”^①在七月一日的信中，毛泽东对如何完成上述任务，进一步作了具体的指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谭震林和罗炳辉带领红十二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在发动群众、分配土地、筹集经费、扩大革命根据地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工作做得很细。他们指定一个连到一个县去，一个村一个村地检查土改搞了没有，没有搞好的帮助搞好，不懂的就讲给他们听。同时，还帮助建立了宁化县革命委员会。在第二次反“围剿”，打王金钰、公秉藩两部时，十二军担任右路军，负责抢占九寸岭和观音崖。在罗炳辉和谭震林的指挥下，十二军同兄弟部队配合，不到半天时间，就取得了首战胜利。随后又同红四军一道担任围攻广昌的任务，同样取得了胜利。

七月，蒋介石拼凑三十万兵，亲任总司令，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在反“围剿”中，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和“磨盘战术”，大胆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为了诱惑和调动敌人，命令十二军一路上扬旗鸣号、大张声势，使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由此突围，吸引敌人出击，以调动和分散敌人。罗炳辉、谭震林根据毛泽东、朱德的部署，率领十二军穿过敌人空隙之后，一路浩浩荡荡，直向北插，敌人果然跟着来了。他们又命令部队走走停停，与敌保持不即不离状态，紧紧地牵住了敌人的鼻子。为了更有效地诱惑、麻痹敌人，他们命令部队：拉开距离，打开旗子。于是，部队的距离更拉长了，一个连成了一个营的架子，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第201—205页，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

有红旗的展开红旗，无旗的就拿出各种花色包袱布皮，高高地摇晃着。走到尘土多的地方，战士们故意跳跃前进，掀起浓厚的尘土，漫天飞扬。敌人的飞机从空中一看，简直象一支几万人的大军。他们还让全军在各自行进的道路上，每逢岔路口，都用白灰画上箭头，写上“三军团由此前进”、“四军由此向北”，……一到宿营地，见门就写：“某团某连驻此地”。在显眼的地方，还要这样的留言：“某某同志，速到前面找我，有要事！”落款是：“某师某某”，名字是随手编的，番号呢？只要红军有的，随意写就是。就这样，尾追红军主力的敌军已全部被十二军牵着鼻子拖了出来，而红军主力已安全到达预定地区开始整训。罗炳辉和谭震林高兴地说：“好啊！蒋介石上钩了，那就牵着他的鼻子多逛几圈吧！”^①于是，他们对十二军的行动又作出新的部署：哪座山高就翻哪座山，哪里道路险峻就从哪里走。这对于行装笨重、补给困难而又缺乏山地行动素养的一二十万敌军来说，简直象受酷刑，被拖得精疲力尽，狼狈不堪。随后，十二军又在东韶附近埋伏起来，黑夜派出一支部队奔袭东韶，佯攻敌人。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到达，怕被我消灭，当夜仓惶溃逃。十二军从容收复了黄陂、小布地区。这时，我军主力经过半个多月的休整，兵强马壮、士气旺盛。而敌人士气低落，蒋介石已下决心撤退了。毛泽东、朱德当即抓住这有利战机，命令全军出击，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胜利地粉碎了敌军的第三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罗炳辉和谭震林奉命率领红十二军向赣南边界挺进，以配合闽西的反“围剿”斗争。一九三一年十月间，红十二军进入汀州同闽西主力红军新十二军胜利

^①《星火燎原》选编之二，战士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24页。

会师。新、老十二军汀州会师后，在长汀一带一面休整，一面帮助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此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对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的编制进行局部调整，决定老十二军的主力第三十四师、三十五师调回江西编入红一军团的红四军，其调出部分由新十二军编入代替，依然称为红军第一军团第十二军，仍由罗炳辉任军长，谭震林任政治委员^①。整编后，十二军在罗炳辉和谭震林率领下，继续向连城、宁化、清流发展游击战争，全歼了卢新铭部的易启文团和扫清了各县的反动“救乡团”武装，解放了连城县城和汀、连、宁的广大地区，从而打通了闽西与宁化、清流、归化、建宁等红色区域的联系。在红十二军的胜利进军下，龙岩、永定、上杭各县被敌人侵占的地区，除县城以外，大部得到恢复，闽西军阀张贞部被迫退却到龙岩、永定一线，使闽西革命根据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江西瑞金叶坪正式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谭震林当选为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②。根据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告成立，朱德为中革军委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谭震林等十五人为委员^③，统一领导各根据地红军的作战和建设。中革军委成立后，红一方面军领导机构即奉令撤销，所属各部直接归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和指挥。

①孔永松：《闽西革命根据地简史》，1980年8月编，存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

②③《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分册上册第3页，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1982年12月编。

同“左”倾教条主义作坚决斗争

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指挥下，中央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以后，为了统一闽西红军和地方部队的军事指挥，中央指示组建福建军区。一九三二年三月，福建军区在长汀十里铺正式成立。谭震林被任命为军区政治委员^①。三月十八日，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汀州召开，他又被选为福建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四月一日，他出席了中央红军总部在汀州召开的部署东征漳州的军事会议。会后，他和罗炳辉一起，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一方面组织部队深入发动群众，建立运输队、担架队、卫生队，搞好扩大红军和支前工作，配合中央红军东征作战；另一方面指挥杭、永、岩边界的红军独立师、团，严密牵制敌人，用假象迷惑敌人，切断广东对漳州之敌的支援。同时，指挥红十二军由汀州迅速出发攻打上杭城，并与由红一军团和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会师，协同作战，经龙岩直下漳州，于四月二十日攻占了漳州。

随着红军的胜利和适应部队不断发展的需要，一九三二年五月，中央决定重新组建福建军区，谭震林被任命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②。

六月，他指挥岩、永、杭军分区和上杭旧县地方武装五、六百人，发起围攻广东军阀陈济棠、黄任寰部的水西渡战斗，

^① 《福建军区的成立经过及其历史作用》，载福建《党史资料与研究》1983年第8期。

^② 《杭永岩新指挥分部通令》第1号（1932年5月8日），存古田纪念馆。

歼敌一个营。九月，又指挥宁、清、归军分区所属部队在安远市击溃敌周志群部，俘获人枪各五十余。一九三二年春，他指挥在闽东南作战的红军主力部队和福建军区汀、清、连等分区以及地方武装，在长汀南阳（现上杭）马洋伏击敌十九路军部队，经过五天的激烈战斗，毙伤敌一千余人，缴枪八百余支，获胜利品无数。

在取得上述军事胜利的同时，谭震林还领导军区积极配合苏维埃政府做好扩建红军的工作。福建军区一成立就决定，每年的五、八、十三个月为扩红突击月，专门组织工作队从事扩红工作，掀起扩红高潮；在杭、汀、宁三县各设立一个新兵补充团，对新入伍的战士进行一段集中训练，然后输送给正规部队。军区还制订了红军家属优待条例，颁发红军家属光荣牌，红军战士光荣匾，鼓励人民群众踊跃参军，解除红军战士的后顾之忧，青年参军非常踊跃。据当时苏区报刊记载：“仅一九三二年五月全省扩大红军就有四千余人，超过原定三千人的计划；六、七两个月扩大两千余人；八、九两个月又扩大红军九千余人”^①。

谭震林十分重视群众工作。他经常对军区的干部战士说，要动员群众，依靠群众，首先要关心群众。军区机关驻南阳茶梓下时，他亲自带着机关干部和直属队指战员，积极参加义务劳动，帮助群众搞生产。当时军队搞生产是件新事，影响很大。他还要政治部规定一个劳动日制度，在全军区执行。部队以实际行动实现了古田会议要求红军既打仗、又做群众工作的决议。张鼎丞在全省苏维埃代表会上，高度地赞扬了他这一做

^① 《福建军区的成立经过及其历史作用》，福建《党史资料与研究》1983年第8期。

法。

谭震林在主持福建军区工作期间，很注意学习问题。一次，在军区教导队开学典礼上，他以亲身的经历，语重心长地勉励学员们学好文化：“打仗手中没有武器不行，闹革命缺文化也不行，我文化水平低，尝够了苦头，现在把你们送到这里，你们可要好好地学习”^①。他还自己带头和学员们一起学习。课堂上，他认真听、细心记，不懂的地方，用本子记下来。一天深夜，他在学习《共产党宣言》，由于缺乏参考资料，对某些地方弄不清楚，他要去请教教员。警卫员劝他明天再去，他说，明天还有明天的事。教员见首长深夜求教，十分感动。他们一起切磋，直到疑难弄清为止^②。

一九三二年八月，毛泽东找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谈话，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还指出，在杭、永、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漳州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③。罗明立即召开省委会议传达并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意见。会后，在杭、永、岩前线成立了由罗明、谭震林、方方等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具体领导政治动员和军事行动，有效地打击了敌人，保卫了苏区，干部和群众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正当福建军区在谭震林等的领导下，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

①②《谭震林在闽西二三事》，载1984年1月7日《福建日报》。

③《罗明的回忆》，现存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成绩的时候，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福建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在江西开展反对“邓毛谢古”的斗争，实质上是反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在这场斗争中，谭震林坚决站在正确路线一边，向“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对形势的看法上，他反对“左”倾教条主义者把国民党统治集团看成铁板一块，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以主要力量来打击那些所谓妥协的反革命派的主张。他认为“蒋粤战争有爆发的可能，十九路军军阀与粤系军阀对闽西苏区的进攻，要暂时的停止。”^①不久，他的判断果然被证实了，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与李济深等国民党内的一部分反蒋势力，在福建成立了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并且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协定。在闽西反“围剿”斗争的方针上，谭震林反对“左”倾教条主义不顾实际情况地“猛烈扩大红军”，把闽西所有武装编入主力红军，开往反“围剿”第一线与敌人决战的主张。他支持罗明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的正确意见，主张“以桃地小兰为第一防线，官庄水口濯田为第二防线”^②。在土地问题上，他支持对富农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反对“左”倾教条主义把这项正确的政策说成是“富农路线”^③。在战略问题上，他坚决主张采取毛泽东、朱德“诱敌深入”的战略原则，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向白区进攻，夺取中心城市的错误主张^④。他的这些正确看法受到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多次斥责。

①②③④ 《为加强党对革命战争的领导而斗争》，《斗争》杂志第18期，1933年7月15日出版。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四日，中共福建省委根据苏区中央局作出的决定，在汀州召开省委临时代表会议，对罗明进行批判斗争。谭震林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同到会的多数同志一样，对中央局关于开展反罗明路线的决定表示不理解，但中央局派来出席会议的代表，不顾谭震林等大多数同志的正确意见，凭借上级的指示和决定进行压服，通过了《临时省委〈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的决议》，决定在省委和根据地的各级党组织中广泛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同年六月十二日，中共闽粤赣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进一步开展批判罗明的斗争，撤销了拥护罗明意见的汀东、新泉、永定三个县县委书记的职务。这次会上要求谭震林检查“罗明路线”的错误，由于他不愿意检查，因此，大会和大会通过的关于组织工作的决议，指责他“是企图保留一部分机会主义武装在某一时机上来向党进攻，这是机会主义最可耻的企图。”^①要求“集中火力向机会主义作无情的斗争”。扩大会议以后，谭震林为了说明自己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向福建省委写了《申明书》，这使“左”倾教条主义者更加恼火。他们决心要用对待罗明一样的手段来对付谭震林。一九三三年七月，“左”倾教条主义者发表了题为《为加强党对革命战争的领导而斗争——谭震林同志和我们分歧》的文章，指责谭震林“不尊重”中央局的指示，而坚持自己的意见，是“腰痛脚软的机会主义者之一”，同“罗明路线机会主义者一样，有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共同观点，又翻出一些新花样来”。文章还说谭震林是“罗明同志的好徒弟，江西罗

^①《中国共产党闽粤赣省委扩大会议组织工作决议》（1933年6月12日），复印件存中共龙岩县委党史办公室。

明路线的同道”。“死守《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曾胡治兵语录》的腐朽思想。”文章还号召开展对谭震林的斗争，为进攻路线战斗。同年十月，根据中央局和福建省委的指示，福建军区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会上对谭震林进行了残酷斗争，并宣布撤销他的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职务^①。同时被撤职的还有一大批干部。

谭震林被错误地批判和撤职后，仍然坚信正确的路线终将胜利。不久，他被调到瑞金保卫局红军科当科长。到职后，他不计恩怨，不嫌职卑，不怕麻烦，继续积极努力地工作和学习。开始，他被派往前线去检查医院，慰问伤病员；后来，奉命去闽西接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华夫）。从闽西到瑞金途中要经过一段白区。所以中央对李德的安全非常重视。要谭震林带领一个加强营去保护。谭震林授领任务后，当天进行了紧张的准备，第二天拂晓由根据地出发，天黑之前走了一百多里路，顺利地到达了李德的驻地，第三天便马不停蹄立即返回。途中，李德提出要骑马走。他对李德说，你是外国人，骑马太暴露，容易被人发现，为了你的安全，还是步行好，到了根据地你再骑马^②。夜间宿营，他首先把岗哨布置好。饭后，李德由交通员带路到每个哨位去查看了一遍，回来一个劲地夸布置得不错。两天后，他们安全地到达根据地。接着，谭震林又接受了恢复交通线的任务。当时连城的反革命地方武装活动很猖獗，在我必经之道上修筑了堡垒，妄想阻止我军通行。要打通交通线，就必须拔掉这些钉子。当他带领一个营的

^① 《福建游击战争史》，福建军区游击战史组1981年11月编。

^② 《谭震林的回忆》。

部队来到连城时，敌人的主力已撤走，他就指挥部队乘机把地堡的敌人消灭掉。然后派一个排驻守，将部队撤到山上隐蔽起来，当敌人出动兵力围攻地堡时，他指挥部队迅速出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消灭了这股反革命地主武装，保障了我军交通线的畅通。随后，他被送到中央红军学校学习。

坚持闽西三年游击战争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前，党中央曾决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设立中共中央江西分局、中央军区和苏维埃政府中央办事处，并留下一部分红军部队，由中央江西分局直接领导，坚持斗争。中央江西分局由项英、陈毅、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陈潭秋、毛泽覃、梁柏台等组成，项英任分局书记兼中央军区司令员，陈毅任中央办事处主任兼政治部主任。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项英继续执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军事路线。他将红军部队、地方武装集中起来，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与敌人硬拼，并寄希望于主力红军很快回师。结果，不到一月，整个中央根据地的全部县城陷入敌手。到了一九三五年二月，中央分局、中央军区、中央办事处和赣南省的机关、部队均被敌人围困在狭小的于都仁风山地区。三四万人的红军队伍，只剩下几千人，情况处于极端危急的关头。恰在这时，即二月十三日，分局接到党中央在长征路上发来的电报，大意是：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会议上，批判了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央苏区的斗争主要是坚持游击战争，反对敌人的堡垒主义与“清剿”政策，组织

方式、斗争方式必须与此相适应^①。这一指示，给广大领导干部及红军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陈毅当即提出要从敌人的包围突围出去，分散开展游击战争。

中央分局接受了陈毅的建议，决定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的干部、红军部队分成五路，分别向闽赣、闽西、湘南、赣粤方面突围。向闽西方向突围的是陈潭秋、谭震林带领的红二十四师的一个加强营。当时，陈潭秋是以中央苏区特派员的身分到闽西指挥游击战争的。因陈潭秋对军事指挥不熟悉，要谭震林作他的参谋。他们从瑞金西南出发，一路走，一路打，到福建长汀、四都，一路平安无事。过了水口，情况很紧张，到处都是敌人。在畚心嶂山山脚下正准备烧点饭吃，敌人打来了，加强营的重机枪被打坏，营长也牺牲了。陈潭秋问谭震林怎样办？他果断地说：“有办法，只要给我一个班归我直接指挥，走在前头边侦察边开路，不愁走不出去？”陈潭秋看他的决心大，有办法，高兴地说：“只要你有办法走出去，整个部队都可以归你指挥。”他风趣地说：“你授这么大的权给我，我更好办。”^②就这样，谭震林指挥部队赶了一天的山路，到了上杭章云岭，并找到了几个乡的苏维埃干部。这些干部见到谭震林极其高兴，并说：“你们不来我们真不知道怎样才好？你们来了，我们就好了。”谭震林一面要部队立即搞饭吃，一面同乡苏干部张春华热情交谈，询问这一带的情况，得知才溪、通贤、南阳都驻扎有国民党部队。谭震林问：“才溪区苏到哪里去了？”张说：“可能在紫金山、南山一带。”谭震林将军区自印的地图摆开一看，要到旧县，只有从通贤、才溪之间插过

^① 《福建游击战争史》，福建省军区游击战史组1981年11月编。

^② 《王直的回憶》。

去，陈潭秋没有同意。谭说：“西南边是汀江，过不去，只有从才溪两侧插过去，否则没有路走。”最后商定，沿着梨子岭、草子岷山脉走。到了才溪的曾坑时，群众告诉他们说，这里离敌人只有五华里，要他们快走。拂晓，谭震林在中寨找到才溪苏区十多个人，得知旧县、石训潭都驻有敌人，旧县河已被敌人封锁。但不过旧县河，无其它路可走。他果断决定从洪北过河。渡河时水的声音很大，部队刚过了三分之一，敌人就向河里乱打枪。谭震林站在渡口，沉着指挥，并鼓励大家：“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过了河就是胜利。”还说：“他打他的枪，我们过我们的河，不要理他”^①。过河后，在铁场稍集结了一下，立即翻山到了岩下山的松柏林，在大森林中继续穿行。天黑路窄，十分难走。谭震林让战士取出一根绳子，走在前边的牵住绳头，后边的指战员一个接一个扶着绳子走。突然，陈潭秋一脚踏空，滑摔到山沟里，左脚跌断了，右耳也被树枝挂掉。部队停止前进，天亮时才把陈潭秋找回来，在松柏林旁驻了一天。翌日，谭震林决定陈潭秋坐担架，自己带两个连在后面掩护。下午，他找到了廖海涛、黄火星，尔后又找到了刘永生。刘很快通知了张鼎丞，张立即派人把他们领到永定石木林与张鼎丞部汇合。谭震林见到张鼎丞高兴地说：“哎，真险啦！差一点不能与你相见了。”陈潭秋说：“一路走来如果没有这位好参谋决心果断，灵活指挥，可能下来不了呢？”张鼎丞说：“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你们胜利来到闽西。”^②大家为瞿秋白、何叔衡在突围途中被捕牺牲万分悲痛。

① 谭震林：《从赣南到闽西》，载《回忆陈潭秋》，华中工学院1981年7月版。

② 《王直的回忆》，存葛慧敏处。

一九三五年五月，在永定县上被南区的赤藜乡，召开了红军长征后闽西地区党、政、军第一次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决定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谭震林当选为军事部长。当时，敌人集中几个师兵力正在闽西进行第一期“围剿”。他认真分析了当前情况和斗争形势，在会议第一天就提出：会议不能开长，部队和领导同志要立即分散坚持，集中一起目标大，对我们不利^①。这个正确的建议深得大家同意。于是会议决定，红军游击队分散发展，独立自主作战，度过这个极为艰苦的难关。会议对闽西红军游击队的军事活动范围和兵力部署作了具体决定。谭震林被分配到上杭与廖海涛、黄火星一起，坚持双髻山的斗争。

在双髻山。谭震林对廖海涛说：“现在我们处境很困难，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群众，不依靠群众寸步难行。”^②他经常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关心群众生活。一天，他到贫农张大伯家，见大伯生病卧床不起，便找来部队医生为大伯诊治。张大伯病好后，无米下锅，天天上山采野菜充饥。他叫警卫员把留给自己吃的一小袋大米送去。警卫员想留下半袋，他知道后，拍着警卫员肩膀耐心地说：“张大伯重病初愈，很需要营养，怎能让他天天吃野菜呢？我虽然劳累些，却没有大病，还是全部送去吧。”^③为了解决群众生活的困难，他还将红军游击队在双髻山、鸡公山一带打土豪，得来的粮食、猪肉分给贫苦农民。有一次，红军游击队截住敌人三条装满粮食的船。他指挥部队把粮食一袋一袋背上山，分给群众，并有意在路上撒上

① 《王直的回忆》存葛慧敏处。

② 《谭震林的回忆》。

③ 《谭震林在闽西二三事》，1984年1月7日《福建日报》。

一些大米，表示这些粮食已运进山里去了，免得敌人找群众报复。还有一次过年，游击队得知敌人到城里将买到的鸡鸭鱼肉，一担一担地往回挑，他要部队在离城十五里路的地方埋伏起来，等敌人路过时，把他们团团围住，挑的东西全部没收，然后分送给贫苦农民。有时，他们把打土豪的粮食分给群众，群众不敢要，他就叫战士把粮食送到群众家里。同时，警告地主：粮食是我们拿走的，你不能损害村子里的老百姓，如果损害了，下次我们来就杀你的头。由于谭震林同群众的联系好，只要敌人有什么行动，群众很快就能通知他们。这样，既可以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又可以及时捕捉战机，消灭敌人。如有一次，敌人要出来活动的消息，头天晚上群众就告诉了谭震林，他立即指挥部队在敌人必经之路上埋伏起来，结果把敌人全部消灭了。红军爱群众，群众也用生命保护着红军。龙岩城里有一个妇女，带着两个孩子，经常帮游击队买粮食，后来被游击队里的一个叛变者告发，敌人把她抓去，问她：“你买了多少粮食给土匪？”她回答说：“我根本没有替土匪买粮食，你们这些人靠抢老百姓的粮食吃，才是土匪！”敌人问：“你买的粮食给谁了？”，她说：“你们不是知道了吗，还问什么！”敌人又问：“你为什么买粮食给红军？”“红军是我们自己的队伍。”“马上杀你的头！”敌人威吓说。她坦然答道：“头杀掉，将来还要长个头。”最后敌人把她杀掉了。类似这样可歌可泣的事，比比皆是。

在艰苦的日子里，谭震林很关心战士们的疾苦。一天，他带领指战员在山地上训练，看到有的战士没有鞋穿，便动员战士上山割茅草编织草鞋，并亲自带领大家上山寻找适宜打草鞋的茅草。回来后，他又不顾疲劳，亲自动手搓绳子打草鞋，细

心传授打草鞋的技术，很快解决了战士们穿鞋难的问题。他还经常深入战士们当中，同战士谈心，战士们也乐于把心里的话对他讲。他后来说，在艰苦的情况下，干部和战士的团结非常重要，团结就能出智慧，就能出战斗力，就能克服任何困难。三年游击战争就是靠这种团结，才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①。

在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谭震林非常重视从实际情况出发确定方针政策。原红四军四纵队司令傅柏翠，后因种种原因脱离红军部队，回乡组织武装，听从敌人指挥。要怎样对待这样一支武装？他认为，傅柏翠是生存在国共斗争的间隙之中，如果失败，也难以幸存。因此，可以同傅沟通联系，建立一种微妙的关系。于是，他给傅柏翠写了一封信，说明“我要生存，你也要生存，我们不能生存，你们也要完蛋”^②的道理。这封信使傅认识到这种利害关系，回信表示同意双方互不侵犯。后来，廖海涛的部队果然同他们安然相处，国民党正规军来搜山时，傅也不积极配合，只是虚张声势，敷衍了事。有时红军游击队还可以到傅的地方暂时隐蔽。有时他还帮助游击队买些粮食和药品。在“左”倾路线统治时，不管青红皂白，对替白军做过事的都要杀。结果使一些保甲长见到红军游击队的人就躲起来。谭震林感到这种情况对坚持斗争不利，就亲自到兰田、大洋坝作调查。他通过一个甲长，找到大洋坝的保长，问为什么见到红军要躲。这个保长回答说，现在我们处境很困难，白军出布告说，通共产党要杀，红军看到我们应付白军，又说是叛徒也要杀。我们不愿意当保长，百姓又不肯，村子里

① 《谭震林的回忆》。

② 《王直的回忆》。

总得有个人出来当，这叫我们怎么办呢？他认为要改变保甲长这种困难处境，是红军对保甲长的政策应改变，应把消灭保甲制度的政策，改变为利用保甲长的政策，这样做对坚持游击战才有利。他很快写信给张鼎丞、邓子恢，建议军政委员会对此进行讨论^①。后来，他们在双髻山开会决定把利用保甲长的政策规定下来，并提出“白皮红心”的口号，把革命的原则性和政策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事实证明，这种办法对游击队的斗争非常有利。对于土匪武装，谭震林认为对他们不能苛求，只要他们不抢农民、不打我们，我们也可以不打他们^②。

在敌人重兵对闽西根据地实行“围剿”的情况下，谭震林指挥红军游击队广泛开展了游击战争，并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经常强调仗打不打，要看对当地群众是否有利，对我军是否有利，有利就打，无利就不打^③。他要求游击队平常住在山中的树林里，在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敌人“清剿”较紧时就隐蔽起来，同敌人“捉迷藏”，其它时间就积极开展活动。在活动中可以集中，可以分散，可以声东击西，要把消灭敌人和宣传、瓦解、利用敌人巧妙地结合起来。有一次，他派部队去拔掉公路上的一个敌军地堡，打进去后，不缴他们的武器，而是把敌军的头头抓起来，向士兵们宣传革命的道理，要他们不要替统治阶级卖命，同游击队合作，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我们。结果，效果不错，他们表示愿意同红军游击队合作。这样，就把敌人的堡垒变成为游击队可利用的堡垒。

谭震林同张鼎丞、邓子恢等一起领导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是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度过的。三年中，他们不仅面临着强大敌

① 《王宣的回忆》。

②③ 《谭震林的回忆》。

人的反复“清剿”，而且常常受到饥饿的威胁，疾病的折磨和虫害的袭击，还要同叛徒特务作斗争。他常常用野菜、野果子、竹笋充饥，用土制的草药治病。一天晚上，一个叛徒带领敌人突然袭击谭震林和廖海涛住的寮子。当时正是夏天，蚊子很多，谭震林满身長疥，又热又痒，睡不安稳。忽然，他听到土“警报器”——把几根竹子扳倒，上面放上洋油桶，一踩上竹子，洋油桶就会发出响声——的响声立刻警觉地问了一声：“谁”？没有回音。他先以为是野兽，可不一会，又听到了响声。他赶快喊醒廖海涛：“老廖，有情况，快起来！”一边喊，一边向外突围。廖醒后顺手去抓枪，可是枪皮带被竹床挂住了，扯不动。就在这时，敌人堵到寮子跟前。廖海涛一个箭步上前，猛力一推，把敌人的枪管推开，迅速突出包围。敌人举枪就打。但是黑夜看不清，打不准。枪一响，后面的敌人以为是谭震林、廖海涛他们开的火，就朝寮子里打枪，结果敌人自己打自己，混战一场，死伤好几个。而谭震林和廖海涛却安全突围出去了。

在艰苦的日子里，谭震林始终坚持看书学习，收集各种各样的报纸阅读。闲暇时，还用竹片制成象棋，和战友们拚杀一局。有时，他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讲故事。由于他过去看过不少古书，知道的故事又多，讲起来能绘声绘色，生动有趣，战士们都很喜欢听。有时，他也给大家说一段笑话，引得大家捧腹大笑。快乐的笑声，驱散了战斗的疲劳，唤起了大家对生活的信心。

一九三五年底，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通过在上海的联络站与党中央交通站取得了联系，得到了党中央“关于开展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策略”的指示。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闽西南军政委

员会在上杭双髻山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谭震林被增补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①。这次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反蒋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分析了当时福建和闽西南地区的政治形势，明确了在闽西南地区开展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新方针和新策略。

一九三七年三四月间，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获悉西安事变和西安事变得和平解决的消息后，为了适应新形势，决定派方方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五月，闽南红三团转来了南方工委给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信，得知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已由抗日反蒋转为联蒋抗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立即在永定召开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紧急会议。会议一致拥护中央的方针政策，提出了“愿与国民党和平合作，共同抗日”^②的口号，确定了新形势下的工作部署。会后，以张、邓、谭名义发表了致国民党驻军的公开信和致各界人士书，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七月，闽粤赣边区临时党代会在上杭白砂召开。从延安回到闽西的方方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对闽西南党坚持游击战的表扬。毛泽东对方方说：“你回去问候张、邓、谭各同志好，告诉他们，你们三年的苦斗有很大的功绩。”又说：“你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的部队和干部，保留了苏区二十万人口地区的土地革命果实，保护了苏区广大群众的利益，这是伟大的胜利。”^③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取消军政

①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闽西三年游击战争》，载《八一杂志》1959年第13期。

②复制件存葛慧敏处。

③方方：《三年游击战争》，载《红旗飘飘》第18集。

委员会，闽西南特委与潮梅特委合并，成立闽粤赣边省委。张鼎丞为省委书记，方方为组织部长，邓子恢为宣传部长，谭震林为军事部长。

一九三七年十月，党中央就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问题与国民党政府达成协议。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新四军军部移到南昌。十五日，闽粤赣边省委接到新四军军部指示，令谭震林到南昌接受命令，办理部队整编有关事宜。于是，他立即率警卫人员日夜兼程奔赴南昌新四军军部，办理有关部队整编集结事宜。

根据新四军司令部命令，坚持闽西游击战争的两千多名红军游击队员，编为新四军二支队，下辖三、四两个团，张鼎丞为支队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①。三月一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率领二支队全体人员，告别了闽西的父老兄弟，浩浩荡荡开赴了皖南抗日前线。

驰骋苏皖抗日前线

二支队到达皖南集中以后，谭震林调往三支队任副司令员，司令员由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由于张云逸主要在军部工作，支队的工作实际上是由谭震林负责。

一九三八年四月，谭震林率领三支队活动于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大通镇之间广大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九月，根据军部指示，他率部开往青弋江、西河，接替友军阵地。十月底，日军集中兵力一千多人，分数路向三支队所在的

^① 《福建游击战争史》福建省军区游击战史组 1981 年 11 月编。

红衣铺、清水潭阵地发起进攻。谭震林当即指挥部队以机动防御的方式与敌周旋，先后取得了清水潭、马家园等战斗的胜利，共毙伤敌伪三百余名，打击了日军凶焰，鼓舞了士气民心，巩固了我军阵地，开创了新四军阵地战的先例。

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从一九三八年八月起，日寇先后占领了鲁港、梅山、三山、荻港、旧县、横山桥等地，并企图强占皖南重镇繁昌。繁昌是皖南前线一个重要前进阵地，它位于芜湖至铜陵一段长江的突出部，境内山岭连绵起伏。同时与我军后方的山地连成一片，因此，日军要从芜湖威胁我军后方，维护其长江航线，繁昌是必争之地。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保卫繁昌，十一月底，谭震林奉命率三支队进入铜陵、繁昌沿江地区。初到繁昌，日军尚无大的行动，他一方面组织精悍小部队，不断袭击敌沿江据点，阻击其长江运输船队；另一方面以较大的精力抓建设繁昌西南山区的抗日根据地，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党派、各阶层的人民，组织各种抗敌协会，开展减租减息。他的夫人葛慧敏（又名田秉秀）就是当时妇抗会的领导人之一。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日军进攻长沙遭到惨败后，为了维护长江交通运输，巩固其占领地区的统治，抽调兵力，增设据点，向繁昌发起猛烈进攻。从十一月起到第二年五月，谭震林指挥三支队与敌浴血奋战，以七战七捷的伟大胜利，痛歼日军，保卫了繁昌。战后，国民党皖南驻军给他发来电报，称赞“该支队指挥得力，将士同心，殊堪嘉尚”^①。日军派遣军指挥官也哀叹：国民党为我手下败将，惟共产党乃皇军之大敌，看来

^①复制件存军事科学院资料处。

要在共产党手中夺取繁昌是极其困难的^①。对于繁昌保卫战胜利的重大意义，新四军军部在战后的总结中这样写道：第一，我军保卫繁昌的英勇战斗，是南繁战线上空前伟大的胜利。它粉碎了敌人企图夺取繁昌“扫荡”皖南的计划，巩固了皖南一部分国土，保卫了繁昌、铜陵。第二，打击了反共顽固投降分子对我军的一切造谣破坏计划。第三，在群众中提高了本军政治及战斗威信，使群众再一次认识了本军不是“游而不击”、“保存实力”的部队，而是抗战最坚决、最英勇的部队。第四，发扬了我军自我牺牲，刻苦耐劳、英勇战斗、勇猛攻击的优良作风。第五，提高了部队战斗力，获得了运动战斗的新经验和开拓了向运动战发展的道路^②。

为了庆祝“繁昌之战”的胜利，在中分村召开了有几千人参加的军民庆祝大会。谭震林和政治部主任胡荣在会上讲了话。新四军《抗敌报》发表了题为《保卫繁昌屏障皖南的伟大胜利》的社论，新四军政治部还编写了《繁昌之战》的歌曲，歌词是：

皖南门户，长江边上，
平静的繁昌，成了烽火连天的战场。
无耻的日本强盗，海陆空军一齐进攻，
七次大规模的侵犯。
遭受了七次重大的杀伤。
峨山头的搏斗，
塘口坝的血战，

① 《繁昌古今》第4期，繁昌县1983年11月10日编。

② 复制件存军事科学院资料处。

我们用雪亮的刺刀，爆烈的手榴弹，
把敌人打下山岗，
发扬了我们的英勇攻击，无比的顽强。
我们艰苦奋斗！
不怕凄风冷雨，
我们英勇牺牲，牺牲，
不怕饥寒死伤！
我们顽强战斗粉碎敌人的扫荡！
谁说我们游而不击，
谁说我们不能打大仗。
七次伟大的胜利，
我们坚决地保卫了繁昌①。

这支歌曲当时在江南、江北到处传唱，成为控诉日军侵略罪行，激励干部战士抗日斗志的生动教材。至今，新四军的许多老战士和繁昌地区的老游击队员仍记忆犹新。

为了总结繁昌保卫战的经验，三支队在铁门门的铁门庙召开了总结大会。会上，谭震林当着国民党三战区“联络参谋”的面痛斥顽固派，说：塘口坝血战的事实，就是要让那些假抗日、真投降的人看看，谁是抗日的先锋？他们说新四军游而不击，不能打仗。新四军血战繁昌，而他们自己却蹲在山上，连个屁也不敢放，骂新四军，帮鬼子说话，这不是汉奸是什么②？谭震林的话，使三战区的代表如坐针毡。会后第三天，那些“联络参谋”突然打点行装，来向谭震林辞行。他一边笑，一

① 《葛慧敏的回忆》。

② 《繁昌党史资料通讯》第1期，繁昌县党史办公室1985年1月编。

边挽留说：“怎么，诸位要走？塘口坝战斗之后，日军不会甘休。以后的战斗会更大，欢迎诸位继续督导。”为首的联络官一听，急忙推辞说：“哪里、哪里，一年来属下随谭司令官转战皖南，亲眼得见贵军忠诚抗战，坚贞不渝，令人钦佩之至。社会上说贵军游而不击实属流言。”^①谭震林又向这些联络官们指出，新四军将士浴血抗战，是诸位亲眼所见，想必不会说不知道。只是请你们回去以后，向先生们也说说这里的真实情况^②。联络官们连声说：“那是、那是，一定、一定。”于是向他请了一个长假。从此没再回到支队来。

为了加强党对苏南东路地区工作的领导，一九四〇年五月，谭震林奉命化名林俊，带了二十余名骨干力量，进入东路地区，主持该地区的党、政、军工作。苏南东路地区包括苏州、常熟、太仓、江阴、无锡这样一大片。苏州、太仓、常熟简称为“苏太常”，江阴、无锡、常州简称为“澄锡虞”。这个地区是有名的“鱼米之乡”，而且又邻近军事、经济的战略要地——上海。所以我党早在一九三八年夏天就在这里建立了抗日游击区，还在常熟桥乡成立了教导队，随后在此基础上正式成立了民抗部队。一九三九年四月，叶飞率新四军第六团，向无锡、江阴、常熟、苏州、太仓地区挺进，五月初，同民抗部队会合，合编为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十一月初，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陈毅即令叶飞率领“江抗”主力西进，开入扬州、泰州之间地区。“江抗”主力西进后，仅留下在阳澄湖养病的数十名伤病员和人数不多的地方常备队坚持斗争。这时，当地的顽固势力乘机猖獗起来，配合敌伪扼杀抗

^{①②}《繁昌党史资料通讯》第1期，中共繁昌县委党史办公室1985年1月编。

日力量，鱼食人民，无恶不作。为了反击国民党顽固势力的猖狂进攻，陈毅曾先后派遣杨浩庐、周达明、陈挺、吴仲超、何克希等干部到东路工作，同当地武装力量一起建立了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并开展游击战争。谭震林到达东路地区后，采取了以下措施：首先，以苏常太为基地，组织了东路军政会。由他任苏南区党委书记。统一领导了东路地区的工作。其次，将江南抗日义勇军改称为江南抗日救国军，由他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克希任副司令员，张开荆任参谋长，吴仲超任政治部副主任，并对东路地区的地方武装进行了整编，先后建立了七个武装支队。第三，打击顽敌武装。一九四〇年六月下旬，他派何克希率二支队从常熟的东乡出发，奔袭驻江阴王庄顽敌赵北部，将其击溃，俘虏了一批人。七月，他又指挥一支队在著名的港下战斗中将顽敌马乐鸣部彻底击溃，使其丧失了战斗力。从此解除了我根据地中的心腹大患，打开了向澄锡虞地区进军的通路，并以缴获的武器充实了江抗部队。第四，巩固和发展已取得的胜利。在巩固苏常太地区已经取得的胜利的基础上，他决定向东西两个方向发展，派部队向东打垮了盘踞在太仓的王士兰残部，打开了太仓地区的局面。接着挥师向西挺进，开辟澄锡虞地区，扩大了游击根据地。为了加强对澄锡虞地区的工作，十月，他将江抗司令部转移到该地区，使澄锡虞地区的抗日斗争很快开展起来。第五，在取得军事胜利的基础上，东路地区进行了政权建设。先建立了各界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的筹备会，接着建立了县、区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不久，正式改为抗日人民政府。到一九四〇年底，中共各级党委、人民武装，脱产的常备队和不脱产的自卫队，各种抗日群众组织，均相继建立。这样，东路地区的抗战工作进入鼎盛时期。当时，

除了县城、长江沿岸港口和锡沪公路上几个敌伪据点外，广大农村、市镇都是我们的抗日解放区。日寇不敢轻易下乡，地方反动武装已被消灭，人民欢欣鼓舞，热烈拥护共产党和抗日政府，青年踊跃参军。抗战教育也兴办起来，成立了东路教育委员会。总之，东路地区向着抗日根据地的规模在发展。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六日，谭震林以林俊作笔名在《大众报》上发表了《东路一年》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回顾了党领导东路地区人民进行抗日斗争走过的艰苦而又光荣的斗争历程，说：“这一年间，可以说是艰苦奋斗的一年！一年来不知流过了多少血，出过了多少汗，战胜了多少困难，克服了多少危机。而终于使那些企图时时消灭我们的人，也只好呆立不敢乱动，使我们成为今天东路抗战的灯塔。”他总结了一年来的斗争经验，指出，“一年奋斗的结果说明了只要有钢铁般的意志和决心，只要有泰山般的顽强性，能够正确的把握斗争的策略和方针，那是一定能够胜利的 and 发展的，任何动摇害怕，企图妥协调和而不愿坚决斗争的人，今天已证明他是绝对的错误，也指明了革命阵营内如有这种倾向，我们是应该反对的！”他最后说，我们担负的责任是很重，今天我们是完成了很小的一点，前途的胜利还需要我们更大的努力。顽固分子，还是继续顽固下去，那些土皇帝、匪头脑，他们还不愿意丢下屠刀，这些陈腐的垃圾还阻碍着我们的前进。我们大家应该在纪念东路成立周年纪念的时候，提高百倍的热忱而努力奋斗，达到最后胜利的目的。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决定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编为新四军第六师，任命谭震林为师长兼政治委员，并

仍兼苏南区党委书记^①。六师下辖两个旅：十六旅，旅长罗忠毅，政治委员廖海涛；十八旅，旅长江谓清，政治委员温玉成，参谋长夏光。五月底，谭震林由苏常太地区来到六师十六旅驻地——宜兴和桥。尔后，他又在罗忠毅、廖海涛的陪同下，渡过隔湖，长荡湖，来到原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驻过的溧阳地区。国民党顽固派得知谭震林到溧阳的消息后，妄图乘他情况不明，先发制人，命令国民党第四十师和挺进队，向我十六旅发动进攻。谭震林认为这一仗非打不可，而且必须打胜，只有这样才能挫灭顽固派的嚣张气焰。于是，他在溧阳戴巷小学召开的连以上干部会上，向大家传达党中央五月八日的指示精神，介绍当前苏南敌、伪、顽的情况，指出了中日矛盾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以及我党与之针锋相对的方针，明确对敌伪顽作战的战术和打法。他还提出“打到山里去，活捉顾祝同，为‘皖南事变’死难革命烈士报仇”的口号^②。为了做到打则必胜，他把预定战场选择在溧阳北部的黄金山。黄金山与金坛、句容、溧水等县连接，地势起伏，居高临下，还背靠我茅山根据地。在这里打仗对我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从五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他指挥十六旅连续三次粉碎了敌人的进攻。黄金山反顽战斗的胜利，使我苏南根据地更加巩固。

一九四一年夏，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彻底摧毁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强化伪政权，巩固敌占区，确保长江下游战略目标的目的，在江南集中了优势兵力，分期分批地进行“清乡”。这次“清乡”，敌伪吹嘘是日寇统治台湾，“扫荡”华北和蒋

^①谭震林的简历表。

^②王直：《黄金山三战三捷》（未刊），存葛慧敏处。

介石十年内战“剿共”经验的综合运用。其部署，首先从苏南东路地区开始，然后推向江北苏中沿江地区。苏南地区地处长江南岸，是通向上海、南京的军事战略要地，乃敌顽我必争之地。加之，苏南广大地区为我新四军、游击队所控制，因此，敌人把“清乡”的重点放在苏南，而首当其冲的又是苏常太地区。从七月一日开始，日军对苏常太进行“清乡”。由于当地党组织对敌情掌握不充分，对形势估计不足，因而使得这个地区的革命力量遭到了较大的损失。为了吸取教训，谭震林于八月底，在太仓县召开干部会，指出苏常太地区反“清乡”斗争失败的原因：第一，对形势估计不足，没有充分掌握敌、伪、顽的情况。看不到他们互相勾结，清乡是他们三位一体的集中行动。第二，我们的锄奸活动在掌握政策上过左，削弱了社会基础。第三，对敌人清乡计划，包括规模、步骤、兵力、方法等情况不明，因而反清乡斗争未能作出相应适当的部署^①。他最后要求大家，吸取教训，振奋精神，作好新的斗争的准备。会后，他对澄锡虞地区的反清乡斗争作了具体的安排，要求部队和地方干部进行有计划的撤退。结果澄锡虞地区在九月的反清乡斗争中不仅损失较小，而且还开辟了新区。

东路地区反清乡斗争的实践，为江南抗日根据地进行的反清乡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苏中领导斗争的粟裕，请谭震林到苏中给部队干部作了题为《江南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的报告。这个报告对后来苏中军民取得反清乡斗争的胜利起了积极的作用。一九八四年二月，叶飞在《悼念粟裕同志》一文中曾这样说道：苏中反清乡“这个胜利是总结了苏南东路（新四

^①复制件存军事科学院资料处。

军六师十八旅)地区反清乡斗争的经验”的结果。

为了加强对新四军所属部队工作的指导，一九四二年九月，新四军军部任命谭震林为军部巡视员，到各部队去检查，指导工作。十月，他在检查了苏中地区的工作后，在苏中党政军扩大会议上作了《对苏中区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报告》高度评价了苏中区工作取得的成绩，并提出了对苏中今后工作的意见。号召大家咬紧牙关，度过今后艰苦的两年，迎接将来的胜利。

一九四二年十月，谭震林调任新四军二师政治委员，兼淮南区党委书记。这时，淮南区党的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正在开展整风。他到任后，从调查中发现淮南区党的组织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开展，相互之间一团和气；一些负责干部中间，贪污腐化蜕化变质的现象严重；有的有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倾向；对非党干部、对有文化有技术的干部党员存在着不正确的看法；有的对党闹独立性；军事纪律不严格等等。虽然已开始了整风。但歪风并没有纠正。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谭震林在一九四三年初主持召开了淮南地区财经会议，揭露了财经工作上存在的严重弱点，特别是揭发了一些主要负责干部中间存在的贪污腐化、蜕化变质的现象。五月间，他又召开了淮南新铺干部会议，以整风的精神，继续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歪风。他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说：这次会议是淮南地区党的建设上空前的一次重要会议，是继续财经会议的精神而召开的。这次会议如果对边区财经会议来说，则是对过去财经工作做一个初步的总结；如果放在整风的意义上说。放在暴露我们所有弱点上来说，可以说是淮南党整风的开始。因此，这次会议的意义就很明显。他赞扬说，大家在会上毫不留情，好的

根本不说，把全部毛病在大会上暴露出来，这是空前的。他希望把大会这种开展批评的精神展开到各工作部门去，从上而下，从下而上，从区党委、地委、县委以至贯彻到每一个支部、每一个连队、每一个工作部门中去^①。由于财经会议和新铺会议揭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对大家震动较大，所以这段整风搞得比较严肃认真，绝大多数干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整风到八月底基本结束。八月二十八日，谭震林在淮南区党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作了《整风工作初步总结报告》^②。一九四三年，新四军军部在向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对这次整风曾这样写道：淮南部队“自春季新铺会议以整风精神开展反对贪污腐化、官僚主义、各自为政的现象斗争后，检查各地区部队与此相类似的倾向，均相当严重。经此教育后再加干部的调整。现有进步，内部不团结的现象逐渐消除。”^③

谭震林在淮南工作期间十分关心农民的精神粮食。一九四三年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达到淮南以后，他把《淮南日报》社正副社长找去，对他们说：“毛主席号召为工农兵服务，我们办报纸的，也要面向工农兵，还是办一个农民刊物吧！”^④于是决定创办《淮南大众》。《淮南大众》在筹备过程中，谭震林以延安的通俗大众报纸为榜样，向淮南日报社的有关同志交待：我们淮南三百万人民，工农兵占绝大多数，办报也要面向他们！根据我在中央苏区的经验，作为群众性的刊物，要图文并茂，读物要通俗易懂^⑤！不久，为淮南农民所喜闻乐见的《淮南大众》诞生了。

①②③复制件存军事科学院资料处。

④⑤《江苏盱眙史志资料》第5期，盱眙县1983年5月编。

转战华东战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北移山东，华中局改组成华东局，统一领导华中、山东的全盘工作。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北上后，另在华中组成华中分局、华中军区，将新四军留在华中地区的部队组成华中野战军，谭震林任华中分局副书记、华中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华中野战军政治委员。这时，蒋介石一面准备进行全面内战，一面伪装和平，妄图将破坏和平的罪责加在中国共产党头上，为内战制造借口。谭震林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对将要发生的内战，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和清醒的头脑。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他发表《时局的问题》一文，精辟地指出：内战是否真正停止了？美国反动派和蒋介石是不愿停止内战的，他们希望成为美国式的中华。日寇投降后，蒋介石第一道命令是要解放区部队不要动，第二道命令是要日伪停止待命，第三道命令是联合敌、伪、顽加上美国武装进攻解放区，结果他们都打了败仗。解放区以力量叫内战停止。蒋介石元旦讲演还是那一套，延安、美国、苏联都给以一铁拳，告诉他再唱老调不行。和平是压迫来的，内战是压迫他停止的，压力是日益上涨的。因此得出结论，内战要停止，和平要巩固，民主要实现，还要经过困难曲折的道路。对于为什么蒋介石不愿停止内战，为什么蒋介石要耍两面派手法？他在文章中回答说，这是蒋介石的本质，是蒋介石一贯的流氓手段决定的。他还针对美蒋反对派想用原子弹吓唬人民群众，吓唬我党我军，鼓吹什么原子时代，原子外交的骗人把戏，指出：原子弹是厉害，但决定一

切的是人，发明原子弹的专家，首先反对用原子弹进行战争。尽管美蒋反动派手中有原子弹，有先进技术装备，但是他们还是打不过我们“土包子”，土炸弹，所以我们不要怕他们那一套。一切要依靠解放区，一切依靠自己的力量，一切要依靠一万万二千万人民^①。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他在华中分局扩大会议上说：前途虽是光明的，但道路是迂回的曲折的，一定要克服许多困难才能得到最后胜利。因为美国是世界最后的反动堡垒，中国反动派的力量仍然强大，一时一刻也没有放弃推翻和平破坏民主，放弃撕毁协定的企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存在，无论如何不愿中国实现民主。他指出，谈判的基本方针是寸土必争，方式是和平的，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还可以用军事手段。军事上要有充分准备，随时可能遇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部队要好好整训，为自己练兵，大量发展党，切实把民兵工作做好，抽调一部分优秀战士任民兵干部。要在两三年内，把解放区人民生活提高到丰衣足食^②。他还十分注意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使干部战士从思想上作好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六月三日，他在对部队所作的《关于政治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部队思想上要解决的问题：第一，随时准备自卫，防止国民党大举进攻。第二，对抗战八年中涌进的大批知识青年进行教育，解决对蒋介石本质认识不足的问题。他明确指出部队的中心工作是三件大事：一是进行思想教育，二是练兵，野战军以运动战为主体，地方部队以游击战为主。三是整编，提高部队战斗力^③。根据这些指示精神，华中野战军所属部队，利用战斗和行军的间隙，结合形势，传达了党的第七次全

①②③复制件存军事科学院资料处。

国代表大会的精神，进行了形势任务教育和阶级教育，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克服了某些同志的“抗战已胜利，可以解甲归田”的思想和不愿意离开本乡本土的情绪。这一切，都从思想上、组织上为我军完成新的战略转变奠定了基础。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七月，国民党以四倍于我的兵力进攻苏中解放区。谭震林和粟裕一起，指挥华中野战军经过一个半月时间，在苏中地区的泰兴、如皋、海安、邵伯等地，取得了七战七捷的重大胜利，歼灭了国民党汤恩伯部队的六个旅、五个交通警察大队，合计五万多人，占汤恩伯进攻兵力的百分之四十。这些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敢打必胜的信心，并为战争初期的作战指导提供了实践经验。谭震林后来在回顾这一段战斗经历时说：“这几十天各级干部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课，学得了打仗的经验，开始从实践中领会和运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了，这个收获可是了不起，意义大得很。”^①

一九四六年七、八月间，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淮南、淮北。当我华中野战军主力撤离这两个地区时，一部分干部战士思想上产生了波动。为了端正这部分同志的认识，增强必胜的信心，十一月十五日，谭震林发表了《对目前自卫战争应有的认识》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说：两淮失守，不可否认对我华中整个作战是有极大影响的。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困难，尤其是运输的困难，将为更大。但是，两淮失守是否等于我军已失败不能再战呢？不能这样说，也不能这样想。事实上两淮失守不是我们没有力量保卫两淮，而是敌人乘我主力未到钻了一个空

^① 《谭震林的回忆》。

子，这并不是敌人之强，我们打不过他。他强调说：战争的胜败，决定在有生力量之消长，不决定在某些土地之得失。两淮的失守虽是给我们很大的困难，但决不是克服不了的困难。当前敌人只有四个军（十个师），如果我们把他的六个师消灭了，那末敌人即陷于被动地位，失掉机动兵力，我们就有可能用拔钉战的方法。把所失城市一个一个的收回来，转而展开攻势，改变局势，逼蒋就范的时候就会很快到来。他最后指出，蒋介石加上一个美国，似乎这个敌人很强大。美国的飞机、大炮、军火、交通工具把蒋介石近代化起来，因此战争也进入了近代化，这一点我们比不上蒋介石，困难较之更多。但是，八年抗战的经验证明，我们能打败一个近代化的日本加上汪精卫，那末，我们就有充分可能打败美帝国主义加上蒋介石^①。这篇文章的发表对于澄清干部战士中的模糊认识，增强部队的斗志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了进一步增强干部战士的信心，十二月一日，他向华中野战军直属部队作了《关于目前国际国内及华中形势》的报告。在谈到国际形势时，他说：现在国际形势，正是世界人民赢得了战争与继续在赢得和平的时候。斯大林说“人民赢得了战争，也要赢得和平”。现在美帝国主义企图霸占世界，这只是反动势力愈益走向崩溃的回光反照。而人民的力量正在大踏步的走向空前的发展和巩固。这与第二次大战前的形势是完全不同了。人民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锻炼，人民的势力变得广大了，变得强硬了。这是一个基本的变动，今天任何反动派再想造成二次大战前一样包围人民势力的“美妙”形势，都将是“徒劳无功”的了。这个胜利形势的到来亦

^①复制件存军事科学院资料处。

不是简单的，而是经过许多艰苦、错综复杂的斗争取得来的，这不仅是要打仗打得胜利，而且要议会斗争及胜利。这个胜利的形势，与日益走向崩溃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比较起来，真犹如太阳雪山相照，太阳终是光芒万丈，而雪山则日益熔解了。现在世界的形势，一方面是人民力量蒸蒸日上，反动势力日渐削弱走向崩溃；一方面是反动势力企图代替德国霸占世界，而人民进行坚决的反抗。一个是进步的发展的，一个是反动的下降的，从这个简单的比喻里，让我们推想一下，就可以确定今后世界是反动还是进步的了。他在谈到国内形势时说：

“国内形势亦正如国际形势一样，是人民力量普遍猛烈的发展，反动力量日渐走向崩溃与瓦解。蒋介石的计划，是要“借刀杀人”，企图在抗战中利用敌伪夹击我们，把人民的力量来“斩草除根”，但由于我们的英勇奋斗，坚持不懈，反动派的这一迷梦不但是粉碎了，而且我们更加几十倍地发展了，而反动派自身更加削弱了，这就是俗语说的“偷鸡不着蚀把米。”他还谈到了华中的形势，他说：涟水战役的胜利，稳定了华中，再经过一两次战役，我们便完全掌握主动，开始反攻。但是，要看到南京是蒋介石做“总统”的地方，与我一江之隔，他还可能从别的战场抽出兵来，所以华中斗争比其他的战略区都要艰苦，但只要我们认清困难，努力克服困难，蒋介石是阻挠不了我们收复华中的^①。他的这个报告，使干部战士受到了鼓舞，在困难中看到了光明和胜利的前途。

一九四六年底，我华中野战军连续取得胜利，华东的主要战场转到了山东境内。此时，蒋介石在全国的全面进攻已濒于

^①复制件存军事科学院资料处。

破产。为了用胜利的捷报鼓舞部队，教育干部战士在胜利的情况下保持清醒的头脑，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谭震林在山东海防对干部战士作了《关于目前时局的讲话》。他告诉大家，形势的发展对我党我军有利。从军事上看，我们在质量上、数量上均要占优势了。我们愈打愈多，愈打愈强。蒋军愈打愈少，愈打愈弱。从政治上看，蒋介石的声望日益低落，已从天上掉到了地下。群众发生了变化，已从旁观者转到奋斗者。他告诫大家，要取得最后胜利，事情是不那么容易，还有困难，还可能失败。一定要克服游击主义、农民意识、保守思想，必须提倡艰苦奋斗，克服财政方面的困难^①。

一九四七年初，战争的发展对我军越来越有利。党中央、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提出了“必须在今后几个月中再歼蒋军四十至五十个旅”的作战任务，要求华东部队，在一个半月至两个月内再歼敌十个旅左右的兵力，以配合其他战场的反攻，并为自己转入战略反攻创造条件。为了胜利完成中央赋予的任务，一九四七年一月，华东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进行了统一整编，正式组成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和党的“华野”前委。谭震林被任命为野战军副政治委员。此后，他积极协助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坚决贯彻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开展政治思想工作。首先，他十分重视对部队进行形势和任务的教育，经常通过写文章、作报告等形式，把形势和任务的每一新变化及时告诉干部、战士，使大家心中有全局，明确奋斗的目标，自觉地为实现党的方针、政策而奋斗。其次，他注意教育干部、战士增强政策纪律观念。他告诉大

^①复制件存军事科学院资料处。

家，我们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有坚强组织纪律的人民军队。它的一举一动，都有着明确的目的，有组织有秩序，任何混乱现象是不准存在的。每一革命军人，爱护自己军队的纪律秩序，就要象爱护自己的生命眼睛一样。再次，他在做好部队政治工作的同时，还经常关心地方党组织的支前工作。他常常出席地方党政机关召开的会议，逢会必讲搞好支前工作的重要意义^①。另外，他还重视总结指导战争的经验。他认为，各级指挥员都要在战争实践中虚心学习、细心研究战争的经验，实行“以战教战”，努力提高自己的战争指导艺术。他不仅这样说，而且亲自认真总结了部队在攻坚、打敌地堡、巷战等方面的经验，并在报刊上发表，为下级干部做出了好样子。对于他做政治思想工作这些得力的措施，陈毅在解放后曾作过很高的评价。陈毅说：“至于我自己，在政治上依靠的是谭震林同志；在军事组织指挥上依靠的是粟裕同志。不妨说，我也只不过是这么一个点点头、摇摇头的司令嘛！”^②这段谈话的话语，一方面反映出陈毅虚怀若谷的革命家风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谭震林在政治工作方面所作的贡献。

一九四七年夏，党中央、毛泽东为争取整个军事形势的转变，把中国革命推向新的高潮，规定“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

① 《谭震林的回忆》。

② 《军事学术》第1期，军事科学院1983年1月出版。

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恢复失地。”^①华东局、华野前委遵照这一指示，确定由陈毅、粟裕率领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第十纵队和特种兵纵队，组成外线兵团，执行外线进攻作战任务；以谭震林同许世友率领第二、第七、第九纵队及由胶东军区新组建的第十三纵队，组成内线兵团，担负内线作战任务。内线兵团组成后，立即在山东诸城、昌邑地区进行休整。这时，谭震林及时向各部队进行了形势任务教育，使部队增强全局观念，稳定坚持内线作战的思想，树立保卫山东基地的光荣感，提高争取最后胜利的信心。休整后，按照作战计划，谭震林率第二、第七纵队和从鲁南返回的独立师、第十师及滨海地方武装集结在诸城地区作战，威胁进犯胶东敌人的侧背，消耗和疲惫敌人。九月，国民党胶东兵团第六十四师一部南犯诸城。谭震林立即指挥第二、第七纵队及独立师、第十师等部在给敌以必要打击后，九月二十四日挥戈北上，与由大泽山区继续南下的许世友指挥的第九纵队会师于高密以西朱阳地区。他们乘敌分兵轻进的有利时机，以第二、第九纵队聚歼六十四师主力于胶河以西饮马地区，从而取得了胶河战役的胜利。胶河战役是我内线兵团在保卫胶东作战中的第一个规模较大的战役，歼敌一万二千余人，破坏了敌人在胶东歼灭我军的计划，使山东战场我军转入反攻。接着，谭震林又与许世友指挥内线兵团歼灭了诸城守敌，解放了胶县，攻克了莱阳，取得了胶东战役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山东战场的敌我形势，有力地配合了外线兵团的战役进攻，为恢复山东一切失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26页。

一九四八年初，中央军委决定将内线兵团改成山东兵团，以许世友为司令、谭震林兼政治委员，继续执行内线歼敌任务。从一九四八年三月起，山东兵团先后发动了胶济线西段战役、潍县战役和兖州战役，歼敌十四万五千余人，解放了除济南、青岛、临沂等少数城市以外的山东广大地区，使山东军事形势起了巨大变化。

同年九月，根据中央军委、“华野”前委的指示，谭震林同粟裕、许世友、王建安、李迎希一起，统一指挥了攻打济南的东、西两个集团的部队。谭震林在战前的干部动员会上提出了“打下济南府，活捉王耀武”^①的口号，激励着参战部队奋勇向前。为了分化瓦解敌军，他利用国民党将领吴化文同王耀武的矛盾，秘密派人作吴的工作，促使吴率部起义。济南战役经过八昼夜的激战，全歼守敌十万余人，活捉王耀武等高级将领二十三名，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济南解放后，临沂、烟台、菏泽等地守敌，先后弃城逃跑，从此山东全境除青岛及南部边缘少数据点外，均获解放。这次战役的胜利，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鼓舞了解放区人民群众的斗志，增强了解放区支援战争的力量，严重地打击了敌人的重点防御和坚守大城市的信心。

在济南战役接近结束时，华东野战军前委即向中央军委提出了组织淮海战役的建议。军委批准了这一建议，并决定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总前委，以邓小平为书记，负责统筹之责。淮海战役打响后，谭震林同山东兵团副司令王建安一起指挥山东兵团三个纵队，从临城枣庄一线

^①金治：《铁马秋风战陇海》（未刊），存葛慧敏处。

向南攻击，突破运河，猛插陇海铁路。接着，部队又乘胜前进，同兄弟部队一起围歼了黄伯韬兵团。

淮海战役结束后，华东我军立即转入了整训。整训期间，中央军委对全军实施统一整编，华东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谭震林被任命为三野第一副政治委员。

为迅速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央军委命令第二、第三野战军在总前委统一指挥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协同下，准备渡江作战，解放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及苏南、皖南、浙江地区，歼灭该区之敌，捣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老巢。总前委根据上述指示，结合敌江防情况，拟制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以第二野战军组成西作战集团，以第三野战军组成中、东、南三个作战集团。第三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指示，决定中集团由第七、第九兵团，共七个军，三十万人组成，谭震林兼任七兵团政治委员，负责指挥中集团所属部队。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当晚，中集团在谭震林的指挥下，首先在裕溪口至棕阳镇段展开渡江，二十一日凌晨突击队已建立了滩头阵地，掩护后续部队登陆向纵深发展。二十三日，谭震林随七兵团指挥所渡江进至安徽繁昌。这时，他接到中央军委关于七兵团进杭州，接管整个杭州的命令。五月三日，他随部队进驻杭州后，一方面指挥七兵团向浙江全境进军，一方面领导全省党政军民开始了建设新杭州的战斗。

在建设新中国的日日夜夜

谭震林率领七兵团进驻杭州后，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浙江是蒋介石和陈立夫、陈果夫的老家，是国民党的“模范省”。这时，整个浙江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匪患严重，物价飞涨，交通中断，谣言四起，投机商活跃，群众生活困难。为了迅速从困难中打开局面，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他在进杭州的第三天就主持召开了省委会议，果断决定：各路干部迅速会师，集中力量接管城市，实行战略展开。五月十日，杭州市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各路干部会师大会，他在讲话中阐明了浙江省的形势，指出了当前的任务，要求南下干部、原在地方坚持斗争的干部和野战军派出的干部要紧密团结起来，为圆满完成接管城市的任务而斗争。

在接管过程中，谭震林紧紧抓住思想教育这个中心环节，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武装党员、干部，统一大家的思想。他在各种场合，都反复教育干部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进攻。他说“我们今天是接管杭州，而不是钻进杭州”，“我们同旧人员接近，要向他们学习的是技术，而不是腐化生活”^①。他还要求大家虚心学习，善于学习，说：“我们过去是赶牛的，拿锄头的，现在放下了锄头，放掉了牛，来领导工厂，就要努力学习，不要再当‘阿木林’。”^②由于党员、干部思想端正，发扬了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所以接管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前后只有个把月时间，除了温州、丽水以外，其它地区都胜利完成了接管任务。

接管城市涉及的面很广，各地普遍感到干部严重不足。于是，谭震林提出了培养十万干部的宏大计划，并且发动党、

^{①②}李丰平、王芳、薛驹：《深切怀念谭震林同志》（未刊），存葛慧敏处。

政、军、工、农、青、妇各个方面，大胆选拔积极分子，通过党校、干校和实际斗争来培养干部。省委党校每期举行开学典礼时，他常常去讲话，勉励学员们努力学习，使自己变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各行各业的“管理专家”^①。到一九五〇年，全省仅脱产干部就达到八万一千多人，连同不脱产的干部在内，总数大大超过了十万的计划。

在怎样管理好浙江这个问题上，谭震林认为，仅仅靠党员干部是不够的，还必须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把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把能调动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他说：许多人以为我们有三头六臂，其实我们也一样土脑土气，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唯有一种武器——劳动人民加上马列主义真理。这种武器比孙悟空的金箍棒还要厉害得多^②。他先后组织召开了省的党代会、农代会、工代会、青代会、妇代会、城市各界代表会，把各方面的群众组织建立了起来。他在许多会上都讲了话，动员各阶层人士共同担负起建设新浙江的光荣任务。当时各界的代表人物，如马寅初、包达三等都安排了重要职务。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吴化文，也安排当了省交通厅厅长。他教育党员干部要尊重、信任这些非党人士。他说，我们不允许任何一个共产党员，对一切非党同志有宗派行为。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要用人家，就不能疑人家^③。在他的亲自过问下，还为受到错误处理的一百六十二名地下党员进行了甄别，恢复了他们的党组织关系。这样，各方面的力量很快就紧紧团结在省委的周围，为建设新浙江而奋斗。

①②③李丰平、王芳、薛驹：《深切怀念谭震林同志》。

在进行接管城市工作的同时，谭震林动员全省党、政、军、民，全力以赴，开展大规模的剿匪斗争。他提出“军事清剿、政治攻势与群众武装自卫三者必须密切结合，而又以群众武装自卫为中心”^①的方针，并指出，军事清剿，必须克服大兵团作战的作风，重新学习游击战，分散驻剿，远袭穷追，善于利用俘匪与降匪。开展政治攻势，必须进行广泛宣传，控制保甲，召开匪属会议。群众武装自卫，必须表明我剿匪决心，争取主动，不使群众自己武装吃亏^②。在剿匪斗争中，有的地区领导干部由于对上述方针领会不深，曾发生“左”的乱捕、乱打与个别乱杀及逼、供、信等现象和对降匪不加教育管制，不加辨别真伪等右倾麻痹现象。他及时地对这两种倾向进行了教育和制止，使剿匪斗争在很短的时期内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九五〇年初，浙江大陆几万公开的股匪与散匪已经基本消灭，全省秩序日趋稳定。

在完成接管城市的任务之后，谭震林毅然提出把全省工作重心转入农村。当时有的干部机械地理解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不赞成把工作重心放到农村去，不愿意到农村去工作。他针对这种思想，耐心地做了许多说服教育工作。在省委扩大会议上，他指出：二中全会提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依靠城市领导农村建设中国，这是今后的总方针、总任务。目前我们把工作重心暂时放到农村，与这个总方针、总任务并不矛盾。把工作重心和主要力量放到农村，并不是忽视城市，而是为了更好地克服当前城市遇到的困难，这正是有力地工作^③。不久，省委的这一决定，得到了华东局和中央的批准。于是，省

①②《工作情况》第2卷第3期，中共华东局1950年2月编。

③谭启龙：《怀念谭震林同志》，载《人物》1984年第6期。

委从城市机关、部队、学校抽调三万干部和青年学生下乡，协助基层党组织完成剿匪、反霸、减租、合理负担、生产救灾和建立组织等六大任务。这些工作由于抓住了浙江当时的主要问题，迅速稳定了革命秩序，激励了广大军民和干部的斗志，发展了生产，打开了全省的工作局面。

一九五〇年六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做好土地改革、整风等工作。会后，谭震林积极领导全省军民为实现三中全会提出的任务而奋斗。在土地改革中，他一再强调不要照搬照套老区的经验。他说：“今天是治天下的环境，环境变了，我们的政策、方法也应该变。”^①为了摸索新环境下进行土地改革的经验，在他的指导下，土改工作进行了典型试验，并召开了全省土改试验会议，总结交流了经验。在整风中，他针对干部中存在的命令主义、官僚主义、骄傲情绪等问题，采取开办党校、训练班、总结工作、召开各种干部会等形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觉悟。在镇反中，他注重了广泛发动群众，深入调查研究，进行反动党、团、特务的登记，雷厉风行地打击反革命分子。仅三个月，就捕杀了一批匪首、惯匪、恶霸及特务分子。两千多名土匪自动投降。浙江在镇反中取得的显著成绩，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表扬。

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完成以后，谭震林雄心勃勃，进一步提出了“建设新浙江”的口号。他的具体的战略设想是：“三年准备，十年建设，发展农业，建设工业”^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谭震林几乎倾注了全部精力。他从轻工业抓起，经过深

①李丰平、王芳、薛驹：《深切怀念谭震林同志》。

②谭启龙：《怀念谭震林同志》。

入实际，调查研究，主持建成了第一个麻纺厂。为了解决麻纺厂的原材料问题，他提出兴办钱塘江乔司农场和绍兴东湖农场。接着他又观察新安江，着手规划修建新安江水电站。他还提出，要把杭州建设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要把各地的名花、名树都移植到杭州来，让杭州与瑞士的日内瓦媲美^①。他亲临现场指挥，改造西湖，建立大型植物园。

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谭震林很注意爱护知识分子，把他们看作是建设新浙江的宝贵财富。一九四九年九月，他在浙江省第一次党代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对于技术专家、学者，我们必须大胆而诚恳地、虚心地与他们合作，向他们学习，放手让他们工作。必须认识，这是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很大的一批财产，是很有用的财产，是新中国建设不可缺少的力量”^② 他还提出要把技术人员当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③。一位解放前曾在外国学习过蚕丝技术的女技术员，回国后，看到祖国的蚕丝业很落后，立志为改变这种状况贡献力量。她发誓不结婚，一心一意搞蚕丝技术，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她办的厂子里生产出来的丝织品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可以不经检查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杭州解放后，有人向谭震林谈起这件事，他说，为了事业不结婚的很少，尤其是女同志更难能可贵，这样的人才要好好保护。他主张把她作为蚕丝方面的代表树起来。在一次运动中，有人说这位女技术员是资方代理人，主张进行批斗，撤去领导职务。他知道后，坚决制止了这种错误的做法。在他的保护下，这位科技人员为我国蚕丝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①谭启龙：《怀念谭震林同志》。

②③《翟翥武的回忆》（1984年5月），存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

献。

一九五二年夏，谭震林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主任、工业企业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十月，中央决定苏南区、苏北区、南京市三地区合并建立江苏省，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谭震林兼任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在这段时间，中央号召成立中医学会，他积极响应，召集华东区不少名医到上海开会，并在会上讲了话。他认为，中医是中国医学的好传统，是宝贝，可以解决西医的不足，特别是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会后，在华东各省成立了中医研究院，收集了不少中医处方和祖传秘方。一九五三年，他又兼任治淮委员会主任，为治理淮河而运筹策划。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谭震林调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这段时间，他常被中央派往浙江、江苏等省检查工作。每次外出，他不仅肯定省委取得的成绩，而且善于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找出问题的原因，并同省委领导同志一起研究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九五六年九月，谭震林参加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不久，书记处分工他主管农村工作。从此，他为完成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探索我国农业发展的道路而努力工作。一九五八年五月，谭震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说明》。同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八届五中全会，被增补为政治局委员。六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治、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他被任命为财经小组组长。这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党的“左”的指导思想，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在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

结果犯了“大跃进”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也宣传过“左”的口号。对于这个深刻的教训，他是常常记在心上的。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他对一九五八年农业指导上的缺点和失误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在一九八二年五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他在发言中再次作了自我批评。后来，在他逝世后发表的遗作《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一文中又写到：“在批‘小脚女人’之后不久，我曾主管过一个时期的农业工作，我仍然没有从这件事吸取教训，没有当好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参谋，我们党在农村工作方面所犯的错误，特别是一九五八年所犯的错误，我是负有责任的。我愿在这里再次提到，以便同志们记取这个教训，使工作能做得好一些。”^①这些都充分表现了他无私无畏的坦荡襟怀。

一九五八年底开始，党中央及地方领导人相继到农村调查研究。谭震林到了山西、湖南，参加了那里的各种干部会议，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一九五九年四月，他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说到，必须彻底解决权力下放、算清帐目、包产指标这三个问题。毛泽东在回信中肯定了这几个问题。同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六〇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全党重新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并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了制定贯彻八字方针的具体政策，谭震林同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一样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並在河南七里营公社主要调查解决了生产大队分为生产

^①1983年12月7日《人民日报》。

小队的问题，公共食堂问题，生产小队怎样进行管理的问题。在调查中，他明确地提出生产小队要搞地段责任制，要有根据具体情况包农活的思想。他批评了那种把包工包产到户称为“资本主义”、“退到单干”的错误说法。一九六二年冬，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为了加强和统一对农业和林业的领导，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农林办公室。十一月九日，谭震林被任命为农林办公室主任。

由于毛泽东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有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谭震林出席了会议。十六日当他听到陈伯达所作的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中提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是反对革命的路线，是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时，当即进行了批评。他认为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提法不妥当，否定了党的领导。对于他的批评，陈伯达一直耿耿于怀，试图寻机报复。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群众代表时，公开造谣说谭震林在农口搞的夺权是典型的假夺权。为了澄清是非，谭震林在周恩来的指导下，连夜给毛泽东写了报告，说明农口的群众运动和夺权的情况。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接到报告的第三天，在报告上批示：这个报告很好，有阶级分析，所提意见也是正确的。要周恩来将其发到更大的范围内一阅^①。周恩来在副总理一级的范围内作了传达，

^① 《谭震林的回忆》。

挫败了陈伯达的阴谋。

一九六七年初，在上海所谓“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全国展开了夺权斗争。面对这种情形，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忧心如焚。他们对党的前途担心，为国家的命运忧虑，同时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表示极大愤懑。在二月十四日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碰头会上，中央政治局委员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和谷牧，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了强烈不满。会上，江青一伙诬蔑谭震林要造毛泽东的反。谭震林对此非常气愤。散会后，他给陈伯达打电话进行了义正辞严地驳斥。当晚，他怒气难消，感到口说无凭，想写信作为正式的抗议。十五日起床后，他给江青、陈伯达写了一封信，讥讽地说，你们的本领是很大的，可以动员全国的学生，包括小学、中学、大学。那么，你们到我所到过的任何一个地区去了解，能找到我有哪一句话是反毛主席的，算你们有本事。你们一句也找不到^①。十六日，碰头会继续进行。他在会上，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他责问张春桥：为什么无理扣押陈丕显？张春桥推说：群众不答应呵！他严肃地说：“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张春桥回答：“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他激愤地指着张春桥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就是你们领导的呵！”他尖锐地指出：“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他

^① 《谭震林的回忆》。

还对张春桥等人说：“你们的目的是，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的打光。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又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他越讲越气愤，霍地站了起来，穿衣服，拿文件，边走边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干不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①周恩来要他回来，不要走。陈毅说：“不要走，要留在这里面斗争！”他回来坐下，听着其他老同志义正辞严的发言，心里更加不平静。他后来无限感慨地说：我过去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有孩子，只是背地里流泪^②。二月十六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的记录，经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二月十七日，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昨天碰头会议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上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尖锐指出，江青“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许多高级干部“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他进一步指出，江青一伙“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

①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531页。

② 《谭震林的回忆》。

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斗下去，拚下去。”^①这封信充分表现出谭震林疾恶如仇，刚直不阿，不顾个人的荣辱安危的革命精神和极其敏锐的政治眼光。二月十九日，林彪将这封信送毛泽东阅时，别有用心地写了一封信，竟说什么“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在信上批示：“恩来阅，退林彪”。林彪满以为可以从中捞到一点好处，结果事与愿违，气得把文件扯碎扔进痰盂。当晚，毛泽东当面严厉批评了谭震林等老同志，政治局多数成员的意见被否定。从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十八日，党中央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会”，以“二月逆流”的罪名，对谭震林等进行批判。从此，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他也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三月八日，江青一伙从打倒谭震林入手，开始所谓的“三八冲击”，把党中央内部的问题公诸于众，诬蔑谭震林一月十七日的报告是“欺骗毛主席”。江青一伙还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在社会上掀起大规模地反击所谓的“二月逆流”的浪潮。三月十四日，北京街头有十万人示威游行，反击所谓“二月逆流”。全国到处张贴着“谭震林欺骗毛主席、罪该万死”、“谭震林的黑报告是‘二月逆流’的宣言书”等大幅标语，到处响起“打倒谭震林”的口号。四月三十日夜，毛泽东要江青出面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开了团结会。当晚，周恩来拟定了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的名单，经毛泽东批准，请这

^①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第552页。

些老同志同首都人民一起，欢度“五一”节。八月的一天，江青一伙指使人把陈毅、谭震林、余秋里等老同志弄到万人大会上进行批斗。十一月，江青一伙利用国家气象局政治部副主任任开盾被学生打死的事大作文章，诬指是“谭震林的阶级报复”。一九六八年三月初，他的家被抄，身边工作人员、警卫人员全部撤走，各种文件被没收。同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十万人大会上。江青公开诬陷“谭震林是大叛徒”，会后掀起了所谓反对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右倾翻案风”，欲置谭震林及其他老同志于死地而后快。四月初，谭震林的家再次被抄。从此，他与家人隔绝起来，不能见面。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他被送到广西进行“劳动改造”。

一九七三年三月，谭震林重新回到了北京，并住进医院检查治疗。八月，他参加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七五年一月，他又参加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副委员长。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谭震林感到无比的高兴。消息公布的这天晚上，他兴奋得彻夜未眠。这时，他已是七十四岁高龄，仍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人民的利益奋斗。他说尽管自己腿足不方便，但还可以动手写，用口讲，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一九七七年八月，他参加了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年底，他重访井冈山，故地重游，感慨万千，即兴写下《重访井冈山》诗一首：

二十五岁上井冈，

七十五岁又重访，

五十年来奋斗紧，
内外妖魔皆除光；
反复搏斗从未停，
天翻地覆慨而慷，
一切归功毛主席，
一切归功共产党。

他登上黄洋界，放眼群山，激动不已，又吟诗一首：

健步登上黄洋界，
险境一眼览，
主席诗词刻石上，
朱总亲笔留，
子孙万代易辨清，
冒充也无虑。

一九七八年二月，谭震林参加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的头两年，党的工作呈现徘徊前进的局面。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挺身而出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宣传党的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在这场大是大非的争论中，谭震林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一九七八年下半年，他为《红旗》杂志写了纪念毛泽东诞辰八十五周年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通过回顾毛泽东的伟大实践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深刻地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列主义的真理，有力地驳斥了“两个凡

是”的荒谬论调，使广大党员和群众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解放起了积极的作用。

一九七八年底，谭震林参加了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和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他同其他许多中央委员一道提出，必须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重大的是非问题。他提议由陈云负责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后，他通过写文章、作报告，热情地宣传了党的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谭震林平反的通知。《通知》指出，“谭震林同志历史清楚，没有政治问题”。“林彪、‘四人帮’诬陷谭震林同志为叛徒等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

一九八二年九月，谭震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因年老体弱，退居第二线，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一九八三年九月三十日，谭震林在北京逝世。十月二日，中共中央、中央顾问委员会发表了讣告，并组成治丧委员会。十月四日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代表两千人，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前往北京医院向谭震林的遗体告别。十月五日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首都各界群众三千多人，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谭震林追悼大会。追悼会由邓小平主持，胡耀邦致悼词。悼词说：谭震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军队和我国人民的重大损失。悼念谭震林同志，我们要学习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几十年来，他不论是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还是在远离党中

央、毛泽东同志而独立作战的情况下，不论是在革命顺利发展的时候，还是在革命遭受挫折的时候，他都坚定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都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坚信共产主义事业的必定胜利。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坚决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准确地完整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要求，同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作斗争。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地与党中央在政治上、思想上保持一致，直到临终前一天，他还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无限欣慰。悼念谭震林同志，我们要学习他坚持原则，无私无畏的高风亮节。他襟怀坦荡，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五十年代末，当发现他在农业指导上有缺点和失误的时候，他主动承担责任，及时纠正，坚决执行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党性原则。在十年内乱期间，他疾恶如仇，刚直不阿，不顾个人的荣辱安危，对林彪、“四人帮”打倒一切、破坏生产的倒行逆施，直言上书，面折廷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悼念谭震林同志，我们要学习他对革命的高度事业心和责任感。凡是党交给的任务和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都不畏艰难，勇于承担。他朝气蓬勃，处事果断，敢于负责。他讲究效率，富于创新精神，善于打开局面。他的这种热情实干的精神，在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今天，值得我们很好学习。悼念谭震林同志，我们要学习他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他对下级，对群众，都能平等相待，谦虚诚恳。他善于听取和集中群众的意见，接受新鲜事物。他对干部严格要求，热情帮助，关心干部的成长。悼念谭震林同志，我们要学习他刻苦学习，勤于思

考，勇于进取的良好学风。他出身工人，原有文化水平不高，但他在担负繁重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中，仍能以惊人的毅力，努力学文化、学理论、学习专业知识。他起草报告、文件，经常亲自动手。这些都是很可贵的。悼词最后说，谭震林同志同我们永别了。他的功绩永垂史册。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纲领而奋斗。十月六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和日本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石桥政嗣，以及日本友好人士清水正夫等，分别向我国党、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发来唁电，对谭震林的不幸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金日成主席在唁电中说：“谭震林同志虽然逝世了，但他长期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繁荣发展贡献的业绩将永放光辉。”

作者附记：

一、此稿是在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的大力帮助下，在福建、湖南、江西、浙江等省的领导同志和有关党史办，以及军事博物馆、军事科学院一些同志的支持、协助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林蕴晖的具体指导下完成的，在此谨表谢意。

二、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除已注明出处者外，还有：

1. 《谭震林同志早期在茶陵》。
2. 《‘第二故乡’人民的怀念》。
3. 《访陈士榘同志记录》。
4. 《建立工农兵政府》。
5. 《工农兵政府》。
6. 《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个红色政权》。
7. 《赤卫队在1927年冬上井冈山的情况》。

8. 《谭震林谈关于县工农兵政府》。
9. 《赖毅同志谈茶陵县工农兵政府》。
10. 《一九二七年县成立工农兵政府的初步情况》。
以上均存中共茶陵县委党史办公室。
11. 《同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座谈记录》。
1984年4月，现存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
12. 《同宁冈党史办工作人员的座谈记录》（1984年4月），现存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
13. 《同茶陵县党史办工作人员的座谈记录》（1984年4月），现存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
14. 《攸县座谈会记录》（1984年5月），现存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
15. 《新四军抗日战争史》，新四军战史编审委员会1963年12月编。
16.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华东军区战史编审委员会1962年11月编。
17. 《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资料摘记》，现存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
18. 《福建游击战争史》，福建省军区游击战史编写组，1981年6月编。
19. 《谭震林在建国前后若干讲话稿》，现存葛慧敏处。
20. 《在谭震林追悼会上的悼词》，载1983年10月6日《人民日报》。
21. 访问葛慧敏、伍洪祥、王直、朱绍清、占化雨、朱直光、田贤臣、廖海光、傅柏翠、李德安、林辉才、陈冒辉、罗炳清、汤光辉、熊斌、朱克铨、周治平、尹燕如、许春华、翟翕武、易成柱、金治、石政、谭乐春、张志坚、谢仲甫、周祖庚、桑景才、吴允中、余森文、王耀亭、孙洪、林承尧、闻智盈、叶遐修、乐子型、吴永希、李光征、罗义贵、李福林、尹烈承、朱木良、李蕊珍、陈国祿、蔡海安、杨浩庐等的记录。

郭 俊

郭思明 集 力

郭俊，湖北省安陆县城关镇人，是我党初期的党员和优秀的军事干部。他参加了黄埔军校的创建工作，在东征中荣立战功，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六团少将团长，一九二七年一月，在游埠战斗中光荣牺牲。

(一)

郭俊字宇安，又名俄自。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日（光绪二十三年农历十月十六日）出生在一个世代从教的寒士家庭。郭俊童年时在本城搭馆读书。十三岁时，到本县北乡接官厅王家台子，跟随舅父王博泉攻读文学。这里曾是太平军战斗过的地方，他经常听当地老人们讲太平天国的革命故事，这给他幼小的心灵以很大的影响。

一九一二年，郭俊考入设在县城的省立“汉东书院”读书。他在这里受到新学教育，认识到我们国家衰弱、受帝国主义欺凌，是由于政治腐败、科学落后、工业不发达等原因。为此，他曾想学习工业，走工业救国的道路。毕业后，他赴京报考，被北京高等工业学校录取，但因家庭经济困难，无力担负各项费用而辍学。后来，他考入官费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

期步兵科学习。

一九二〇年，因直皖战争的影响，保定军校停办，郭俊又被迫回到家中。社会的现实使他对个人的未来、国家的前途感到茫然，对军阀混战十分厌恶。此时，“五四”新文化、新思潮在各地风起云涌，郭俊为了探求真理，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等书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

同年，郭俊在家中与胡玉贞女士结了婚。

一九二一年秋，保定军校复课，郭俊返回学校。学习期间他与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同学金灿（金佛庄）交往密切，相互砥砺，立志做一个新军人。并和四十余名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了一个以探求救国真理、促进中国革命为宗旨的“壬戌社”

（因他们将在壬戌年毕业）。后来，又与恽代英在湖北武昌创办的“利群书社”取得联系，经常购阅进步书籍，钻研革命理论，并刻苦攻读俄语。经过反复的探索，他终于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唯一真理。于是，他于一九二三年，郭俊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纪念这件有意义的事，他将这年出生的长子取名“保定”^①。

一九二二年，郭俊在保定军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北驻军第一混成旅，充任见习排长，驻防安陆、随县一带。在随县参加剿匪时，配合各部将寇令邦匪部一举歼灭，初显军事才能。后提升学兵连连长，调往孝感负责训练入伍新兵。他在湖北从军期间，上级党组织曾派共产党员李之龙与他秘密联络，进行革命活动。当时，他为了保密，常用“俄自”

^①郭俊烈士堂妹郭幻如、长子郭令文提供。

别号署名，同李通讯联络。

(二)

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着手筹建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郭俊经党组织委派奔赴广州，参加创办军校的工作，担任第三队第一区队长。为了适应当时迅猛发展的革命斗争形势需要，军校把学制缩短为半年，修订了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和交通通讯五大教程，各科目齐头并进，进行着艰苦而又紧张的教育训练。郭俊勤勤恳恳，忠于职守，态度和蔼，联系群众，向学生传播军事技术，宣传革命道理。他经常对学员们讲：“要早日建立起我们革命的军队，就要求我们刻苦学习，尽快地学会军事技术。”我党办的《向导》报，他经常传递给思想觉悟较高的学员们看，增强他们学习和革命的自觉性。在郭俊的影响下，学员们懂得了刻苦学习军事技术的重大意义，任务再重，训练再苦，不害怕，不退避。他们高唱黄埔军校校歌：“怒潮澎湃，红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情绪高昂地进行军训。

在训练中，郭俊对学员要求非常严格，但从不打骂和轻易处罚他们。一次列队出操时，有个学员迟到了，按照纪律应受到处罚。当郭俊弄清了这个学员是因发烧拉肚子来晚了的情况后，他不但不批评，反而还当众表扬了这个学员带病坚持训练的精神。

郭俊喜欢和学员们促膝谈心，善于运用富于哲理的话语启发学员，没有一点官架子，学员们对他感到亲切，都愿意和他

接近，在郭俊的熏陶下，他那个区队的学员很多被培养成出类拔萃的人物，现在山东、湖北政协任职的他的两个学生，均已九十高龄，至今对他仍念念不忘。他们说：“郭俊是我们的好老师。”中央军事科学院院长阎揆要说：“在黄埔军校时，学员对区队长郭俊很满意，很拥护，我当过他的传令兵。他带兵很有办法。他如果不死，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①

郭俊在黄埔军校担负着秘密开展党的工作的任务。由于校内国民党右派的阻挠和限制，活动非常困难。那时，他常常利用课余、夜间、野外散步等各种机会和多种形式，单独秘密地进行党的活动，有时，郭俊也利用星期天休息的机会，组织他那个党小组的学员，到广州东皋大道的一个礼堂，去听党内的各种报告。在这里，郭俊等还听到了第三国际派来的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对当时国际形势的演讲。

一九二四年十月，广州发生了商团叛乱事件。英国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和佛山大地主陈恭受，组织武装商团，同革命势力相对抗。他们筹集巨款，向西欧订购大批军火，计有枪械一万余支，子弹四百三十余万发，由丹麦轮“哈佛号”运载来华。孙中山获悉后，电令黄埔军校协同海军进行拦截扣留，黄埔学生立即投入了扣械的斗争。郭俊率领着他的区队的学员配合海军参加拦截“哈佛轮”，把枪支弹药押运到黄埔军校。为防商团夜袭，郭俊又同学员一起巡逻放哨，严加防范。后来商团张贴布告胁迫孙中山下野，并以陈恭受为司令，调商团军密集广州西关，准备对革命政府进行反扑。他们凭借西关的层层铁栏和木栅，防守森严。受命平叛的滇军和湘军未能攻破。孙

^①访问阎揆要谈话记录。

中山命黄埔学生军投入战斗，郭俊遵照命令带着区队学员，随军校的另两队学员开赴广州，组成平定商团叛乱的中央革命委员会的卫队，协同工团军、农民自卫军及滇、桂、湘、赣包围西关，进行夜战火攻，迫使商团缴械投降。郭俊率领的军校学生兵，打得沉着勇敢，无一伤亡，胜利返校^①。

正当军校各方面工作节节顺利发展的时候，校内革命与反动的斗争也日益尖锐起来，斗争集中反映在“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大组织之间的对立上。

“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周恩来同志发起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正式成立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宣言号召：革命军人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的统治。“青军会”的主要负责人在学生中有李之龙、蒋先云、徐向前、陈赓、左权等；在教职员中有金佛庄、郭俊、茅延楨、胡公冕等^②，它公开提出的任务是：巩固统一战线，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围绕学校中心任务开展革命活动。“青军会”出版了《中国军人》、《兵友必读》会刊和杂志，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统一战线，为提高军人的政治觉悟，团结青年军人拯救中国而献身。

由国民党右派戴季陶、王柏龄等人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公开与“青军会”相抗衡，它赤裸裸地干涉和破坏“青军会”的活动，指责“青军会”是共产党的御用工具，叫嚷要清除“青军会”中的共产党员。自此，军校以两大组织之间的分歧与斗争反映出来的革命和反动的斗争日益尖锐和明朗化了。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郭俊和“青军会”中的共产党员团结

^①访问侯镜如、李仙洲谈话记录。

^②覃异之：《黄埔建军》，载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国民党左派，用大会演说和画漫画等形式，揭露王柏龄及其一伙右派打击共产党人、破坏国共合作、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种种罪行，使这个教授部主任王柏龄丑态毕露，威风扫地。

王柏龄龟缩鳖潜，大长了革命师生的志气。“青年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会员发展到二万多人，造成很大影响。在讨伐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中，各军中的“青军会”在瓦解敌军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陈炯明自一九二二年背叛孙中山后，盘踞广东东江地区，接任了北洋政府粤军总司令之职，部将有叶举、熊略、钟景堂、林虎、洪兆麟、谢文炳等。全军约十万余人。盘踞东江，依靠着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府的军事援助，伺机进攻广州，推翻革命政权。为了粉碎陈炯明的反动阴谋，广东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组织武装力量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举行了第一次东征，参加东征的有粤、湘、滇、桂等军，主力军是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新装备起来的黄埔军校学生军的两个教导团，共三千多人。郭俊任第一教导团第三营第七连连长，随黄埔军校学生军参加第一次东征。在行军中，郭俊认真执行周恩来“组织官兵向人民群众进行政治宣传”的指示，沿路开展“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为拯救东江人民而战”的宣传，他们所到之处不拉夫、不筹饷、不住民房、公平买卖。一次，郭俊所在连的官兵到一个村庄扎营时，烧了农户的柴，当时主人不在家，郭俊亲自留下一张纸条说明，连同所付柴款一并压在桌子上。

部队向淡水挺进时，郭俊的连担负尖兵任务，敌洪兆麟部在淡水城内部署了一个旅的兵力，为其主力集结进攻广州作准备。发现此情况后，郭俊立即向团部报告。同时，积极主动地

做好该连官兵准备迎战的思想动员工作。二排长李仙洲是山东人，因不习惯南方生活，想去北方工作，郭俊发现后跟李促膝谈心，晓以道理，使其乐于吃苦，安心出征。

二月二十五日拂晓，黄埔军向淡水城发起进攻，郭俊率全连官兵顽强攻击。激战至正午，一团首先攻入城内，经过一场巷战，歼灭和俘虏了全部敌军。不久，敌人后续部队出动万余兵力，疯狂反扑。军校教导第二团团团长王柏龄见敌势凶猛，连连后撤。蒋介石的指挥所从城内撤到城外高地上，郭俊率全连战士担负右翼掩护，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保卫了指挥所的安全。当时敌军数倍于我，情势十分危急。在此紧要关头，周恩来派共产党员陈赓率领学生军迎敌，经过一场激战，终于阻击了接近淡水城的敌军。接着第一团迅速组织和指挥部队，向城外敌人发动反攻。时近黄昏，敌人把我一团误认为是从城里溃逃出来的自己人，未予阻击。等到弄清真象后，黄埔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端起刺刀冲杀，敌人手足无措，纷纷败退。黄埔军乘胜追击，杀得敌人狼狈逃窜，溃不成军。黄埔军迅速控制了整个潮汕地区，名声大振。郭俊率部随黄埔军到达海丰时，受到当地农民群众的盛会欢迎。

在迎战陈炯明主力洪兆麟部五万余众反攻潮汕时，郭俊所率七连系主攻部队之一。战斗中，郭俊发挥了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在冲锋中身负重伤，他仍坚持战斗，最后弹中胸腔，倒在血泊中。战斗结束后，在阵亡烈士的遗体中找到他时，他已生命垂危。

十月上旬，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时，郭俊伤愈归队，被编入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升任一营营长，编属东征军第一纵队。在攻取惠州要塞的战斗中，郭俊所在的一师为总预备队。

经过反复变换战术，主攻部队终于打开缺口，冲进城内。郭俊率部随即入城，同敌人进行巷战，经过三十个小时的浴血奋战，号称“南国第一天险”的惠州，终于为国民革命军所占领。

在战斗中，郭俊十分注意扩大党的组织，发展觉悟高的官兵入党。他发现一营副营长侯镜如革命性强，作战勇敢，便对侯重点培养。当部队攻克惠州进驻之后，郭俊便和周恩来一起在西湖关帝庙秘密地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①。

攻克惠州后，郭俊被提升为三团党代表。郭俊率部由平山、白云进入海丰时，遭到洪兆麟、谢文炳部七、八千敌军的袭击。在遭遇战中，郭俊率第三团奋勇抵抗，伤亡很大。郭俊动员后备力量全力投入战斗，侦察队从右侧冲锋，抄敌后路，特务连正面增援，第三营向敌人密集的郑家桥冲锋，敌腹背受击，终被击溃。三团以少胜多，胜利地结束了海丰战斗，为完成统一广东，巩固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三)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强迫在第一军中工作的全部共产党员退出该军。此时，郭俊任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一军军长何应钦以准备让郭俊去苏联学习为借口解除了他一团团长的职务。后来，由于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郭俊没能出国学习，仍留广州。他在党的领导下，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宣传党的主张。为北伐战争的开展，为祖国

^①访问侯镜如记录。

的统一而奔走。不久，郭俊被委任为黄埔军校术科总教官^①。

这年六月五日，国民政府通过北伐案，为了保证十万北伐大军的各项军需，六月三十日，国民政府成立了兵站总监部，郭俊被委任为第一兵站监（少将军衔）^②，主管一军兵运、兵器、粮秣、被服、军饷、医疗等各项后勤工作。七月九日，正式出师北伐，兵站随大军北上，经韶关、郴州、衡阳，抵达长沙。虽然战斗紧张，后勤工作繁重，郭俊从不松懈。他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千方百计保证了各项供给。为了加强对战地医院的管理，防止贪污舞弊行为，他在长沙物色了一名年轻有为的医务工作者，安排到兵站医院当司药。郭俊对他说：“你的职务虽小，但责任重大，一是要管好医药的进库、发放；二是要掌握医院的情况，发现贪污舞弊行为向我汇报。”由于郭俊工作深入，秉公无私，严格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堵住了贪污行为的发展，保证了野战医院工作的顺利进行。郭俊非常注意军纪，处处为人表率。一次，有个副官领来一个妓女介绍给郭俊，郭当即严肃地指出：“一个官长如不能作表率，怎么要求部下执行纪律，没有纪律怎么能称革命的军队。”在从湖南浏阳向江西铜鼓行军的路上，他发现一个士兵与小贩争吵，立即策马上前了解，发现是因买水果吃少付了群众的钱。他便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当即责成那个士兵按市价付清欠款，并对兵站全体官兵进行教育。他说：“我们是革命的军队，革命的军队就应该不同于军阀的军队。古人云：‘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我们肩负着消灭军阀势力，统一国家的重任，行军的前方，就要进入大山区，物资比较困难，但我们

① 访问郭俊烈士堂妹郭幻如、长子郭令文记录。

② 访问覃异之记录。

一定不能侵犯民众的利益，只有坚持铁的纪律，民众才能拥护我们，才能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使全体官兵受到很大的教育。后来兵站行军，军纪严明，他们每到一处，都受到人民的拥戴。

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伐军开始进攻江西，与号称拥有二十万兵力的孙传芳部展开激战。因战争需要，郭俊被调离兵站，任第一军第二师六团团团长。同年十一月初，郭俊率部属随东路军在江西全线发起总攻，相继攻克九江、南昌。一九二七年一月进入衡洲。孙传芳垂死挣扎，派孟昭月统率韩光裕等五个师，布防于汤溪、兰溪、游埠、淳安一线，妄图阻止北伐军继续东进。东路军前敌指挥部决定进行汤（溪）、兰（溪）战役，扫清东进障碍。郭俊所在的二师主攻游埠。游埠守敌共有七千人。一月二十九日拂晓，战斗展开。郭俊率六团打右翼，由桥头江进攻青峰山、市园以北地区之敌，敌以兵力和装备之优势进行顽强抵抗。初期战斗进展缓慢，郭俊奋不顾身，率部与敌拼杀。最后将预备队、工兵统统投入战斗，终将顽敌击溃。下午五时，追敌至裘家埠、邓家坪一线。敌军再凭借一条衡江支流，隔河坚守。郭俊挑选一个排健壮的士兵，趁黑夜泅水过河，摸掉敌哨兵，夺取敌前沿阵地的机枪，对敌方一阵猛烈的扫射，敌措手不及，一片慌乱，全线溃败，胜利地结束了这次战斗。是役俘敌三百余人，缴获山炮三门，机枪、步枪四百余支。可是，郭俊却不幸腰部中弹，因伤势过重，在转往衡洲抢救途中，光荣牺牲^①。

北伐军进攻浙江前，郭俊曾给家属写信，言明抱负：“这

^① 《北伐战争全史》，第51页，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藏书，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复印《游埠战斗总结》（1928年）。

次打仗为扫除军阀，解救民众，我不为官、不为财、不怕死，只为革命拼一死战。”郭俊言行一致，视死如归，以身殉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和为革命的献身精神。

郭俊灵柩运到衢洲，各界民众为其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给郭俊追赠中将军衔^①，以彰英烈而慰英灵。后按家属要求将遗体运回原籍，由安陆县政府举行公葬，棺木葬于县城东门外文昌楼下。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追认郭俊为革命烈士。

郭俊烈士浩气长存，永垂不朽！

^①参加游埠战斗的原第1军第2师第6团王楚的口述记录。

辛 焕 文

刘 厚 中

(一)

辛焕文，号质彬，一九〇一年六月出生于湖北省安陆县辛家榨。父亲辛余三，清末秀才，曾任湖北圻水知县。长兄辛焕甫，湖北新军测绘学堂学兵。次兄辛达文，耕种经营数十亩土地并操持全家生活大计。

一九〇七年，辛焕文入塾启蒙。他喜读《左氏春秋》和《东莱博议》。稍长，便模仿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叙事作文，褒贬乡风民俗。其聪明才智深为塾师赞许。

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首义成功。辛余三被推举为湖北省临时议会议员，辛焕甫也在湖北军政府测量局任职。辛焕文在其父兄的影响下，逐渐萌发着革命意识。

一九一六年，辛焕文考入武昌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因董必武、陈荫林、刘子通先后在该校执教，组织读书团体，传播革命思想，辛焕文因而眼界大开，学习异常勤奋，各科成绩优良，并积极参加校内外的各种社会活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武汉地区在恽代英领导下，学界一片沸腾。六月一日，辛焕文和省立一师学生冲破反动当局阻扰，上大朝街一带游行演讲。他痛述“亡国惨祸迫在眉睫，青岛主权

快要丧失”，号召“凡有血性的爱国同胞，都要激励士气，抵抗强暴，以争回青岛，灭除国贼，即有牺牲亦在所不惜。”^①军警“四面包围”游行队伍，但数千游行仍“驻足泣听”，不为强暴所动。是日，反动军警开枪打死和無理拘捕武昌高师和文华大学演讲学生数人，酿成流血惨案。湖北督军王占元害怕学潮扩大，特令各校于三日內严禁学生出校回家；同时通飭各县知事，一体查禁学生集会演讲。六月四日，辛焕文与安陆籍私立法政专科学校学生朱益吾等七人，离省返乡。他们不顾反动当局种种禁令，在安陆各乡镇举行巡回演讲，每至一镇，必先到该地驻军处，“详述山东外交之失败，凡属国民万不可漠不关心，坐视危局而不救”。各士兵“聆其言论皆为之感动，痛诋省垣军警摧残之非是”^②。

(二)

一九二二年，辛焕文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理化部。入学后，他一面努力学习，一面广泛交游，鼓吹反帝反封建爱国思潮，深得同学们的爱护。不久，他被推选为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会主席。

一九二三年，回国不久的中法大学陈毅，担任了北京学生总会党团书记，积极在北京各校学生会的干部中发展党员。这一年，辛焕文加入中国共产党^③，并同陈毅一起，参与北京学生总

^{①③}辛焕玉回忆材料（1982年4月10日）。

^②1919年6月11日《汉口新闻报》；辛焕玉回忆材料（1982年4月10日）。

会的领导与组织工作。他“经常出席北京各团体代表会议，共同讨论当前形势，斗争任务。……有时与出席会议的西山会议派针锋相对地辩论起来，他词严义正，压倒对方，……不愧为北师大进步学生的代表。”^①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辛焕文正在故宫参加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祭奠仪式，突然传来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进攻天津，炮击驻守大沽口的冯玉祥国民军的消息。三月十六日下午四时，日本帝国主义又借口“辛丑条约”，纠合英、美、法、意、荷、西、比等国，由荷兰首席公使欧登科领衔，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停止抵抗，撤除津沽防务，并限四十四小时内作出答复，否则以武力扫除，大有重结“八国联军”之势。这激起了辛焕文的极大愤怒。三月十七日，他在李大钊、陈乔年的布置下，作为北师大和北京学生总会代表，出席在北大三院召开的北京各院校、团体代表紧急会议，提出了驳复“最后通牒”、敦促国民军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和十八日上午十时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等几项议案，获得了一致通过。会后，代表们分为两组，分赴外交部、国务院请愿。辛焕文同陈毅、陈日新（留日归国代表团）、王步仁（留法工人代表）带领六十三人到铁狮子胡同，要求见执政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②。不料辛焕文等进去未及五分钟，“穿军服之某员，忽然喝打”，卫队士兵便向请愿队伍“用枪柄并刺刀，向退走的各代表乱打乱刺”。许多代表被刺伤，其中以四川国民外交代表团杨伯伦受伤最重。辛焕文等冒死向接谈之王科长和卫队团长武九清发出种种质问，坚持到深夜十一点

^{①②}陈涛：《缅怀辛焕文同志》（1984年11月17日）。

半，国务院秘书长邓汉祥终于出来，应允“容纳民意”^①，转呈所提各条。离开执政府前，辛焕文等郑重声明：“段祺瑞政府如欲自新，不自绝于民众，则当驳回八国通牒！”^②

三月十八日上午十时，北京各界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抗议日舰炮击大沽口和各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到会团体、学校二百多个共一万余人。主席台上，辛焕文拿着被刺伤代表的血衣数十件，“报告昨日向执政府交涉经过及执政府卫队枪伤代表情形”，当宣读受伤最重的杨伯伦致大会群众书时，台下群众一致高呼：“坚持到底，誓死不屈！”^③大会通过了反对八国通牒的八项条件，即出发前往执政府。当代表正与卫兵交涉，请见总理贾德耀时，遭反动军警残酷镇压，“一时中弹倒地之男女甚众，满地皆血，哭声震天”，“其凄惨之情，不堪久视”^④，计死四十七人，伤二百余人。史称“三·一八”惨案。

惨案发生后，辛焕文以北京学生总会名义，派代表到各校慰问；对外发出代电，通告事件真相。三月二十四日，北师大举行公祭。辛焕文主持大会并致词，他号召全校学生“对卖国政府惨杀群众一致声讨”，“为烈士复仇”^⑤。

段祺瑞为了推脱罪责，嫁祸于人，命京师警察厅通缉各校参加示威游行的骨干，辛焕文亦因“宣传赤化，主张共产”，被通缉。他便按照党组织的决定，转入地下，继续开展革命活

①1926年3月19日、20日《京报》。

②周祖羲：《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陈毅》，见1984年10月6日《团结报》。

③1926年3月19日《京报》。

④1926年4月1日—6日《上海民国日报》。

⑤胡治熙：《校友辛焕文烈士行状》（北京师范大学校史室藏）。

动。

(三)

四月中旬，辛焕文接到陈日新传达陈毅意见的通知，叫他们立即南下广州参加革命，并带来沿途的介绍信和“济难会”资助的一百元路费。

翌日晨，辛焕文同陈日新、王步仁、杨某（北大学生代表）等人，乘火车，离开北京，首途南下。在路经上海时，得知杭州正筹备纪念五四大会，于是辛焕文、杨某和陈日新决定，分别以北师大、北大和留日归国代表团三团体代表名义，前往杭州，声援浙江革命运动。五月四日，辛焕文等在杭州群众游行集会上，“阐述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最近的‘三·一八’事件原委，呼吁与会者发扬五四精神，踏着烈士的血迹奋勇前进”^①。然后他们折返上海，与沈雁冰接头，从海路南下广州。

在广州，辛焕文由党组织分配到北伐军总政治部担任党务秘书。九月十九日，总政治部随第三、第六军进入江西省高安县城。根据总司令部命令，部队在此就地整顿和补充，待命进攻。辛焕文一面做好部队工作，一面积极参与地方党务事项，支持以共产党员聂思坤为常务委员的县党部，揭露国民党右派黄用中等勾结县长刘振群、警察局长毛正先，放掉被农民协会捉来的土豪劣绅，破坏农民运动的事实，领导各界群众向大土豪陈筱国等“高安五虎”展开了清算斗争^②。

^①陈涛：《缅怀辛焕文同志》（1984年11月17日）。

^②杨实人：《高安大革命回忆》（江西省高安革命历史纪念馆藏）。

十一月六日，总政治部随军进入南昌。这时，身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反对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的决定，无理提出迁都南昌的要求，并截留从广州迁都来汉口的国民党要员和党政军机关。十二月十日，辛焕文和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摆脱了国民党右派的监视和封锁，“秘密逃出”反革命势力麇集的南昌^①，来到武汉，在汉口新市场（今民众乐园）重新设立北伐军总政治部，以此作为武汉国民政府和我党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

一九二七年春，蒋介石先后在赣州、南昌、九江等地，用重金收买流氓打手，捣毁各地党部机关和革命团体，残杀工农群众领袖，制造了一系列流血惨案。三月十九日，辛焕文奉武汉国民政府之命到达安庆，协助正在那里的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发动北伐军和各界群众遏制蒋介石的叛逆行径，相机将政治工作推向长江下游。不料第二天蒋介石也到了安庆，安庆杀机四起。三月二十二日，郭沫若、辛焕文接到武汉国民政府电令，要他们到上海组织总政治部分部。蒋介石得悉，即与总参议张群、军务处长陈焯密谋，命郭沫若、辛焕文去上海组织“总司令部行营政治部”，许以每人每月丰厚津贴。郭沫若、辛焕文将蒋介石的叛逆“早就密电了中央”，并根据武汉国民政府的回示，继续与蒋“虚与委蛇”，伺机脱离蒋介石的控制^②。

当时，安庆是安徽省府，拥蒋的武力只有陈调元两营人，

①〔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489页，辛焕文回忆材料（1982年4月10日）。

②郭沫若：《脱离蒋介石以后》，见《革命春秋》第1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反陈的武力有蔡文彬的一个旅。蒋介石令参谋长朱一民强迫蔡部出城。蔡文彬意欲倒蒋，但想得到江左军总指挥李宗仁的支持。三月二十五日，郭沫若、辛焕文去“游说”李宗仁，指出“蒋介石残杀工农群众，有良心的人都应起来反对他”，“希望他在安庆举事，肃清一切反革命派的势力”^①。李宗仁心有所动，但因亦在蒋的“虎肘”之中，意存观望。

三月二十六日，郭沫若、辛焕文根据武汉国民政府指示，准备去上海筹设总政治部上海分部。蒋介石也一面催促他们快去长江下游，一面派朱一民监视他们的行动。是日，朱一民派来一只兵舰，要他们率总政治部全体人员出发到南京。幸好船载不下全体人员。辛焕文见朱一民上了船，便佯称还有几十担宣传品和几十名人员没有地方安置，迫使朱一民答应他们再弄一只差船赶去。这样，他们脱离了蒋介石及其爪牙的控制。

三月二十八日，郭沫若、辛焕文候船等得焦灼难耐之时，总政治部南昌留守人员杨正宗等，也瞒过了张群，乘坐一只差船来到了安庆。第三军政治部主任朱克靖，奉武汉国民政府之命，回九江找朱培德军长，因所乘之船过九江未停，也拖到安庆来了。郭沫若、辛焕文欣喜万分，决定乘杨正宗所坐的差船，先送朱克靖去九江，再一起去上海。

三月二十九日，差船到九江停泊。根据变化中的情况决定，辛焕文回武汉请示行止。四月三日，辛焕文向郭写信，“传达邓主任的意思”，要郭“火速赴沪”。四月五日，辛焕文率领着许多赴下游工作的同志，坐着原来的差船，从武汉来到九江，与在那里等候的郭沫若一起，驶向上海。

^①郭沫若：《脱离蒋介石以后》，见《革命春秋》第151页。

四月八日，因长江风浪太大，辛焕文和郭沫若乘坐的差船被迫在南京靠岸。辛焕文改装进入市内，从报纸上得知总政治部上海分部被查封！原来，辛焕文到达安庆前后，总政治部已差遣秘书李民治（李一氓）和蔡文彬去上海进行分部筹设工作。

辛焕文考虑，李民治、蔡文彬可能遇着不测，便立即打发赴下游工作的同志乘原船返回武汉，自己则与郭沫若于当日深夜乘兵车赶赴上海。不料兵车到达苏州突然不开了，郭沫若便在胥门外一家客栈住下，辛焕文化名“文焕星”，只身改乘去上海的火车。

辛焕文首先在上海一家银行找着了李民治的妻子，然后到静安寺路的一个弄堂找到了李民治，得知他们在上海工作的情形。四月十一日晚，辛焕文又返回苏州。

四月十四日，郭沫若、辛焕文乘火车到达上海，找到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汇报了蒋介石在九江、安庆指使暴徒捣毁党部、工会，屠杀民众的真相。这为周恩来向中央提出“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建议，增添了重要依据^①。

会见了周恩来后，郭沫若、辛焕文连夜改装，离开了血腥的上海，乘船溯江而上，直赴武汉。随即踏上了第二次北伐的征途。

（四）

四月十九日，武汉国民政府的二次北伐主力在东湖誓师。

^①周恩来：《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6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辛焕文受命担任第四方面军第一纵队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主任，于四月二十七日随队进驻河南驻马店。五月八日，辛焕文在驻马店开办了党务研究所，他和所属军、师政治部主任每日下午轮流授课，为地方培养党务干部。辛焕文还分别到驻军所在地的驻马店、凉亭、界牌、顺和店等处，帮助筹建地方党部，做好民众工作。

五月下旬，奉系张作霖派张学良亲赴前线督战，将其五个军集中临颍，准备反攻。北伐军第一纵队紧追奉军，辛焕文随张发奎率十一军二十六师作总预备队从正面跟进。五月二十七日午后七时，黄琪翔率四军十二师于十里头一带向敌开火，遭敌阻击。相持到翌日拂晓，辛焕文率二十六师七十七团蒋先云部开赴辛庄，抄敌左翼，配合前线发起攻击。战斗中蒋先云重伤阵亡。张发奎率二十六师七十六团、七十七团，相继接力猛扑过来，与奉军白刃格斗。辛焕文率七十七团冲进敌阵，与敌拼死相搏。至下午四时，奉军撤退，七十七团首先进入临颍^①。

辛焕文立即组织力量散发传单和书册，张贴“打倒军阀张作霖！”“打倒新军阀蒋介石！”“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组织救护伤兵委员会，建立武装农民组织，肃清奉军残部。

此时，武汉国民党反动倾向日渐严重。由河南班师回武汉的张发奎，已升任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他有个警卫团，是刚刚在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个营的基础上扩建的，团长是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共产党员卢德铭，参谋长

^①晁凌音：《二次北伐临颍战役调查》（河南省政协藏）。

是原十一军教导营营长韩浚，当时也是共产党员。马日事变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也将两湖遭到国民党反动派搜捕而逃到武汉来的一批地、县级干部和大学生，如何长工、何挺颖、宛希先等，调到警卫团当班长，因而这个团的政治基础很好。为了牢牢掌握这支革命武装，党中央又特地将辛焕文调到警卫团担任政治指导员，加强对这支革命武装的领导，以适应紧急时期的斗争需要^①。

七月上旬，张发奎率部沿长江东进时，对警卫团很不放心，一再催促随大军出发。恰好，张发奎为警卫团在广东招募的第四营新兵，正在来汉途中。辛焕文、卢德铭则以警卫团正等待接收新兵为理由，滞留武汉，静观时局发展，等候党的指示，相机投入革命。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叛变了革命。八月一日，在周恩来领导下，南昌起义爆发了。八月二日晚，警卫团同时接到两份电报：一份是张发奎从九江打来的，命令警卫团乘船迅速开到九江待命；一份是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周逸群打来的，要警卫团迅速赶到南昌，投入起义大军。辛焕文、卢德铭接到电报后，共同分析研究，认为南昌起义已经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朝夕盼望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警卫团必须坚决响应党的号召，迅速开到南昌参加起义；而张发奎要部队开到九江，其目的是要缴警卫团的械，警卫团又只有奔赴南昌，才能摆脱张发奎的控制。“他们作出了三项决定：第一，坚决响应南昌起义，不回张发奎的电报；第二，立即组织兵力去南昌；第三，只带一、二、三营走，把四营留在武昌，因一、三营营长是共

^①何长工：《在大革命的洪流中》，见《红旗飘飘》第19辑第22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产党员，二营营长不是党员但思想进步，只有四营营长是张发奎派来的。”^①为了保守机密并争取时间，决定部队出发时，仍用船舶输送一段路程，计划到湖北阳新县的黄颡口上岸，再徒步前进，经江西武宁、涂家埠，直奔南昌。

八月三日，辛焕文、韩浚到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争取该校师生同警卫团一起行动，以壮大起义军声威。辛焕文找到该校地下党党委书记陈毅，得知该校党团组织在周恩来、恽代英、聂荣臻等关怀下，经过整顿，已“团结一致，待时而动”，“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大革命成果，把革命进行到底”^②。韩浚找到由该校师生组成的中央独立师师长侯连瀛，侯不赞成国共分裂，主张“哪个革命就拥护哪个”，但对南昌起义半信半疑，只勉强答应随警卫团一起行动。辛焕文又将韩浚找侯连瀛的经过及侯连瀛对参加这次起义的态度，回头转告了陈毅，以防紧急时之不测^③。

八月四日，警卫团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计五千人，分乘租用汉口招商局的四条船舶，从武昌徐家棚出发。上船时，何键的三十五军在汉阳龟山上虎视眈眈，威胁着警卫团。第二方面军宪兵营，也奉张发奎之命赶来上船，名义上是交警卫团指挥，实际上是来监视警卫团。辛焕文、卢德铭安排行船的路线是：第一条船警卫团，第二条船军校，第三条船警卫团，第四条船军校。每条船相距一华里。他们这样安排，是考虑到军校

^①《秋收起义部队总指挥卢德铭烈士》，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第94页。

^②袁继成、刘继增、毛磊：《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见《湖北文史资料》第5辑第48页。

^③韩浚：《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响应南昌起义前后》，见《湖北文史资料》第1辑第109—110页。

旧军官太多，参加起义的思想基础不牢靠，如果情况有变化，便于采取必要的措施。

船到黄石港，辛焕文、卢德铭向军校宣布起义的决定和行军路线。果然，军校的船因总队长杨树松要去九江找张发奎，不按号令靠岸，并径直向下开去。于是靠岸的船又返回江心。辛焕文召开团党支部扩大会议，认为如果追赶，势必发生火并，影响起义大局，不如让他们去九江；但警卫团的船必须加快航行速度，赶在军校至九江之前登岸。

船到黄颡口，辛焕文、卢德铭决定解决宪兵营，因宪兵营上船图谋不轨，其手枪连又是张发奎的旧部。待宪兵营上岸后，韩浚突然向他们宣布起义的消息。该营营长是张发奎亲信，执意要去九江，不愿参加起义。辛焕文、卢德铭决定，每连发五支枪，每人发足粮食菜金，其余枪枝留下，让他们去见张发奎，从而消除了隐患。

八月七日，部队翻过幕阜山到达江西省武宁县，与从涂家埠折回的余贲民平江工农义勇队“合在一处”，方知南昌起义大军给敌以重创后，已于八月三日离开了南昌，正向广东潮汕方向转移；张发奎在九江缴了军校的械后，已率部进入南昌并派出两个团于涂家埠一线堵截警卫团。辛焕文决定与余贲民“由修水回平江”，同时派人赶到瑞州，通知刚与余贲民分手的苏先骏浏阳工农义勇队，“由上高、万载到铜鼓，与他们联络”^①。部队经奉新、靖安间，警卫团仍试图从南浔路突出东进，追赶南昌起义部队，因此派何长工带领一个侦察组，去靖江附近侦察敌情，未果，不得不放弃去广东的计划，仍决定

^①潘心源：《关于秋收起义前后浏、醴、平革命斗争情况的报告》（1927年7月2日）。

“暂时把部队带到江西、湖南、湖北结合部的修水、铜鼓一带，再向上级请示如何行动。”^①八月十二日，警卫团进入高安县城。这时，国民党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派兵一部，死死咬住警卫团，警卫团内一些旧军官，害怕艰苦，思想动摇，连长史宝亨乘机煽动士兵哗变。辛焕文眼看警卫团四面受敌，内外交困，立即召开团党支部会议，分析情势，确定对策，指出高安不是久留之地，必须迅速转移。接着，他又召开了全团连以上干部会，传达团党支部决定，号召共产党员和全团干部，团结一致，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带好部队。会上逮捕并枪毙了煽动兵变的连长史宝亨，获得全团的一致赞同。会后，辛焕文又找到高安地下党员胡毓秀等人，动员他们利用社会关系，为部队筹措了一些给养，同时将沿途招收的散兵，补齐了第三营。

八月十九日，部队进入修水县城，警卫团团部驻凤猷书院。这时，罗荣桓率领的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也因奔赴南昌起义途中受阻，折回了修水县城。警卫团扩编至五个营。

修水县内有两股武装：一股是西乡的靖卫团，其头子是上源的大土豪曹祖烈，外号“曹老虎”，有六十多家丁，勾结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横行乡里，收租逼债，镇压农民运动，罪大恶极；一股是北乡的渣津、马均一带的邱国轩一个团，是蒋介石所杀徐州战役败将、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残部，他们经常下山抢粮，奸淫妇女，闹得当地群众一夕数惊。辛焕文召开团党支部扩大会议，分析了这两股势力的实力和处境，确定了争取邱国轩、消灭曹祖烈的方针。首先由韩浚去与邱国轩

^①何长工：《红旗插上井冈山》，见《革命回忆录》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谈判，给该部送去一些粮食和武器，指出上山为匪是没有出路的，要革命就要站到人民一边来。邱国轩到警卫团来，辛焕文、卢德铭热情接待他，给他讲革命道理，对他的部队军纪败坏也提出严肃批评。经多次争取，终于达成协议，邱国轩团被整编为警卫团两个营，仍驻渣津、马均一带训练。接着他们决定由余贲民、李腾芳率领第二营，攻打曹家据点，消灭靖卫团，将其反动武装全部缴械，活捉了曹祖烈，为修水人民除了一大害。

(五)

收编了邱国轩，镇压了曹祖烈，修水得到了安定，部队也扩大到七个营。辛焕文、卢德铭认为，部队战斗频繁，形势瞬息万变，为保存和发展自己，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决定将部队编为一个师，师长卢德铭，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辛焕文，副师长兼参谋长韩浚。下辖三个团：第一团，团长卢德铭兼；第二团，团长余洒度；第三团，团长邱国轩^①。部队扩编以后，他们一面申报上级党组织批准，一面继续整训部队。

他们没有找到江西省委，而与湖南省委取得了联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夏曦派人来到修水，传达他的意见：赞成警卫团扩编为师，但暂不打出师的番号，以免目标过大，不易立足；同时决定辛焕文、卢德铭、韩浚离开部队，经武汉、上海到广东东江或福建南部，去找起义大军，理由是起义军战事在即，需要有作战经验的干部。

^①韩浚：《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响应南昌起义前后》。

辛焕文听到这个决定后，非常诧异。他认为部队主要领导人突然全部离开，部队可能会有波动，尤其是邱国轩刚刚收编，思想不成熟，弄的不好，甚至可能产生严重恶果。但又考虑，既是上级党委决定，就得服从。于是辛焕文一面向夏曦派来的代表反映情况，一面表示服从命令，离开部队。

八月三十一日，辛焕文作好了出发的准备后，在凤巖书院召开了团营干部会议，宣布湖南省委关于辛焕文、卢德铭、韩浚离开部队的决定，任命余洒度接任师长兼第一团团长，李腾芳接任第二团团长，要求他们团结一致，服从指挥，打仗避实就虚，灵活机动，把这支革命武装带好。会议结束后，辛焕文、卢德铭、韩浚换上便衣，与大家告别启程。全体团营干部热泪盈眶，依依惜别，一直送了几里路程。不久，余洒度“为灰色态度起见”，将部队番号改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①。

九月一日，辛焕文等取道长沙赴武汉。他们原计划经武汉乘船到上海，再去广东或福建。但对夏曦突然通知他们离开部队，心中总不免有些蹊跷，想找党中央汇报情况，听取指示。而当时，党中央已迁往上海，长江局亦难找到。辛焕文等在汉口见到了坚持斗争的向警予（时任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长），汇报了警卫团从成立到扩编为师，以及湖南省委夏曦要他们离开部队的全部过程。向警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就他们提出的问题请示了上级党委。次日，向警予告诉他们，夏曦在环境险恶、起义大军去向不明的情况下，要他们离开部队、追赶起义大军是错误的，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精神 and 准备搞秋收起义的计划，要他们迅速返回部队，与正在

^①余洒度：《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1927年10月19日）。

湖南发动秋收起义的毛泽东取得联系^①。鉴于部队已扩编为师，余洒度担任了师长，又决定他们返回部队后，成立一个指挥部，卢德铭任总指挥，辛焕文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韩浚任副指挥兼参谋长。为建立指挥部，还派遣了六名干部，发了三千元经费。于是辛焕文一行，又离开武汉，重返征途。

九月三日，辛焕文等到达武昌东站，与派给的六个干部接上头，一起上了火车。他们在蒲圻赵李桥车站下车，计划经崇阳、通城、麦市，转平江到达修水。九个人分三部分走，辛焕文走在前面，韩浚走在中间，卢德铭走在最后，每人各带两名干部，彼此相距十五华里路程，以保证安全，又互相照应。

九月四日，辛焕文带着两个干部朝麦市方向走，走到崇阳大沙坪，已是傍晚时分。他们打算在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站——镇南兴发客栈歇息一夜，第二天再走。不料几天前，崇阳、通城两县国民党警备队开展“联防”，破坏了这个联络站，地下党负责人已经被捕。辛焕文等进入客栈，即被敌逮捕盘问，他沉着应付，声称是过境商人，瞒过去了，但那两位同志由于都带有手枪，不能让其搜查，不得已直冲关帝庙哨卡。结果，双方开枪射击，辛焕文不幸中弹牺牲^②，时年二十六岁。

作者附记：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除已注明者外，还有：

1. 张影辉、孔祥征：《五四运动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

①蔡博：《怀念母亲，倍觉党亲》，见1978年5月4日《长江日报》。

②丁汝凡：《关于辛焕文遇难的调查》（湖北省崇阳县文化馆藏）。

2. 《三一八运动资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
3. 卜庆华：《真挚深厚的友谊——读周恩来给郭沫若的四封信》，见《历史知识》1984年第4期。
4. 《平江县革命历史文献集》（未刊本）。
5. 访问刘洪茂、刘洪付、刘汉明、辛焕玉、刘烈根、刘裕黑、韩浚、吴翼如、杨实人、胡毓秀、杨春洲、周祖羲、陈涛、何长工等同志记录和湖北省政协、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市妇联、武昌中央农讲所、崇阳县文化馆、江西省宜春地区文化局、秋收起义修水纪念馆、高安县革命历史纪念馆、湖南省平江县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北京师范大学、河南省政协、四川省政协等单位提供的文字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

徐成章

元邦建 陈永阶

徐成章是我党早期从事军事运动的优秀指挥员。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著名的铁甲车队和省港罢工纠察队的主要领导人，在反击国民党右派和创建琼崖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一)

徐成章原名天宗，字惠如。一八九二年十月出生于广东省琼山县演丰乡昌城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祖父徐正佩是私塾先生，为人忠义正直。父亲徐开积，长年在南洋出卖苦力，每月工薪，除了维持个人基本生活之外，根本无法接济家庭。徐成章兄弟姐妹六人，全家仅有水田一亩多，主要靠租种地主田地和开垦荒坡种植蕃薯维持生活。

徐成章小时，曾跟祖父就读，后转入琼州府城肇新高等小学读书，他勤奋好学，考试总是名列前茅。一九〇七年，徐成章和堂兄天柄考进了琼州府城中学。在中学里，他不仅认真读书，而且注意研究社会问题。一九〇九年，他和徐天柄、梁安周（即梁秉枢）等爱国青年学生在革命潮流的推动下，加入了由当地进步人士在琼山县演丰乡组织的“励志社”。他们以研

究学术和互助为名，在群众中开展“反清”宣传活动。在他们的宣传和组织下，“励志社”成员不断增加，发展成为琼崖地区初具规模的革命团体，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同年，陈子臣、林格兰在海口市成立了琼崖第一个同盟会支部，徐成章、徐天柄、梁秉枢等进步青年，以“励志社”成员的身分参加该会，成为琼崖早期同盟会会员^①。为了推动琼崖革命运动的发展，徐成章在府城中学积极向同学们宣传“反清”的道理，发展同盟会会员。结果，触怒了学校当局，把他当成“异端分子”开除出校。此后，徐成章继续以“励志社”为据点进行革命活动。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给琼崖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和鼓舞。琼崖道尹刘永镇伪装进步，宣布独立。这样，琼崖虽然名义上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实际上政权仍然掌握在旧官吏范云梯（琼崖独立后道尹由范云梯代理）手中。

随着革命的进一步深入，范云梯等终于原形毕露，疯狂地压迫群众。在这种形势下，徐成章等同盟会会员，积极开展革命宣传，揭露范云梯的反革命面目。不久，广东都督胡汉民派赵士槐回琼崖主持政务。范云梯不肯向赵士槐移交政权。于是，赵士槐便在海口市召集同盟会琼崖支部成员徐成章等开会，商议对策。并决定组织学生军，以武力威迫范云梯交出政权。在徐成章等人的积极努力下，组织了一支一、二百人参加的学生军，筹集毛瑟单响步枪数十支，分兵两路进攻府城。范云梯对

^①梁秉枢：《辛亥革命前后琼崖革命党人的活动》，广东省政协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

于学生军的行动早有提防，学生军伤亡惨重，徐成章等被迫率领学生军退回海口市^①。后来，广东都督改派古襄勤任琼崖镇守使，范云梯被迫弃职逃离琼崖，于是学生军自动解散。为了扩大辛亥革命在琼崖的影响，徐成章等人将解散后的学生军改组为宣传队、男子剪辫队和女子识字班等，在琼崖各地积极开展革命宣传活动。

(二)

一九一三年，琼崖讨袁护国军总司令陈侠农秘密潜回琼崖，与徐成章、梁秉枢、熊受天、徐天柄、张孟麟等人商议，在琼山县演丰市附近的白石溪设立讨袁总机关，并在文昌县的潭牛、白延、抱罗和南阳等地农村设立联络站。他们分头到各地组织群众，筹集枪枝，成立琼崖讨袁护国军。

一九一三年下半年，讨袁军成立后第一个军事行动是打击袁世凯的死党周绍昌。讨袁军总部派员到海口进行侦察，得知周绍昌要返回文昌县原籍进行反革命活动，遂决定在中途伏击。于是陈侠农、徐成章等率领讨袁军十六人，分四路会合在琼(山)文(昌)公路线上的九林铺，击毙了周绍昌及四名卫兵，其余两名卫兵逃脱。这次战斗，缴获步枪四支，子弹九百多发及鸦片烟膏四大箩。

为了加强和统一讨袁军的领导，一九一四年二月，成立了以陈侠农为总司令的中华革命军琼崖总司令部(亦称讨袁军)。

^①徐成章：《十余年来琼崖革命运动的回顾及今后应取的方针》，《新琼崖评论》第12期，1924年6月16日出版。

下设参谋、总务、秘书等三个处；参谋处由梁国一、徐成章负责。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后，陈侠农、徐成章等立即着手制订夺取万（宁）、陵（水）、崖（县）、府（城）、海（口）光复琼崖、建立根据地的行动计划。讨袁军在陈侠农、徐成章的率领下，潜至万宁县兴隆墟附近的黎族村寨驻扎，与黎族首领钟奇曾等进行联系，争取他们对讨袁军的支持和援助。经过艰苦的工作，黎族首领钟奇曾率领二、三千黎胞加入了讨袁军，黎族村寨成为讨袁军的根据地。

讨袁军根据地初步建立后，陈侠农、徐成章率部攻取万宁县城，并乘胜追击，向陵水县城发起进攻。万陵战斗的胜利结束，对崖县之榆林、三亚两大港口守敌形成了军事包围。陈侠农和徐成章等对敌我力量进行详尽的研究，决定由陈侠农带领策反人员秘密潜入榆林，进行策反工作；由徐成章、梁秉枢率领队伍逼近榆林、三亚策应。但陈侠农派去策反工作的人员被扣留。敌人戒备森严。这时徐成章挺身而出。他扮成商人，亲入虎穴，与敌班长岭峰等人取得联系，岭峰等人同意联络部下举行起义，以为内应。这天凌晨，徐成章率领一支打扮成渔民船队的讨袁军，开进三亚港，迅速发起攻击。早有准备的岭峰班长听见枪声，立刻率部起义，将反动军官击毙。敌士兵纷纷向讨袁军投降。三亚光复后，起义部队改编为琼崖讨袁军第二支队。

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凯在北京病死，北京政权落入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中。在广东，桂系军阀陆荣廷窃取了广东政权，龙济光被委派为两广矿务督办，于七月间到琼崖赴任。龙济光到琼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缉讨袁军总司令陈侠农^①，接

^① 《侦缉陈聘珍（即陈侠农）文》，1916年7月29日《广东公报》。

着就是解散讨袁军，琼崖讨袁运动至此结束。徐成章、梁秉枢、徐坚（即徐无柄）、熊受天等讨袁军主要成员，为了避免龙济光的逮捕，于一九一六年下半年避居广州。此时，在桂系军阀统治下的广州，政治空气与琼崖一样沉闷。徐成章决心离开广州到革命气氛较好的云南昆明。他取道南洋，于一九一七年底到达昆明。一九一八年初，他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学堂第十二期步兵科，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涯。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波及全国各地，西南边陲的昆明，也掀起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六月四日昆明各界召开了盛大的国民大会，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爱国示威大游行。徐成章和讲武学堂的部分爱国同学冲破阻力，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

一九二〇年初，徐成章在云南讲武学堂毕业，回到了琼崖。此时，桂系军阀沈鸿英统治着琼崖。琼崖唯一的一个舆论机关——《琼岛日报》被查封，经理林格兰被军阀陈世华处死，三百万琼岛人民竟没有一份报刊看，岛内外新闻全无所知。为了传播“五四”新思想，同年夏天，徐成章集合同志，招募股份，拟在海口创办《琼崖旬报》，后因桂系军阀凶恶异常，只好派爱少年等人去香港设立筹办处，待政治开明之日再搬迁海口出版。这时广东“护法”军政府内部斗争十分激烈，桂系、滇系军阀竟与政学系联合起来，同北洋军阀政府妥协，改组广东军政府，排挤孙中山，拥护岑春煊。是年冬初，李根源率领海疆军到琼崖取代了沈鸿英，琼崖政治形势十分动乱。此时琼崖民军首领陈继虞率队在万（宁）、陵（水）宣布独立，徐成章加入民军，为民军制订军事计划，率部进攻海口、府城。敌人为了报复，到处张贴通缉徐成章，并将其刚从南洋归里的父亲及两位堂兄抓去。十月二十八日，粤军攻克广州，桂系残

部逃回广西。这样，琼崖民军改编成为粤军警备游击第十九统领部，徐成章由于作战有功被委任为该部副官，其父亲和堂兄被释放①。

一九二一年春，徐成章应琼东县民选县长王大鹏之邀，就任加积市公安局长，兼任琼东县第一小学义务体育教员。为了扩大革命宣传，他利用上体育课的机会，向学生传授军事知识，宣传革命思想。四月间，在徐成章主持下的《琼崖旬报》，在海口出版。他任用从欧洲勤工俭学回国的罗汉、鲁易和从北京来琼宣传革命的李实等人做编辑工作，并与罗汉、鲁易、李实、徐天柄、吴明（即陈公培）等六人组织琼崖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以《琼崖旬报》为阵地宣传革命思想②，明确提出该报以“改造琼崖”为宗旨，积极“介绍欧洲社会主义学说”③，“鼓吹革命，反对封建，反对土豪欺凌贫苦百姓，宣传破除迷信，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并“会同海口艺人吴发风改良土剧（即琼剧），以宣传改革旧社会风俗，提倡文字改革，鼓吹宣传妇女剪辮等一系列革命活动。”④为琼崖党组织的成立在思想上作了必要的准备。

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背叛孙中山，炮击广州观音山总统府。琼崖军阀邓本殷与陈炯明相呼应，乘机占据国民党琼崖办事处。这时琼崖国民党党员多半离散，徐成章感到国民党所领

①徐成章：《琼崖旬报的略历》，载《琼崖旬报》第36期（1922年4月）。

②《吴明致光亮信》，《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③徐成章：《琼崖旬报的略历》。

④樊秉樞：《徐成章烈士事略》，《广东文史资料》第29辑。

导的革命斗争前途十分渺茫，产生了“自觉，忏悔，牺牲，奋斗”的心理，开始重新思考如何在光明正大的新道路前进，去找我们的新生命。”^①

一九二二年初，陈炯明被赶出广州。徐成章从琼崖来到广州，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充任湘粤桂联军某支队参谋长，进驻增城，与盘踞东江的陈炯明相对抗。陈炯明率部围攻三月不克。在此期间，徐成章认真地阅读马列主义著作，从此，他开始懂得了过去长期斗争失败的原因，也逐步认识到取得革命成功的道路和方法。一九二三年下半年他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②。

(三)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徐成章和洪剑雄等在广州创办《新琼崖评论》，作为向琼崖人民进行革命宣传的刊物。这个刊物自一九二四年一月创刊到一九二五年五月，共出版了三十期。徐成章曾先后任交际主任和理财主任，并在这个刊物上，写了大量文章，系统总结过去琼崖的斗争经验，指出今后进行斗争的方向。他在《敬告琼崖同志》一文中，号召琼崖人民起来同敌人坚决斗争，指出：“应当拿出我们坚忍沉毅的全副精神，作伐木开山的先锋，除这道途上一切的障碍物，造成平坦康庄的

①徐成章：《敬告琼崖同志》，《新琼崖评论》第10期（1924年5月16日）。

②《革命烈士传记资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版，第98页。

大道；为民众之永久的幸福，为社会留永久的纪念，这才是我们同志的责任，这才是我们革命党的精神”^①。《新琼崖评论》第十二期至第十五期，连续刊登徐成章的《十余年来琼崖革命运动的回顾及今后应取的方针》一文，对过去的革命运动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他深深感到，过去最大的教训，就是“只努力于军事运动，而忽略于民众方面做工夫，此其所以失败者一”；“不能完全统一，与敌人以可乘之机，此其所以失败者二”；“没有团体训练，未曾认定革命的目标，行动又不一致……，此其所以失败者三。”^②

一九二四年五月，党组织决定调徐成章到黄埔军校任特别官佐，负责对学员进行军事训练工作。在军校，徐成章每天和学员们一起早操，对学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坚持三操四讲，生活严肃紧张。

一九二四年十月，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由香港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与佛山大地主陈恭受组织的广东商团军叛乱，广东革命政府于十月十四日派出黄埔军校学生，会同广州的工团军、农民自卫军等采取军事行动，包围商团军。徐成章在这场战斗中率领学生军，身先士卒，与商团军激战，镇压了商团的叛乱。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将要毕业时，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周恩来，从黄埔军校中抽调特别官佐徐成章和第一期毕业生周士第、赵自选三人，并从其它单位抽调了廖乾五、曹汝谦二人，一共五个共产党员，负责组建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是我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铁甲车队

^① 《新琼崖评论》第10、12期。

^② 《新琼崖评论》第12—15期。

成立后，徐成章被任命为队长，廖乾五为党代表，周士第为副队长，赵自选为军事教官，曹汝谦为政治教官。全队一百三十六人，编为三个排。该队名义是大元帅府属下组织，实际上是由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铁甲车队所有人员的配备调动，都由区委决定。徐成章是中共广东区委军事委员，铁甲车队的工作与活动，由他直接向区委书记陈延年，区委军事部长周恩来请示报告。

铁甲车队在徐成章的领导下，每天除军事训练外，上午两小时政治课，晚上组织小组讨论。他和廖乾五、曹汝谦分别授课。他还经常找队员个别谈心，对犯有错误的队员，耐心地进行启发教育。他在抓军事训练时，注意因人施教，根据不同对象、不同程度进行具体帮助^①。

一九二四年十月，广宁县农民，在周其鉴为首的中共广宁支部领导下，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减租运动。地主豪绅进行顽抗，组织民团攻打农民协会，屠杀农民。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派出铁甲车队赴广宁支援农民运动，镇压豪绅地主的武装反抗。徐成章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决定，经大元帅府同意，率领铁甲车队，于十二月十一日赶到广宁县，驻扎在广宁的社岗。当天晚上，徐成章与正在广宁指导农民运动的彭湃和周其鉴、陈伯忠、陈国杰等举行会议，讨论进攻计划。为了锻炼农民自卫军，会议决定先由农民自卫军包围敌人据点潭埗，如攻不下，再由铁甲车队上阵支援。

第二天，农民自卫军军长陈伯忠下令，由农军中队长郑兴宝带领农军六十人进攻潭埗，激战两小时，铁甲车队即上阵援

^① 《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助，声势大振，迅速进占广宁地主头目汪淮英老巢潭岭坑。敌人退守炮楼顽抗，因炮楼建筑异常坚固，一时无法攻下，这时各地地主武装也前来援敌。铁甲车队与农民自卫军退回社岗驻扎，并派廖乾五、黄克两人赴省报告并请求援助。

十二月十五日，粤军第三师派出一百三十多人，由占学新等率领，从四会县江谷抵达潭埗。潭埗地主江汉英和反动民团局立即宰猪杀羊，热情款待，并以巨款收买该部官兵。该部即宣布潭埗为该师防地，并给铁甲车队徐成章发出通报，要铁甲车队“制止农军越轨行为”，“不许农民扰乱治安。”^①

十六日，占学新带一排士兵到社岗会见徐成章，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占学新胡说“农会抽捐”，“不但侵害地主，而且影响政府收入。”徐成章理直气壮指出：“农会不是抽捐是减租，不可误会。”“政府宣言农会有代缴地税之权，毫不影响政府收入。”他还指出：“我们革命政府为维护痛苦农民起见，不能不派队保护。”要求占部“最好协同缉拿匪首，解散匪团，使痛苦农民，永安无祸。”^②

为了争取团结粤军第三师的官兵，孤立和分化敌人，徐成章、彭湃两人回访占学新。翌日第三师官兵到社岗游行。徐成章和彭湃事先教育农民，派出代表热情欢迎第三师官兵，并由周其鉴、陈伯忠等在潭埗墟演说。第三师有些官兵也到墟上听演讲，使他们逐步了解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况。十九日，为了更好地教育、团结第三师官兵，以农民协会、铁甲车队、农民部特派员名义，在社岗举行农兵联欢大会，邀请驻潭埗的第三师

^{①②}周其鉴：《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

全体官兵参加，出席联欢会的官兵和农民协会会员五千多人。徐成章和周其鉴及第三师营长李汉魂被推为大会主席团。徐成章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他指出：“农民兵士本是一家兄弟，情爱相亲，阶级相同，应该无分彼此，大家联合起来，然后团结坚固，势力雄厚，进行革命，自必成功。”他还指出：“我们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若能和兵士团结起来，不怕革命不会成功。”^①彭湃、周其鉴、罗国杰和李汉魂等也在会上相继演说，团结、革命气氛十分浓厚，经过一系列的争取工作，第三师的官兵也逐步采取中立态度。

广东革命政府，根据广宁县农民运动状况，决定由农民部特派员彭湃、铁甲车队党代表廖乾五、广宁县长蔡鹤鹏、第三师代表占学新组成“广宁绥缉善后委员会”，处理广宁农民同地主斗争的问题。二十七日，在“广宁绥缉善后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缉拿江汉英、谭侣松等八名破坏农民运动的祸首，收缴反动地主武装的决议。会后，谭侣松为了逃脱罪责，特向铁甲车队、农民部特派员、第三师带队长官发出“请柬”，邀请他们当晚到县民团局赴宴。徐成章与彭湃、廖乾五三人，身佩短枪，武装赴宴，即席逮捕了谭侣松；周其鉴和赵自选等也带领铁甲车队到达民团驻地，收缴了民团长短枪四十多支，武装了广宁的农民自卫军。

二月一日，经过充分的准备以后，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发起进攻广宁地主反动巢穴——潭埗炮楼。彭湃率工程队挖掘地道，准备用炸药炸毁敌炮楼。徐成章率铁甲车队全力掩护工

^①周其鉴：《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

程队进行坑道作业。二月三日，农军发现离潭埗十里有地主武装五、六百人前来支援被围的敌人。徐成章镇定指挥铁甲车队与农民自卫军迎击敌人。他身先士卒，带领铁甲车队二十多人和另一个排的武装，分两路直向敌人占据的山头猛冲。至半山腰，双方枪声密集，徐成章手持驳壳枪，带领队员五人奋勇直上，再分两路，由他自己带队员两人继续向山上冲去。敌人用机关枪向他们猛扫，徐成章毫不畏惧，带队向敌冲杀过去。敌人见势不支，才拔旗后退，铁甲车队直追至山背始退回潭埗。周士第参加了这次战斗，他说：“徐同志神勇，惊人毛骨。”^①党代表廖乾五除表扬铁甲车队奋勇杀敌外，并嘱咐铁甲车队有关同志注意关照徐成章，以后战斗，不能任令前进，以防不测。广宁匪首李济源残部营长冯濂溥经此次较量以后，“自言自经战以来，未见有如此次铁甲车队之神勇酣战者。”^②在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的围攻下，潭埗炮楼守敌终于树起白旗投降。此次战斗共缴获步枪三十支，火药枪五十支，土炮一门，弹药五十斤，粮食四百石，全部送给农民自卫军。二月十六日，徐成章又率领铁甲车队和陈伯忠领导的广宁农民自卫军，乘胜进攻螺岗的地主武装。敌踞该乡炮楼顽抗，徐成章亲自带队冲入炮楼。此次战斗共歼敌二百八十多人，收复了被地主豪绅占据的螺岗，取得了又一次胜利。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八日徐成章率铁甲车队回到社岗。由于广州形势紧张，徐成章带领铁甲车队于二月十九日离开广宁，二十一日回到广州。二月二十三日，广州各界人民团体在广州公园举行庆祝铁甲车队凯旋大会，表彰了铁甲车队的英勇奋斗精神。

①②周其鉴：《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

(四)

广东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惊慌，驻广州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在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的支持下，阴谋进行反革命叛变。铁甲车队从广宁胜利归来不久，中共广东区委已经发觉刘、杨叛变日益明显的迹象，立即命令铁甲车队加强戒备，在广州大沙头的桥头堆放沙包，修筑工事，准备随时迎击敌人。刘、杨叛变时，铁甲车队在土敏土厂（即珠江南岸）一带，担任保卫革命政府任务。

为了配合回师广州的东征军歼灭刘、杨叛军，徐成章和廖乾五指挥铁甲车队，从猎德附近渡河，向石牌、瘦狗岭敌人背脊攻击，切断了石牌、瘦狗岭方面敌人与广州之间的联系，向敌人展开猛烈夹攻，击溃敌人，收复了广州。

六月十九日，为了声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斗争，香港十余万工人举行罢工，并有部分工人回到广州。六月二十三日，在陈延年、周恩来等领导下，广州十万人举行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途经沙基时，沙面的英帝国主义者突然开枪射击，杀害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徐成章指挥铁甲车队，冒着弹雨，奋不顾身，掩护游行队伍，抢救遇难的群众。

“沙基惨案”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香港罢工人数迅速发展到二十五万人，有十三万人陆续回到广州。罢工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设立了罢工工人纠察队，对香港实行武装封锁，维持罢工秩序。中共广东区委抽调徐成章到工人纠察队担任总教练，赵自选为大队教练。七月五日，工人纠察队在广州东园正式成立，二千多纠察

队员编成三个大队，并进行军事训练。徐成章到职后，和担任训育长的邓中夏一起，坚决执行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抓紧对纠察队的政治军事训练。七月十一日，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罢工工人十多万人，在广东大学操场举行公祭沙基死难烈士大会，公祭完毕又列队赴国民政府请愿。纠察队也步伐整齐地参加游行，深为广大群众赞扬。《工人之路》记者在报导中说：“观者咸谓纠察队虽成立不过三数月，而训练之成绩实可惊人，比之军队亦不过如是云。”^①

工人纠察队成立仅一个月就发展到六个大队、二十二个支队、二千六百多队员，并分别派出队员赴深圳、石岐、前山等地封锁港口。八月十七日，纠察队在东园总队部西凉亭召开全体会议，徐成章在会上进行讲评，表扬了成绩优异的队员，并提出了新的教练日程。为了加强军事训练工作，他提出请求黄埔军校派学生五十人来纠察队任教练。九月十六日，军校应徐成章请求，派了十五名毕业生到纠察队充任教官。十月，革命政府举行第二次东征。罢工委员会派出罢工工友组织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东征。

纠察队成立后，做出了不少成绩，但也出现一些问题。如驻江门纠察队截留公款、违反命令、盗卖火油等；少数奸商偷运粮食出口，不服纠察队制止，开枪杀害纠察队员。为加强对纠察队的领导，罢工工人代表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改组纠察队，成立纠察委员会，作为纠察队最高领导机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派徐成章为委员，再由罢工委员会派出邓中夏、黄金源、廖祝三等六人，组成委员会，并公议由徐成章、

^①1925年7月12日《工人之路》。

黄金源、何清海（后何被开除，由施卜充任）三人为常委，施卜为秘书长。徐成章主持常委的日常工作。纠察队委员会下设秘书、军务、训育、军需、军法、调查等六个处，具体处理日常事务。纠察队规定了四大宗旨：一是维持秩序，二是截留粮食，三是严拿走狗，四是镇压工贼。

纠察队改组以后，首先发出布告，明确宣布各地在执行任务时，“须奉有本队委员会命令，或知令本队纠察方能着手扣留货物，拘拿人犯，以重纪律而维持治安”，“如有不法之徒假冒纠察恣意妄行，及未奉命令和擅逮捕人犯及截搜货物舞弊营私者”^①，定严拿惩办。接着又组织模范纠察队，调共产党员唐澍为模范纠察队队长，参加模范纠察队的百分之八十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罢工工人纠察队设立以来，分布在全省沿海各主要港口，严密封锁香港，维护罢工秩序，对保证罢工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九月十二日，省港罢工代表大会召开颁发奖旗和奖章大会，徐成章代表纠察队委员会郑重受旗，并在会上发表演说。全国总工会代表刘少奇也在会上讲话，热情称赞罢工工人纠察队。

一九二六年十月，省港罢工工人代表会议，根据全国形势的发展，决定改变斗争策略，主动采取步骤以结束罢工和停止封锁，变局部奋斗为全国奋斗，以便建立更坚固广泛的联合战线，向帝国主义展开总攻击。罢工委员会发表布告，决定于十月十日十二时起，将全体纠察队撤回广州，取消武装封锁。十月十日，广州举行双十节与扩大反英示威大会，参加大会的有

^① 《工人之路》第136期。

七百个团体共三十万人。大会以广州各界同胞名义，给工人纠察队颁发“反帝国主义先锋”红旗一面，以表扬工人纠察队功绩。”徐成章代表纠察队委员会受旗。

十月二十二日，罢工工人代表举行慰劳纠察队大会，三千多工人纠察队出席大会，徐成章为大会总指挥。罢工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致慰问词，邓中夏、李森也相继演说。徐成章代表纠察队委员会在致答词中指出：“现在我们集中回来，要更加努力受军事教育，学习革命理论，我们要注意下列三条：一、我们要养成军事人材；二、我们要严守纪律；三、我们要变成一个革命宣传家。此后，更要实行以下的口号：严守铁的纪律！养成铁的精神！”^①

一九二六年冬，由于省港罢工已告一段落，大批工人纠察队便进行了改组，有的编入北伐军随军参战，有的转入农村，参加农民运动，深入各县训练农民自卫军，推动各县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仅顺德等地转到农村去的纠察队员就有几百人。为了保存一部分力量，经中共广东区委和邓中夏、苏兆征等人的积极争取，利用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和国民党上层人物中间的矛盾，将纠察队员几百人，改编成“缉私卫商保卫团”，由宋子文负责发给枪械、服装和其他费用。徐成章被调到该团担任团长，施卜担任参谋长。集中在虎门太平训练了两个月。训练结束后，又调回广州沙面对面的芳村和太平南路（现人民南路）等地驻扎。这支武装，在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时，由于没有和中共广东区委取得联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包围下，虽然进行了激烈的反抗，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情

^① 《工人之路》第472期。

况不明，终于被钱大钧等反动派缴了械。徐成章逃出广州，前往香港。从此又投入了另一场新的战斗。

(五)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周恩来等的领导下，我党举行了南昌起义。起义军于九月间打到广东潮汕一带。徐成章奉广东省委指示，前往海陆丰农民军中工作，以配合起义军解放潮汕平原。九月二十六日，彭湃和徐成章领导的海陆丰农民军四千多人会同起义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二十军第一师解放了揭阳县城，建立了揭阳县第一个革命政权——揭阳县工农临时政府。二十七日，敌人对我西进部队以及留守在潮州、汕头和三河坝等地部队，分别发起进攻，终因敌兵力集中，我兵力分散，敌以逸待劳，我军疲惫，起义军和农民军遭受严重损失。十月三日，起义军在普宁乌石附近遭敌兵伏击失利。此后，周恩来、叶挺、贺龙等按其撤退计划相继到普宁流沙集中。十月四日，在流沙一个天主教堂召开会议，研究整个作战部署。徐成章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周恩来总结了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同时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号召大家坚决执行八七会议的决定，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旗帜下，将革命斗争坚持到底。会议还决定，起义军领导人员分批去上海找党中央，听候分配。贺龙被分配回湘鄂西，继续领导那里的革命斗争，叶挺和周恩来等留在广东，与彭湃、徐成章等参加领导海陆丰根据地的游击战争。之后，起义部队从流沙出发，又遭受敌人袭击。我军损失严重，许多领导干部相继牺牲。周恩来身患严重疟疾，发高烧，由叶挺护送到陆丰转香

港。此时，徐成章奉党的指示，在海陆丰地区将起义军失散人员收集起来，最后率领起义军三百多人，冲出重围，乘船前去香港^①，将起义军的武器送给当地农民，加强了海陆丰地区的农民武装。当年陆丰县碣石区区委书记黄秀文回忆说：“徐成章团长（属起义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奉军委的命令，把武器送给了英勇的碣石和金厢农民，金厢的州渚村就发了一百多支枪。农民有了枪，斗争劲头更大了，部分青年农民穿上起义军赠送的制服，全副披挂起来可神气哩！”^②

徐成章率领三百多名起义军转移到香港后，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大部分人员在香港就地分散。徐成章便抓紧时间做好安置工作。十月下旬，广东省委派他和刘明夏等人到海南岛，参加领导琼崖人民武装斗争。

此时，正是琼崖工农革命军举行全琼大暴动遭到严重挫折的关键时刻。十一月间，他到乐会县第四区找到了中共琼崖特委和王文明，被特委任为琼崖军委委员，并出席了特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会上，中共广东省委代表杨殷传达了党中央的八七会议精神。这次会议还总结了琼崖一周暴动的经验教训，并根据省委关于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指示，确定继续加强武装斗争；向敌人发动新的进攻的方针，决定增设东、中、西路三个总指挥部。由徐成章任东路总指挥，严凤仪任中路总指挥，琼崖工农革命军司令冯平则兼任西路总指挥^③。整编后的工农革命军，扩大了队伍，加强了政治工作，投入了创建苏维

①《八一南昌起义》，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3页。

②黄秀文：《难忘的日子——记一九二七年周恩来同志到陆丰》，《南昌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0页。

③万宁县政协编：《万宁革命历史简编》（1964年3月10日）。

埃政权的伟大斗争。

十一月中旬，徐成章在万宁县第四区军寮岭孤村东路总指挥部，召开了连级以上干部会议。徐成章在会上传达了特委扩大会议精神，对于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第二天，东路工农革命军召开授旗大会，徐成章把中共琼崖特委授给东路部队的三面有镰刀斧头标志的战旗，分别授给各个连队。接着徐成章率领东路工农革命军和万宁第四区农军数千人向和乐墟发起进攻。他命令工农革命军一连绕道至和乐墟西南，以切断敌人向县城的退路和打击敌人的援兵；命令第二连从和乐墟东北进行正面主攻；命令第三连和农军作为预备队。由于对战斗作了周密部署，上午十一时，战斗打响后，敌人抵挡不住，纷纷向街道集结，利用店铺负隅顽抗。下午三时，徐成章发现敌人有突围逃跑的迹象，立即命令冯建农率领第三连一个排向西南迂回，开展包围，敌人被迫集中主力选其一路突围。是役，我军缴获步枪十多支，弹药一批，毙敌十多名，我军仅第三连连长吴均南牺牲。

和乐墟战斗结束后，万宁县城敌人已无招架之力，闻风而逃。于是我军准备进攻陵水县城。在万宁与陵水两县交界的牛岭是我军必经之道，敌人在该地驻有钢岭民团，企图凭险阻止我军前进。徐成章同第三连连长冯建农研究，认为必须智取不宜强攻。遂派冯建农率领十几名战士，化装成国民党军进入钢岭，插入敌人心脏，以便策应。正当反动民团的官兵们兴高采烈地迎接冯建农等的时候，徐成章率领工农革命军迅速开进钢岭，逮捕了民团团长及其大部团丁，胜利地拿下了钢岭，打开通往陵水通道，为解放陵水创造了极为有利条件。

十一月二十五日（农历十一月初二），徐成章率领东路工农革命军在陵水县农民群众三千多人的配合下，第二次攻占了陵水县城。

陵水解放后，在中共陵水县委的领导下和东路工农武装的积极支持下，陵水人民建立了琼崖第一个县苏维埃政权。琼崖工农革命军也不断扩大。徐成章为了培养军事干部，在陵水县城圣殿设立军事干部学校，从地方武装和农民自卫军及社会进步青年学生中选拔优秀分子六十多人（后扩大到二百多人），进行军事训练，加强对农民自卫基干队的培养；同时还从工农革命军连队中，抽调曾在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中受过军事训练的王学志等几位排长，到农民自卫军基干队中担任连长，以加强农民自卫军的领导。使农民自卫军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如何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问题上，特委个别同志认为，主力部队只有分兵把守，苏维埃政权才能“长治久安”。与此相反，徐成章却认为，巩固陵水苏维埃政权的根本方针是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其措施是用少数工农革命军兵力配合农民自卫军在万陵交界之牛岭牵制敌人，而主力工农革命军的主要任务是追歼王鸣亚残敌，解放三亚、榆林，苏维埃政权才能得到真正的巩固。于是，徐成章在十二月间率领工农革命军攻下崖县重镇——藤桥后，立即率领工农革命军、农民自卫军挥戈南进，横扫陵水等地残敌，解放榆林、三亚城镇，扩大了苏维埃区域，把红色根据地连成一片。

一九二八年春，工农革命军改称工农红军。这时，中共琼崖特委和红军的一些领导人受“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以“左”的观点分析当时的革命形势，错误地估计了敌我力量对比，对于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和武装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

曲折性认识不足，热衷于进攻和夺取大城市，命令红军进攻海口，说什么要“三个月打下海口”，“进海口海天楼吃大饱”。徐成章认为当时形势是敌强我弱，革命处于低潮，特别是叶挺、贺龙领导的军队失败后，红军在大陆方面力量不大，东江红军人数也不多，没有大陆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支援和配合，琼崖红军要在短时间内夺取全琼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琼崖党和红军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应是面向山区，到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把这些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民运和生产工作搞好，才能做到以战养战，战胜敌人。徐成章还将其看法，写了一份意见书报告特委。但是，由于交通不便，他的这份报告未能及时送到特委，特委在未接到他的报告前，一天之内发三封急信，命令他回师陵水，继续北上。

一九二八年二月初，徐成章率领东路红军在北上途中，据方宁县第四区群众的报告，分界墟陈烈卿乡团只有七十五人，枪六十八支，战斗力极弱。徐成章决定拿下敌人这个据点，以补充我军弹药和武器的不足。红军九个连队在乐（会）万（宁）边区几千农民群众的配合下，向分界守敌发起攻击，四日早晨战斗打响后，方知敌人为了阻止我军北上，已于昨夜调来两个正规连队增援。当时虽然我众敌寡，但是敌人武器优良，弹药充足，而我军除从文昌新调来的第四连和第二连有些子弹外，其余各连子弹都很少。第一连全连步枪子弹只有二百多发，第七、九两个连每枝枪平均不到一发子弹。在此情况下，他决定用炸弹掩护部队冲入街道，与敌展开白刃战。徐成章身先士卒指挥总预备队的步枪连向街道冲锋，不幸被流弹打中颈部，抬下火线，送到军寮村临时总部医治。由于伤势过重，医治无效，英勇牺牲。年三十六岁。

李 汉 藩

张 秀 娥

李汉藩一九二一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在黄埔军校入党，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积极分子。他参加过东征和北伐战争，一九二八年春，他在担任湖南省委军委书记时被捕，壮烈牺牲。

李汉藩又名意产，一九〇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出生在湖南省耒阳县新坡洞管子山。山村里几十户人家，均以务农为生。李汉藩的父亲李庆佑，从小务农，三十岁始做生意，肩挑串户卖茶油，后来，与人合伙在青水铺开一粮油小店；其母谭氏，生二女三子，汉藩居次。谭氏勤劳俭朴，协助丈夫耕种、料理家务。

李汉藩八岁读私塾，十二岁考入本县云峰镇小学。他刻苦用功，古文习作常常被老师“揭示”（贴堂），得到同学们的赞扬。一九一九年暑假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了衡阳市私立成章中学。时值“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勃起。毛泽东等领导的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波及全省。何叔衡等驱张请愿代表团来到衡阳，开展驱张斗争。这时李汉藩是成章中学学生会负责人和湖南学联发起的耒阳旅衡学友会负责人。他和湘南学生联合会夏明翰、蒋先云、黄静源等联络各校进步师生，并团结全市各界民众，召开国民大会，举行示威游行，向衡阳驻军吴佩

孚请愿，陈诉张敬尧祸湘罪行。他们协助何叔衡等利用吴佩孚和张敬尧的矛盾，掀起“驱张”运动的高潮。在民众的愤怒声讨下，张敬尧终于被赶出了湖南。

一九二一年春，毛泽东、何叔衡介绍青年团员陈书农、黄和钧到衡阳省立第三师范教书，在省立三师、三中和私立成章中学等校发展团员，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李汉藩是成章中学建团的第一批团员^①。“一九二二年初，衡阳党小组发展了刘泰、韦汉、罗严、刘通等人入党，二、三月间党派戴述人来到衡阳，在新民中学以教书为掩护，做党的工作，充实党的力量，继续发展党员。到四月底，党小组又陆续发展了袁痴、李汉藩、李弼廷等人入党。衡阳党员人数不断增加”^②。

一九二二年五月，李汉藩和成章中学的学生党员刘泰一道发起组织“读书会”，他们仿照蒋先云、黄静源等在第三师范办“新书报贩卖部”的经验，通过衡阳宝华书局从上海、长沙等地买来《向导》、《新青年》、《先驱》、《共产党宣言》等报刊、杂志。每逢星期日，他们就把这些书籍、报刊摆在教室里，供学生阅读和购买，使广大进步学生受到了影响和启迪。

一九二三年暑假开学后，李汉藩担任了湘南学生联合会第十届总干事。这时省立第三师范黄静源等革命师生，因闹学潮，一次被开除五十三人，他们在党团组织的安排下，先后离开衡阳分赴安源、岳北等地，开展工农运动。湖南谭（延闿）赵（恒惕）战争之后，毛泽东随谭军从长沙撤出，退至衡阳。李汉藩、陈芬等同他亲切晤谈。之后，他们召集衡阳各校学联

① 屈子健：《省立第三师范在衡阳初期的革命活动》，载《衡阳文史资料》第1期。

② 《衡阳党史通讯》1985年第1期。

代表开会，认真总结了三师大学潮的经验和教训，决心重整队伍，争取和团结更多的进步学生，为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斗争。

同年冬天，李汉藩在成章中学毕业，他父亲要他回到清水塘铺子里习商做生意。李汉藩在店里住了数月，他不顾父亲的阻拦，偷偷向姐夫借了八块银元作路费，毅然奔赴当时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广州^①。

一九二三年冬，李汉藩在党组织的帮助下，考入孙中山领导的大元帅府大本营军官学校——陆军讲武学校，编入第一队。在近半年的兵员军事生活中，他和同学们接受过孙中山的检阅，聆听过孙中山“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的革命军人精神，担当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神圣任务”的教导；还接受过廖仲恺的多次巡视和听过他多次演说。李汉藩在这里受到了民族革命的教育，更加激发了革命热情。可是，陆军讲武学校被旧军官所把持，管理和训练都是旧军队的一套，动辄打骂，不讲道理，引起了同学们的普遍不满。

国共合作后，孙中山在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按照苏联的建军原则和教授方式进行训练。我党派了恽代英、肖楚女、叶剑英、聂荣臻、张秋人等重要干部到军校担任教官，同时从各地选送了许多党、团员来校学习。这年五月五日军校开学编队，李汉藩和四、五个同学自动离开陆军讲武学校，转入黄埔军校^②，编入第三队^③。在军校

①李汉藩在成章中学的同学刘己明及其兄弟李涤非等人的回忆。

②汤季南：《记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载《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本）第3集。

③《黄埔同学录》。

里，他学习勤奋，成绩优秀，并写得一手好文章；他是非分明，为人诚恳，对同学友爱，但不屑与贺衷寒、鄒悌等人为伍，且经常嘲讽他们是“专门舔蒋介石屁股”的“弯脚分子”。

同年十一月，我党派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为了加强军校政治工作，李汉藩同蒋先云、李之龙、杨其纲等共产党员被抽调到政治部工作^①。他们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修订黄埔军校政治部教育计划，政治科目除原来的《三民主义》外，增设了《社会进化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课程，丰富了政治教学的内容。

一九二五年二月，军校学生中一部分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及在我党影响下的教职工和学生，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学生中的主要负责人有李之龙、蒋先云、徐向前、陈赓、王一飞、左权、黄鳌、李汉藩……等。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范围不限于黄埔，在湘、粤、桂各军中都开展工作^②。李汉藩为这个“革命团体拼命地工作”^③，经常秘密去广州，到湘军中串联同乡同学，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有时深夜才乘船回黄埔。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引起国民党内一部分右派的仇视和反对，军校内以王柏龄、繆斌、贺衷寒、鄒悌等人为首，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对共产党采取敌对态度，经常攻击和诽谤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偷窃我党文件，扰乱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工作，制造事端，挑衅摩擦。一天，李汉藩去领办公用品，军校管理处长林振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故意刁难，以致两人

①②《包惠僧回忆录》。

③李汉藩给陈芬的信。

相骂起来，林振雄竟然掏出手枪，向李汉藩开枪（未中）。李汉藩当即揭露他的阴谋，痛斥他是杀人凶手。在共产党人的斗争下，廖仲恺撤了林振雄的职^①。

一九二五年二月，黄埔学生军奉命参加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李汉藩虽患疾在身，但他决心血战沙场，不惜牺牲自己。二月二十一日，李汉藩写给好友陈芬的信说：“今奉命调我到东江作战，……子弹是没有眼睛的，革命就是要牺牲，我的生死关（观）念，是接到命令的时候就打破了，作战便是牺牲”^②。他念及母亲年老，弟妹尚小，拜托好友教育弟妹。李汉藩被派往第一团任连党代表，在攻打东江重镇淡水战役中，他是十名敢死队员之一，担任爬城队的前锋。在冲锋号声中，他和敢死队员们奋勇当先，冒着枪林弹雨冲到城墙脚下，架起长梯，越过城墙，打开了西门。不到半小时，全团就攻进了城，淡水之役大显了黄埔军威^③。

六月，东征军胜利回师广州，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南堤肇庆会馆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李汉藩、蒋先云、李之龙等以军校代表身分出席了大会。会议由王一飞主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李汉藩被选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中央候补委员。

“五卅”惨案发生后，李汉藩奋笔写下了《五卅惨案以后面面观》，文中列举了帝国主义者利用封建军阀，制造“中国内乱，延长中国战祸”、“压迫工农及一切革命势力”的事实。同时，万分沉痛地悼念“正红（即顾正红）为大家利益而

①夏蒸月：《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载《党史资料研究》第10期；《包惠曾回忆》。

②原信存湘南学联纪念馆。

③李奇中：《黄埔精神永存》，载《黄埔军校回忆录专辑》。

牺牲”，他呼吁，“革命的工农商学兵”，“大家团结起来”，“为‘五卅’死难者复仇”，“为救国保种复仇”，“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中国民族解放决一死战！”^①

李汉藩战斗的檄文写得激昂慷慨，诗歌也写得形象生动，锋芒锐利。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被帝国主义的走狗暗杀，噩耗传到黄埔军校，李汉藩写了《悼廖党代表》的长诗。诗中写道：

“廖先生之死，
谁个都知道是帝国主义的阴谋，
谁个都知道是军阀的暗害，”

……

“我不以为死是人生的悲剧，
我最可惜造福人类的人不能长生。”

……

“廖先生啊！
你的身体虽死，
你的精神如经天的红日。”^②

李汉藩身在广州，工作繁忙，但不忘家乡父老，不忘“唤醒耒阳人的觉悟，使他们同跑国民革命的道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他与在广州的同乡，创办了《耒阳新潮》半月刊，并写了发刊词——《本刊的使命》，他认为应该有一个“揭开帝国主义的阴谋，公布军阀祸国殃民的事实，使民众都了然痛

^{①②}原作存广东省档案馆。

苦的原因，去干国民革命事业的刊物”。在《耒阳新潮》第一期上，刊登了《我们纪念十月革命之意义》、《为十月革命纪念敬告被压迫的中国民众》、《穷是谁给我们的》等文章。通过广州华宁里茂源祥转发，把俄国十月革命的理论和经验介绍给了家乡人民^①。

这一时期，李汉藩和在广州政治讲习班学习的女共产党员张觉非相识了，张觉非性格坚毅刚强，她冲出封建家庭，追求革命真理，能说会写，他们热烈相爱，志同道合，经蔡畅介绍，他们结成了革命伴侣^②。

一九二六年初，李汉藩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兼党务科长（国共合作后，黄埔军校学生都加入了国民党，这里指国民党党务科长）。当时，二军军部在广州，部队驻防韶关，他往返于广州、韶关之间，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下级军官，教育士兵群众，为部队宣传工作起草提纲和文件。

驻防韶关期间，李汉藩参加了争取熊克武部共同北伐的工作。当时熊克武率川军和蔡锷部约万余人驻防粤北连县一带。广东革命政府动员其部一起北伐。李汉藩自告奋勇，到熊部进行劝说。在李汉藩的劝说和整个革命形势的影响下，熊克武部接受广东革命政府的改编，一起参加了北伐^③。

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夕，李汉藩调任第二团宣传委员会主席（党代表）。一九二六年七月，他随军北伐，从韶关出发，经

①见《耒阳新潮》第1期，原作存湖南省博物馆。

②姜玉涛、张起华回忆。

③彭侃1962年的回忆记录，张伯伦（任过二军连党代表）1962年回忆。

乐昌、坪石，经过衡阳。途中，他曾应家人的要求，回乡安葬停柩已久的父亲，并为当地农民演讲，宣传北伐的意义。尔后，迅速归队。北伐军路过攸县、茶陵时李汉藩等沿途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并于八月十三日在茶陵讲演三民主义，听者百人^①。之后至九江，参加了攻克南昌的战役。这时，张觉非已从广州政治讲习班毕业，调任南昌市妇女部部长。征途相逢，又匆匆分手，旋即李汉藩随军向福建进发。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李汉藩等共产党员离开部队到了武汉，参加了中央军委在武昌召开的干部会议。会上，分析了当时形势，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决定在军队中崭露头角的团级党员干部都要撤退，李汉藩按照党的决定离开了第二军^②。到湖北蒲圻县找到旧友、时任十三军团长的文修信，文修信委任他为步兵营长。李汉藩深入士兵，开展策反工作，计划拉出这支部队到咸宁，援救当地被围困的农军^③。七月，形势进一步恶化。李汉藩等兵变未能成功，被迫离开了十三军，从此，他结束了戎马生涯，转入了地下斗争。

党的“八七”会议后，李汉藩受长江局派遣，回湘任湖南省委军委委员。他从武汉返回长沙，同行的有张伯伦、张超华、张觉非兄妹，及宋觉、何悟、陈卜武等人，李汉藩西装革履化名李子木，和爱人张觉非以及长江局派来的两位同志，住在长沙清泰街、福宁里等处，设立机关，开始与同志联系，发展组织，准备参加长沙暴动。九月，福宁里机关被反动派破

①见1926年8月《广州民国日报》。

②谢华：《大革命的一点亲历》，载《峥嵘岁月》第3期。

③《宁乡人民革命斗争史》第77页。

坏，李汉藩、陈卜武和工作人员张觉非、姜国芬等同时被捕。藏在楼上瓷坐凳里的党的秘密文件落到敌人手里。被捕的同志屡遭审讯，长江局派来的同志完全承担了责任，英勇殉职。李汉藩、陈卜武、张觉非、姜国芬等被五花大绑，装在刑栏子里，押去陪斩，他们视死如归，未暴露身分。国民党特别法庭暂时不好处决，声称“此案关系重大”，不准保释，把他们关在长沙县公安局监牢里。一个月后，李汉藩等又被关进长沙市潮宗门陆军监狱。经敌人无数次审讯和酷刑，李汉藩等始终守口如瓶，严寒和刑伤时时威胁着他们的生命，于是李汉藩、陈卜武等秘密串通难友，筹划冲监^①，并将这一计划设法向省委作了汇报。

一九二七年冬，新军阀混战，长沙政局很乱。省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设法营救狱中的同志。当时姜国芬的哥哥姜玉涛，在武昌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司令部任上尉参谋，张伯伦（省军委成员）发电报请他回长沙营救姜国芬和张觉非、李汉藩夫妇。姜玉涛拿到收编散兵的委任状，回到长沙。是年古历除夕，十三军李抱冰师到达长沙北郊。唐生智部未作抵抗即弃城逃走。省军委研究决定，取出枪枝，准备暴动。暴动的目的是显示地下党的力量，使敌人有所畏惧；向十三军表示配合。除夕夜，张伯伦、曾竞勋、黄逸夫、周纬璜等十几个地下党团员，取出枪支、登上城墙，鸣枪暴动，他们从小吴门一直伸展到经武门，向城外铁路沿线放枪，追击唐生智残部。正月初一，李抱冰师进入长沙。姜玉涛便到李师司令部取了释放“犯人”的条

^①姜国芬回忆记录：张觉非同志尚健在，但长期的监狱生活，被折磨成神经错乱，至今人事不清。

子，和张伯伦等带着几个传令兵到司禁湾监狱“提取”姜国芬、张觉非出狱。那时监狱里的官吏都跑光了，只剩下几个“禁子”，不敢放人。他们便用斧头砸开牢门，“犯人”一拥而出，姜国芬、张觉非等一齐冲出了监狱。张伯伦、姜玉涛、曾竞勋、黄逸夫等又携带枪支、棍棒，打开了陆军监狱，里应外合解除了看守的武装，营救李汉藩、陈卜武等出狱^①。

李汉藩出狱后，正值省军委书记黄鳌被反动派逮捕^②。长江局委派李汉藩继任中共湖南省军事委员会书记。军事委员有宋觉、何悟、陈卜武、张伯伦等，张觉非任军委秘书。长沙“灰日”暴动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长沙。省委决定，将省军委机关迁往衡阳，开展湘南武装斗争。一九二八年春，李汉藩率省军委何悟、宋觉、陈卜武等转移到衡阳。当时，正是湘南暴动席卷湘南各县，耒阳的土豪劣绅纷纷逃到衡阳，李汉藩等刚到便被他们发觉。驻衡白崇禧部接到密报，立即包围了李汉藩等下榻的旅馆，除陈卜武因外出取文件未归，幸免于难外，李汉藩、宋觉、何悟等均被逮捕^③。在监狱里，李汉藩再次惨遭酷刑，压断了手指，被打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但他宁死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为真理、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一九

①姜玉涛回忆录，1928年2月12日《晨报》载，“陆军监狱、长沙看守所及长沙旧监狱均于二十六日早冲监，所有共产党在押监犯，逃走一空。”

②1928年2月11日《晨报》载“李子骥即黎崇厚，又名黎伯森，赵子杨，黎植湖南共产党省委秘书、即秘书厅秘书，即前中秋湖南全省总暴动军事部部长，即王本施、一名王半石，黄鳌，共党，湖南军事运动委员会主任（余洒度灰日暴动军委书记，因失败撤职，以黄鳌继任）。”

③张起华1966年回忆记录。

二八年春，被反动派杀害于衡阳。时年二十七岁。

一九五六年，李富春回忆说：“李汉藩同志在大革命时期，曾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六师营长、团指导员等职。大革命失败后，曾担任过湖南省委军事书记，在派往湘南工作时，不幸被捕牺牲。李汉藩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干部，对党忠心耿耿，英勇牺牲。”^①

作者附记：

本稿由李汉藩烈士的女儿李可荏、兄弟李涤非等提供了宝贵资料，李可荏同志并参加了部分调查研究。在征集史料的过程中，承蒙广州革命历史博物馆、广东省档案馆、湖南省博物馆和长沙市档案馆的大力协助，同时参考了李铭中同志关于烈士的调查记录。这里一并予以感谢。

^①李富春给李汉藩写的证明材料，原件存长沙市档案馆。

詹乐贫

冯生敏

詹乐贫，化名詹懋懋、马复生，一九〇二年二月十九日出生在湖南省汉寿县毛家滩乡东岸村一户农民家里。他三岁丧父，寡母善良能干，率领全家耕种佃田，纺纱织布，以维生计。

詹乐贫小时读书非常勤奋，成绩优异，于一九一八年春考入长沙明德中学。该校革命气氛甚浓，老同盟会员、明德中学校长胡子靖、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时常对学生讲演孙中山、黄兴等推翻专制的史实，灌输教育救国的思想，詹乐贫从小立下了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志向。在明德中学求学期间，詹乐贫除了认真学习规定的课程以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经济学原理》、《新青年》、《太平天国史》等进步书刊。他每看完一本书，都提出一些问题，和同学们共同研究，从中受到很大启发。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长沙各校爱国学生纷纷响应。詹乐贫邀集进步学生，敦促明德中学学生会，联合长沙市各中学学生，在教育会坪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国领土、侵犯我国主权的罪行。随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詹乐贫高举横幅，走在队伍前面。同时，他还组织雪耻会，上街宣传，抵制日货，

焚毁日货，受到爱国群众的热情赞扬。

一九二一年冬，詹乐贫毕业于明德中学。一九二二年暑期，他赴北京住入学生公寓复习功课。一年后，考入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刻苦学习农艺、农业化学、农业经济；同时，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一九二四年春，詹乐贫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北京农业大学特别支部书记、国民党北京市第九区党部（即北京农业大学区党部）执行委员、北京农业大学学生会主席和北京大学生联合会农民部长^①。

从此，詹乐贫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带领爱国学生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他以北京农业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发起组织每周一次的学生“自由辩论会”，讨论“学生应不应该研究政治？”“如何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等一系列问题，团结和教育了大批年轻学生。一九二五年，中共北京地委为了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正式成立了中共北京地委农民运动委员会，詹乐贫和乐天宇、胡求仙、左士、李启耕为委员^②。他们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经常邀进步同学到北京西北郊的绿稻庄、罗道庄、玉渊潭、公主坟、竹坊坨、跑马厂、大井、小井、大瓦窑、羊圈头、温泉、卧佛寺、西山一带大小村庄访问农民，和农民交朋友，从扫盲和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开始，向农民群众宣传反帝反封，推翻军阀统治的主张。他们办起农民夜校，并担任教员，为一百多入学农民上课，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时弊，帮助农民提高觉悟。在这一基础上，他们进一步发动农民组织外交后援会，成

^{①②}乐天宇：《我所知道的中共北京地委早期的革命活动》，载北京《文史资料选辑》。

立农民协会，积极投入反对帝国主义强占耕地，盖别墅、修马路的斗争；踊跃参加北京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的示威游行。遇到逢年过节，逢集赶庙，詹乐贫还组织北京农业大学学生为农民演出时事新剧、活报剧。他撰写的《论吴佩孚以武力统一中国之我见》等文章，抨击反动军阀穷兵黩武，在《北京晨报》等报刊上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一九二六年三月中旬，在共产党组织和国民党进步力量的领导下，一个声势浩大的“抗议八国最后通牒，要求驱逐八国公使出境”^①的运动在北京迅猛地开展起来。詹乐贫率领农大学生和西郊绿稻庄农民加入了这一行列。他们与北大、北京总工会、总商会所属几百个团体五千余人参加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国民大会之后，举行了示威游行。他们沿途张贴标语，分发传单、高呼口号，路边群众纷纷鼓掌致意。下午一时，游行队伍来到执政府的东辕门，段祺瑞命令警卫队对手无寸铁的请愿学生实行镇压，卫队有的开枪射击，有的用大刀、铁棍追打砍杀，当场被打死和重伤事后致死的群众达四十七人，受伤者二百余人，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詹乐贫在这次惨案中身负重伤，满身血迹，昏倒在死难者的尸堆中，后经同学和农民搭救脱险。在“三·一八”惨案牺牲的烈士追悼大会上，他慷慨陈词，用血的事实控诉了帝国主义和军阀互相勾结，狼狽为奸的罪行，还撰写了《“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原因与所得的教训》一文，刊登在《反抗八国最后通牒，段氏惨杀爱国

^① 《北京惨案真相——全国学生总会北方特派员杨善南报告书》；
乐天宇：《我所知道的中共北京地委早期的革命活动》。

同胞》特刊上，呼吁民众团结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和卖国军阀的蹂躏和压迫。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军阀张作霖入京，自称大元帅，大肆逮捕爱国民众和革命学生，对革命群众残酷镇压，特别是对南方籍的更是不分青红皂白，到处乱抓，投入狱中。中共北京地委通知詹乐贫、乐天宇等迅速南撤。一天，北京西部委的詹乐贫、乐天宇、陶季玉、黄龙、唐昭熏等和东部委的几个南方同志，来到东郊民巷苏联驻华使馆隔壁的一间屋子里，李大钊亲切地对他们说：“我们在一起工作好几年了，我怎么舍得你们走啊！但是，你们暴露了，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不走怎么行啊！南方革命形势那样好，你们到那里继续努力，这也是革命的需要，组织上的指示。”^①五月，詹乐贫被派回湖南，由中共湖南区委安排到常德，然后回汉寿做党的工作。

詹乐贫回县后参加汉寿县 CP 小组的领导工作^②。他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先后介绍了先进分子帅孟奇、毛觉民和一批思想先进、立场坚定、敢于斗争的工人、农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每逢工农集会，詹乐贫都亲自登台讲演，通俗易懂地阐述反帝、反封建和工农革命的道理。他还创办了《新汉寿报》，配合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初办阶段，撰稿、编辑、校对都由他一人承担，经常忙得废寝忘食。通过他和同志们卓有成效的工作，汉寿县的工会、农民协会、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队很快在城乡建立起来，工农革命运动迅猛地在全县

①乐天宇：《我所知道的中共北京地委早期的革命活动》。

②毛碧云、姚靖国回忆录。

展开。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詹乐贫根据全县工农大众的要求，派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队到本县洲口捉拿了阻止农民加入农协的汉寿最大的土豪、号称“汉寿王”的梅孟乔，并亲自主持公审大会，在衙门坪前将其枪决，为全县人民除了一大祸害。在打土豪的同时，詹乐贫组织数万民工，修复了拥有数万亩良田的大连障和驿护堤，加固了全县一百多个大、中、小垸^①，使农业生产获得了空前大丰收，深得群众拥护。

一九二七年一月，中共汉寿县委员会正式成立，詹乐贫被选为县委书记。他主持召开县委会，决定从反动派手中把枪杆子夺过来，武装工农群众，并且一致决定，首先拔掉鸭子港团防局这颗钉子。一天深夜，詹乐贫派毛觉民、李年华、曾玉廷率八十多名工纠队员，分乘小船从县城出发，鸡叫两遍，船靠鸭子港码头，队员们立即上岸，包围了团防局。这时，团防局的兵丁乱成了一锅粥，有的反穿衣裤，有的跪着，有的钻到桌子底下，副官杨冬生被打成重伤，团防局长杨西川不知溜到哪里去了。这次战斗缴获长短枪十二支。

同年三月，汉寿农民运动如火如荼。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分子，被吓得手忙脚乱，有的携带黄金、白银，逃往长沙、武汉一带躲风；有的挟着“悔罪书”找农民讨好求饶。东乡猪儿湾的大土豪朱泽堂，占有良田数千亩，豢养着数十个武装镖客，平时残酷剥削、压迫农民，逼死人命，唯恐农民起来找他彻底清算，挨户给佃户作揖叩头，并向县委具结保证：“以后改恶从善，重新做人，愿捐款修筑堤垸。欠债户果系贫寒，愿不再索讨，捐大洋二千元、水田二百五十亩，兴办

^①垸，即堤，防水的建筑物。

本县公益事业。”^①县委给他自新机会，允许他将功赎罪。但他贼心不死，见局势稍有缓和，又开始猖狂反扑。租债一律加五收进，有四十人因没有还清他的租债，被押进他私设的监牢。县署规定邦费主八佃二，他竟倒过来按主二佃八收交，不依就夺田拔佃。并造谣威胁农民说：“县农民协会几个人，已被我花几千块钱收买了，你们有话无处说。”“北兵三月准到，农民协会就要垮台”。随后，他躲到武汉观看动静。三月十四日，各乡农民协会向县农民协会和县公署请愿，坚决要求镇压朱泽堂，以平民愤。数千农民、工人环集在县委、县公署周围不散，“打倒土豪劣绅！”“枪决朱泽堂！”的口号声震天动地。詹乐贫多次找县长刘焮商议，刘顽固坚持要请示省府后再办。詹乐贫当机立断，紧急通知召开县委会，决定将朱泽堂交民众制裁。于是，詹乐贫策促县长刘焮发出电报，将朱泽堂召回东乡猪儿湾。三月十四日，派农民自卫队员、工人纠察队员一百多人，星夜赶往东乡猪儿湾，将朱泽堂捆绑，押解来县。朱泽堂被愤怒的群众拖出，乱枪乱棍打死在衙门坪前。从此，工农大众声威大振。詹乐贫因势利导，发动群众，改造县级政权组织，赶走了县团防局长俞都，把县团防局武装的领导权夺到了人民手中。紧接着，彻底改组了县团防局，全部解散了区乡团防局，迅速摧毁了各区乡地主武装。这年四月，湘西匪首周铁鞭之子周小鞭窜来汉寿，潜居县内，暗中活动，组织反革命武装，妄图抢走工人纠察队枪枝，谋杀中共汉寿县委、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负责人。詹乐贫当即派罗承闾、曾玉廷率纠察队抓住了周小鞭，深夜处决了这个家伙。不久，反革命分子马

^①见1927年3月18日《湖南民报》。

绍武与土豪劣绅勾结，裹胁数百名不明真象的群众围攻县城，妄图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打下去。詹乐贫率全县工农武装和数千群众击退和驱散了马绍武的全部人马。

一九二七年五月“马日事变”发生后，中共汉寿县委根据省委组织工农自卫军攻打长沙，严惩反动军阀许克祥的指示精神，将全县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合编为工农自卫军，詹乐贫任总指挥，曾鹤皋任副总指挥，共数千人，数百支枪，梭镖、大刀人手一把，绝大多数党员随队加强领导，将队伍撤离县城，到云台山驻扎。同时，派陈刚、张启幕等留城筹措粮款，做好自卫队员的补给工作；派帅孟奇北上武汉，寻找上级党组织。这时，国民党反动派与当地民团狼狈为奸，疯狂反扑。詹乐贫毫不动摇。当大土豪劣绅杨明德路过云台山时，他命令工农自卫军枪决了杨明德。随后，他率师回城，游行示威。驻常德省防军熊震部派兵来汉寿围剿，双方激战，均有伤亡，在敌人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大部分人员失散的情况下，他迅速将剩下的一千多人撤出县城，到金牛山会师，动员了一批党员转入地下活动，留下三百人由他率领星夜开赴益阳，与该县工农武装汇合，组成益、汉工农自卫军。由益阳县农民协会委员长余璜任司令，中共益阳县委书记袁铸仁和詹乐贫分别任政治部正、副部长。这支千多人的队伍在益阳大桥钲、鳊鱼山、黄藤桥等地袭击敌人团防局，夺得了大批枪枝弹药。省委当即派省总工会纠察队队长武文元来部加强领导，在向宁乡方向挺进途中，省委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自卫军原地休整，计划扩充队伍，在资水流域建立游击区，打击敌人。这时，国民党反动派从长沙和常德调兵两面夹击。自卫军腹背受敌，为了保存力量，化整为零：一部分队员往长沙找我地下

党员袁仲贤设立的招募处参军；一部分疏散隐蔽；党员骨干分途寻找组织，坚持斗争。七月，詹乐贫参加中共益阳特委，担负组织、宣传工作。

一九二八年一月，詹乐贫化名詹愿懽、马复生，转移到南县北河口东胜村，住杨桂林家中，参加南（县）、华（容）、安（乡）特委，坚持做党的地下工作，在三仙湖水仙庙发展了地下党的组织；亲自给混入党内，多次盗用地下党的枪枝，到处抢劫的肖丙武写出罪状，并派陈刚处决了肖丙武。三月，他和陈刚在南县西堤尾又处决了无恶不作，鱼肉乡民的孟团钰，还在安乡夹口一带发展了地下党的组织。他率工农武装数百人，进攻南县县城，打击了清乡队反动势力。这年秋天，詹乐贫任中共湘西特委常务委员，与湘西特委书记刘泽远研究制定了北上洪湖的具体计划。

一九二九年一月八日，詹乐贫头挽毛巾，身穿青布棉衣、棉裤，腰系围腰，在沈家沟一带活动，途中与汉寿县挨户团常备队长彭裔谦相遇，被士兵邓家元认出，当即被捆绑起来押往汉寿。押解途中，他低声嘱咐同时被捕的黄和龔，要黄在释放后，将他放在麻河口蔡家铺子一个姓吴的家里的一支短枪交给党组织，与他在夹口一带发展的新党员取得联系，坚持斗争。第二天，行至太白湖，詹乐贫遇见姨父，再三托姨父安慰他母亲，不必为他忧伤，七天之后，买一口木匣子到县城给他收尸。

詹乐贫被解到汉寿以后，关进了县团防局的牢房。狱中，国民党反动派曾多次劝其自首，用尽了种种酷刑。但他横眉冷对，坚贞不屈，痛斥国民党反动派，愤怒揭露了蒋介石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他严厉警告审判官说：“你们不要随声附和。”

现在，共产党员遍天下，你们有什么本事说服真正的共产党员！”“你们想降服我，这真是海底捞针——枉费心机！”

“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志不可夺！”^①詹乐贫大闹刑堂，敌审判官一无所获，狼狈不堪。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二日，敌人将詹乐贫押赴刑场，临刑前，詹乐贫高呼：“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敌人给他口里塞泥沙，捆上布带，他挣脱布带，吐掉泥沙，在生命的最后一息，放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詹乐贫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挂头扬尸，惨不忍睹，工农大众莫不含泪痛惜！一九四五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帅孟奇为詹乐贫写了传略；一九七九年，中共汉寿县委员会为他迁葬在西竺山建墓树碑；一九七九年、一九八四年，帅孟奇两次回汉寿视察，都亲自到烈士墓地扫墓献花，并含泪为烈士写了悼词。

^①帅孟奇 1945 年七大时撰写的《詹乐贫传略》。

李 硕 勋

何锦洲 李 荣 罗慰年

李硕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早期全国学生运动的杰出领袖，我军卓越的军事指挥员，浙江、江苏、广东党组织领导人之一，英勇的共产主义战士。

(一)

李硕勋，原名开灼，字叔薰，又名石心、心仁、李陶。一九〇三年二月二十三日生于四川省庆符县（现称高县）^①庆符镇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家庭。

李硕勋的父亲李天祺，家境清贫，以纺织、养蚕、买卖油盐和替人做工为业；母亲何圣熙，十九岁与李天祺结婚，生下了四个儿女，李硕勋排行第三。

李硕勋五岁入私塾发蒙，受业于李晋叙先生。一九一二年，他转入镇内梧岗书院初级小学；一九一五年，又升入庆符县立高等小学。翌年，因军阀混战、学校停课曾辍学一学期；一九一七年复学，继续在原校学习。李硕勋少年读书时，不追求死记硬背、寻章雕句，不屑于做“书袋子”，经常对同学说：

^①全国解放后庆符县与高县合并，称高县。

“吾不欲为学者，愿成功一事业家。”^①同时，他喜好过团体生活，待人以诚，和蔼可亲，爱打抱不平，富有正义感，在同学中极富号召力、组织力。一九一七年，有一支四川军阀的部队驻扎在庆符镇。士兵军纪很坏，常常扰乱社会治安，偷鸡摸狗，无恶不作。教书先生李鼎三起而阻止，那些兵痞怀恨在心。士兵出卖子弹案发，李鼎三遭到诬告，被诬陷“窝藏子弹”无辜入狱。李硕勋知道后，和另一青年一起，即刻前往驻军所在地，证明李鼎三无罪。他们据理力争，要求释放李鼎三。后来经过调查核实，李先生无罪开释。

在庆符高等小学时，学校只要求学生身穿长衫做徒手操。李硕勋鉴于帝国主义入侵、军阀压迫的现实，决心习武从军，向校长提出进行军事体操训练的要求。遭到校长拒绝后，他便同几个学生骨干一起到镇里的警备队借来一些枪枝操练。最后，校长不得不同意高年级学生进行军事体操训练。

一九一八年七月，李硕勋小学毕业后，即与长兄李伯焘、二兄李仲耘来到宜宾。他以良好的成绩考入叙州联合县立中学。同年十月，父亲李天祺不幸逝世。为了料理后事，他不得不停学在家；次年一月，他与二兄来到成都。他希望当一名军人，于是投考四川讲武堂。因不够入伍年龄，没被录取，后考入成都的一家私立中学——储才中学^②。

这时，五四运动的风云席卷全国。李硕勋积极参加宣传新思想和抵制日货的运动。因受新思想的影响，在储才中学读了一

①李开炯：《庆符李氏族谱·季弟硕勋传略》，存中共四川高县县委党史办公室。

②李一氓：《革命先烈李硕勋》，载《新观察》1951年第12期。

学期，便毅然停学，进川军骑兵师第一团担任团部文书。几个月后，因不满军阀的压迫，想入四川讲武堂亦杳无希望，于是他愤然辞职，于十二月回到故乡。

第二年春，李硕勋到宜宾考进叙州联合县立中学。同校同学有刘鼎、熊瑞文、阳翰笙等。李硕勋因为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被推选为叙州中学校学生会委员。这一年，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四川开展了抵制日货的斗争。李硕勋在与四川省学生联合会抗敌后援会取得联系后，与联合中学班代表及明德中学的代表，在叙联中学礼堂召开会议。会议决定：（一）成立四川省学生联合会抗敌后援会宜宾分会（李硕勋是该会负责人之一）。（二）由各班代表分头发动同学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三）各班推荐三至五人参加检查队、宣传队。会议还决定四天后举行反帝示威大游行。

四月下旬的一个上午，叙联中学与明德中学全体学生集中在叙联中学操场，一致推举李硕勋担任游行总指挥。在李硕勋的率领下，浩浩荡荡的队伍举着一幅上面写着“四川省学生抗敌后援会宜宾分会反帝爱国示威大游行”的大字横额标语，在市区主要街道穿过。他们还组织检查各商店的货物，收缴了大批日货，并当众毁掉^①。

由于李硕勋积极率领宜宾学生进行反帝斗争，不久，被推选为宜宾市学生联合会常委，成为宜宾学生运动的领袖。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影响的扩大，李硕勋在叙联中学带头提倡白话文，反对辱骂和体罚学生，受到进步师生的拥

^①熊瑞文：《李硕勋与宜宾、成都、上海学生运动》（1984年8月11日），存中共四川高县县委党史办公室。

护和支持。一九二一年一月，李硕勋和阳翰笙，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成都，插班进入四川省立第一中学。

四川省立第一中学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读新书的风气很浓。李硕勋在这里，除了认真学好各门功课外，还阅读了当时在四川颇为流行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和《阶级斗争》（恽代英译）等进步书籍。未几，他当选为四川省立第一中学学生会委员和四川省学生联合会出版部主任，参加领导四川的学生运动。在省学联的各项活动的斗争实践中，李硕勋逐步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一九二一年夏，他与各校进步学生联络，计划按照《新青年》发表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的宗旨，建立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一年秋，李硕勋和童庸生、阳翰笙、刘弄潮、雷兴政（雷晓晖）等经过充分酝酿，在成都郊区锦江边的望江楼开会，正式创立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改称为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他是四川青年团创始人之一^①。

那时，四川军阀把教育经费移作军费并把军队驻扎在学校，使不少学校停学。四川青年团组织向省政府正面提出要求，但得不到满足。李硕勋等四川学生联合会负责人和四川教职员联合会领导人于一九二二年六月上旬商讨决定：成都各校举行罢课，要求四川当局同意教育经费独立。六月十日，李硕勋和王右木等商议，以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名义发表宣言，号召师生迅速行动起来，积极投入这场维护教育经费独立的斗争。六月十二日，李硕勋等四川学生联合会骨干发动各校学生到四川省议会旁听，请求省议会议决教育经费独立案。省议会

^①阳翰笙：《甲子一周怀硕勋》，载《人物》1983年第3期。

副议长熊晓岩老奸巨猾，有意不到会，使会议决议案无法通过。

学生们义愤填膺，冲到熊宅，与之论理。熊晓岩下令警察逮捕学生代表，造成了“熊宅事件”。次日，王右木、李硕勋等再率学生一千余人赴省议会。熊晓岩勾结反动军警，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打出手，致使学生多人受伤。与此同时，当局还通缉刘弄潮等八名学生代表，以此威胁学生，逼他们放弃要求。

在这严重情况下，李硕勋毫不畏惧，继续领导这场正义的斗争。罢课、示威游行接连不断。鉴于学生运动的声势浩大，四川省议会最后不得不同意召开教育经费独立的代表大会。李硕勋、阳翰笙作为代表参加了大会，经过谈判斗争，省议会通过了划拨全川肉税作为教育经费的议案。

之后，李硕勋还领导发动了驱逐军阀亲信、新校长严恭寅的斗争，并以同学会的名义，出版了《四川一中半月刊》。

李硕勋等人在省一中掀起的学生运动高潮，引起了四川军阀的恐慌。他们决定以武力镇压学生运动，下令通缉进步学生的六名代表，解散省立第一中学，强迫同学从校内撤出^①。

李硕勋领导一中同学和反动军警斗争，迫使反动军警不得不撤出校园。但李硕勋等人因此遭到通缉，不能留在成都。十一月上旬，李硕勋与阳翰笙前往山城重庆。

到重庆后，李硕勋先在川东联合中学读书，不到一个月，

^①参阅雷晓晖，《对往事的回忆》，载《南充地区党史资料》1983年第4期。

在亲友帮助下，又去了南京；年底，转到北京，进入四川青年比较多的弘达学院学习，并与陈毅一起开展学生运动。当时，北洋军阀盘踞的北京，空气异常沉闷，而南方则十分活跃。李硕勋在北京住了一年，一九二三年底，毅然离开弘达学院，奔赴上海，考入了当时培训革命干部的高等学府——上海大学^①。

李硕勋在上海大学就读社会学系。他先后听了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的《社会学》，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以及恽代英、张太雷等人讲的课，还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人的著作，从而使他的理论修养、思想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课余，他与郭伯和、余泽鸿等人发起组织了平民世界学社，出版《平民世界》半月刊，宣传平民要起来当家做主人，以改造社会为己任，号召青年踊跃走上社会政治舞台。

由于李硕勋表现积极，思想进步，于一九二四年在上海大学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②。

十月十日上午，中共党组织领导上海大学进步师生在天后宫举行辛亥革命十三周年纪念会。但会场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冲击，上海大学学生黄仁不幸被流氓打伤，并于当晚死去。李硕勋对此无比愤慨。他召集上海大学四川同学会三十多个同学，讨论黄仁牺牲一事，决定通电全国，要求惩办凶手，为黄仁身后发起募捐，推动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同年十二月，他任上海大学四川同学会委员。

在上海大学期间，李硕勋白天坚持理论学习，晚上到沪西

^① 《李硕勋同志传略》，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存中央档案馆。

^② 《李开灼（硕勋）略传》，中央组织部印（1965年），存中央档案馆。

区工人学校，帮助工人学习文化，启发工人觉悟，开展工人运动。一九二五年二月九日，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日商办的上海内外棉纱厂工人举行大罢工。李硕勋遵照党的指示，深入内外棉纱厂工人中，鼓励他们坚持战斗。他还参加了募捐、联络等工作，支持罢工斗争。

李硕勋由于忙于援助工人运动，耽误了学校内的一些课程。为了集中时间和精力把缺的课补起来，这年三月初，他和刘照黎、阳翰笙一同来到杭州。临行前，他们每人凑了十来元钱，买下了当时所有能买到的马列书籍和进步文学书刊，用两个大藤箱装到杭州，并在葛岭山庄租了三间房子，潜心补习功课。两个多月时间，他们在安静的西湖一带，把带来的书籍都读完了，收效甚大^①。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五卅惨案。六月一日，李硕勋和阳翰笙、刘照黎闻讯赶回上海，参加反帝斗争。党随即派遣李硕勋、阳翰笙到全国学生总会工作，筹备召开全国第七届学生代表大会。四日，李硕勋和学生总会代表刘一清、梅殿龙、阳翰笙、林钧以及上海总工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代表举行联席会议，成立反帝的统一指挥机构——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李硕勋当选为该会委员。

在李硕勋等人筹备下，第七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于六月二十六日下午在上海小西门少年宣讲团团部开幕。这次大会通过了一个宣言和八个决议案，正确地总结了前一段全国学生运动的经验，提出了今后青年、学生运动的方针和方向。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全国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李硕勋被选为常务委员

^①阳翰笙：《回忆上海大学》，载《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2期。

(任总务委员)。在常委分工会议上,他又被推选为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会长兼交际部主任^①。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早在一九二四年间曾出版了《中国学生》半月刊,指导全国学生运动,后因缺乏印刷经费,加上军阀阻挠,编辑、发行障碍重重,只出了五期就不得不停刊了。李硕勋主持全国学联总会工作后,召开总会委员会议,议决重新出版《中国学生》,并增加篇幅,改半月刊为周刊,创办一个新型的学生杂志,以推动全国学生运动的发展。在李硕勋的积极倡导、活动下,《中国学生》周刊创刊号于八月一日在上海正式公开出版发行。这个刊物发表关于学生运动的论文,揭发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种种罪行的材料和文章,探讨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并经常刊载各地学生会的活动消息和总会的重要通告,对推动全国的学生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第七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上,李硕勋根据我国同胞惨遭帝国主义杀戮,青年学生、爱国志士无端被军阀武装逮捕、殴打的现实,提出建立全国学生军的建议,获得一致赞同。之后,李硕勋又和总会委员研究制订了《全国学生军组织大纲》,刊载于《中国学生》杂志上。在这同时,李硕勋积极筹划在上海搞试点,建立学生军。通过与上海戒严司令部邢士廉等负责人联系^②,总会得到了一些可作为军事训练的武器。不久,上海学生军正式建立,并以全国学生总会军事委员会为最高指挥机

^①张崇文口述、何锦洲整理,《李硕勋同志和全国第七次学生代表大会》(1984年8月25日),存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②《英帝工部局警务日报》(1925年7月14日)。

关。李硕勋担任委员会委员长。

在上海建立了学生军后，李硕勋即与总会委员商议，通过各地学生联合会，积极筹备在各地建立学生军。为了便于对各地学生军军事行动作通盘的计划和指导，总会的通告要求各地在正式建军时，具文呈报总会存查。

在总会和李硕勋的布置下，全国各地纷纷建立学生军。由于各地军阀的阻挠，全国性的学生军活动始终未能进行。尽管如此，学生军的地方性的活动还是大大提高了许多青年学生对建立革命武装重要意义的认识，并且训练了大批学生军事骨干。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学生军起了重要作用。

这年九月一日，李硕勋还主持了由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联合发起召开的反帝国主义同盟代表大会的筹备会议，当选为上海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主席。筹备会决定在八国联军侵略我国、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的“九七”国耻纪念时举行大会。李硕勋即以“硕瓊”的笔名在《中国学生》上发表《九七纪念与五卅运动》^①，阐明纪念“九七”的意义。九月七日那天，一百多个团体十余万人参加了国耻纪念大会，李硕勋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并作了报告。

在一系列的革命活动中，李硕勋经受了斗争的锻炼，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者。这年九月十日，他在给二兄李仲耘的一封信中说：

我们认清只有彻底的用革命手段坚决的作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才是我们死里求生的唯一

^① 《中国学生》第6期，1925年9月5日。

出路！弟近来对于一切均置之度外，将本此伟大的使命作终身之奋斗^①。

这封信表明了李硕勋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不惜献出自己生命的志向。九月二十日，李硕勋出席中国济难会筹备会，嗣后被选为该会委员。十月，他又兼任中共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党团书记。

十月十日前，中共上海区委决定组织双十运动委员会，由李硕勋等七人组成。十月十日那天，李硕勋和委员会成员组织广大学生参加上海纪念“双十节”活动。为配合纪念活动，李硕勋又以“硕壘”的笔名，在《中国学生》上发表了《民族解放运动中之中国学生》一文^②。

一九二五年冬，英帝国主义提出召开关税会议，以同意增加海关二五附加税为条件^③，要求军阀压制反帝爱国运动，制止抵制英货。李硕勋在给二兄仲耘的信中指出：“关税二五增税不特有失独立国关税自主之原则，且此项增税必由军阀政客分肥，以为从事内战之资，益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地。”^④十月十七日晚，李硕勋负着上海北上外交代表的使命，乘火车离开上海，赴北京主持召开临时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反对关税会议。

经过几天紧张的筹备，十月二十六日——即关税会议召开

①原信存中共四川高县县委党史办公室。

②《中国学生》第9期（1925年10月10日）。

③《中国学生》第11期（1925年11月30日）。

④《李硕勋致李仲耘》（1925年11月15日），原件存中共四川高县县委党史办公室。

的同一天——临时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也开幕了。李硕勋代表总会执行委员会在会上作了《总会会务报告》，总结了前一段的宣传、组织工作和各项特殊工作的经验，并且针锋相对地提出反对关税会议，提出了开展关税自主运动的口号。

李硕勋虽然也认识到这次的北京集会并不能在实际上反对关税会议，也不可能达到关税自主的目的，但是，“全国学生总会不在此紧急关头（变相华盛顿会议的关税会议）不起来召集这次全国代表大会，共议并指挥全国学生运动，学生是不会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而诚心踏上革命之途！”^①为了唤醒青年和学生的觉悟，他又觉得这种宣传和鼓励是绝不可少的。他认为，革命必须从宣传做起，并为宣传真理不遗余力。他在给李仲耘的信中说：“我的人生观是革命，我的生活也就是革命了！革命的步骤当怎样呢？第一是宣传，第二是组织，第三就是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要免掉兵祸，要求我们生命的安全，要求我们生活的保障，只有大家觉悟起来，宣传组织，造成民众的力量，以革命的手段，去扑灭军阀！——同时打倒军阀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及其爪牙官僚政蠹！”“若不从此做起，对己对人都无益处。”^②

为了进行革命宣传，李硕勋不论哪里需要他，他都毅然地走在前面，殚精竭力，在所不辞。这期间，他还积极投身非基督教运动，把开展非基督教活动作为当时学生运动的重要工作。他不光加入了上海非基督教大同盟，还为从教会学校退学的学生提供转学上海大学的种种方便，支持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正义行动。

^{①②}《李硕勋致李仲耘》（1925年11月15日）。

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两年，加深了李硕勋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二日，他在《中国学生》上发表《反奉战争中的直系与国民军》，立场鲜明地提出“向奉系军阀作直接猛烈斗争，以争取人民的自由，取还人民的政权，召集人民会议，建设人民政府。”^①在同一期上，他还撰写了《帝国主义也反对学生干政！》^②，号召“全国青年学生，要求自己的解放，要求民族的解放，只有大家起来加入革命政党，参加政治运动才是唯一的途径”^③。当北洋军阀政府制造了取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事件时，李硕勋即以“孺”的笔名撰写了《女师大与女大》^④一文，声援女师大学学生的反军阀斗争。

这一年二月，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李硕勋进入上海高级党校学习。这所党校是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决定举办的，学习时间为八个月，校长是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李硕勋在这里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概论》、《经济学》、《阶级斗争史》等十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课，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课余，他常与余泽鸿、沈雁冰、杨之华等二十八个同学一道，互相切磋，共同研讨，相互之间得益匪浅^⑤。

在高级党校学习期间，李硕勋一面钻研革命理论，一面继续领导全国学生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在舆论上支持各地的反帝革命行动。他利用《中国学生》周刊的阵地，配合时势，先

①②③ 《中国学生》第15期，1926年1月12日。

④ 《中国学生》第16期，1926年1月23日。

⑤ 参见上海市档案馆：《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七年上海地区党组织发展概况》。

后发表了《英人封锁粤港》^①、《纪念孙先生》^②等文。当北洋军阀段祺瑞制造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李硕勋又积极投入抗议大屠杀的活动，并且是“京案后援会”的骨干。

那时，中共上海区委设有职工运动、妇女运动、军事运动、学生运动、宣传运动等五个运动委员会。这年四月，李硕勋任学生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并兼中共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独支书记^③。全国的学生运动尤其是上海的学生运动在李硕勋的领导下，开展得轰轰烈烈，无论是在组织方面还是在宣传方面都取得很大的成绩。

为了总结前一段全国学生运动的经验和部署今后的学生运动，根据党中央、青年团中央的指示，李硕勋与总会委员商量后，决定七月在广州召开第八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不久，李硕勋偕中共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党团副书记、总会委员张超等前往广州，筹备会议。

李硕勋和张超等到广州后，首先拜访了周恩来和中共广东（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请他们参与领导这次大会。周恩来、陈延年指示说，要引导青年学生努力学习，掌握知识，同时，还要带领他们参加反帝反军阀活动，走革命道路。

为了开好这次学生代表大会，根据党的指示，李硕勋还争取设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的支持。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丁惟汾表示支持这次大会，届时派代表出席。

我党对于第八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十分重视，指示代表大会要建立党团，由李硕勋任书记，以保证大会的成功。

① 《中国学生》第18期，1926年3月6日。

② 《中国学生》第19期，1926年3月12日。

③ 见《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9月28日）。

经过充分的准备，七月二十三日下午一时，由李硕勋主持，第八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广东大学礼堂正式召开，李硕勋担任书记，张超任大会执行主席^①。

会上，李硕勋代表第七届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执行委员会作了一年来总会会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论述了全国学联会和各地学联在组织发展、宣传工作、促进学生运动的统一、发动广大青年学生参加政治斗争等方面的成绩，总结了学生运动的经验，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今后的学生运动力求做到组织、主张、行动三方面统一的努力方向。

会议期间，广州正在举行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为了表示对工人运动的支持与援助，李硕勋带领全国学生代表来到越秀南路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赠送慰劳品，慰问罢工工人。

这次大会由于得到周恩来、陈延年等的亲自指导和具体帮助，开得很顺利。李硕勋和到会代表通过的决议案，进一步推动了全国学生运动的迅猛发展。

全国学代会结束，李硕勋即刻返回上海，投入更加紧张的工作。

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为了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许多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决定，李硕勋兼任中国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书长^②。

^①1926年7月20日、23日、30日广州《工人之路》报。

^②上海市档案馆：《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七年上海地区党组织发展概况》。

九月，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讨论了国民会议促成会问题；指定由李硕勋等负总责，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梅电龙等协助，通过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国民会议促成会，揭露北洋军阀践踏民主、实行专制独裁统治的种种罪恶，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实行民主，结束法西斯统治。由于北洋军阀的压制，国民会议终于未能开成。但是，以国民会议为中心的各项宣传组织活动，却使民主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通过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活动，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北洋军阀的反动本质。

九月十四日，李硕勋调任中共上海南市区委书记。嗣后，他常到南市一带，深入群众开展工人运动。

(二)

一九二六年正是国民革命汹涌澎湃、北伐战争节节获胜的一年。这年十月，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党派李硕勋到武汉，任中共武昌地委组织部部长。

在攻占武昌战役中，叶挺独立团第一营的官兵大部分壮烈牺牲，急需补充大批新兵。团长叶挺、参谋长周士第经与武昌党组织和李硕勋联系，要求协助发动当地青年踊跃参加北伐军。李硕勋迅速发动了许多年轻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参加独立团；针对少数青年存在的“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错误观点，他反复做工作，教育青年区别革命军与军阀军队的不同，遂使部分青年打消了顾虑，踊跃参军，独立团短时间内得到了人员补充。

这年冬天，李硕勋继林育南之后，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北省委员会书记的职务。此后，他又以全力搞好团的工

作。他十分注意加强青年团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布置团干部和青年团员学习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使广大团员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和青年团的性质、任务。为了使团干部能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他还举办了短期团干部学习班，每期一月。学习班组织各级团干部阅读《共产主义ABC》、《阶级斗争》、《青年团章程》等书籍。他亲自到学习班讲授中国青年运动简史、目前湖北青年团的任务等课程，使团干部学习了理论知识、业务知识，并且对从事当地团的工作，也有了较明确的方向^①。

这期间，李硕勋还根据青年团中央的指示，在武汉建立了劳动童子团，开展了对青少年的思想工作。

李硕勋担任青年团湖北省委书记的时间很短。一九二六年底，党组织又派他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任师政治部主任。

由于在汀泗桥、贺胜桥的战功，原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叶挺升任第二十五师副师长。李硕勋与师长朱晖日（后由李汉魂继任师长）、副师长叶挺密切配合，领导“铁军”中这支英勇善战的队伍在武汉进行军政训练。

一九二七年一月，英帝国主义在汉口租界制造了杀戮我同胞的流血事件。在党的领导下，武汉三十万工农商学兵群众举行了反英示威大会。李硕勋率领第二十五师政治部部分工作人员与七十三团等部队，参加这个大会，与群众一起参与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②。

^{①②}周士第的回忆（1976年3月28日）。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制造反革命政变。消息传到武汉，李硕勋异常愤慨。但是，为了北上讨伐张作霖，李硕勋领导的二十五师七十三、七十四两团奉国民政府调令，继续北上。四月下旬，师长和李硕勋率领的二十五师两个团到达河南省驻马店。

五月十四日下午，第二十五师与奉军第十二旅在上蔡发生激战。李硕勋冒着枪林弹雨，亲临前线，鼓励将士发扬叶挺独立团猛打、猛冲、猛追的英勇战斗精神，消灭敌人。结果，把奉军第十二旅围在上蔡城。

敌人疯狂反扑，并调来奉军第四十六旅从东洪桥进攻，企图与上蔡的第十二旅接通。七十四团一时两面受敌，形势十分不利。李硕勋向师长建议，调七十三团前来东洪桥增援^①。

七十三团二千余人十七日凌晨从西洪桥出发，以优势的兵力，猛攻驻张庄、固村附近的敌炮兵阵地和指挥所；数小时后，敌西洪桥防线被全部突破；一时间，水寨、东洪桥的敌军溃不成军。七十三团接着又将来援的段国璋部在上蔡以南的十里铺一带击溃，然后合力进攻上蔡。已成瓮中之鳖的上蔡守敌，举手投降。

河南战役后，二十五师奉命回师湖北。一九二七年七月初，自武汉附近分批乘轮到达江西九江。李硕勋和全师官兵驻扎于赣北南昌至九江的南浔铁路沿线上，师政治部设在离九江南边不远的黄老门火车站以东路段上。

这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举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决定举行南昌起义。

^①周士第的回忆（1978年3月28日）。

八月一日上午，李硕勋根据我党的指示，以“打野外”为名，甩开师长李汉魂所掌握的少数武装，带领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七十五团全体官兵和七十四团重机枪连，参加南昌起义。他们沿南浔铁路南下，于当天下午六时前，抵德安车站集中^①。

当李硕勋率起义部队到德安车站以北时，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率卫队营坐火车前来阻挡；七十三团第一营一阵扫射把张发奎、李汉魂吓跑了。七十五团在李硕勋等的部署下，将五、六百人的敌卫队营在德安车站围住。经过政治攻势，卫队营全部缴械，其中一部分下级军官和士兵参加了起义部队。

八月二日早，李硕勋率领二十五师胜利抵达南昌。当日，根据我党的决定，这支起义部队重新编为第二十五师，以周士第为师长，李硕勋任党代表、中共第二十五师委员会书记和政治部主任。

部队整编后，李硕勋旋即主持召开了中共第二十五师党委会。他认真地和周士第、游步仁、符克振等研究和确定了有关加强部队政治教育、纪律教育、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以及加强练兵、保卫南昌等问题。接着，他在七十四团和七十五团建立党总支部和党支部，加强各团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

国民党反动派为消灭起义部队，迅即调动大批反动军队包围南昌。起义部队于八月初开始撤离南昌。周士第和李硕勋率领的第二十五师为后卫部队，至八月六日方才撤出南昌。这支

^①李何林口述、何锦洲整理：《李硕勋同志与二十五师》（1984年8月14日），存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部队沿着江西东部的山区，先后经过抚州、宜黄、广昌、石城，向南挺进，于八月十九日，抵达江西瑞金。

当时，国民党南路总指挥钱大钧率第二十师、第二十八师、新编第一师和补充团合计十个团，在会昌附近集中；黄绍竑部的广西军队七个团也集结于附近的白鹤圩，同会昌城遥遥相对，成犄角之势，企图阻止我军南下。为此，前委决定，必须消灭会昌之敌。

叶挺、聂荣臻指挥的第十一军二十四、二十五师，担负进攻会昌西北的重任。

二十五师接到战斗命令后，随即做了战前动员。二十四日早晨，会昌之战打响，第二十四师等部队先进攻，激烈的战斗一直从早晨打到下午，双方呈胶着对峙状态。二十五师由于道路不熟，当日下午方赶到，在周士第、李硕勋指挥下，立即投入战斗，发起攻势。我军如虎添翼，敌人溃不成军，悉数逃入会昌城^①。七十三、七十四两团顾不得吃饭喝水，一鼓作气，与二十四师等兄弟部队一道，于下午四时攻入会昌城。

二十六日，周士第、李硕勋又率七十三团、七十四团和七十五团迎击企图向会昌反击的黄绍竑部，歼敌两个营，缴枪几百支，大获全胜。

会昌战役胜利结束后，叶挺、聂荣臻以十一军军部名义传令嘉奖英勇作战的二十五师及该师领导人周士第、李硕勋、游步仁等。

起义部队在会昌稍事休息，又折回瑞金，于九月一日从瑞金出发，向福建汀州挺进。二十五师仍担任后卫。李硕勋率政治

^①周士第：《南昌起义中的二十五师》，载《党史教研资料》第20期，1980年8月9日。

部同志，发动会昌、瑞金几千名群众，组织浩浩荡荡的担架队、运输队，抬运伤病员和武器弹药。在二十五师掩护下，南昌起义部队和七、八百名伤病员九月三日越过武夷山，顺利到达汀州。随后，又继续向广东进军。

九月十八日，周士第和李硕勋率二十五师到达广东大埔县的三河坝。

三河坝位于梅江、汀江、梅潭河流向韩江的汇合口。这里众山环绕，江流汹涌，战略位置十分显要。此时，南昌起义军主力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率领，直奔潮汕。周士第和李硕勋带领的二十五师则留三河坝，归朱德指挥，与第九军教导团一道共三千余人，扼守三河坝，牵制和防御从梅县及闽西的来犯之敌，密切配合潮州、汕头的南昌起义军主力作战，防止敌军抄袭我军进攻潮汕的后路。

二十五师最初驻扎在三河坝镇上，地形于我极不利。李硕勋经请示朱德同意，在当地农民、船工帮助下，挥师渡河，在三河坝对岸的东文部、笔枝尾山龙虎坑、下村一带，构筑防御工事，准备迎击来犯的敌人。

不久，当地农民送来情报，钱大钧部三个师约二万余人从梅县松口沿梅江来犯。二十五师在朱德指挥下，在周士第、李硕勋部署下，依仗宽阔的大江天险，坚守阵地，与敌人隔江对峙。

十月一日，敌军沿韩江北岸发起进攻。在周士第、李硕勋带领下，二十五师与敌激战一天。在战斗猛烈进行的时候，李硕勋曾到前沿阵地，指挥部队抗击敌人。在战斗的间隙，趁着敌人溃退的时候，他又提醒前线官兵说：“敌人虽然暂时被我们击退了，但敌众我寡，敌人还会卷土重来，再来渡河。我们

务必坚守河边阵地，歼灭敌人，牵制敌军，……为起义军继续前进创造良好条件。”并鼓励战士说：“我们一定要发扬‘铁军’叶挺独立团攻打汀泗桥、贺胜桥和武昌的英勇战斗精神，要发扬会昌歼敌的勇猛精神，坚守三河坝，随时准备为打倒军阀、统一祖国而献身，为中国人民革命的事业而流尽自己最后一滴血。”

敌人在二十五师猛烈炮火的阻击下，寸步难行，无法登岸^①。

晚上，周士第、李硕勋又令第二十五师一部官兵强渡梅潭河，占领有利制高点，夹攻敌人。

十月二日上午，李硕勋再临前线，在韩江东岸的江畔上，指挥我军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下午五时，只见大批敌军从梅县方向进入三河坝。入夜，十凡只船载满敌兵，企图登岸。在朱德指挥下，师长和李硕勋等领导人部署七十五团对敌“半渡而击”。等敌船驶到江心，密集的枪火猛烈扫射，有的木船被打沉了，有的木船无人掌舵，向下游漂去。敌人伤亡惨重。可是，他们不甘心就此罢休，下半夜又从梅江驶来五十多只船，从正面强渡，除一部分船被击沉外，约有半数敌人爬上东岸，占领了滩头竹林阵地。周士第、李硕勋见状，立即部署七十五团乘敌人立足未稳，用六个连的兵力，以猛虎下山之势，扑向敌群。侥幸登陆的三百多敌人，背水顽抗，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打伤，或被活捉，无一漏网。

第二天拂晓，大雾弥漫，数十步外什么都看不见。狡猾的敌人对笔枝尾山、龙虎坑一带阵地进行了半月形的包围，从西

^①参阅《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版第145页。

北面渡过梅江、汀江，企图造成我军腹背受敌的处境。同时，组织更强大的兵力强渡过江，再度占领滩头竹林阵地。七十五团官兵顽强战斗，打退了敌人波浪似的冲锋，坚守了阵地。下午三时许，敌军在机关枪、迫击炮的掩护下再度进攻。战斗呈拉锯状态。到了黄昏，周士第、李硕勋下令侧翼第七十四团前来增援，击退了敌人，夺回笔枝尾山一带的阵地^①。

与此同时，七十三团在距离笔枝尾山五百米处左侧的一座高山——石子嶙粉碎了钱大钧部猛烈的进攻。七十四团扼守东文部一带，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战斗中，李硕勋到七十三、七十四团阵地，鼓舞士气，表彰战功。

由于敌人不断增援，我军占领的一些阵地陆续陷入敌手。东文部、笔枝尾山被敌人占领。二十五师处于占绝对优势的敌人的三面包围之中。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虽然消灭了敌人三千多人，并缴获大量枪枝，但二十五师也伤亡九百人。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朱德、周士第、李硕勋经过研究，决定全师退出战斗，迅速转移，拟经百侯、饶平到潮州、汕头，与南昌起义军主力会师。

二十五师采取次第掩护、逐步撤兵的办法，使部队摆脱了敌人，沿着通向湖寮的路线，朝西南方向前进。这时，为了加强对这支队伍的领导，决定由朱德、周士第、李硕勋三人组成前敌委员会，以朱德为领导人。十月五日，部队到达饶平县茂芝，恰巧在这里与从潮州退出来的第二十军第三师和教导团会合。

为了解决革命前途问题和部队向何处去的问题，十月六

^①参阅周士第：《南昌起义中的二十五师》。

日，李硕勋参加了由朱德主持召开茂芝军事会议，决定“穿山西进，直奔湘南”^①，到湘粤赣边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寻找立足地；同时，决定把这两支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第二天，李硕勋跟随朱德率领的第一师从饶平的茂芝出发，经福建的永定、武平等地，向江西方向转移。经过半个月艰苦的跋涉，十月下旬，李硕勋和部队官兵到达江西南部会昌县筠门岭的天心村。

鉴于李硕勋曾在上海学习、工作多年，熟悉上海情况，部队党组织和朱德等决定，派李硕勋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第一师的战斗情况和请示今后行动方针。李硕勋于十月底告别了这支队伍，奔赴上海寻找党中央。

(三)

李硕勋日夜兼程、餐风露宿，由江西南部农村到于都，经九江最后到达上海^①。他和瞿秋白取得联系，向党中央汇报了南昌起义军在赣粤边艰苦作战的情况。

党中央没有分配李硕勋回南昌起义部队，而是把他留在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处秘书。李硕勋的妻子赵君陶这时配合丈夫，一道从事地下工作。他俩过去都是上海大学学生，一九二六年八月在上海结婚。婚后，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两人长期不在一起。这时，他们同住民德里十五号，开展白区秘密战斗。

白区工作十分危险，必须具备高度的警惕。一九二八年二

^① 《先烈李硕勋同志年谱》，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月，上海总工会地下机关被反动派破坏。一天，李硕勋来这里开会，走到附近，见机关已被包围，便赶忙到其他机关通知党内同志转移；然后，他又急往省委秘书处，收藏秘密文件。正在这时，探捕临门。李硕勋到三楼阳台，见后门巡捕包探密集，便由晒台翻过邻家，机警地逃脱虎口。脱险后，他立即找其他同志，在主要路口守候，通知来往秘书处的同志不再前往。就这样，秘书处的工作人员无一逮捕。他的机警、多智，处变不惊，深深受到周围同志的称赞^①。

这年四月，根据党的指示，李硕勋被派到武汉工作。当时，武汉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李硕勋一到武汉即为反动派所注意。他住在旅店，被军警多次盘问追查。军警说李硕勋所述与身分及当地情况不符，逼他离境。因为处境险恶，李硕勋不得不折回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②。

一九二八年五月，李硕勋来到浙江杭州，接替梅龚彬的职务，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当时，主持浙江省委工作的是卓兰芳。当卓兰芳不在省委时，省委的日常工作就由李硕勋等主持。

这时，浙江各地党组织有了恢复和发展。全省已有二十多个县建立党组织，其中成立县委的有十几个县，还有十几个县也有党员开展革命活动，浙西还成立了特委。形势的发展要求省委有更充实的领导班子。这年夏秋间，李硕勋曾一度任中共浙江省委军委书记，领导全省军事工作^③。

^① 《李硕勋同志传略》（1961年8月3日），存中央档案馆。

^② 参阅《革命先烈李硕勋》及《先烈李硕勋同志年谱》，存中央档案馆。

^③ 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110页。

此时，他曾部署各地大力开展革命斗争。在浙南的永嘉、瑞安、平阳等县爆发了联合的武装起义，给敌人以打击。

一九二八年七月以后，李硕勋和省委军委的同志们一道，发动农民、农军、革命士兵，开展军事斗争。他特别注重做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不断派出党员、革命干部加入军队当兵，打入敌军内部；同时还派出党员或同情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在兵营附近扮作小商贩，与士兵的密切来往。在军队内则秘密组织士兵联合会，发动士兵开展革命活动，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和扩大革命力量，瓦解和削弱反动军队的战斗力。

为贯彻党的六大决议和精神，中共浙江省委拟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召开一次全省党的代表大会，改选省委。为此，在省委第五十次会议上，通过了包括李硕勋在内的新省委成员名单，并于十一月二十日呈报中共中央审批。这时，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省委扩大后内部组织和分工确定下来了，十一月二十七日，李硕勋任中共浙江省委代理书记^①。

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复信给浙江省委，明确表示不同意即时召开党代会，但同意李硕勋等五人为省委正式常委。

李硕勋等省委同志接到中央复信后，立即研究如何贯彻执行。这时，党中央派澎湃来浙江视察。澎湃要省委从速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根据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精神，决定浙江的工作路线。为此，李硕勋等省委同志遂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六日在杭州召开了扩大会议。由李硕勋主持召开的这次会议，通过了政治、组织、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决议案。会议还

^①见沈自强：《中共浙江省委的建立、改组及主要领导人的变更情况概略》，载《浙江党史资料通讯》（1981年12月23日）。

对省委进行了改组；由工人出身的省委常委徐英任中共浙江省委
委书记。李硕勋改任组织部长，积极协助徐英做好各项工作^①。

省委扩大会议结束后不几天，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在检查邮
件时发现中共浙江省委通讯处的线索。敌人纷纷出动，青年团
浙江省委受到严重破坏，党的省委机关也受威胁。李硕勋等省
委同志因及时转移，才免遭被捕。但白色恐怖笼罩杭州，杭州
党组织，除士兵党支部外，大部分解体，工作暂时无法进行。
鉴于这种形势，徐英、李硕勋等决定，部分同志到各地巡视，
报告省委扩大会议的决议案要点，帮助各地党组织进行工作。
李硕勋和其他四位省委委员则留在杭州，重建省委机关，并布
置各地开展革命工作。

一九二九年春，浙江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敌人到处搜捕革
命同志。有一天，军警突然到李硕勋等同志住宿的地方查户
口，有些同志以为敌人发现了蛛丝马迹，是来搜捕人的，因而
非常恐慌，准备撤走。但是这时，敌人已到了门口，转移已经
来不及了。李硕勋严格制止了轻举妄动。军警前来盘问，李硕
勋对答如流。敌人见查不出什么，只是例行公事地查查户口就
走了。李硕勋和同志们避免了一次损失。

根据革命的需要，这年春，李硕勋被党组织分配到上海，
担任中共沪西区区委书记^②。

沪西区有许多工厂，共产党员中以工人居多。全区共产党
员八十九人，其中工人八十二人，知识分子仅有七人。该区共
有十八个支部，平均每个支部只有五人左右。支部很小、很分

①《李开灼（硕勋）略传》中央组织部印，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李一氓：《革命先烈李硕勋》，载《新观察》1951年6月25日。

散。李硕勋经常要深入到各街道、工厂开展工作。

当时，上海白色恐怖也相当严重。国民党反动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后，不断逮捕共产党人。李硕勋曾在上海公开开展学生运动，参加各种大、中、小型会议，很多人认识他。大革命失败后，有些人叛变了，为虎作伥，出卖同志，环境异常险恶。但李硕勋早把生死置之度外，秘密来往于各个地下据点、支部之间。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他出外活动都进行适当的乔装，以免被叛徒认出。

一九二九年五月，蒋桂战争暂告结束。但是军阀与军阀之间，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并未消除，通过战争，矛盾日益加深，并且酝酿着更大的混战。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霸占更多地盘，加紧从经济上、政治上剥削、压迫工人。经济上，发行七千万编遣公债、加征各种苛捐杂税；政治上，一面强化白色恐怖，逮捕工人，屠杀工人领袖，通缉、拘禁进步人士；一方面拉拢工贼，控制上海总工会，破坏工人运动。

面对这样的形势，李硕勋大力发动工人参加革命工会——上海工联会，同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一年的“五一”劳动节和“五九”示威运动周，李硕勋发动了沪西工人参加上海工人举行的示威运动；当“五卅”惨案四周年到来之际，李硕勋又组织更多的沪西工人与全市工人一道举行总示威，反对法西斯统治和政治上、经济上的高压政策。他引导工人不断地从经济斗争进入政治斗争。这时期的上海工人示威运动，打破了敌人环攻高压造成的沉寂局面。

八月，李硕勋又作为中共法南区委负责人^①，领导上海法

^① 《省党委会》（1929年8月3日），存上海档案馆。

南区的工人运动。有一段短时间他还任中共上海沪中区委书记，在上海的中心地区开展工作。

由于历年的辛劳过度，加上在上海开展工人运动，没日没夜，饥饱无时，李硕勋患有严重的胃病，身体日见消瘦。但他把病痛完全置诸脑后，仍然以高昂的精神同反动派斗争。

一九二九年秋，李硕勋任中共江苏省委军委负责人，稍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①。与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维汉等一起工作。那时，中共江苏省委机关设在上海，领导江苏、上海的革命战斗。

这时，中共江苏省委、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和李硕勋先后派何昆、徐德等大批军事干部到江苏的通海、如泰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并决定将战斗在这个地区的南通、海门、如皋、泰兴等地的农民武装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

在李硕勋等的指导下，如泰地区的红军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发起进攻，占领长江江畔的周庄头，挺进至西来庵、长安市等军事要地。到一九二九年底，如泰红军已建立了一块幅员辽阔的游击区。翌年一月，如皋薄家湾共产党组织召集四五十人，也举行了武装起义。在南通、海门、如皋、泰兴等地区，红十四军在江苏省委和李硕勋的领导下，大力开展武装斗争。与此同时，江苏的宜兴、江阴，无锡等地的武装斗争也迅猛发展，小型斗争始终不断。

在领导组织军事斗争的同时，李硕勋对于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也给予关注和指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他在上海市龙华路外日晖桥的泉漳中学出席了中共江苏省

^①李一氓：《革命先烈李硕勋》。

第二次代表大会，与到会代表一起总结了江苏工作的经验，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案。

为适应武装斗争的需要，一九三〇年三月，中共江苏省委李维汉、李硕勋等研究决定，正式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军部，以何昆为军长，下辖两个支队。红十四军随后在江苏大地上不断打击国民党反动派。与此同时，李硕勋和江苏省委军委的同志准备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

一九三〇年春，李硕勋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①，在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等的领导下从事军事工作。

这时，根据党中央指示：中共江苏省委建立江苏省行动委员会，李硕勋是该会主席团成员。这年五月四日，他出席了江苏省行动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主席团会议，布置今后的斗争。

五月，在李硕勋等省委、军委同志部署下，红十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师）由三马路、西三甲、余东五灶、小五总到达大然镇。进军途中，他们与武装农民汇合，共一万四五千，兵分两路，攻下通海边区的军事据点——白龙党的巢穴汤家沟，击毙敌人六七十名。

七月六日，以徐海云、赵雪门为负责人的宿迁县军委在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号召下，以肖县武装起义队伍为主力，兵分两路，攻占了陇海铁路的军事重镇黄口，消灭敌七十二师一个连和商团、民团十人，俘虏一百多人，缴获一百八十多支长短

^①参阅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刘瑞龙：《李硕勋同志和中共江苏省委》；李维汉1984年2月1日的回忆；并参阅赵君陶：《忆硕勋》；李荣、杨柳：《李硕勋烈士简介》，载《宜宾地区党史资料》第2期，1984年10月。

枪，同时，王寨、永堙等地革命武装也举行起义。这支革命武装随即按省委军委的部署，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第一师。七日，宿县西北部的白善、东部的水池铺、东三铺等地革命武装举行起义，编为红十五军第三师；在铜山县的黄集、大湖贺村地区武装则被编为第二师。不久，由于红十五军军长陈资平被捕，革命武装被打散，红十五军这支队伍的番号也就随之不存。

这时候，正是党内“左”倾盲动主义盛行的年月。六月，李立三主持党中央的工作，制订了冒险主义的计划，热衷于搞城市暴动，希望一省首先取得胜利，最后夺取全国胜利。一九三〇年七月十四日，江苏省委改组为总行动委员会，李硕勋是该会成员。为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中共江苏省委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工人、农民、士兵及一切劳苦群众赶快行动起来，继承南昌起义的精神，准备工农兵武装大暴动，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为此，中共涟水县委发动八一起义，因敌强我弱，遭到反动武装“围剿”，暴动总指挥吴长来、县委张玉林等三十多人被捕。与此同时，一些同志在“飞行集会”、散发传单中也遭逮捕。

八月中旬，国民党南京卫戍司令部又拟将三十五名被捕的共产党员杀害。卫戍司令部宪兵连的共产党地下支部为营救这些同志，要求提前举行武装起义。为了避免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避免更多的同志的牺牲，李维汉、李硕勋等省委同志研究后，不同意在条件尚未成熟时举行武装起义。李硕勋没有盲目地执行党内的错误路线，而是善于独立思考，有效地跟反动派进行斗争。他不赞成搞“飞行集会”、城市暴动等一系列“左”倾行动，主张积蓄革命力量，到条件成熟时才打击敌人。

八月下旬，李硕勋还领导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七军，以省委委员蒋雄为军长，在石牌、南河一带战斗。

一九三〇年九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全会主要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这时，根据党中央指示，江苏省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共江南省委，领导江苏、上海、浙江、安徽等省市党组织，李硕勋开始是中共江南省委的军委副书记，旋即任中共江南省委军委书记。这期间，他经常与中共江南省委书记李维汉，常委陈云、夏采曦、刘瑞龙等，一道讨论如何在江苏、上海、浙江、安徽等省市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的问题。尽管环境比过去更险恶，斗争比以往更艰巨，他依然不顾个人安危，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火热的斗争，生龙活虎地上海沪西、沪中、法南等区出入，了解情况，联络同志，分析问题，指导工作。

为进一步领导江苏、浙江、安徽各地县开展革命斗争，中共江南省委于十月二十九日在上海召开了常委会议。会议决定由陈云、李硕勋、蒋云、黄理文、刘瑞龙等省委委员组成中共江南省委外县工作委员会，领导和发动三省农民起来进行游击战争。十一月二十日，李硕勋又出席了江南省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江南三省农民运动决议》。会后，李硕勋即往江苏各地传达贯彻中共江南省委扩大会议决议，大力发动江南地区农民起来投入斗争。

虽然六届三中全会批判了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但是，盲动主义的影响一时还未能肃清，继续给革命工作造成严重影响。一九三一年一月八日，中共丹阳县县委领导镇江、丹阳边界的吴家桥群众三百余人举行武装暴动，遭到敌人镇压；二十五日，县委又决定在东乡五大区大坝头一带再次举

行起义，由于坏人告密，队伍被反动警察包围，经过激战，暴动队伍一人牺牲，五人被捕。武装起义失败，当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事后，李硕勋认真总结了丹阳、镇江武装起义的教训。他认为，应该积蓄革命力量，待时机成熟时再举行武装起义；条件不成熟，则不要轻举妄动，以免暴露革命力量。

转眼一九三一年的春节就要来临，为了发动工人参加年关斗争、改善经济待遇，李硕勋和中共江苏省委^①的同志研究，就年关斗争作出了一系列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通过赤色工会组织群众进行政治上、经济上的年关斗争。嗣后，李硕勋到上海的沪西、沪中和法南等区传达省委的决议，并组织工人、店员要求提高工资，争取春节期间生活有所改善。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江苏省委发生了常委王克全、陈资平、蒋云等人阴谋分裂省委的事件。对此，李硕勋明确地指出，王克全等人另组第二个省委，进行分裂党的非法活动，是完全错误的。他赞成党中央对王克全等人的处理意见。李硕勋还以这个事件为例，启发、教育上海和江苏的共产党员提高组织纪律性，增强党的观念，加强党的团结，以王克全等人为戒，万万不可搞分裂党、分裂工会的错误活动。

一月三十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代替过去颁布的《反革命治罪法》。新法令是专门用来对付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的。随后，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疯狂地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实行法西斯统治。这时，从事革命活动，

^①1931年1月17日，中共江南省委改组为中共江苏省委。

随时都有被捕和牺牲的可能。可是李硕勋依然镇定如常，领导各地革命同志的斗争。他经常提醒上海、江苏的同志，要加倍小心，注意维护党组织的安全。他还针对上海一些地方搞“飞行集会”的教训，指出，这种在繁华的街道轰轰烈烈的宣传，表面上好象热闹一阵子，实际上却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了我党的力量，以至使党组织、革命团体遭到破坏，使一些同志被捕牺牲。为此，他告诉同志们，不要再干这些“左”倾的事，要扎扎实实地积聚革命力量，不暴露白区的党组织，以便保存同志，在条件成熟时开展更大规模的斗争。

二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二十万军队围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其它苏维埃区域。李硕勋认为，必须发动上海等地共产党员、工会会员、进步人士，声援和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三月十六日，在李硕勋的参与下，中共江苏省委发出《关于蒋介石第二次进攻工农红军，与我们对他的回答——接受中央给红军地方党部的训令的决议》，要求动员全省党、团、赤色工会及一切劳苦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予以有力的回答^①。

嗣后，李硕勋不断深入上海工联会、各区赤色工会以及中共沪东、沪中、沪西、法南、闸北、吴淞、浦东等区委，指导区委积极开展工人运动，使敌人后方不得安宁，不得不派来大批军队驻守；同时，在军火、军需品工厂，发动工人开展怠工斗争，减少军火生产；还为中央根据地输送了人员、金钱和物资，有力配合了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为了指导江苏、上海等地军事工作和工人运动的深入发

^①参阅《一九一九——一九三七年江苏革命斗争史纪略》。

展，李硕勋、孔原等省委同志五月初讨论制定了六、七月工作计划，准备向苏区及红军输送人力、物力、财力，并于六月选出出席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同时决定各级党委军委以下设立工农武装科和破坏科，以加强对白区工农武装斗争的领导，要求上海闸北、法南、浦东、吴淞等区和南通、无锡、徐州、宿迁、宿县等地成立军委^①。

此后，李硕勋在上海亲自指导建立了中共闸北、法南、浦东、吴淞等区委兵委，秘密建立、扩大了工人纠察队，并发给部分纠察队员武装，伺机打击敌人、消灭叛徒，以保护地下党组织的安全^②。

在上海，李硕勋曾与王明一起共事。他对于王明提倡的“飞行集会”一类“左”的做法有不同意见，曾展开过争论，表明自己不同意那一套既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不适合当时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的做法。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李硕勋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光明磊落，胸怀坦荡。对于党内的错误路线，他用正确的理论一方面展开斗争，一方面力争在行动上纠正，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四)

由于南方革命工作的需要，党决定派李硕勋赴转战于广东、江西边区的红七军工作，担任红七军政委^③。李硕勋愉快

^{①②}参阅刘瑞龙口述、何锦洲整理：《李硕勋同志和中共江苏省委》、《一九一九—一九三七年江苏革命斗争史纪略》。

^③参阅李一氓：《革命先烈李硕勋》；柯麟口述、何锦洲整理《李硕勋同志在广州、香港、上海等地的战斗》（1984年8月21日）。

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匆匆准备之后，即打算取道香港，转赴红七军。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日，李硕勋踏上了往香港的客轮。临别时，他的妻子赵君陶与儿子李鹏，和他的老同学阳翰笙前来送行，对他的离别依依不舍^①。

到达香港后，李硕勋立即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请党中央迅速决定他的行程，他急切地希望投入工作。

当时，中共广东省委机关设在香港。由于敌人的破坏，这一年春夏间许多同志被捕，迫切需要大批干部。为此，中共广东省委写报告给党中央，请求调干部到广东工作，特别要求把李硕勋留在中共广东省委。

五月底，李硕勋又以“素”的化名给党中央写信，信中说：“函谅达，我去留如何，速复电，即遵行”^②。

这年六月十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蔡和森不幸被捕，被引渡到广州，壮烈牺牲；原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章汉夫任代理书记，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省委人事有很大调整。鉴于广东急需干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遂任命李硕勋为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③，就地留在香港工作。李硕勋愉快地服从了调令。

在中共广东省委、省委军委领导下，广东的武装斗争在艰苦中曲折发展。东江一带，开辟了以大南山、八乡山为中心的

①《李硕勋日记》，1931年5月20日。

②李硕勋给党中央的信，原信无年月日，据分析应是1931年5月底。

③聂荣臻：《回忆李硕勋烈士》（1984年6月30日），并参阅李一氓：《革命先烈李硕勋》。

九块革命根据地，并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以古大存为军长；粤北的南雄油山一带，也有工农红军的活动，并且开辟了粤北革命根据地。尤其是在中国的第二大岛——海南岛，中国工农红军独立师人数发展到了二千余人，且在澄迈、定安、琼东、乐会、万宁、陵水等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李硕勋担任了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对于东江、粤北、海南岛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情况十分关注，经常跟广东省委的同志一道研究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壮大红军队伍、进行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等问题。他指出，东江根据地要力争跟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对于海南岛的武装斗争，他则希望能亲临指导，使之不断发展壮大。

这年七月一日，为了从事地下工作的方便和安全的需要，党中央又派在中共中央妇委工作的赵君陶来到香港。当赵君陶携李鹏到达香港时，李硕勋喜出望外，兴奋地对赵君陶说：“幸亏你早来一周，如果迟来一周，我已到琼崖去了。”^①原来，李硕勋已经按照党的指示计划到海南岛策划游击战争，碰巧这时赵君陶抵达。

一星期后，李硕勋乘上了从香港到海口的船，赵君陶携李鹏前来送别。赵君陶感到，李硕勋此去天涯，凶吉难卜。她强忍着心中的不安，与李硕勋互道珍重，依依惜别。她没有告知李硕勋，说她这时已有孕在身，只是千叮咛万嘱咐，要李硕勋一到海南后马上给她写信，完成任务后即刻返回香港。

两天后，李硕勋乘船来到海南岛的首府海口市，住在得胜沙路中民旅店，按照秘密地址，与琼崖地区党组织和军事负责人

^①赵君陶口述、何锦洲整理：《忆硕勋》（1984年8月26日）。

联系，准备召开军事会议。可是，由于叛徒的出卖，李硕勋不幸被捕。

敌人千方百计地想从他嘴里掏出党的机密。严刑拷打使他皮开肉绽腿被打断，但李硕勋铁骨铮铮、忠贞不屈，拒不说出任何情况。他知道叛徒已经出卖了他的身分，只愤愤地说：“我李陶是共产党员！”此外再也不肯吐露半句。敌人无奈，只得把他解押到琼山县政府监狱，并电呈广东省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核办。

李硕勋在铁窗里对党始终忠贞不二、宁死不屈。他早知国民党反动派一定会杀害他，便在狱中写下了两封遗书。一封给妻子赵君陶，信中说：

陶：

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

勋

九、十四^①

另一封是给柯麟医生（地下党员）的妻子陈志英的：

英姊：

^① 《李硕勋遗书——致赵君陶》，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我本不认识你，但我曾知你同我的妻子是朋友，故特寄一函存你处托转她。我死不必念，务望代安慰她!!! 并希望托人照料她回家去!!!

要她向肥兄^①处要数百元作路费回家（川），根本把儿子安顿好为要。

勋托

九、十四^②

写好了这两封信，李硕勋即通过可靠的人送出监外。几经辗转，才到达陈志英手中。

第二天，海南的反动派接到电令：就地枪杀李硕勋。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六日，李硕勋被反动派押出监狱。由于他的腿已被打断，敌人用竹筐抬他到刑场，他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他从容自若，昂首挺胸走到就义地点——海口市东较场刑场。一声枪响，李硕勋倒在了血泊之中。这年他才二十八岁^③。

两星期以后，李硕勋的遗书才从邮局寄到柯麟、陈志英手中。柯麟、陈志英迅即向章汉夫汇报了情况，要章汉夫派出同志到海口营救硕勋。随后，又把遗书转给赵君陶。赵君陶得到李硕勋的遗书，马上写信给党中央。党中央指示，要尽力营救，但李硕勋已经遇害。

①肥兄即章汉夫。

②《李硕勋遗书——致陈志英》，存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另据国民党资料记载，李硕勋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五日被杀害。

③参阅李一氓：《革命先烈李硕勋》。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李一氓:《革命先烈李硕勋》,载《新观察》第12期,1951年6月25日。
2. 中共中央组织部:《先烈李硕勋同志年谱》、《李开灼(硕勋)略传》。
3. 1924年8月至1926年10月上海《民国日报》。
4. 1925年6月至1926年11月《中国学生》杂志。
5. 1926年7月广州《工人之路》报。
6. 沈自强:《中共浙江省委的建立、改组及主要领导人的变更情况概略》,载《浙江党史资料通讯》,1981年12月22日。
7. 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5月版。
8.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一九一九年——一九三七年江苏革命斗争史纪略》。
9. 管文蔚:《回忆中共江苏第二次代表大会》,载《党史通讯》第5期,1984年5月25日。
10. 李荣、杨柳:《李硕勋烈士简介》,载《宜宾地区党史资料》,第2期,1984年10月。
11. 《李硕勋日记》。
12. 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
13. 上海《热血日报》(1925年)。
14. 访问李鹏、李一氓、赵君陶、李琼、黄火青、李强、刘瑞龙、周士第、刘鼎、阳翰笙、钟复光、柯麟、李何林、张崇文、罗鬻渔、尹伯休、李开济、李逸秋、李远志、胡英华、杨升莲、熊瑞文、张超、陈志英等人记录。

许 甦 魂

许肖生 胡提春

许甦魂，是我党从事侨务工作的先驱，我军出色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原名许统绪，又名许进。一八九六年农历十月生于广东省潮安县庵埠区一个贫农家庭。一九一六年到新加坡，一九二一年在吉隆坡加入国民党，一九二四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海外期间，曾任吉隆坡《益群日报》编辑，国民党缅甸党支部负责人，仰光《觉民日报》总编辑，积极宣传革命主张，参加并领导华侨的反帝爱国斗争。一九二五年秋回国参加次年初的国民党“二大”以后，历任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海外部秘书长，中共海外总支部书记，《海外周刊》主编，华侨协会第一届、第二届常务委员，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秘书，红七军十九师政治部主任，红七军前敌委员会委员，红七军政治部主任等职，一九三二年初在中央苏区牺牲，年仅三十六岁。

(一)

许甦魂的父亲许则厚，一向务农，以佃耕本村二亩多公田为生。许甦魂有四个姐妹和四个弟弟，他排行第三。由于家贫，许甦魂从小就跟父亲一道劳动。家贫使许甦魂迟迟不能上

学，但他十分羡慕读书，常在屋后的学堂旁听，流连往返。直到一九〇六年十岁时，他才博得家庭和亲戚的同情和支持，进入本村私塾汀源学校读书。

辛亥革命后，许甦魂从报上和老师那里了解到革命党人为推翻清朝而历尽艰险的斗争情况，他十分敬佩孙中山的革命精神，认为这是自己的楷模。南京临时政府颁布限期剪辫子的通告后，许甦魂在学校里带头剪掉自己头上的辫子，并劝说两个妹妹不要裹脚。在他的带动下，学校的师生纷纷剪掉辫子。

一九一二年夏天，许甦魂的父亲因护理疫病乡亲染疾身亡。这一沉重的打击，使他的家陷入困境。他的弟妹，有的饿死、病亡，有的被卖到南洋当童养媳。他本人被迫辍学，为了谋生而踏进社会，到庵埠镇香和百货店当店员。在四年的店员生涯中，他省吃俭用，把节省的钱用来买书报，白天工作，夜间读书，对革命党人的著作和当时的进步书刊爱不释卷，常常通宵达旦地在昏暗的油灯下看书，以致二十出头即高度近视。从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出发，他十分喜爱陈天华的《猛回头》一书，把书中一首诗“瓜分豆剖逼人来，同种沉沦剧悲哀。太息神州今去矣！劝君猛省莫徘徊。”抄贴在自己床头，时常吟诵！以此表达他对时局的忧虑和自己的期望。一九一五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出版后，他又成了《新青年》的热心读者，说：“中国需要德先生和赛女士（即民主和科学），犹如植物需要阳光雨露那样。”^①

一九一六年三月七日，香港革命党人策动潮安和汕头驻军起义，攻占潮安，进据汕头，接着宣布独立讨袁。许甦魂目睹

^①据烈士的弟弟许统豪的回忆（1980年8月）。

了这一事件的经过，为革命党人的行动而欢欣鼓舞，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今天”已在消逝，必将永远消逝。
“明天”已在到来，定会迅速到来。
月转星移，是宇宙的自然形象。
这黑暗社会的今天啊，要人们来赶路！
用血和汗，创造美好的明天！
用欢笑和热泪，迎接胜利的明天！^①

进步书刊启迪了许甦魂的思想认识，潮汕独立讨袁运动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重新考虑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他将原名许统绪改为许甦魂，表示自己已经觉醒，和旧我决裂，立志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而斗争。

一九一六年秋天，许甦魂毅然抛弃了店员饭碗，瞒着结婚不久的妻子和亲友，只身出走南洋，到达新加坡，开始了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生涯。

(二)

许甦魂在新加坡一家百货商店当店员，结识了彭泽民、鲍惠僧、董成方等一批有志的爱国青年和国民党人士。他们经常在一起研究学问，畅谈辛亥革命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并利用假

^①许甦魂：《潮汕独立讨袁运动有感》，1917年2月新加坡《新国民日报》。

日深入华侨群众之中，了解侨情。经过一段时间的探讨，许甦魂认为：开展华侨教育，宣传革命，培养人才，乃救国之途也！他的主张，受到彭泽民等人的赞赏和支持。

许甦魂以自己的积蓄和工资收入作资金，一九一七年八月，在新加坡大坡马车街创办了一所华工免费夜校，以此作为宣传和团结华侨的阵地。他自任校长，主持校务，并聘请了三位兼职教员。夜校开设了《初级白话文》、《中国历史》、《中国时事政治》、《民族、民权、民生问题讲座》、《南洋群岛之革命运动》、《华侨与祖国》等课程。许甦魂主讲《华侨与祖国》专题课。他用通俗的语言讲课，从什么叫华侨，华侨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说起，讲到华侨为什么飘洋过海，流落异乡，为什么被当作劣等侨民，为什么要团结，为什么要向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作斗争，辛亥革命以及各地华侨对辛亥革命的大力支持和援助等等。最后，他还讲到华侨必须组织起来，各行各业都要建立自己的组织，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提高华侨的社会地位而斗争。他那深入浅出的分析，有说服力的论证，生动的比喻，“常常博得满堂掌声。”^①

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〇年，大坡马东街夜校先后吸收了四批学员，有近二百名华侨在这里受到教育，其中的许多人成了新加坡地区华侨爱国运动的第一批骨干。一九一八年一月，新加坡华侨店员工会成立，许甦魂被聘请为工会名誉主席。接着，黄梨工会、机器工会、屠业工会等相继成立，广大穷苦华工开始有了自己的组织，并以集体的力量反抗殖民主义的压迫，支持祖国的革命斗争。

^①据老归侨许贵深的回忆（1981年1月）。

一九一八年三月底，日本帝国主义与段祺瑞政府签订了侵犯中国主权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消息传来，许甦魂和华工义愤填膺，他召集店员工会委员商量对策，挽救国难。经过讨论决定：（一）店员工会与华侨总商会结成同盟，共同抵制日货；（二）联合其它工会，游行示威，纪念“五七”国耻三周年。会后，他们分头行动。五月一日，一次有组织的抵制日货运动在新加坡展开，各华侨商店不卖日货，广大华侨不买日货。这次运动持续一星期，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气焰，表现了广大华侨对祖国的忠诚。五月七日，许甦魂和广大华侨一起参加国耻纪念。数千华侨、华工走上街头，汇成了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高举着“五七国耻纪念”、“抵制日货”、“不忘国仇”等横幅，在新加坡主要街道游行，气氛极为紧张热烈^①。广大华侨为维护中华民族神圣尊严的斗争，深得当地人士的同情。

一九一九年初，许甦魂被聘请为《新国民日报》编辑。这年春天，协约国在巴黎召开的分赃会议上，把战败国德国在我山东半岛的各种权利转让给日本。广大华侨怒不可遏，许甦魂更是大声疾呼：“外有强权，吞我河山；内有国贼，卖我民族，山东焉存？民族焉存？”号召广大海外侨胞为祖国和民族的生存而斗争，他慷慨激昂地说：“海外同人，你可知晓？当母亲受到凌辱，是凉血动物当无动于衷，是热血儿女当举起拳头，拼他个你死我活，爱我中华，乃爱我母亲。海外同人，是吾人雪耻的时候了，是吾人救国的时候了。”^②这些爱国言

^①据老归侨许贵深的回忆。

^②许甦魂：《还我河山》，1919年4月《新国民日报》。

论，在广大华侨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应。

当国内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时，许甦魂在新加坡华侨青年中发起成立了“旅新华侨反帝救国后援会”，领导华侨开展斗争。在后援会的组织下，新加坡华侨召集大会，演讲时事，游行示威，有力地声援和配合了国内的反帝爱国运动。

华侨的觉醒和爱国斗争的日益加强，引起了英殖民政府的注意。一九二〇年初，英殖民政府颁布了教育注册苛例，许甦魂创办的华侨免费夜校被取缔。接着，英殖民政府更采取恐怖政策，解散华侨组织，捕捉华侨进步分子。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摧残下，马来亚和新加坡的“革命机关遂完全被解散，首领亦纷纷被监禁、驱逐，革命风潮亦渐下。”^①为了逃避殖民政府的追捕，一九二〇年秋，许甦魂秘密离开新加坡，回国省亲。

(三)

许甦魂于一九二〇年秋回到故乡。他眼见家乡依然如故，一片死气沉沉，于是，决定从改革教育入手，开展新文化运动。他以新文化新思想宣传和教育群众，耐心地说服乡里的进步绅士。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许甦魂把原私塾性质的汀源学校改名为凤歧小学，从学校体制、师资到教学内容与方法各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一）解聘了两位老朽的旧教师，另

^①许甦魂：《南洋群岛的革命运动》，《海外周刊》第24、25合期。

聘四位品行端正、思想进步的新教员；（二）取消对学生体罚制度，提倡师生平等，尊师爱生；（三）反对尊孔读经，废除八股文，推行白话文和应用文，增设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课程；（四）降低穷苦子弟的学费标准。改革后的凤歧小学，面貌焕然一新，学生的素质大大提高，邻乡的适龄学童纷纷前来求学。

紧接着，许甦魂以凤歧小学为校址，创办了凤歧女子夜校。办学初期，由于封建思想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大多数女青年徘徊观望，报名入学者寥寥无几。于是，许甦魂从我做起，动员自己的爱人和六个堂妹入学，作为首倡。接着，沿门劝学，鼓励女青年走出闺阁厨房，做一个有文化的新型女性。在他的发动下，仙溪、文里等乡的妇女也纷纷前来就读，夜校人数达四十多人。一九二〇年十月，凤歧女子夜校正式开学。许甦魂在开学典礼上宣布：“女子赋有与男子一样的平等权利。男子应该受教育，女子亦有权进学堂，为做一个新女性而读书，为做一个新国民而读书。”

当时的潮汕地区，女孩子多缠足，妇女多结髻，遵循《女儿经》作人。在办学过程中，许甦魂极力反对封建礼教，鼓励女孩子放脚，动员妇女剪髻。他的爱人陈宝英生前常对人回忆这样一件事：“当时甦魂动员我和几个姐妹剪辮剪髻参加夜校，开始大家都怕羞不愿剪，有一天天亮起床时，我发觉自己的髻没有了，原来是当夜甦魂乘我熟睡时偷偷剪掉。”可见许甦魂当年支持妇女解放的热忱。

一九二一年春，许甦魂重返南洋，和董方成一道，被聘为吉隆坡《益群日报》编辑，并加入了国民党。《益群日报》是马来亚吉隆坡一带的中文报纸，由革命党人所掌握。彭泽民任

总经理兼编辑。办报初期，由于编辑人员的腐败无能和军阀陈炯明的不良影响，使《益群日报》不能成为“华侨之声”，销路有限。许甦魂和彭泽民到职后，即对《益群日报》进行整顿和改革。首先，他们确定该报“以拥护孙中山革命大纲为主旨”^①；认为报纸是向广大华侨进行教育的武器，主张什么，反对什么，一定要旗帜鲜明，决不可含糊。其次，他们改革了报纸的形式，使它通俗易懂。一、开辟了具有针对性的各项专栏，一版设有国内一周时事评述，介绍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对帝国主义列强为害中国的经过，常有揭载”；二版辟有侨胞之声专栏，范围广泛，涉及华侨的工作、生活、学习和侨胞的呼声等方面；四版的“祖国之光”专栏，专门介绍历代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的故事，向侨胞进行历史知识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二、文章短小精悍，语言生动活泼，形式多样，言之有物。

改革后的《益群日报》成为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新知识的阵地，成为吉隆坡国民党联系和团结广大华侨的桥梁，成为广大华侨的良师益友。回忆当年的情景，彭泽民指出：“《益群日报》有董方成、许甦魂等为助，宗旨明确，内容充实，销额大为增加，在南洋华侨中影响甚大。”^②

陈炯明在一九二二年六月叛变革命之后，派刘常天利用《益群日报》大发反动言论，反对孙中山，拥护乱军，在侨众中产生了恶劣影响。彭泽民、许甦魂、董方成等联合起来，坚定不移地站在革命立场上，支持孙中山，反对陈炯明，反对刘

①② 《彭泽民自传》（手稿）。

常天的叛卖行径，坚决禁止在《益群日报》上刊发拥护陈炯明的文章。接着，《益群日报》召开了董事会议。会议决定清除刘常天，重申《益群日报》以拥护孙中山革命大纲为主旨。由于他们的联合斗争，使《益群日报》继续掌握在爱国志士手中。

一九二三年秋，许甦魂回国采访。在四个月的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及北京、上海、汉口、广州、潮汕等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使他深受鼓舞，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使他看到了祖国的希望所在，更坚定了为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终身的信念。在给彭泽民的信中，他深有感触地说：“国内之行得益非浅”，“民众底运动，其势之猛，其功之丰，为弟所未见过”；“布鲁什维克底真蒂，为吾人救世之药方也。”一九二四年初，许甦魂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接着，被派遣重返南洋，负责国民党缅甸总支部的改造工作。

（四）

许甦魂到达缅甸仰光，担任国民党缅甸总支部执行部主任兼仰光《觉民日报》总编辑。他致力于把缅甸总支部改造成为爱国侨领、华侨商人、华侨知识分子和华工四个阶层组成的革命联盟。从一九二四年二月起的一年半时间里，他主要做了五件事。

第一件：对《觉民日报》和《缅甸新报》进行改造。《觉民日报》是缅甸总支部的机关报，《缅甸新报》是总支部领导下的侨报，它们有较长的历史，但是由于办报人暮气沉沉，

内部分裂，使它们不能起到国民党喉舌的作用。许懋魂到职以后，进行了有效的改造。一方面，他挑选了一批精明能干的青年当编辑，派遣袁任远、黄壬戌、陈愚化等骨干分子主持笔政，给报社输进了新鲜血液，并解聘了一些不称职的人；另一方面，他从内容和形式对报纸进行改造，明确规定《觉民日报》和《缅甸新报》以拥护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宗旨。在改造报纸期间，许懋魂亲自动手，写了大量文章，向广大华侨宣传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宣传国共合作的作用和意义。改造后的《觉民日报》和《缅甸新报》成为宣传国共合作，团结广大华侨的工具，“缅甸党务之所以能发展与团结，全赖该报鼓吹努力之功。”^①

第二件：创办华侨学校，培养革命骨干。许懋魂以缅甸总支部名义，发起创办仰光模范学校，以此作为集会和培养骨干的基地，进行组织和宣传活动的据点。为了解决办学经费，他发起向华侨募捐。他把自己的积蓄全部用来办学。一九二四年九月一日，仰光模范学校正式开学，首期学员二百多人。此后，缅甸总支部又创办了缅甸华侨中山学校，以这两所学校为基地，为革命培养了一批干部。

第三件：建立和健全缅甸各地的国民党支部和分支部。他先发展了一批优秀青年入党，然后依靠他们作骨干建立和健全总支部下属的支部和分支部。他还派出了一批国民党左派和仰光模范学校的优秀学生，以特派员身分，到各地建立和发展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到一九二五年九月许懋魂离开缅甸时为止，缅甸总支部下属的党支部由原来的三个发展到五个，分部发展到二

^① 《缅甸党务报告》（1926年11月）。

十二个，党员由二千多人发展到三千四百五十五人^①。整顿后的缅甸国民党组织，成为支持国内革命斗争的政治力量。

第四件：反击陈炯明余孽的进攻。一九二五年二月初，广东革命军举行第一次东征，陈炯明的余孽陈起森、唐小藏等人，勾结北京政府驻仰光领事沈艾荪煽动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侨众，在仰光组织了国民协济会，向侨界骗钱，为陈炯明筹饷。他们的阴谋活动被《觉民日报》揭露出来后，恼羞成怒，捣毁《觉民日报》社，向殖民当局告密，陷害报社人员。为了反击陈炯明余孽的进攻，许甦魂召集了总支执委扩大会，采取了四项措施：（一）将陈、唐两人清除出党；（二）给追随者以严厉警告；（三）公布陈、唐的罪恶，通告各支部和支部及广大侨众群起而讨之；（四）联合缅甸各华侨团体，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撤换辱国害侨的领事沈艾荪。经过斗争，陈炯明向缅甸侨胞骗钱的阴谋终于被粉碎。

第五件：发动侨胞支持和配合国内的革命斗争。一九二四年底，国内掀起了国民会议运动，缅甸总支部也发动了一百多个华侨团体，联合组织了国民会议促进会，以为声援。一九二五年五、六月间，缅甸总支部发动广大华侨，大力声援和赞助国内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反帝斗争。

在缅甸工作期间，许甦魂为党的事业、为华侨的切身利益而斗争，他富有成效的工作，受到广大华侨的尊敬。他被聘请为旅缅潮州会馆名誉总理。爱国侨领、缅甸潮州会馆会长陈维岳赞扬他：“人品学问两堪敬佩。”^②

① 《缅甸党务报告》（1926年11月）。

② 见许甦魂回国参加国民党二大的《公函》（1925年9月26日）。

一九二五年八月，国民党中央电请缅甸总支部选举华侨代表一人，回国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各支部的推荐和总支部投票选举，许甦魂当选为国民党二大代表，九月下旬离开仰光回国。

(五)

一九二五年十月，许甦魂到达广州，立即加入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行列。

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国民党右派活动猖獗。谢持、邹鲁等人继西山会议之后，正酝酿召开非法代表会议与在粤的国民党中央争夺领导权。原定十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由于右派的阻挠而推迟，许甦魂抵穗后，除华侨代表来了三十多人外，各省代表极少。情况十分危急，如果大会开不成，将助长右派气焰，给革命带来恶果。为此，在粤的共产党人正极力敦促国民党中央尽早召开大会。许甦魂立即串连海外华侨代表，组织了海外代表办事处，以华侨代表的名义，向国民党中央进言，催促其尽早召开中央会议筹备大会事宜。

许甦魂、董必武、钱介磐等和来自海外的华侨代表，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广州革命纪念会集合，反对国民党西山会议派，拥护广东革命政府，坚决主张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接着，许甦魂、董必武和来自湖北、福建及海外的代表一起，联名发表通电，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活动。通电痛斥了国民党右派对中国共产党和广东革命政府的诬蔑，赞扬共产党人和广东革命政府“数月来一切措施，多能遵照党纲进行，如肃清

刘扬，肃清东江，南路逆军及一切反革命派，皆有事实可见”；通电强烈呼吁，希望国民党中央，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海内外各级党部，“以全力拥护在粤开会之主张，即派代表到广州，俾党务得以解决，革命工作得以继续进行。”^①在这种情况下，十二月十一日，国民党中央召开一届四中全会，指出西山会议为非法，决定一九二六年元旦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推举吴玉章为大会秘书长，负责筹备工作。此后，许甦魂和在广东的共产党人一起，积极为国民党二大的召开作准备，同时他又深入海外各华侨团体驻广州联络处，倾听华侨对国民党二大的意见和建议。

十二月二十五日，许甦魂等向国民党二大筹备委员会提交了《以实力保护华侨案》，指出华侨是祖国的儿女，因生活所迫而漂洋过海。华侨在海外受尽了帝国主义者的欺压和摧残，痛苦万分，用眼泪望祖国，盼我国政府来保护。但是历届政府只知卖国，只知媚外，不特无丝毫保护华侨的能力，且无丝毫保护华侨的意思，使广大华侨失望和痛心。指出，国民党是革命的党，国民政府是革命政府，应该关心华侨的疾苦，以实力保护华侨。他建议，国民党中央应制定保护华侨的条例；国民政府应建立侨务机关，办理华侨事务；中央海外部应附设华侨协会^②。许甦魂等的提案受到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的重视。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期间，许甦魂参加了大会的一切重要活动，并在一月十二日下午向大会作了《緬

① 《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见《政治周报》第2期（1925年12月13日）。

② 《二大保护华侨案》，见《海外周刊》第2期（1926年3月22日）。

旬党务报告》的发言。当日，关于以实力保护华侨的提案被大会所通过。根据许甦魂和彭泽民等华侨代表的提案，大会决议：（一）对我海外同胞，极力保护；（二）使本党指导下之国民政府规复侨务局；（三）中央海外部附设海外同志招待所；（四）由党赞助组织华侨协会。

一月十三日，吴玉章向大会提出国民党对外政策：（一）与苏俄切实联合；（二）扶助弱小民族；（三）联络世界上的革命民众。许甦魂赞同吴玉章的主张，并在提案上签名。这一提案获得通过，成为国民党二大的对外政策^①。

根据大会主席团的提名，一月十八日上午大会进行选举。许甦魂以一百七十二票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成为出席国民党二大、并当选为候补执委的七位共产党员之一。

国民党二大之后，国民党中央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任命彭泽民为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许甦魂为秘书长。

（六）

许甦魂按照党组织的安排，一九二六年一月底出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秘书长，同时兼任中共海外总支书记，从此，他由海外转回国内，协助海外部长彭泽民开展侨务工作。彭是爱国华侨，国民党左派，很支持海外部共产党人的工作。许甦魂到职之后，解散了前任部长林森所组织的海外部工作班子，挑选了一批爱国华侨和共产党人到海外部工作，明确规定了海外部的

^① 《大会始末纪要》，《政治周报》国民党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号。

主要职责是指导海外各党部依照二大宣言、党章和决议办理海外党务，随时查核其执行情况和办理侨务。接着，许甦魂派遣董方成、林秉铨、郑省一、李芳园等一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以国民党海外党务专员和党务组织员的身分，分赴海外各地，宣传和贯彻国民党二大的精神。

国民党二大以后，西山会议派不甘心于失败，派林森出国向各地侨胞游说和筹款，为此，许甦魂和彭泽民以中央海外部的名义，于当年二月五日向各党部和广大华侨发布了《告海外同志》（第一号）。文告首先指出林森等人自命为国民党元老、真正的中山主义信徒，但他们反对广东国民政府统一广东，反对联俄，反对联共，事实上反对孙中山的政策。文告强调：由于各帝国主义勾结我国军阀，一致压迫我民众，其势甚凶，其力甚大，为完成国民革命，使民族独立，民众自由，非联合一切革命分子，非请教革命先进国——俄国不可。共产党的政策——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相同，可以合作共同革命，共产党人在党内较之自命为元老者更为努力。反对联俄联共，无疑就是反对革命，就是助军阀和帝国主义者为害中国。文告最后号召广大华侨提高警惕，驱逐林森，预防一切反动分子向海外活动的阴谋^①。

这篇文告和以后发布的《防止反动派之反宣传》、《通告海外同志防范反革命派宣传》等，加深了广大华侨对中国共产党人和国共合作重要意义的理解。在海外部的领导下，海外各党部和各华侨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和宣言，反对西山主义派，拥

^①彭泽民、许甦魂：《告海外同志》，《海外周刊》第1期（1926年2月5日）。

护国民党二大。

许甦魂和彭泽民根据国民党二大的决议，着手在广州筹建全国华侨协会。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四日，他们主持召开了华侨协会筹备会，并以华侨协会的名义公开参加社会的政治活动。协会成立初期，会员只有五十多人，多为参加国民党二大的代表和在海外部工作的归国华侨。在许甦魂和彭泽民等筹备员的共同努力下，驻广州的十六个海外华侨团体集体加入华侨协会，在广州的归侨亦纷纷入会。此后，华侨协会在汕头和海口等地建立了分会，并由国内发展到国外。三月下旬，许甦魂参加了华侨协会筹委扩大会议，讨论华侨协会的章程，会议明确规定：华侨协会是中央海外部指导下的华侨联合会，它的使命是：发展华侨事业，保护华侨利益，拥护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①。六月六日，华侨协会选举产生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二十二名爱国侨领和华侨积极分子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许甦魂和彭泽民同时被选为中央执委和常务委员。在许甦魂和彭泽民的领导和发动下，会员迅速增加，遍布海内外。据不完全统计，至一九二六年底，华侨协会已拥有会员十五万左右，成为不可忽视的一股政治力量。

华侨协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直接影响下而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华侨群众团体，在中国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爱国侨领的共同领导下，它团结了广大海外华侨，支持和配合国内的革命运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九二六年二月初，省港罢工委员会派代表会见彭泽民和

^① 《华侨协会为征求会员告海外侨胞》，《海外周刊》第2期（1926年3月29日）。

许舜魂，要求给予援助。二月八日，许舜魂主持召开了海外部和华侨协会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一）以海外部和华侨协会的名义，电请海外华侨继续支持省港罢工；（二）致函省港罢工工友，表示声援和慰问。在二月十一日的函件中赞扬省港罢工工友的革命精神，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接着，许舜魂和彭泽民向海外各支部、各华侨团体发出通电，希望广大华侨大力支援省港工友。在海外部和华侨协会的领导下，援助省港罢工成为海外华侨爱国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从一九二六年二月至十月十五日，华侨捐助省港罢工的款项达二百余万元^①。

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帝国主义的憎恨与日俱增，对海外华侨的压迫也有加无减。一九二六年初，越南和暹罗殖民政府颁布华侨人头税苛例，压迫华侨；三月十二日，新加坡华侨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遭到英殖民当局的袭击，捕去六十多人，并封闭了乐群、乐育和民智三间华侨学校。为了援助受难侨胞，四月十四日，许舜魂和彭泽民以海外部名义发布了《为援助星洲被捕同志告海外华侨》，号召侨胞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援助被捕的侨胞。

接着，华侨协会连续召开反帝大会，声讨帝国主义对华侨的虐待。五月三日，华侨协会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了第二次反帝大会，出席会议的有各地华侨和各界代表，以及印度、越南、朝鲜三国代表。许舜魂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一）请国民政府向各殖民地压迫华侨之帝国主义提出严重抗议；（二）通电警告各帝国主义勿再压迫华侨；（三）唤起侨众，联合各地弱小民族，共同作反帝运动。

^① 《海外部工作报告》，（1926年1月至10月）。

五月二十七日，华侨协会邀请驻粤各华侨团体，召开反抗帝国主义对华苛例讨论大会，许甦魂出席大会并讲了话。会议决议：（一）促国民政府改善中法越南商约；（二）促国民政府向越南、暹罗政府交涉，取消华侨人头税；（三）促各殖民地华侨团结一致反抗一切苛例；（四）促国民党中央速建设华侨招待所，以安慰被逐回国之华侨；（五）促国民政府速规复侨务局；（六）通告海外华侨以实力赞助国民政府北伐；（七）资助为党奋斗被帝国主义驱逐出境之华侨^①。

在广大新加坡华侨的斗争下，殖民当局被迫释放了所捕华侨，七月下旬，受难华侨二十多人从新加坡回国。七月二十五日，海外部和华侨协会联合在中央党部礼堂召开欢迎星洲被驱逐回国同志大会，许甦魂主持了欢迎大会。会后，又和受难华侨亲切交谈并率领他们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黄埔军校等地参观，接着，对受难回国华侨作了妥善安排：（一）凡未有职业者，由海外部供给膳食费；（二）凡文字略端者，介绍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②，这使受难华侨感到祖国的温暖。

在创立华侨协会的同时，许甦魂又亲自创办了《海外周刊》，自任主编。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海外周刊》与国内读者见面，它的宗旨是：（一）发扬孙中山的革命学理和方法；（二）报告每周重要时事给海外侨胞，使得一个明确的消息，不致误信谣言；（三）报告中央执委会的重要议案，及有关华侨的事项；（四）记载本部及海外各级党部的工作经过

① 《华侨协会上国民政府呈》，《海外周刊》第12期（1926年6月14日）。

② 《海外部欢迎星洲出狱同志》，《海外周刊》第19期（1926年7月26日）。

和重要通告；（五）记载华侨的消息；（六）评论华侨运动。

《海外周刊》在广州期间共出版了三十五期，它是国民党中央海外部的喉舌，是祖国加强与广大华侨联系的桥梁，受到了广大华侨的欢迎。在许甦魂的主持下，《海外周刊》曾经集合过一批革命青年，左联作家洪灵菲和经济学家王学文等先后在《海外周刊》工作过。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右派的活动也更加猖獗起来了。为了与国民党右派争夺青年一代，许甦魂以同乡的名义，把在穗读书的潮州籍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潮州旅穗学生革命同志会，以此为阵地，引导学生走上革命道路。当时洪灵菲和戴平万等就读于广东高师（中山大学前身），在学校期间曾参加学生运动，并参加了潮州旅穗学生革命同志会，毕业后失业流落在广州。许甦魂向他们伸出了热情的手，先从经济上予以帮助，又逐步鼓励和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推荐他们到海外部工作，介绍他们参加共产党，培养他们成为革命骨干。后来，洪灵菲的爱人秦静在《洪灵菲选集》序言中说：“洪灵菲的进步和变化，跟许甦魂同志对他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为了推动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实现中共中央二月特别会议决议，五月中旬，许甦魂和彭泽民联名向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案，要求迅速出师北伐，接着又于五月二十七日电请海外各党部和华侨团体力促国民政府出师北伐。

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推动和领导下，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翌日，海外部和华侨协会召集驻粤各华侨团体，举行华侨北伐后援会成立大会。会议讨论通过了《华侨北伐后援会简章》，选举彭泽民、许甦魂、周启刚、莫子材、陈任一、刘兼善、陈英三等七人为执行委员。选举许甦

魂为宣传部长，彭泽民为筹款部长，莫子材为总务部长。华侨北伐后援会成立之后，许甦魂和彭泽民发布通告，指示海外各党部组织北伐后援会，至一九二六年九月，各地华侨北伐后援会达五百二十四个，会员约一百万人。七、八月间，海外华侨“电贺北伐胜利及汇款者日有数起”，自九月份起“汇寄北伐军饷者纷至沓来，中央海外部大有接应不暇之势”^①。至一九二六年底，华侨捐助的军饷达一百万元。与此同时，华侨大力宣传北伐并派遣优秀儿女回国参战。

随着北伐的胜利发展，为了进一步加强祖国与华侨的联系，“集中华侨革命力量，同时联合国内民众，共同参加国民革命，以达中华民族解放”，十月上旬，海外部和华侨协会联合发起了华侨恳亲大会，邀请海外各侨领、华侨积极分子回国恳亲。十一月十二日，华侨恳亲大会开幕，许甦魂代表海外部在会上发言，他介绍了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赞扬了华侨对祖国革命的热心赞助，最后，他向广大华侨和海外党部提出希望：（一）集中革命的华侨；（二）扩大党的力量——多吸收学生、工人入党；（三）使党有威信，能领导侨众做侨众运动；（四）联络弱小民族，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向帝国主义进攻^②。这次恳亲大会持续半个月，使华侨加深了对祖国和北伐战争的了解。

从一九二六年初开始，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主持和领导下，开创了侨务工作的新局面，充分显示了许甦

① 《海外周刊》第28期（1926年9月14日）。

② 《华侨恳亲大会盛况》，《海外周刊》第34期（1926年11月20日）。

魂的组织领导才能。他任人唯贤，办事讲究效率，热爱华侨，为华侨的利益而斗争，对动员华侨支持祖国的革命斗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彭泽民所说的：“许甦魂是大革命时期华侨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是受华侨尊敬的华侨领袖，他为华侨说话，为华侨着想，为华侨办事而使他成为华侨界中的有影响的人物。”^①在海外部的领导下，海外党务迅速发展，共建立了十四个总支部，五百二十四个分部，党员九万七千四百多人^②。

由于革命军北伐节节胜利，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北迁武汉，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底，许甦魂和彭泽民率领海外部同志由穗迁至汉口。

(七)

许甦魂到汉口以后，继续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秘书长，并担任中共国民政府特别支部书记，管理国民政府机关内党员三十多人，王学文、向警予等都是这个支部的成员^③。他利用支部生活的空闲时间，向党员报告形势，希望大家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变的发生，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共产党员的立场^④。

一九二七年三月七日至十七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举行。许甦魂和全体共产党员一起，联合国民党左派，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会议通过了

①彭泽民的回忆（1963年4月）。

②《海外部工作报告》（1926年1月至10月）。

③④据王学文的回忆材料（1983年）。

维护国民党二大政策，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加强国共两党合作，扶助工农运动，反对与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妥协等各项议决案；取得了反对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的一次重大胜利。四月二十二日，许甦魂和毛泽东、林祖涵、董必武、吴玉章、恽代英、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彭泽民、程潜等人，以四十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的名义，联名讨蒋^①。五月十三日，许甦魂和彭泽民以中央海外部的名义，签发了《海外部紧急通告》，声讨并揭露蒋介石及其在粤爪牙，勾结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屠杀爱国华侨，捣毁广州华侨协会和海外部留守处，抢劫华侨支援北伐战争的捐款和财物等血腥罪行；号召海外各党部和各华侨团体，一致声讨蒋介石；希望海外同胞团结一致，巩固革命战线，肃清一切反革命派^②。

在这段时间里，许甦魂朝夕奔忙。日间，他到海外部主持部务，经常以海外部和华侨协会的名义参加汉口地区的反帝反新军阀的群众运动；夜间，他或者主持中共特别支部会议，或者写文章，揭露帝国主义与新军阀互相勾结的罪行。

华侨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七月三日在武汉召开。彭泽民主持大会，许甦魂代表首届华侨协会执委会在会上作了会务报告。报告指出：华侨协会今后的工作任务是“致力于唤起海外侨胞，努力于打倒蒋介石，反对帝国主义出兵华北”。他号召广大华侨团结一致，为打倒南京反动政府，打倒广东反动派和军阀及其一切走狗而斗争。经过热烈的讨论，会议通过了“通

① 《中央委员联名讨蒋》，1927年4月22日《汉口民国日报》。

② 《海外部紧急通告》，1927年5月22日《汉口民国日报》。

电海外同胞一致讨蒋”，“呈国民政府速下讨蒋令”、“联合各国工人阶级，共同打倒帝国主义”等决议案。会上，许甦魂、彭泽民和鲍惠僧等十五位华侨代表被选为华侨协会第二届执委会委员^①。

继蒋介石反革命政变以后，汪精卫也于七月十五日公开叛变革命。许甦魂和一批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被通缉，许甦魂的爱人和三个儿女被困在广州。

许甦魂并没有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而畏缩，没有动摇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更没有因妻儿在广州被围困监视而产生后顾之忧。他化装为伙夫，避开国民党反动军警的耳目，于七月下旬赶到南昌，参加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被委任为前敌委员会秘书。他和吴玉章等一起，日以继夜地工作，为前敌委员会起草宣言、布告，制订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实施政纲和一些革命标语等。

八月一日，南昌起义爆发，同日，许甦魂与宋庆龄、毛泽东、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彭泽民、邓演达等十八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联合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揭露蒋汪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歪曲三民主义，叛变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屠杀工农等种种罪恶行径；决心为反对新军阀，反对帝国主义而奋斗到底。

南昌起义之后，他随军南下，仍然担任前委秘书，并一路协助做部队及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十月二十四日，部队进入了潮汕地区，许甦魂参加了接收潮汕敌方机关的工作。他忠心耿耿，把精力投入到党的宣传工作上。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吴玉

^① 《华侨协会全体代表大会》，1927年7月5日《汉口民国日报》。

章赞扬许甦魂“是一个很好的同志。”^①

南昌起义军在潮汕一带遭到失败，许甦魂和郭沫若、吴玉章、彭泽民等由汕头乘船赴香港。并接受党组织的派遣，化名黄子卿，主办《香港小报》，继续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在香港的半年多时间里，许甦魂寄宿在彭泽民家里，上午到报社上班，下午校对《香港小报》样版，夜晚撰写、审阅稿件和各种电文。他利用《香港小报》向国内外介绍国内时局变化的情况，揭露南京政府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罪恶面目。

随着《香港小报》发行量的增加，影响日益扩大，《香港小报》受到反动派和香港当局的注意。一九二九年八月初，蒋介石反动政府勾结香港当局，查封了《香港小报》，许甦魂被捕入狱。在狱中，他虽然备受种种折磨，但忠贞不屈。经党组织和彭泽民多方托人疏通，终被释放，香港当局将他驱逐出境。

出狱以后，许甦魂恢复了党组织关系。这时，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和绥靖司令李明瑞主政广西。党中央决定派遣部分干部通过各种关系到广西省政府和李明瑞部队开展工作。八月上旬，许甦魂启程去广西^②。

离港前，在与彭泽民告别时，他暗示要到广西参加武装斗争的意愿，并把自己在狱中作的一首诗赠送彭泽民^③。其中有这样几句：

① 《吴玉章致许甦生函》（1964年10月26日）。

② 《广西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12期。

③ 据彭泽民的回忆材料（1953年）。

转眼二寒暑，
憔悴自支持，
苦况问心知。
群魔未泯日，
志不移。

表达了他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艰苦岁月中，坚持革命的斗志。之后，他改名许进，表示自己参加革命，只许前进，不许后退的决心。

(八)

一九二九年八月，许甦魂到达广西南宁。九月一日，许甦魂参加了中共广西省委召开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会上，邓斌（小平）和贺昌代表党中央向大家传达了党的六大决议。会议决定武装农民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苏维埃，做军事运动，成立红军，把省委改为特委，由粤省委领导。会议确定了红军干部的具体人选。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政治部主任陈豪人，组织科长罗少彦，宣传科长许进（即许甦魂）^①。

党代会以后，许甦魂在张云逸和邓小平的领导下工作，“他为人文质彬彬，沉静寡言，善于写作，很少言笑，是一位很有思想、肯用脑子的中坚干部。在红七军中的宣传文件，大多出于他的手笔。”^②“为了迎接百色起义的到来，许甦魂和

①莫文骅：《红军第七军简史》，《广西党与苏维埃红军运动简史》（1954年8月）。

②《莫文骅给许甦生的信》（1984年10月10日）。

政治部的同志一起，为百色起义起草和印刷起义宣言、布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等文件。

九月下旬，俞作柏、李明瑞不听我党劝告，贸然发动了反蒋战争，广西特委按照预定计划，将留守南宁，由我党掌握的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由张云逸率领开到右江地区，进行武装斗争。不久，许甦魂与邓小平、陈豪人、叶季壮、罗少彦、李谦、冯达飞、袁任远、李朴等随军出发，于十月二十日到达平马镇，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①。接着，部队到达百色县城，与韦拔群、黄治峰领导的右江农民自卫军汇合。在张云逸和邓小平的领导下，右江农民运动进入了创造红军、红色政权和红色区域的新阶段。

十月二十八日，张云逸和邓小平领导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队和当地农军举行起义，解除了反动的警备第三大队的武装，成立了临时的革命政权，并由起义部队组成红七军。经党中央批准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及右江工农民主政权正式成立，雷经天任右江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张云逸任红七军军长，邓小平任红七军政委，许甦魂被任命为军政治部宣传科长。

红七军成立的第三天，许甦魂就率领宣传队下乡进行宣传。他们在右江地区各城镇、乡村张贴布告，书写标语，散发传单，开谈心会，群众会，向工农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方针、政策和红军的宗旨。在许甦魂的组织领导和带动下，红七军的政治宣传工作十分出色。当年红七军的宣传标语从广西各

^①雷经天：《广西的苏维埃运动》，《广西党与苏维埃红军运动简史》（1954年8月）。

地到江西，至今仍多处可见，仅河池、平马两处宿营地旧址，就有近百条之多，宣传的广泛和深入，是红七军获得广大群众爱戴的原因之一。

红七军成立之后，前委决定加紧全军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政治思想教育的具体工作由军宣传科负责。许甦魂与军宣传科的同志一起，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一套符合红七军特点的政治教育方法，并逐渐形成制度：（一）他们在部队广泛地进行阶级教育，召开诉苦会、忆苦会、控诉会等，引导指战员认识地主阶级、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认识自己和亲属受剥削和压迫的原因，以此激发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二）他们组织全军开展政治理论教育活动，学习政治常识，党的方针政策，如六大通过的十大纲领，红七军目前的实施政纲，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的政策等等，使广大指战员明确红七军的性质、任务和作战的目的；（三）他们在部队中进行加强军纪的教育活动，派出宣传队教唱《红军纪律》，印发了军纪宣传提纲，教育红军战士“不拉夫不发洋财”，“不借端滋扰良民”，“不好淫掳掠”，“不强买强卖”^①。经常不断的政治教育，使红七军纪律严明，受到民众的爱戴。

许甦魂随红七军转战广西、贵州两省，开展政治宣传工作。一九三〇年初，部队进入贵州苗族区。许甦魂、余惠、袁任远等，陪同张云逸军长向苗族同胞进行宣传。在他们的耐心说服下，苗族同胞打开了寨门，让红军通过。进寨之后，许甦魂率领全体宣传员，深入各家各户宣传红军是劳动人民的队伍等等，给苗族同胞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① 《广西河池红军标语》第32、33页。

一九三〇年夏，由李立三“左”倾领导的党中央派邓岗到红七军，指示红七军主力部队离开右江根据地北上。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二日，红七军到达南丹县进行改编，全军编为十九、二十、二十一三个师。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兼十九师政委，李明瑞任总指挥，许甦魂任十九师政治部主任^①。十一月间，部队攻下全县，休整四天。由于红七军贯彻立三“左”倾错误，使红七军丢掉了右江根据地，而且减员很大，干部战士议论纷纷。前委作出决定，调许甦魂任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并决定部队在粤桂湘边界活动^②，与中央红军会师。

自此以后，许甦魂担负全军政治宣传、思想教育、组织建设的领导责任。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广大干部战士的思想波动很大。针对这一情况，许甦魂利用休整时间，向广大干部战士进行动员，说明红七军是一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利益打江山，决不能因为一些挫折和失败就对革命失去信心，革命的前途光明远大；红七军绝不会被敌人所消灭，而且会迅速发展，会扩大到十万、二十万、四十万……他鼓励大家坚持战斗，争取胜利^③。

红七军在张云逸、许卓和许甦魂的率领下，从全州向粤桂湘边界进军。在行军作战中，许甦魂派出得力的干部充实各部队的政工队伍，建立和健全党内的民主生活制度，提倡政治民主，官兵平等，实行民主集中制；建立和健全连以上的士兵委员会，广泛地开展官兵之间、士兵之间的谈心活动。解释红军

① 《红七军宣传员谢扶民日记》，1930年9月22日。

②③ 莫文骅：《红军第七军简史》，见《广西党与苏维埃红军运动简史》。

攻打桂林、柳州的错误和进军粤桂湘边的重要意义。经过教育，广大干部战士增强了革命的信心。

一九三一年一月五日，部队进入广东省连县。早上，他主持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了解战士们的思想情况，布置宣传的工作要点；下午，他带领军宣传队队长李干和宣传员谢扶民到连县教会，商议部队伤员的离队留医问题。经他们反复说服，连县教会同意收留红七军伤病员一百多人^①。

同年三月，红七军终于到达了湘赣根据地永新。这次“小长征”使红七军受到极大锻炼，部队由一九三〇年九月出发时的六千四百人减少到二千六百人。许甦魂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主持了红七军在艰苦斗争环境中的政治工作，使这支坚强的部队终于完成了到中央苏区汇合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中央红军的光荣任务^②。

同月，红七军在永新召开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许甦魂和张云逸、李明瑞、许卓等人被选为主席团常委。会上，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传达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清算了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总结了经验，选举了新的前委。许甦魂和李明瑞、许卓、叶季壮、袁仁远等被选为前委委员^③。

永新党代表会之后，红七军参加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许甦魂和李明瑞等一起，率领红七军向盘踞在安福的敌人发动进攻，在红二十军和湘赣边区独立一师的配合下，取得了“安福大捷”，消灭了敌军韩德勤的一个团，为保卫和发展湘赣边区

① 《红七军宣传员谢扶民日记》，《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19期。

② 《莫文骅给许甦生的信》（1984年10月10日）。

③ 袁仁远：《从百色到湘赣》，《星火燎原》1981年第6辑。

作出了贡献。

一九三一年六月，红七军前委奉命开到兴国县桥头镇与中央红军会师。从此，红七军编入红三军团，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许甦魂被任命为红三军团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张云逸任军团参谋长兼红七军军长。

一九三一年七月，红七军在李明瑞、张云逸和许甦魂率领下，投入第三次反围剿战斗。经过两个多月的苦战，红七军歼灭韩德勤一个师，取得了辉煌胜利。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七军奉命到江西于都县发动土地革命，帮助地方巩固和发展革命政权。正在这时，不幸的事件发生了。一九三一年九月，由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统治的中央，派人到红七军开展肃反运动，污蔑红七军中“没有无产阶级。只有军阀残余”，“七军的人没有一个是靠得住的。”^①红七军组成了秘密肃反委员会，团级以上的干部都受到审查和迫害。许甦魂和李明瑞等被打成“国民党改组派”，受到残酷迫害致死，对革命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党中央根据红七军干部、战士的强烈要求和充分的调查研究，为许甦魂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追认为烈士，并载入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合编的《军队烈士英名录》，以纪念他为中国革命事业所建立的历史功绩。张云逸高度评价许甦魂革命的一生说：“许甦魂是一位为中国革命英勇奋斗，对党对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的优秀共产党员。”^②

①莫文骅：《红军第七军简史》。

②《张云逸致许甦生函》（1965年2月27日）。

蔡升熙

杨树荣 袁新安 吴兴强
曾长秋 阮烁瑶

“蔡升熙同志是红十五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对鄂豫皖红军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具有战略家的胆识和气度，而且在历次战役战斗中机智果断，勇猛顽强，因而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很高的威望。在河口镇地区作战中，他身负重伤后躺在担架上仍指挥战斗，直至坚持到胜利，充分表现了一个杰出红军高级指挥员的责任感和无畏精神。”^①

(一)

蔡升熙，字旭初，乳名“润伢子”，湖南省醴陵县人，一九〇六年二月十二日生。参加革命后，因做党的地下工作，曾改名为申熙、申西、升喜、中西、正西、刘辑明等。

蔡升熙的家世，好几代都是贫苦农户，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祖父曾沿门乞讨，饥寒折磨，去世较早。父亲蔡志廉一辈子当佃农，受尽地主的重重剥削，全家过着“早上菜，中午汤，晚上稀粥照月亮”的穷困生活。

蔡升熙是家中长子，还有三个弟弟和四个妹妹。当他八岁

^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版。

多的时候，家中节衣缩食，供他上私塾。一年后，转到花麦冲附近的上屋里初级国民小学，改读新学。由于他聪明勤奋，两次跳级，只用两年时间完成了初小四年的学业。接着升入王仙区永龙庵高级小学，又两年毕业。这时，蔡升熙十三岁了。由于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难，父母要他停学谋生，以减少家庭的食口，便送他去学道士。

蔡升熙到了道士汤正生家，一见主人的阴沉面孔，不免打了个寒噤。主人没有教他学道士的行当，而是天天叫他放牛、喂猪，还经常挨打受骂。一天，他上山砍柴，脚板被野刺锥破，鲜血直流，柴比往日砍少了。回来后，汤道士大发脾气，骂他是无用“奴才”，是“懒畜牲”，用棍子把他打得皮开肉绽。他忍受不了这种折磨，跑回家去。父母抚摸着他身上的伤痕，十分难过，但想到家中经济困难，也希望他长大成人后能操道士职业养家糊口，只得忍痛地又把他送回了道士家^①。

打这之后，主人阴沉的面孔变得更可怕了，对他的折磨更多了。他被逼得无法，只得再次逃出道士家，钻进深山。由于在森林里辨不清东西南北，他整整转了一天，实在累极了，便倚在一棵大树旁睡着了。

父母得悉蔡升熙逃走的消息后，心急如焚，四出寻找，两天过去了，连他的人影也未见，以为是给老虎吃了，全家人都痛哭起来。直到第三天，他正在寻找野果充饥，才被村里上山砍柴的人发现，将他领回了家。

蔡升熙在家里住了一段时间，父母又送他去学“郎中”（中医）。没有多久，他又跑回了家。此后，就在家作

^①曾广澜：《忆升熙》（未刊稿），存中共醴陵县委党史办公室。

田。

蔡升熙在小学读书时，以成绩优异闻名乡里，很受当地教师和地方有识之士的称赞。他们都出来劝说蔡志廉继续送儿子上学。蔡志廉摇头叹气说：“谁叫他生在我家里，我是供不起呀。”蔡姓族里长者，为了改变蔡姓在当地宗族斗争中屡受天族欺凌的地位，想培养一个“为族争光”的后代。于是决定由蔡氏公堂负担蔡升熙的上学费用。就这样，他又得到继续上学的机会，考取了醴陵县立中学。

时值五四爱国运动发生后不久，湖南反帝反封建的浪潮此起彼伏，冲击着旧秩序。蔡升熙入中学后，常和同学参加校内外的社会活动，如抗议遵道会^①洋人的专横、禁用洋货、提倡国货，参加游行队伍，发传单、写标语，进行街头演说等等，他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痛快。这年寒假，他回到家乡，邀了邓文仪等几个同学，先后在附近的王仙镇、视头洲等地，焚烧了几家商店的日货。

一九二一年冬，李立三到安源开展工运工作。李立三是醴陵人，曾就学于县立中学，多次回醴陵向母校师生传播马克思主义。不久，安源路矿大罢工爆发，一万七千多工人怒吼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他们联合起来，经过坚韧不拔的斗争，迫使洋人资本家屈服，取得了罢工的胜利。安源同醴陵毗连，消息传到醴陵，激起了蔡升熙心中的兴奋浪花。他想：当今之世，决不能只是为了摆脱自家穷困生活而努力学习，更不能象族长期期望的那样成为一个宗族斗争的继承者，而应该象安源工人那样，敢于向旧世界宣战，与邪恶势力作斗争，

^①遵道会是当时美帝国主义在醴陵进行文化侵略的教会组织。

为天下的穷苦人做一番事业^①。

一九二三年，蔡升熙与同学陈觉、陈恭、左权、王亚文、肖石朋等，组织了社会问题研究社。他们订阅进步书刊，定期学习讨论，还主办《前进》周刊，宣传新思想，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罪行，在当时醴陵知识界颇有影响。

这年年底，广东政府大本营军政部开办陆军讲武学堂，秘密派人到湖南招生。蔡升熙与一些同学投笔从戎，一道报名应考。一九二四年春，他与左权、张际春、李隆光、叶或龙、邓文仪、李才震、何元准等八人，从岳阳乘轮船，经武汉到上海，然后由海路到达广州，于二月底进入讲武学堂学习。

一九二四年五月，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成立，讲武学堂奉命合并，蔡升熙亦随之编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第六队^②。他听周恩来、恽代英等共产党人讲课，很受启发；与陈赓、许继慎、王尔琢、蒋先云等同学交往甚密，思想进步很快。一九二四年秋，蔡升熙在黄埔军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党的教育领导下，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道路。

(二)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底，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蔡升熙在毕业前夕，参加了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的战斗；毕业后，被分配到黄埔军校教导团担任下级军官。

一九二五年二月，蔡升熙随教导团参加平定陈炯明叛乱的

^①访问黎琼初等记录，存中共醴陵县委党史办公室。

^②《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30页。

第一次东征，经历了夺淡水，攻平山，大战棉湖、河婆，占领兴宁、梅县等战役。六月，回师广州，参加了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战斗。七月初，黄埔教导团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蔡升熙被编在第一师任营长。十月，他参加了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惠州战役。

一九二六年“中山舰事件”后，蔡升熙退出第一军，调至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张发奎部任营长，七月，随部队参加北伐。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武汉政府的汪精卫集团，也发出了一系列反动训令，革命形势日趋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党指示蔡升熙离开部队，返回湖南农村，从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的工作。

离开武汉时，蔡升熙把弄到的三支短枪藏在一口小皮箱里，雇辆人力车出武昌城。到了城门口，被岗哨拦住要检查。他镇静地从车上站起来，指着哨兵的鼻子呵斥道：“对上级军官这样不礼貌！我是师部参谋，有急事出城，延误公事，你有几个脑袋？”哨兵懵了，连忙立正，目送他出城而去^①。

蔡升熙到衡阳，刚着手武装农民，长沙“马日事变”发生了。许克祥及湖南反动派发布“清乡”命令，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三湘四水，血雨纷飞全省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为了自卫，蔡升熙集合刚刚组织起来的农民自卫军，与叛军鏖战于衡阳、岳北之间，终因缺乏训练寡不敌众，队伍溃散。

六月，贺龙的独立第十五师扩编为第二十军。蔡升熙奉命赴武汉，到二十军第二师任团长。七月间，他随二十军向南昌集

^①曾广澜：《青春的颂歌》（未刊稿），存中共醴陵县委党史办公室。

中，准备参加党领导的武装起义。

八月一日凌晨二时，南昌起义的枪声打响了。不满二十一岁的蔡升熙，率部从驻地宏道中学出发，包围了设在顺直会馆的敌卫戍司令部，趁着夜幕展开攻击，迫使敌军缴械。

八月五日，起义军主动撤离南昌，南下广东，蔡升熙随军行动。下旬，起义军进至瑞金西南的会昌和赣粤两省的分水岭——筠门岭，受到敌黄绍竑、钱大钧部十几个团的阻击，双方展开激战。我军勇猛冲杀，前仆后继，终于将敌军打垮，攻克会昌。但是，筠门岭仍在敌军手中，我军不能由此入粤，便折入闽西长汀整顿。此时，蔡升熙调任叶挺部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参谋长。

九月中旬，起义部队翻越武夷山，沿闽粤边界继续南下，出敌不意地占领了广东境内的大埔、松口和三河坝地区，总指挥部决定留下一部分兵力在此驻守，蔡升熙则随主力继续向潮州、汕头前进。九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起义军占领潮、汕，再次分兵留守，只剩下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军的第一、二两师，共计不足六千人，向揭阳进发。经过两次分兵，致使起义军兵力单薄，于九月下旬和十月初，在汤坑、揭阳等地遇到敌人重兵的围攻，久战不克，遭到惨痛失败。蔡升熙左冲右突，杀出重围，但队伍已被打散，他只率少数几个人，辗转到了广州。不久，又参加广州起义。

蔡升熙到了广州，通过叶剑英的关系，与其他同志一道派到新编的警卫团工作，使警卫团基本上掌握在我们党的手里。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起义爆发。当天上午，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苏兆征为主席（苏时在上海，由张太

雷代理)，蔡升熙为广州市公安局局长①。

广州起义的枪声，震惊了反动派。国民党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战舰炮火掩护下，向广州疯狂反扑。蔡升熙和战友们虽经三天三夜的浴血奋战，终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起义失败了。

蔡升熙撤离广州后，潜入汕头一带，因人地生疏，离开组织，无法展开活动，急于想找到党中央，接受新的战斗任务。为了筹措路费，他又冒险返回广州，去见一个同乡同学，已担任国民党军队高级军官的邓文仪。邓文仪得知蔡升熙经济上有点困难，就拿出几十块钱，装出一副同情的腔调说：“你呀，就不该当共产党人。共产党破坏了国民革命，闹得自己都无法立脚，你还是趁早回头吧。”

蔡升熙一听，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马上义正词严地驳斥道：“共产党忠实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谋私，不篡权，当共产党人有什么不对？！是谁破坏了国民革命，自有公议。”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承你顾念旧交，慷慨解囊，但是，大丈夫不受‘嗟来之食’。”话语铿锵，掷地有声。他将几十块钱往桌上一甩，转身就走。走到门口，又猛回头指着邓文仪警告说：“如果你敢把我暗杀了，你的脑袋也要掉在广州街头！”转身扬长而去②。

这时，蔡升熙又想起了曾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共过事，此时已升任第四军副军长的薛岳，遂大胆地出现在薛岳面前。薛岳想以私人感情使他放弃革命斗争；见面后，便为他更衣、接

①曾广澜：《回忆蔡升熙》，《艰苦的历程》（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1页。

②曾广澜：《忆升熙》。

风，显得格外“亲热”。隔了一天，薛岳才说：“升熙，我知道你是个热血青年，有理想，有事业心。但现时是国民党当权，共产党成不了气候了。如果你不愿在国民党军队干的话，我可以资助你去日本留学。”^①

蔡升熙听了，本想痛斥一番，但一想到要得到资助去寻找党中央，便虚与委蛇。薛岳以为他已就范，很高兴地送给他几百块大洋做路费^②。蔡升熙得款后，当天就离开广州。

蔡升熙到了武汉，方知党中央自“八七”会议后已迁入上海。这时，湖北省委正在组织武汉三镇的旧历年关暴动，准备组织三个军，武昌、汉口、汉阳各一个军，他便参加暴动的招兵工作。原定腊月二十三晚“祭灶”放鞭炮时举行暴动，不料，先一天我党一个地下印刷厂被敌人破获，搜去全部暴动计划。敌人大肆搜捕，起义无法举行^③。蔡升熙便离开武汉赴上海。

一九二八年春，蔡升熙在上海找到了党中央，被分配在周恩来主持的党的军事委员会工作。

旧上海既是帝国主义在此建立了“国中之国”的租界，又是反动派统治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的中心。巡捕军警，举目皆是，特务包探，人妖难分。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必须胆大心细，随机应变，蔡升熙表现出他是一位机智灵活的无畏战士。

一次，蔡升熙在上海一家大饭店楼上的“雅座”主持党的

①②曾广澜：《忆升熙》。

③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第2页。

会议，一群国民党的稽查人员突然闯进来，要把他们带走。蔡升熙情急智生，想到国民党上海驻军有个熟人，便操着官腔说：“你们要干什么？我是驻沪党军参谋长，在这里商量要事，不要大水冲了龙王庙。”……

稽查人员将信将疑，伸手拿起桌上的话筒，查明果有其人，便放下话筒，满脸陪笑地说：“对不起！误会，误会。”连续点头退出。

同志们都为这突然的风险捏了一把冷汗。蔡升熙赶紧叫大家疏散。不多时，稽查人员伙同反动军警返了回来，却扑了个空^①。

还有一次，在上海一家大旅社的扶梯上，蔡升熙碰见黄埔军校的同学、国民党高级军官胡宗南。胡以为他是流落上海的，想动员他投身国民党。寒暄数语之后，见他衣著素旧，便从随身皮包里拿出两封银元，并嘱咐他快点搬到一块去住。蔡升熙也装出自己正处在徬徨无定、他乡遇故知的样子，欣然接受胡的“美意”，并煞有介事地问清住址，只说明回去收拾一下东西马上去找。二人分手后，蔡升熙迅速绕道回到机关，将银元交给组织。胡宗南却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位同学^②。

刘伯承在回忆中写道：“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与蔡升熙同志在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党的军事委员会之下工作。他给我的印象是：忠诚勇敢，工作认真。”^③对蔡升熙作了高度评价。

①②曾广澜：《青春的颂歌》。

③刘伯承：《纪念蔡升熙烈士》，《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

(三)

一九二八年，蔡升熙由党中央派到江西，任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同年十一月间，经党组织介绍，他与曾广澜^①在南昌结婚。

这时，南昌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异常激烈，开展地下活动，困难重重。蔡升熙凭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反动派的满腔仇恨，终于在艰难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扎下根，和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他不仅在城市发展地下党的力量，而且为扩大红军进行了有效的兵运工作。

一九二九年春，罗炳辉当上了吉安的靖卫大队长。七月，党派赵醒吾争取罗炳辉起义。随后，蔡升熙也以江西省委军事巡视员的身分，多次赴吉安找罗炳辉谈话，并与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一起，介绍罗炳辉入党。十月底，罗炳辉接江西省委密信，率领靖卫团一千余人在吉安起义，加入工农红军，组成江西红军独立第五团^②。

同年，军阀鲁涤平由湖南带了一批人到江西就任省政府主席，这给蔡升熙在南昌进行秘密工作增加了困难。此时，赣江两岸，鄱阳湖畔，武夷山麓，都燃烧起了武装暴动的烈火，鲁

^①曾广澜，红军干部，1934年1月被选为第二届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曾随红四方面军长征，西路军失败时被俘，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解放后，先后在中央组织部和太原市委工作。

1969年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为“叛徒”，迫害致死。

^②沈毅：《瞻睿思功——罗炳辉将军生平事略》，载《革命文物》1980年第4期。

涤平在蒋介石的严训下，疯狂地寻机破坏中共江西省委。他们侦知蔡升熙是军委书记，便千方百计地想抓到他，向蒋介石邀功请赏。于是，便在南昌街头张贴通缉令，并登报悬赏，赏金高达千元光洋。面对敌人的追捕，蔡升熙毫不畏惧。他依靠群众，同敌人斗智斗勇，多次巧妙地躲过搜捕，把敌人扰得不得安宁。敌人逮不着他，竟派特务到醴陵抓走了他的父亲，妄图迫使他屈服。

一天深夜，蔡升熙从外面开会回来，神态严肃，一言不发，低着头在房间来回踱步。妻子问他出了什么事，他沉痛而坚强地说：“敌人把我父亲抓去了。他们想用这种卑鄙手段来动摇我的革命意志，哼！简直是白日做梦！”曾广澜十分着急，要他赶快向党组织汇报，设法营救。他安慰妻子说：“广澜，不要着急，我的父亲了解我，我也了解我的父亲，为了革命，他老人家会忍受一切的，反动派的阴谋不会得逞的！”^①

由于蔡升熙的身分已经暴露，不宜再留南昌做地下工作，党改派他去东固革命根据地，担任游击队第一路总指挥。临行前，他将曾广澜身边珍藏的银首饰拿去换了二十多元钱，作为路费，告别即将临产的妻子，踏上了新的征程^②。

东固革命根据地，是一九二七年底创建起来的。它以东固圩为中心，纵横三十余里，四周崇山峻岭，层峦叠嶂，地势极为险要，且介于吉安、永丰、兴国三县之交，远离县城，反动统治力量较为薄弱，革命活动所及，影响周围数县。蔡升熙到东固后，很快建立了江西红军第二、三、四团，后来与罗炳辉的第

^{①②}曾广澜：《战斗的一生》（未刊稿），存红安县革命博物馆。

五团合编，成立了红六军（后改红三军）。这支部队有力地配合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当地群众有“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之说。

蔡升熙在东固革命根据地积极整顿地方部队，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为了配合湘赣边的反“围剿”，十一月间，他带领队伍西渡赣江，出其不意地打开了峡江县城。峡江县，东濒赣江，西接井冈，傍水依山，地势险要，是国民党军队进攻湘赣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基地。峡江被打开，红军游击队得到大量物资补充。敌人溃败后，重新组织力量疯狂反扑。蔡升熙在完成预定任务后，即迅速布置阻击火力，指挥队伍撤退。当他最后一个撤出阵地时，遇到一位身负重伤的战士。他不顾敌人正在背后追赶的危险，迅速地背起那位战士往前跑，直到摆脱了敌人，才精疲力竭地停下来喘了口气。当负伤的战士发现冒死把自己从火线上背下来的正是总指挥蔡升熙时，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①。

峡江战斗结束不久，蔡升熙接上级通知，去上海党中央开会。他与曾广澜化装成一对商人夫妻，从九江乘船到了上海。会后，留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工作。

（四）

一九三〇年六月，中央军委在武汉成立长江办事处。蔡升熙被调往武汉军委办事处和党的长江局军委工作。八月一日，中共中央长江局重新组成，书记是项英，组织部长是任弼

^①曾广澜：《青春的颂歌》。

时，秘书长是朱瑞，蔡升熙任军事部部长。那时，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之间军阀混战犹酣，为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扩大革命根据地，壮大红军力量，蔡升熙受命将长江局的军事工作移交给周以栗，自己赶赴鄂东南，指挥阳新、大冶和蕲（春）、黄（梅）、广（济）地区的武装斗争^①。

阳新、大冶是湘鄂赣区的组成部分。原先在大冶兵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红八军，一九三〇年夏，军长何长工率主力参加攻打长沙的战斗后未归。留下的部队在鄂东特委的领导下，组成红八军第四、五纵队，在陈奇、黄刚率领下，开赴蕲、黄、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蔡升熙来到阳新，要求组建新军，可是，因当时只剩有当地小游击队，鄂东特委经过研究，决定将阳新县沿江游击大队划归蔡升熙指挥。随后又请示党中央，决定将红八军四、五纵队也划归蔡升熙指挥，组建新军。并派柯庆施前往蕲、黄、广，向陈奇、黄刚传达中央关于成立红十五的决定。接着，蔡升熙率部队二百余人过长江与四、五纵队汇合^②。

蔡升熙和陈奇、黄刚一起，指挥这支汇合后的部队，从九月二十六日起，二十天内，打宿松、攻六村、战广济、下漕河、取英山，连战皆捷。十月十六日，在黄梅县考田山冲吴祥村，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正式成立^③，蔡升熙任军长，陈奇任政委，下辖第一、二两个团，有战斗员二千余人^④。

①柯庆施：《关于红十五军的组成情况》（1962年4月9日）。

②③陈康等四人：《红十五军和蔡申熙同志》，1985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

④见中国革命博物馆红军战斗序列表。

红十五军组建起来以后，在考田山冲进行了短期整训。蔡升熙和陈奇一道，迅速建立和健全了各级政治机关和党、团组织，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军事教育，并宣布废除肉刑，禁止打骂战士，使红十五军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有较大提高。

经过整训后的红十五军，展开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冒着滂沱大雨，再次攻打黄梅县城；夜袭蕲春重镇张家塆，打开敌人武器弹药库；奔袭桐梓河，歼灭夏斗寅部一个营；东进皖西，将前身为英蕲游击支队的独立一师第五团正式编入红十五军；攻入没有坚固设防的太湖县城，为部队补充了部分冬衣。然后回师黄梅考田山冲根据地休整^①。

十一月初，形势急剧变化。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中原大战以蒋介石集团的胜利而结束，国民党开始准备对苏区进行第一次反革命“围剿”。黄（梅）、广（济）处长江中游战略要地，红十五军在这里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被列为首先“拔除”的重点，并利用水陆交通之便，迅速向蕲黄广地区增兵。蔡升熙、陈奇等分析面临的形势，认为在战略上要继续坚持原地区以扼长江中游已很困难，加之红军战士十分艰苦，隆冬将届，尚无棉被背包。便决定率部队离开蕲黄广地区，北进与红一军会合，一则可得到一些物资补充，二则可以协同作战粉碎敌人的“围剿”。当红十五军向西北方向转战寻找红一军时，而红一军正按鄂豫皖特委计划向蕲黄广发展，跟红十五军会师。当时通讯条件差，两军行动路线错过，会合计划未能实现。红十五军到了豫皖边地区，决定打皖西重镇金家寨。由于情报失准，封锁消息不严，遭敌伏击，部队受到损

^①陈康等四人：《红十五军和蔡申熙同志》。

失，战士们产生消极情绪。部队转移到南溪，传达了中央关于红十五军与红一军合编为红四军的决定，集中力量，粉碎敌人“围剿”；并将蕲黄广地区划归鄂豫皖苏区。大家听了，战斗情绪又高涨起来。会后，部队向黄麻地区西进^①。

这时，蒋介石调集九个师约十万人的兵力，正从东西南北四面向鄂豫皖根据地猛扑，开始了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十二月初，敌军攻至鄂豫边中心区。许继慎、徐向前指挥的红一军，在皖西作战未归。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在刚到职不久的书记曾中生主持下，决定以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对付优势敌人：一面把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组织起来，在敌侧后展开袭击、骚扰敌军的战斗，使敌不敢冒进和分散“清剿”，迟滞敌人的步伐；一面调蔡升熙的红十五军袭击分散薄弱之敌。红十五军离开蕲、黄、广家乡，长途转战，来到黄麻地区时，人困马乏，仅有千多人枪，弹药十分缺少，平均每人子弹三发，时已寒冬，许多指战员身着单衣、脚穿草鞋。就在这种情况下，蔡升熙率领全军，以机动灵活的战术，紧密配合地方武装，避敌锋芒，攻其虚弱，打了不少胜仗，予敌军以重大杀伤。十二月十六日，红十五军一举攻入黄安城西之河口镇，因地方武装配合失时，未能全歼守敌。十二月下旬，敌人大举攻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黄安七里坪，红十五军在十倍于己的敌军面前，经过两昼夜的激烈阻击战，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掩护了鄂豫皖特委机关向东转移。这时，情况是十分困难的：敌人重兵进至根据地中心区，而红一军主力在皖西；敌人烧杀抢掠，使红十五军粮食供应发生困难。于是，有的主张将全军分散到各

^①陈赓等四人：《红十五军和蔡申熙同志》。

县打游击，以口就粮；有的主张部队不分散，打到别的根据地去。曾中生、蔡升熙、陈奇等，经过研究，否定了这两种意见，决定跳出包围圈，按党中央计划，与红一军会师。接着，加紧突围前动员，做细致的思想和组织工作。统一认识，组织突围。

一九三一年一月上旬，红十五军到了鄂东北的福田河，与红一军会师，两军在商城南部的长竹园合编为红四军。军长邝继勋，参谋长徐向前，下辖第十、十一两师，蔡升熙任第十师师长，许继慎任第十一师师长。临时特委对红四军的作战任务作了明确指示，决定以主力寻机包围根据地外围敌人的薄弱部分，调动增援之敌于运动中消灭它，另以一部配合地方武装，拔除敌人设在根据地内部的孤立据点，以打破敌人的反革命“围剿”。

一月下旬，红四军根据特委决定，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以红十师围攻麻城磨角楼据点，歼敌夏斗寅部一个营，缴枪数百支，从而调动了敌第十三师四个团的兵力前来救援，红十一师予以迎头痛击，敌死伤惨重，狼狈逃窜。接着，蔡升熙又率领红十师围攻光山县南部敌之重要据点新集，用坑道作业，爆破攻城。二月十日炸开围墙，指战员乘着弥漫的硝烟冲入寨内，全歼守敌千余名。新集攻克，打通了鄂豫边和商南根据地的路线，不久，新集便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中心。二月间，中共鄂豫皖特委和军委正式成立，蔡升熙任特委委员、军委副主席。

鉴于敌人的“围剿”尚未彻底打破，特委决定向敌人发动新的攻势，命红十一师向平汉线信阳至广水段出击，先后袭占李家寨和柳林车站。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急调花园、小河溪一

带的守敌岳维峻第三十四师向我反扑。三月上旬，岳维峻率部趾高气扬地进至孝感县的双桥镇。红十师、红十一师乘敌立足未稳，分别从五十里外奔袭双桥，先歼敌一个团，占领了外围阵地。岳维峻被红军的突然打击弄得晕头转向，摸不清红军的虚实，急调两个团与我争夺外围阵地。战斗从拂晓打到中午，双方形成对峙局面。待到敌人呈现疲乏态势，红四军前线指挥所立即命令预备队两个团从双桥镇的北面、东面出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镇内敌人的指挥机关，打瘫了敌人的指挥系统，并趁势发起总攻，穿插分割，打得敌人溃不成军，纷纷向南逃跑。战士们一鼓作气，勇猛地冲上去捕捉俘虏。狡猾的岳维峻使用“金蝉脱壳”计，叫士兵抬着空轿子欺骗红军，而本人则混在溃兵中逃跑。但没能骗过红军战士的眼睛，终于在双桥镇南面的罗家城被活捉了。

此役，蔡升熙在前沿阵地指挥战斗，被敌人机枪打中右臂，左腿也负了伤。但他咬牙忍痛，一面让人包扎，一面继续指挥，坚持到战斗胜利。后因伤势严重，医疗条件差，致使右臂残废。

（五）

蔡升熙负伤后，离开红十师治疗。四月间，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等从上海到达鄂豫皖苏区。五月，根据中央决定，撤销鄂豫皖特委，组成中央分局，蔡升熙是中央指定的分局委员之一，并担任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这时，他的伤势基本好转，要求工作，说：“我虽然手不能拿枪，脚还能走，口

还能讲，可以给我一点适当的工作！”^①组织上调他到刚改建的彭（湃）杨（殷）军政学校担任校长。六月二十九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成立了党的监察委员会，蔡升熙任主席。七月至九月，蔡升熙代理鄂豫皖分局军事委员会主席。

为了办好彭杨军政学校，培养革命急需的军政干部，蔡升熙常常彻夜不眠地钻研业务，仔细审订各种教育计划。他十分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并强调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训练必须结合实战要求的教学方针。教员不足，他亲自从国民党俘虏中挑选了一批下级军官充任，自己也经常给学员上课。他在彭杨军政学校主持了四期训练，为鄂豫皖苏区培养出大批军政干部，为学校赢得了根据地“干部的摇篮”^②的荣誉。

蔡升熙负过重伤，身体虚弱，组织上照顾他，每月给他发三十元生活费。他算了一下细帐，有十五元就够了，坚决退掉多余的钱。有一次，军委会给他送来一些战场上缴获滋养身体的补品，他派人全部送给了医院里的伤病员。在学校里，他的日常生活很简单，除了为恢复体质吃点生鸡蛋外，同事们吃什么，他也吃什么。他的秘书常说：“给蔡校长当秘书，真是再好不过了。他不但脾气好，生活上也克己奉公，艰苦朴素。他的津贴费全由我管！但给他吃什么，他从不过问。”^③

他的爱人曾广澜和小女孩蔡萍迹，一九三〇年秋与他在鄂东南分手后，一别经年，未通音信。后来，她们装成讨米要饭

①曾广澜：《战斗的一生》。

②曾广澜：《忆升熙》。

③曾广澜：《青春的颂歌》。

的，北渡长江，历经千辛万苦，找到彭杨学校。亲人相处，他总是先从政治上关心，帮助曾广澜锻炼得更加成熟，而很少去计较生活琐事。他非常喜欢自己的小女孩，但绝不对她溺爱。一九三二年旧历年关，学校决定给每个同志发两块银元过节。事务主任建议对他的小孩也照发，理由是“她是红军高级将领的小孩，我们学校也只有一个。”他坚决拒绝了这番“好意”。当时战争频繁，彭杨军政学校经常搬迁，曾广澜在情况紧急时，往往用很大的精力去保护萍迹，蔡升熙对此曾严肃地指出：“在革命斗争危急的时刻，应该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保护好他人。”^①

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后，曾一度得到蔡升熙的尊重和信任。但是，随着张国焘用所谓“整肃”排斥、打击许多好同志，逐步暴露野心家的面目时，蔡升熙对他推行“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进行了抵制。

一九三一年六月底，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张国焘借“彻底把过去一切工作上的错误和缺点揭露出来”^②，以反军阀土匪倾向和富农倾向以及立三路线残余为由，企图打倒曾中生、许继慎、邝继勋、余笃三等鄂豫皖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对此，蔡升熙鲜明地表示，如果说过去工作有错误或不能及早纠正的话，“他自己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③，并指出这些领导同志是经过长期革命锻炼的好同志，

①曾广澜：《忆升熙》。

②《张国焘在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总结》（1931年6月30日）。

③张国焘：《我的回忆》第六章。

是披荆斩棘开拓鄂豫皖根据地的功臣，是完全可以信赖的^①。在他的坚持下，张国焘只得暂时收敛排斥异己的企图，继续让这些同志担任要职。

七月上旬，鄂豫皖分局军委在商城西南余家集召开会议，讨论红四军的具体行动部署。不料张国焘推翻原来大多数人同意南下作战的决定，强行要红四军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攻安庆，威胁南京。显而易见，这是孤军远离根据地，深入白区攻打大城市的冒险主义计划。曾中山、徐向前、许继慎等四军领导人根据实际情况，在指挥部队的行动中没有执行张国焘的决定，而是率领红四军攻下英山后挥戈南下，横击浠水，回扫罗田、广济，威逼黄梅、武穴，与江南红军遥相呼应。这一行动消灭了大量敌人，缴获甚多，既解决了部队的物资补给问题，又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的斗争。可是，张国焘竟借口违抗中央分局决定，强令红四军北返，更公然诬蔑曾中生、许继慎等领导人是对六月分局扩大会议的“揭露错误倾向”不服，企图率军南下“渡过长江”脱离鄂豫皖苏区。张国焘这种“莫须有”的横加罪名，一度蒙蔽了后方工作的许多同志，蔡升熙也一时认为有必要纠正红四军的“错误”行为。但当张国焘、陈昌浩提出派他去接替曾中生的红四军政治委员职务时，一贯服从组织调遣的蔡升熙却以体力不逮而推辞，表明他对张国焘采取惩办主义的作法是不赞成的。

张国焘的到来，给鄂豫皖苏区罩上了“左”倾的阴霾。由于蔡升熙、曾中生、许继慎、徐向前、陈定侯、徐朋人等一大

^① 《蔡升熙烈士传略》，存红安县革命博物馆。

批党和军队的优秀干部的坚决抵制，才使得鄂豫皖根据地仍能在曲折中向前发展。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兵力达到三万余人。彭杨军政干部学校直属方面军总部，蔡升熙仍留校主持工作。

蔡升熙作为鄂豫皖苏区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在制定根据地大政方针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主张纠正红军中的军阀游击习气，改善领导方法，提高正规化程度，这些建议促进了鄂豫皖红军的建设。由于他德才兼备，深孚众望，连骄横自负、不可一世的张国焘也不得不承认，他“在战略见解上则往往有独到之处”，是“具有战略见解的人才”^①。

一九三二年春，蒋介石重新稳定了政局，积极准备向革命根据地发动新的反革命“围剿”。

四月间，我军已觉察将有更大规模的战争，便加紧扩充和部署红军的力量。那时，在皖西金家寨、苏家埠一带活动的红二十五军发展较快。为了提高该军的战斗力和素质，曾决定蔡升熙去兼任政治委员，因彭杨军政学校工作羁身，未能即时成行。七月，红二十五军遭到敌军徐庭瑶部的进攻，来电告急。中央分局急促蔡升熙赴皖西前线指挥。蔡升熙昼夜兼程赶到前线，以解红二十五军之危，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当他赶到霍丘时，红二十五军的守城部队一千多人在与敌血战五昼夜后，几乎全部损失，仅军长邝继勋及少数人脱险。邝继勋因此被撤职，蔡升熙接替红二十五军军长职务。

蔡升熙受任于危难之际，重整队伍，迅速投入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从八月下旬到九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和皖西地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六章。

方武装在他的指挥下，南起英山，北迄麻埠，与各路进犯敌军不断展开激战，阻击了敌人的进攻，予敌以重大杀伤，坚持到与红四军会合。

在紧张战斗的日子里，红军的一个严重困难就是粮食极度缺乏，常以野菜充饥。蔡升熙因负过重伤，加之连续指挥行军作战，极度疲劳，身体越发显得虚弱。一天，军部特务班的同志设法煮了一碗稀饭，端去给他吃。他拒绝说：“快拿回去，下次再不要这样做。大家都吃野菜，我也应该吃野菜，干吗要特殊对待呢？”

送饭的战士解释说，是为了照顾他有病的身体。他说：“我的身体很好，谁说我有病？要是为了照顾伤病员，那就把这碗稀饭送去给他们吃！”^①

战士说不服他，只好把稀饭端走了。

为了帮助部队渡过粮食难关，他还亲自上山寻找野菜，把经过自己尝试能吃的野菜向全军推荐。

那时，部队一面行军赶路，一面打仗阻敌，经常日夜得不到休息，有些人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一跤跌在地上也摔不醒。伤病员一天比一天多起来。蔡升熙瘦成个皮包骨，可那一双眼睛仍炯炯有神。行军途中，他经常不骑马，有说有笑地走在队伍中。战士们见军长总是那样的乐观，与自己同甘共苦，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一天，部队正在赶路，一个病号忽然倒在路旁，蔡升熙得知，立即赶来看望，忙叫警卫员牵来自己的战马，卸下驮的东西，亲自扶病号上马。

^①黄河清：《红二十五军军长蔡升熙》，《红旗飘飘》选编本第1集。

那个病号先是迷迷糊糊的，可是一定神，发现是军长，就喃喃地推辞：

“不行……不行，这是你的马……”

“不，这是革命的马，谁需要，谁就可以骑！”

“可是……你是首长，我是什么呀？”

“你是英雄！为革命流血流汗的英雄！”

“军长，我……我可以走。你的手脚都负过重伤的啊！”

“别说了，我命令你上马！”

他立刻叫警卫员抱病号上马，自己扛起背包，跛着脚和战士们一块走去。

“我的好军长啊，我这一辈子只要还有一口气，决不能给你丢脸！就请你放心吧！”病号伏在马上感动得眼泪滚滚下落^①。

(六)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调集三十余万兵力，另配四个航空队，开始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

敌军重兵压境，并不是不能打破的。只要战略指挥得当，完全有可能粉碎敌人的“围剿”。

可是，在反“围剿”开始时，张国焘散布蒋介石已是“偏师”，不堪一击，盲目轻敌，主张“坚决进攻的战略”，命令部队出击平汉线，“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和准备夺取武汉，完成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徐向前、蔡升熙坚决反对这

^①黄河清：《红二十五军军长蔡升熙》。

一错误的行动方针，建议停止进攻作战，主力积极进行反“围剿”的准备，以逸待劳。但张国焘仍坚持要“不停顿的进攻”，又错误地作出“围攻麻城，威逼武汉”的决定，继续要红军围攻敌占城市。红军以四个师的主力屯兵敌人坚固设防的麻城城下，久攻不克，与敌相持一个多月。结果是：一方面使得敌人完成收缩包围圈，向苏区腹地逼进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使敌陈继承、卫立煌两个纵队，于八月上旬直插我中心区域，向七里坪、黄安猛扑。这时，张国焘才被迫下令撤麻城之围，可是他又采取拚命堵击的方针，命令红军回师黄安，与敌死打硬拚，恶战于黄安城西的冯寿二和城北的七里坪。虽打垮敌人两个师，终未能扭转战局。九月一日，胡山寨战斗打响，红军经五天激战，歼敌两千，但仍不能退敌。九月九日，敌人占领新集。至此，张国焘倾全力堵击敌人的方针，宣告彻底破产。

九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向皖西转移，抵金家寨后，与红二十五军会合。两军会合后，旋又遭到“进剿”皖西之敌徐庭瑶纵队和尾追而来的陈继承、卫立煌两纵队的东西夹击。四方面军决定南下英山，寻机歼敌。走到燕子河，分局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针问题。会上争论激烈。一部分同志主张红军南下英山，以英山为立脚点，继而恢复根据地；敌如继续重兵压迫，则将红军主力暂时拉到外线，向潜山、太湖方向转移，伺机再打回根据地。另一部分同志则积极主张内线作战，将部队拉回黄麻地区。在红四方面军何去何从的事关大局问题上，蔡升熙慎重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红军内线作战，现时已无多少回旋余地，没有胜利指望，剩下的路只能是外线出击。他说，东出潜、太不如西出平汉路以西的应山、随县、枣阳一带有利，那一带有

党和红三军的活动基础，南靠桐柏山，地形条件也比较好。待将敌人引向白区寻机歼灭后，再返回苏区，收复失地^①。蔡升熙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九月底，四方面军由燕子河出发，计划下英山，过黄麻地区，越平汉路向西转移。为了保证军队、政府机关人员和随行农民群众的安全，蔡升熙率红二十五军在后面掩护。

十月八日，红军主力抵达黄安县河口镇地区，与胡宗南的第一师、俞济时的八十八师遭遇，敌军在死伤二千人后退到河口固守。九日下午，敌人又加派整编后的第二师，从东面配合夹击，战斗激烈展开。蔡升熙率领红二十五军在河口至冯寿二一带阻敌，指挥所设在仙人洞，与敌激战两昼夜，打退敌人多次冲锋，坚守了阵地。十日上午，部队三面被围，情况十分危急。蔡升熙在阵地上指挥部队与敌人打了整整半天，相持到中午。他已经一天一夜没吃饭了，战士们乘枪声停止的间隙，强拉苦劝地把他拉进工事，让他吃饭。刚端起饭碗，枪声又响了。他扔下饭碗就往指挥岗位上跑，命令主力向新阵地转移，自己则率领小分队阻击敌人。警卫员见敌人快扑到跟前，几次要求他退下火线。他坚定地说：“队伍还没全部撤到安全地带，我不能走！”^②就在这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射进了他的小肚。他咬着牙齿，捂住伤口，坚持指挥战斗，最后昏倒在地。警卫员将他抢救下来。他苏醒后，躺在担架上，仍不忘指挥战斗。

曾广澜得到军政委的通知赶到他身边，蔡升熙已经昏迷过

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

②曾广澜：《战斗的一生》。

去了。待他渐渐清醒过来，看到爱人泪流不止，便劝慰她说：“广澜！别难过，你……要永远跟党走，……坚持下去！”^①一阵剧痛，又使他昏迷过去。曾广澜心如刀搅，泪水刷刷地滴落在他的脸上。他再次醒了过来，艰难地伸出未受伤的左手，接着爱人的头挨近自己，象有许多话要说，但又痛昏过去^②。不久，徐向前来看望他，亲切地安慰他^③。曾中生来了，王树声来了，……他疼得不能说话，用深情而坚定的目光望望这些并肩战斗的战友，然后闭上了眼睛^④，时年不满二十七岁。

作者附记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除文中已注明出处者外，还有：

1. 《聂荣臻回忆录》第四、五章，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2. 肖克主编：《南昌起义》，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资料汇集》（未刊稿）。
4.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未刊稿）。
5. 《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6. 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
7. 章明：《活捉岳维峻》，《红旗飘飘》选编本之二。
8. 覃异之：《黄埔建军》，中国人民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9. 李奇中：《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战争》，中国人民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10. 黄绍竑：《阻击叶贺南征军的战争》，中国人民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四辑。
11. 《蔡升熙烈士传略》、《蔡升熙烈士简历》、《追悼蔡升熙烈士祭文》，存红安县革命博物馆。

①②④曾广澜：《青春的颂歌》。

③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

12. 访问烈士胞弟蔡升根、堂弟蔡升全、同学黎琼初等和中共株洲市、醴陵县、武汉市、阳新县、红安县等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的记录。

胡 梓

谢树森 李新福

胡梓，原名吴致民，号铁汉，在鄂东南工作期间，因他嘴上蓄着浓密的胡须，群众亲切地叫他“胡子”。以后，他就取其谐音，化名为胡梓。

胡梓是鄂东南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一九三四年在湖北通山县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

胡梓一九〇〇年二月五日出生在湖北黄梅县考田镇严家林一户富人之家；父亲吴亲仁，开屠铺为业，是镇上有名的小财主。

胡梓七岁入私塾，十七岁就读于武昌启黄中学。在这里，胡梓结识了恽代英、宛希俨、陈学渭、林育南等人，参加了由恽代英组织的“互助社”。他经常听恽代英的演讲，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受到了新思想的薰陶。

五四运动爆发后，武昌中华大学的学生在恽代英的领导下，首先奋起响应。启黄中学的学生，在胡梓的带领下，也积极地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演讲宣传，散布传单，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

一九二〇年二月，恽代英、林育南等人在“互助社”的基础上创办了“利群书社”，胡梓协助恽代英筹集“利群书社”的经费，销售各种新书报，新杂志，以传播进步思想。这年

冬，胡梓利用寒假之机回到黄梅，与邓雅声、熊映楚，李子芬等人，仿效“利群书社”，集资办了一个“书报流通处”（不久又改名为“醒民书社”），除公开出售一般书籍外，主要是秘密发行《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共产党》、《武汉星期评论》等进步书刊。并以“书报流通处”为阵地，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学习心得，检查自己的品行，谈论民族、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他们还直接与来“书报流通处”购买书的农村知识青年接触，向青年们推荐革命书刊，组织他们座谈读书体会，启发他们的觉悟。这件事在黄梅的农村知识青年中影响很大，使很多青年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九二一年九月，胡梓考取了南京的东南大学教育科体育系。因家乡的农业落后，农民极端贫困的生活情景，经常在他的脑际萦绕，使他无法安心体育专业的学习，遂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向学校提出要求，转到农科的农艺系学习。在东南大学，胡梓和在此学习的湖北同乡宛希俨，南京河海专科学校学习的谢定远、曹壮父等进步青年经常在一起阅读、研究马列著作，探索救国救民的途径，逐步消除他那体育救国、农业救国的思想，终于使他明白了只有民众觉悟，民众大联合，才是真正救国的力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一九二三年五月他和宛希俨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东南大学一面学习，一面从事党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工作。同年冬，胡梓和宛希俨一道回家乡度寒假，他们利用此机会，在家乡黄梅发起组织了，“平民教育促进会”“少年黄梅学会”“农民进德会”（后改为农协会），并筹建黄梅的党团组织。在他们具体指导下，中共黄梅县委于一九二四年五月成立了，县委成立时，尽管他们已离乡返校，为了不忘他们的功劳，县

委决定让他们担任了兼职的委员，经常用通信的形式以指导家乡的工作。黄梅的农运、青运工作从此蓬勃开展。

一九二四年三月当他从家乡返回南京时，根据南京地委的指示，决定宛希俨担任南京东南大学党支部书记，而决定胡梓参加南京地委的工作。从此，胡梓成为南京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当时党的南京地委机关，设在北门桥居安里二十号，胡梓经常和地委的其他领导成员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并通过交通员与南京市各级党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组织和指挥南京的斗争。

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胡梓和宛希俨等遵照党的指示，有组织、有计划地举行了孙中山逝世宣传周的活动。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揭露北洋军阀卖国求荣的丑恶面目，抨击了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反共罪行。接着，又领导东南大学的党团员，团结国民党左派和先进青年开展了驱逐郭炳文的斗争。郭系东南大学反动校长，他任意开除进步学生，压制民主，克扣学生的伙食津贴，因而引起公愤。通过斗争，迫使郭下台，这样，东南大学的革命力量进一步发展，成为当时南京革命运动的中心。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为了声援人民的正义斗争，胡梓和宛希俨等人组织南京的工人、学生、商人举行了罢工、罢课、罢市。胡梓带领一部分学生来到下关，成立了五卅惨案后援会下关办事处。他身穿工人服装，深入工人中间讲演五卅惨案的真情，鼓动工人起来罢工，他支持下关工人捣毁了英商开办的“和记洋行”，并将洋行的买办罗步洲抓起来，关在马车里，押到东南大学进行审判。向罗提出，要允许工人罢工；

承认“和记洋行”成立的工会；要发放工人工资，改善生活待遇等十三项条件，罗步洲一方面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另一方面他勾结江苏省警察厅长王桂林出动军警将东南大学包围，并当场打伤学生多人，将罗也抢走了。此事激起南京人民极大愤怒，连普通的交通警察也罢岗。由于全市人民的反对和罢工斗争的压力，王桂林被迫辞职。接着胡梓又带领百名东南大学的学生去组织宁沪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铁路一度被工人掌握，使铁路陷于瘫痪。他还率领千名工人和学生包围日本领事馆和孙传芳的“五省联防司令部”，要求惩凶、赔款、收回租界、撤走外国军警等，通过这些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鼓舞了南京各界人民斗争的信心。

一九二五年七月胡梓在东南大学毕业了，中共江苏省委任命他为南京地委代理书记，并通过关系将他留在学校当教员作掩护，继续从事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工作。在五卅运动的影响下，南京人民要求收回教育主权的呼声日益高涨。胡梓认为这是发动群众开展反帝斗争的好时机。一九二五年十月他和战友们在文化教育界发动了一场非基督教运动，成立了“非基督教大同盟”，创办了“非基旬刊”，指出帝国主义的某些传教士以传教为名，行文化侵略之实，用以欺骗和麻痹中国人民。一九二五年圣诞节，“非基督大同盟”在秀山公园（后改为中山公园）举行了群众大会，到会者有五千多人。会后举行反帝示威游行。

一九二六年六月，北洋军阀孙传芳，在南京疯狂的镇压学生运动，屠杀共产党人，指名要缉拿吴致民（胡梓），多次派出军警搜查东南大学的师生宿舍。胡梓在群众的掩护下，改名换姓，藏在鼓楼东南尖角营五号一个工人家里，指导学生运动

和工人运动，参与领导南京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党为了掩护他，也为了迎接革命军北上和加强党在湖北的工作，一九二六年八月胡梓被调到武汉，专门从事工人运动，担任了湖北省码头工人总工会秘书长。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正当北伐军渡江追击吴佩孚败兵时，停泊在长江中的英帝国主义军舰公然炮击北伐军。我党领导的汉阳兵工厂的工人和胡梓鼓动在英国码头做工的工人以及沿江各码头工人举行了大罢工，配合北伐军进攻，在大军压境和工人罢工的威胁下，码头工人还为北伐军准备了大批的渡江船只，英军舰被迫撤走，七日北伐军就渡江占领了汉阳和汉口，吴佩孚的残军往黄陂、孝感方面逃窜了。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至三日，武汉的工农、市民、为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军取得的胜利，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三日下午，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组成的一支宣传队，在英租界江汉关码头前面进行演讲，听众达千余人，大部分是码头工人，可是英国的水兵上岸干涉，他们荷枪实弹，冲入人群，乱杀无辜。制造了“一三血案”。英国水兵的残暴罪行，使人民群众悲愤异常。一月五日，李立三、刘少奇等组织四十万群众举行示威大会。胡梓带领码头工人冲入英租界、驱逐英巡捕。租界内的英国官兵纷纷逃到军舰上。汉口的码头工人和人民群众占领英租界。从此，武汉的英租界就被收回了。

“四一二”、“七一五”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国民党军阀部队突然袭击鄂东各县，使各县委机关，农民协会、妇女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共湖北省委将黄梅、蕲春、广济划为鄂东区的一个起义分区。胡梓以中共湖北省委特派员的身分，和周维邦、张获伯、汪玉堂、

潘月桂一起回到黄、蕲、广地区领导秋收起义。一九二七年八月底，胡梓等人到达鄂东后就提出了进一步恢复党组织，扩大宣传活动，积极准备实行武装起义。胡梓等人先后在黄梅的蔡山、濯港、孔垅、城关和广济的武穴、龙坪、郑公塔一带积极活动，很快地就恢复了黄梅县委和广济、蕲春的党组织。接着胡梓以他从武汉带去的两条半枪（共两条好长枪，一支打不响的驳壳枪故称半条）为“本钱”，先在黄梅建立一支农民自卫军，其他各县各区也建立了农民自卫队，经过一番准备，九月八日晚，胡梓等人首先率领黄梅农民举行了秋收暴动，数以千计的农民，手持梭镖、大刀、长矛等武器，打着灯笼火把，象潮水一样冲向县城，吓得敌人龟缩城内，不敢越雷池一步。同时，大河铺、蔡山、孔垅等地的农民也涌向土豪劣绅的庄院，一夜之间打土豪四十八处，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但因县城的敌人已有准备，胡梓考虑到，敌人的援兵也将至，县城久攻不克，便说服县委的同志停止攻城，将农民自卫军撤退到乡下，全面的开展“三杀四抗”的斗争，打击各地的反动民团。（三杀即：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四抗即：抗租、抗债、抗税、抗捐）通过这场斗争，动员了更多的群众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对反动势力给予了沉重的打击。一九二八年二月初，胡梓和黄梅县委再次组织农民武装攻打黄梅县城，但因敌我力量悬殊，加以准备不足，起义失败，桂系军阀加强了对人民的反扑，使当地党组织再次遭到严重的破坏。周维邦、张荻伯等人先后被捕牺牲。敌人到处贴布告，以五千银元的巨款悬赏捉拿胡梓。从此，黄、蕲、广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更加困难的时期，革命转入隐蔽的斗争。

一九二八年二月底，为了接受新的任务，迎接更艰巨的斗

争，胡梓奉命从黄梅回到武汉。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湖北省委曾派胡朝珠、方步舟^①等到阳新、大冶、通山工作，成立了阳大县委，找到了一批坚持地下活动的同志，发展了一批党员。不久，阳大县委遭破坏。方步舟、曹大俊和刘海山等重建了阳新县委。但因与省委失去了联系，再加上敌人反复“清乡”，活动十分困难。一九二八年初，胡梓根据省委的指示，以特派员身分，来到阳新，开始进行开辟鄂东南根据地的工作。

胡梓到阳新后，认真分析当时的形势，遵照省委的指示：把工作着重点放在积极发展党的组织，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农会，积蓄革命力量上。他带领县委成员深入到各区群众中去。胡梓则在曹家湾、中庄铺、沿埠头、石板桥和南山头等地进行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曾先后发展了曹树金、李秋成、程万里、黄达才等入党。“一九二八年三月，阳新单独成立县委，建立了龙山、金海、福寿、黄沙、木港、排市、龙港等区委。五月，大冶、通山也成立了县委。”^②随着党的组织秘密发展，武装斗争才又逐渐开展起来。

当时阳新县委只有三支枪和十几名游击队员；而敌人不仅有正规军，还有地主武装。胡梓认为敌强我弱，只能智斗，不能硬拚。他率领游击队，寻找战机，歼灭敌人，逐步壮大自己。

一九二八年八月，胡梓获悉金海镇四个里的土豪劣绅麇集

①方步舟，湖北省阳新县人，大革命时期入党，1937年3月投敌叛变，解放战争时期在浙江率部起义。

②《湘鄂赣苏区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

于大王店公所开会，筹款购买枪枝，便和阳新县委同志商量，率部发动突然袭击。当场活捉在公所开会的十几个土豪，缴获部分枪枝。首战告捷，群情振奋。不久，游击队又出奇制胜，消灭了小基铺民团，打垮了大王店的保卫团常练队，全歼白沙铺的地主武装。这时，阳新北乡已为我党控制。游击队便把活动推进到阳新南部，扩展到蒲圻、通城等县。

一九二九年二月，中央指示在阳新县委的基础上，成立大冶中心县委，由胡梓任书记。叶金波、徐宁甲、方步舟、刘海山等均是中心县委成员，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

大冶中心县委在领导群众“四抗”（抗租、抗债、抗捐、抗税）的同时，大力开展武装斗争。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晚，游击队和大冶、阳新、鄂城农民数千人，在胡梓、徐宁甲的率领下，猛攻大冶重镇刘仁八。经数小时激战，击毙敌首刘维敬，将敌武装全部解除。七月初，又攻克大冶保安镇，八月，在蒲圻车桥等地也取得了胜利。

随着游击战争的胜利发展，游击队也不断壮大，拥有队员数百，快枪近百枝。一九二九年九月，大冶中心县委，“将大冶、阳新等县的游击队集中起来，成立第十二军。”^①由中央派来的军事干部谢振亚具体指挥，以南山头为据点，不断袭击阳新、大冶等县的地主武装，给敌以沉重打击。后来，十二军主力与五纵队原二支队合编为第三支队，谢振亚任支队长，游雪程任党代表，成为湘鄂赣苏区的一支重要武装。

一九二九年九月，李灿、何长工根据彭德怀的指示，率领红五纵队向鄂东南挺进。经过十多天的艰苦行军，进入崇阳县

^① 《湘鄂赣苏区史稿》第50页。

境。第二天拂晓向崇阳县城发动突然袭击，歼敌一个连，打响了进入鄂东南的第一仗。部队在城内休整了三天，经四、五天的行军，抵达通山县的一个村子。当天下午，红五纵队召开了群众大会，公开亮出红军旗号，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

胡梓闻讯后十分振奋，立即召开大冶中心县委扩大会议。指令通山县委书记叶金波前去迎接，并具体研究了如何协助五纵队开辟鄂东南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等问题。

会后，叶金波赶回通山，向五纵队介绍了鄂东南地区的一些情况，建议五纵队选择黄沙镇作为落脚点。黄沙地势险要，土地肥沃，并建立了革命政权和农会、赤卫队等群众组织。部队到达黄沙后，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关怀。当时，五纵的战士还穿着五月间在井冈山发的单衣，胡梓得知后，立即动员和组织裁缝和妇女为部队赶制棉衣。经过一个星期的突击，五纵一千多人的队伍全换上了冬装。革命友谊温暖着战士的心。战士们严格遵守部队纪律，积极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帮助群众挑水打柴，军民关系十分密切。大批工农青年要求参加红军。

为了更好地配合地方党推进鄂东南地区的革命运动，一九二九年十月中旬，五纵党委和大冶中心县委在通山的黄沙镇召开联席会议。胡梓和大冶、阳新、通城、通山、崇阳、咸宁等县委负责人都到会。会议确定：鄂东南地区的中心任务是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消灭当地的反动武装，扩大红军主力，发展地方武装，迅速造成鄂东南地区工农武装割据局面。

会后，大冶中心县委和五纵党委，根据黄沙会议的决议，向敌占城镇进行两次大规模的游击活动，取得了横扫通山、大冶、阳新三县反动势力的胜利。

十月底，五纵从黄沙出发，在一千多农民武装的配合下，

攻打通山县城。当时，该城只有夏斗寅部一个营。经三小时激战，城门被炮火轰开，敌伤亡惨重。残敌开西门向咸宁方向逃窜，又遭我军伏击，除当场被消灭的部分外，还有百余人被活捉。十一月初，我军胜利返回黄沙镇。大冶中心县委动员一批工农积极分子参加红军，五纵队的力量更加增强。接着，我军出击阳新龙港镇和龙港洞下两个据点，打死民团七、八十人，又攻下阳新的排市，全歼花潭吴民团，活捉民团团团长吴汉卿。

十一月下旬，五纵队开始了进攻大冶的战斗。大冶城内有常练队百余人，他们自恃地形险要，顽守拒降。我军事先开进城郊树林中隐蔽，黄昏时发起攻击，爬城队迅速用活动云梯登上城楼，敌措手不及，被迫缴械投降。我军乘胜出击，又先后消灭了大冶刘仁八、阳新白沙铺、小箕铺、三溪口等十几个集镇的常练队，全歼驻阳新城守敌范石生部两个营，攻占了阳新县城。

鄂东南革命斗争的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惊恐，忙派独立十五旅唐云山部到大冶、阳新等县进攻红军。

十二月十四日，五纵队又配合敌独立十五旅中的共产党组织，发动了大冶兵暴，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五纵发展到六千多人。十二月下旬，纵队党委与大冶中心县委在刘仁八召开联席会议，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决心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巩固和扩大鄂东南革命根据地。

随着武装斗争的胜利发展，各县、区、乡纷纷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和农民协会、妇女会等群众团体。通山、阳新、大冶等县还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

一九三〇年六月，在阳新县排市召开了全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阳新县苏维埃政府。刘怀玉为主席，机关

设在大风区郭家冲。七月，根据湖北省委指示，撤销大冶中心县委，成立鄂东特委，以后，又改为鄂东南特委、道委。均由胡梓任书记。八月，成立了鄂东南革命委员会。由曹玉阶任主席，机关设在阳新县太子庙，后又迁至三溪口、龙港镇。与此同时，大冶、通山、通城、咸宁、崇阳、蒲圻和鄂城等县也成立了县苏维埃。整个鄂东南苏区已扩大到方圆数百里，人口数百万。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九日，国民党武汉行营代主任何成濬令二十六师郭汝栋部进攻阳新北部根据地。同时，令驻汉航空第一队派飞机轰炸黄颡口一带，又令海军鱼雷司令派军舰于江面上堵击。十一日，敌又增派四十四师肖之楚部两个团由黄冈的团风向黄颡口进犯。敌军对当时鄂东南之中心，特委所在地阳新太子庙一带形成了包围圈，形势十分危急。

这时，以胡梓为首的鄂东特委，立即深入发动群众，积极准备粉碎敌人的围攻。胡梓鉴于当时我方只有一个警卫连（一九三〇年六月，五纵扩编为红八军，不久，主力南下，留下少量部队在鄂东南坚持武装斗争），各县虽有一些游击队，但武器不好，众寡悬殊，同敌人硬打硬拚是不行的。为了保存实力，待机歼敌，我警卫连等革命武装保护驻太子庙的党政军机关和革命群众，主动向南撤至三溪口等地。敌人先后占领了太子庙、太小牙山、大王店等地。

在三溪口鄂东特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以警卫连为基础，把阳新、通山、大冶等县的部分游击队和赤卫队集中起来，建立红七团，由红三军团留下的军事干部刘振山任团长。在战术上采取“撒开两手，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其一路”的作战原则，布置了著名的沿埠头战斗。

郭汝栋攻占阳新的太子庙后，率部向南尾追，又占领三溪口、沿埠头等地，一直深入到阳新南部的龙港外围。一九三一年一月，敌五十四师郝梦麟部一六一旅，也由赣北向龙港进攻，郭汝栋部刘公笃旅以该旅第五团留在沿埠头为后防，刘亲率二、三、四团南下夹攻，又侵占了阳新之木石港、龙港及通山的燕厦等地，形成了对我军的包围形势。但是，敌人深入苏区内地，占地甚广，只好分兵把守，从而暴露了战线长、兵力分散的弱点。于是我军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地打击一路的办法，以增援而来的红十六军一部和当地赤卫队共同阻击南来之郝梦麟部，并在龙港一带牵制敌人的主力，而以红七团为主，配合大批地方武装，于一月三十日夜，乘朦朦月色，悄悄从龙港附近隐蔽出发，直趋沿埠头，以袭击敌军后防第五团。天色刚亮，我军进至沿埠头街口，立即发动猛攻。敌军见伏击圈四周红旗招展，号角齐鸣，惊慌失措，纷纷溃逃。战斗仅两小时，全歼敌军第五团，击毙团长袁帮铃，击伤副旅长一名，生擒民团团长余召台，缴枪二百支，俘敌三百余人^①。刘公笃见后防被毁，慌忙率部北撤，我赤卫队乘胜反击，红七团又从侧翼猛攻，取得了重大胜利。“敌受这个打击后，恐慌异常，占据龙（港）燕（厦）三日即行退出。”^②敌对鄂东南苏区的第一次围攻遂宣告破产，我军班师龙港。

沿埠头战斗后，红七团缴获大量装备，又补充了大批战士（包括工农群众和部分俘虏士兵）便新建了红八团、红九团。一九三一年二月，在龙港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全师约两千余人，长短枪一千余支。师长郭子明，政委叶金波。

^{①②} 《鄂东特委来信》（1931年2月12日）。

一九三一年，国民党反动派连续向中央苏区和各个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三次反革命围攻。红三师在特委的直接领导下，与红十六军（湘鄂赣边特区委领导的主力部队），密切配合，迎击敌人。

五月四日，郭汝栋部发动了对阳新苏区三溪口的进犯。当时，敌人在鄂东南地区兵力的分布是：郭汝栋师四个团驻阳新，两个团驻大冶；谢彬师一个团驻通山；谭道源师一个团驻武宁，一个营驻瑞昌；十四师一个团驻咸宁高桥。郭汝栋奉令从上述各处抽调兵力向三溪口集中。三溪口被围，形势危急。鄂东南特委（一九三一年初，中央指示调整苏区党的组织，鄂东特委改名为鄂东南特委）在胡梓的领导下，立即作了军事部署：红三师的一部分和地方武装相配合，与敌作战；另一部分红军分散到刚被敌军占领的阳新金龙区、福丰区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同时，由红三师派一个营到修水与红十六军联系，以便两军互相联系，协同作战。在我军和赤卫队的有力打击下，围攻三溪口的敌人，除郭汝栋部仍不断向阳新苏区骚扰外，其余均纷纷溃退^①，苏区大部分被收复。

五月底，中央苏区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湘鄂赣边区特委立即抓住这一有利形势，令红十六军和红三师紧密配合，发起了通山和官埠桥、马桥战役。

六月，首战通山，歼敌一千六百多人，缴枪一千六百多支。接着，乘胜前进，击败咸宁、官埠桥、马桥守敌，缴获步枪三百余支，子弹两万余发，俘敌官兵三百余人。七月中旬，红三师和红十六军主力，于木石港、吉山一带诱敌深入，在玉

① 《鄂东特委来信》（1931年5月12日）。

岭山将敌包围，全歼敌二十六师一个团，粉碎了敌对鄂东南苏区的第三次围攻。红三师扩大到四千多人。以龙港为中心的鄂东南根据地发展到北临长江，西抵粤汉路，东南与湘东、赣西北苏区连成一片。

七月，湘鄂赣区委在浏阳东门楚东山召开了湘鄂赣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大会选举李宗白、赖汝樵、胡梓、孔荷宠、刘建中等为省委委员，李宗白任书记，正式成立了中央湘鄂赣省委，属苏区中央局领导^①。

八月，鄂东南特委在龙港召开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因胡梓调到省委工作（任省委委员、省苏维埃政府卫生部部长），由方步舟任特委书记，委员有刘海山、王应田、叶金波、吴干等。

一九三二年春，成立湘鄂赣省军区，红十六军归省军区指挥。为增强主力红军的力量，将红三师编入红十六军。

红三师编入红十六军后，为了加强鄂东南地方武装力量，鄂东南革委会决定将地方游击队扩编成警卫团，下辖四个营，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到一九三二年四月，红军扩大三倍以上，约三、四千人；警卫团和地方武装扩大一倍以上^②。鄂东南道委（一九三二年初，特委改称道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将警卫团改编为新的红军独立第三师。五月八日，新红三师在龙港正式成立，由张涛任师长，叶金波任政委。

正当鄂东南苏区蓬勃发展的时候，国民党武汉行营集中二十九个团的兵力，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向鄂东南根据地的政治

① 《湘鄂赣苏区史稿》第136页。

② 《中共鄂东南道委扩大会议决议案》（1932年4月）。

中心——龙港大举进攻。由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再加上“左”倾路线的干扰，我军损失严重，被迫向燕厦、高山一带撤退。敌军于十月四日占领龙港^①。一九三三年初，燕厦、扬林铺、沙子田等地相继失陷，道委机关迁至兰田、黄沙一带。

一九三三年十月，省委决定胡梓重返鄂东南苏区，兼任道委书记。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反革命“围剿”，进攻鄂东南苏区的敌人也增加了兵力。情况十分危急。十一月，道委在通山石门召开了扩大会议。大会由胡梓主持。出席会议的有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一百多人。会议总结了前几次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布置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工作。胡梓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他指出：鄂东南苏区的任务，是牵制敌人，打击和骚扰敌人，以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我们要加强对群众的组织教育，正确执行肃反政策，团结一致，为恢复失陷的苏区而斗争。

一九三四年春，红三师和红十六军主力，在赤卫队配合下，首先攻下何子恕、胡田畈、最后集中兵力合攻下木石港。经过激战，歼敌八百多人，获枪千余支。

木石港战斗，是我军在反“围剿”斗争中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但当时红三师的领导人，却在胜利的欢呼声中，产生麻痹轻敌思想：他们竟在攻克木石港后，命令部队连续休息七天，给敌以喘息之机。随即敌人调集新七旅、新四旅、二十九师等部，向我进攻，并在紫荆山附近设下伏击阵地。我军仓促应战，中了敌人伏击，兵力损失三分之二以上。红三师的失利，使我军在优势敌人面前相继后撤，鄂东南苏区大都失陷，革命

^①1932年10月14日《武汉日报》。

转入低潮。道委也由黄沙、兰田一带转移到通山南部的冷水坪。敌人层层封锁，日夜搜剿，环境十分险恶。胡梓和道委的同志，以野果、野菜充饥。为了克服困难，胡梓带领红一连战士和二百多名红军家属开荒生产。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劳动，终于克服了困难，贫穷、荒凉、寂静的冷水坪，又开始沸腾起来。但就在这时，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件发生了。

一九三四年寒冬的一个深夜，二百多名敌军，利用叛徒和地主武装，冒充我游击队，混过岗哨，向道委机关进攻。枪声划破了寒冷的夜空，胡梓从床上一跃而起，率领十几名战士，抢占了一个制高点，把敌人压在村外，掩护机关干部和群众转移。在战斗中，胡梓不幸中弹牺牲。时年三十四岁。第二天，红军主力打回冷水坪，消灭了全部敌人。党政军民数百人，怀着深深的敬意和无限悲痛的心情，为胡梓和其他烈士举行了追悼会。为了纪念胡梓的光辉业绩，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决定，划出修武崇通苏区的一部分建立一个县，命名为胡梓县。

作者附记：

本文资料来源除注明出处者外，还参考了《鄂东南斗争史》和访问何长工、吴光治、方步舟等的记录编写而成。

廖恩波

张模超

廖恩波是四川早期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曾任全川学联执行部主任，四川省委组织部长，领导过著名的自流井工人大罢工，一九三五年在中央根据地突围中被俘，与刘伯坚等同志一起英勇就义。

(一)

廖恩波，又名承永，字恩波，化名时民（世民），昔昆（昔崑、锡坤、坤），一九〇一年生于四川内江裨木里（镇）元山子^①。父亲廖振奎，是清末秀才，私塾先生，在恩波幼年时，便因病离开了人世。母亲曾氏，知书达礼，为人善良，在丈夫去世后不久，便带着恩波和他的姐姐离开元山子回到白马庙娘家孀居。依靠娘家的房租和婆家的佃租为生。

廖恩波在白马庙度过了他的童年。由于年幼丧父，母亲特别疼爱，并把一生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廖恩波六、七岁时，就被送去白马庙私塾念书。后来，又转到离家三十华里的内江县城，就读于南街小学堂。一九一七年，廖恩波小学毕业，考

^① 《廖氏家谱》。

入内江县立中学。他爱好算术，渴求新知识。每逢周末，还喜欢和同学一起，摆谈古代英雄人物的故事。议论灾难深重的祖国和社会的不平。他为人耿直，性格倔强，有反抗精神。对当时学校陈腐不堪的教学内容和规章制度常表不满。

一九一九年，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内江，青年学生极为振奋。加之这年暑假在外地读书的内江籍学生返回家乡，带回一些五四运动的刊物，在部分青年中传阅，使沉静的内江城开始沸腾起来。廖恩波积极的参加了内江的学生爱国运动。他和同学们一起组织了“日货检查队”，在街头巷尾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劝告店主“商人要知亡国恨”，对那些只知受利，不知爱国，存放日货最多的一些商号，进行警告、痛斥，将检查出来的日货用木棍砸烂。由于廖恩波表现特别积极，在内江县学生联合会成立时，廖恩波被推选为“学联会”的负责人之一^①。

“学联会”成立后，针对当时内江的教育受到封建学阀的把持和军阀割据势力的摧残，决定发动一场争取学生自治的斗争。那时，有一些奸商，由于受到内江县立中学抵制日货的打击，怀恨在心，勾结内江县立中学的校长古德钦（绰号叫古罗汉），妄图对学生严加“管教”，把学生束缚在课堂上。这件事引起了大多数同学的不满，他们在廖恩波的带领下，去找校长说理，反对学监制和校长的专横，要求实行学生自治。学生的合理要求，遭到了校长的训斥和拒绝。同学们极为气愤，廖恩波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挺身而出，带领同学们举行了罢课。罢课浪潮迅速波及内江各校。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对

^① 《余农治档案》（1953年8月）。

此，古德钦恼羞成怒，竟暗中勾结县衙当局，指控廖恩波“带头闹事”，是“当今的余孽”，“品行不端”，违反了“校规”，强行挂牌将廖恩波开除学籍。对于这种卑劣的行径，廖恩波将挂在校门口的开除布告牌打碎，丢进了粪坑，以示抗议^①。同学们对学校的这一处理，也纷纷表示不满和反对。学校当局见众怒难犯，怕激起更大的风波，被迫同意发给廖恩波转学证书^②。这件事，刺激了青年时代廖恩波的心灵，深深地埋下了仇恨旧社会的种子。随后，忿然离校。

廖恩波被强令转学后，离开家乡，到达成都，在内江旅省同乡会的帮助下，转入资属中学插班读书。中学毕业后，一九二二年夏，考入四川省立工业专门学校机械专业学习。

当时，成都人物荟萃，新文化，新思想广泛传播。廖恩波到成都后，先后认识了王右木、吴玉章、杨闇公等四川早期的一批革命家，在他们的教育和影响之下，思想进步很快。这段时间，他一面学习，一面积极从事校内外的各种政治活动。

那时，四川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高师学监王右木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成都组织了部分青年、学生、工人、记者，成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经常秘密集会，进行革命的政治宣传。廖恩波和一些进步青年积极参加了读书会的活动。开始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读书会中，他听了王右木讲的《唯物史观》、《资本论》、《社会主义精髓》等，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等著作，视野大为开阔。与此同时，廖恩波还和学校中的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在一

^①访余农治谈话记录（1982年3月13日）。

^②张星石：《回忆廖恩波烈士》（1982年6月）。

起，也组织了一个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后来，杨尚昆在回忆中写道：那时“我在成都高师附中读书时，闾公四哥就曾介绍我同廖恩波相识，参加他们所组织的读书会。当时读的书，如《欧洲社会思想史》等，虽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著作，但读书会会员从这些书里已经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初步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①廖恩波组织读书会会员们一面学习革命理论，一面畅谈时局、研究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校内外广泛传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九二二年，廖恩波在成都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四川早期的一批团员之一^②。

此后，廖恩波为了向家乡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以扩大革命的影响，便利用回家度寒、暑假的机会，仿效成都读书会的形式，与黎灌英、谢独开、廖释惑等进步青年一道，在内江城里的太平巷杨家祠堂内秘密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他们邀约了一批社会青年和内江县立中学的学生，一起阅读《向导》、《中国青年》和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等^③。会员们还利用星期日在一起聚会，畅谈读书体会，探讨、辩论一些社会问题。发生争论时，廖恩波总是认真地倾听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发表自己的见解。为了尽量把问题说得透彻、明白，他总是不断地比划手势，使读书会的讨论显得十分生动活泼。廖恩波还常常教育会员们，要热爱祖国，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勉励大家。此外，会员们还结合内江的社会实际，组织演

①杨尚昆：《回忆闾公四哥》，载《重庆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2卷。

②《死难烈士英名录》，1945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编印。

③黎守忠：《内江地下党活动概况》（1959年1月18日）。

讲队，到大街上去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以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唤起社会民众的觉悟。

同时，廖恩波又根据成都团组织的决定，除广泛联系群众，发展读书会的会员外，还及时地将读书会的优秀会员吸收到社会主义青年团里，并组成了内江县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为内江的革命活动培养了干部力量，从思想上、组织上为后来的内江地下党组织的创建奠定了根基。

一九二四年，廖恩波为团结更多的青年同学进行社会活动，便联络在成都读书的内江籍学生，发起组织了“内江旅省同学会”，廖恩波被推选为会长^①。“内江旅省同学会”成立后，为了揭露控诉当时内江的封建反动势力对人民的摧残，以传播革命的火种，特地创办了油印刊物《不平鸣》。廖恩波为刊物写了《发刊词》。《发刊词》结尾写道：“当今野草丛生，谁是锋利的剪草机呢？！”^②文章用反问的笔调，把矛头指向内江的“三九”。（县团练局局长马祥九、商会会长林基九、浮桥经费收支所所长范承九。因这三人名字后面代一个“九”字，故称为“三九”。）“三九”互相勾结，贪污田粮，鱼肉乡民，称霸地方，早已为内江各阶层人民深恶痛绝。

《不平鸣》刊物上公开揭露“三九”的罪行后，激起了内江人民的斗争热情。在黎灌英和谢独开等人领导下，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三九”的公民大会。反动当局在民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将“三九”关押起来，以息民愤。

廖恩波在校内外进行革命活动的卓越组织才能和显著成

①赖图南：《廖恩波烈士生前革命史之一》（未刊稿）。

②访问高伯华、高允斌谈话记录（1982年3月18日）。

就，逐渐引起了成都学生界的注意和敬慕。他先后被推选为四川省立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和全川学生联合会的执行部主任，成为领导全川学生运动的杰出人物之一^①。从此之后，他奔走各校，不辞劳苦，为领导全川的学生运动更加努力地工作。

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反帝的怒吼声遍及全国。当时在成都，民众异常激昂，他们在团组织的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掀起了一场席卷成都地区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为了执行党中央关于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工农商学兵一起行动，经过廖恩波等人的奔走联系，六月十七日，在学道街工专校内召开了二十五校学生代表紧急会议，商议了声援上海人民进行斗争的问题^②。接着，成都各界一百多个团体的代表约一千人，在川北会馆正式成立了“上海英日惨杀华人案成都国民外交后援会”。廖恩波在会上，报告了上海“五卅”惨案的经过情况。他的报告，感情奔放，极大地激发了代表们的反帝爱国热情。会议还研究决定成立总务、文书、庶务、宣传、交际五部来做“后援会”的具体工作，由总务部统筹一切。廖恩波任总务部主任^③。

六月二十日，“后援会”召开了各部紧急联系会议，决定次日举行全市国民大会，进行示威游行。同时决定，国民大会由总务部主任廖恩波担任会务主席，童子军总司令谢晓轩担任

① 《廖恩波档案》（第1276号）。

② 《全川学生联合会之紧急会议》，载1925年6月23日重庆《商务日报》。

③ 《成都外交后援会之组织》，载1925年6月22日重庆《商务日报》。

会务总指挥^①。

六月二十一日（星期日）黎明，成都市区各商店均停止营业，悬旗致哀，全城罢市。各群众团体达万余人，手持小旗和各种标语，齐集西较场旧皇城会场，隆重举行国民大会。廖恩波等“后援会”的各部负责人，为了召开好这次大会，忙碌了一个通宵。次日晨，廖恩波提前到会，在主席台上指挥各群众团体进入会场。上午十一时，他宣布大会开始；接着由宣传、文书、庶务等部主任发表讲演，与会群众无不义愤填膺。最后，廖恩波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代表“后援会”向大会提出了四项议案：“一，请政府照吾人目的向日英严重交涉，立刻释放被拘华人，赔偿死者命债及受伤医药费，惩办英日肇事官及凶手，英日政府向我道歉；二，凡英日在华所雇佣之中国人，一律退职；三，与英日经济绝交；四，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打倒帝国主义。”^②廖恩波宣读完毕，万众高呼，一致赞成。顿时，悲壮激昂的战斗气氛，使整个会场变成了一片愤怒的海洋。接着，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游行。廖恩波等负责人，率领游行队伍，沿途高呼口号、散发传单。会后，又到处奔走，积极组织宣传队、募捐队，帮助各群众团体加强联系，扩大组织，为推动以后成都地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出了艰苦的努力。

（二）

一九二六年初，廖恩波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

^{①②}《成都全民之大游行》，载1925年6月29日重庆《商务日报》。

员^①。从此，在党的领导之下，廖恩波更加忘我的工作 and 艰苦的战斗，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

同年夏，廖恩波在四川省立工业专门学校毕业，被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即四川省委）派往川南自流井。协助刘远翔（重庆地委工运委员）在盐场工人中开展工作。廖恩波肩负着党的重任，满怀革命热情来到这个古老而又富饶的盐都。他和刘远翔一起，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工作，建立起了中共自流井特别支部。刘远翔任特支书记，廖恩波负责组织工作。

自流井特支工作的重点是盐工运动。然而，当时自流井的神会制度特别浓重，加之，受反动派的利用，这里的工贼常常勾结绅士、军阀，倚官仗势，剥削工人，破坏真正的工人组织，给党在自流井开展工人运动带来了困难。面对这种复杂的环境，廖恩波没有畏惧，他觉得这是对自己进行考验和磨练的好机会。为了便于发动和组织盐工，他常常是一身盐工打扮，顶风冒雨，风尘仆仆地奔走于釜溪河畔的东、西盐场，出没在盐工喝茶的茶棚或居住的茅寮之中，与他们交朋友，促膝谈心。起初，只是随便拉拉家常，问寒问暖，了解盐工的切身痛苦和要求；等盐工们和他熟悉后，他才逐渐向盐工们讲述盐场的不合理制度，宣传盐工们为什么穷，老板为什么富的道理，启发工人对盐场资本家的仇恨。廖恩波每讲到盐场老板如何剥削压榨工人的凄惨情景时，总是特别激动，拍案怒骂吃人的资本家，对盐工们影响很深，大大激发了盐工们憋在心里的满腔怒火，为后来盐场工人运动的开展作了思想准备。

^① 《廖恩波自述》，载国民党《驻赣第六绥靖区公报》（1935年2月）。

不久，自流井特支接到中共重庆地委的指示，要求尽快地组织和领导盐场工人进行罢工斗争，以支持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战争。特支经过开会研究决定，为了加强对盐业工人罢工斗争的领导，刘远翔改任特支工运委员，专作工运的领导工作，特支书记由廖恩波接任。此后，廖恩波肩上的担子更重了^①。

一九二六年秋，自流井特支在廖恩波和刘远翔的具体领导下，经过三个多月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在长土洞云寺召开了自流井盐场第一次机车工人代表大会。廖恩波到会作了《关于成立机车工会的报告》^②，他用通俗的语言，阐述和分析了成立工会组织的重要性，以及盐工们组织起来就有力量的道理。大会经过讨论，正式成立了自流井长土机车工会。长土机车工会的诞生，在自流井盐场树起了一面战斗的旗帜。接着，盐场各帮工会也在特支的领导下相继成立。这些工作的开展，为即将形成的自流井工人运动的高潮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一九二七年一月，自流井特支再次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决定利用旧历年关，开展一场以增加工资为中心内容的全盐场工人大罢工。经过准备，一场声势浩大的盐场工人大罢工开始了。二月十四日，天刚蒙蒙发亮，盐场各帮工会就按照特支的决定，带领着手执“反对资本家剥削工人血汗！”、“增加工资养活全家！”、“改善工人生活！”等标语旗的盐工们，从四面八方向自流井市区汇合。很快，二万多游行示威的工人队伍，就将井商会和反动当局围得水泄不通。在工人群众的愤怒

① 《自贡现代革命斗争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期。

② 《自贡现代革命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2期。

呼声和强烈要求下，井商会无可奈何，只好接受了工人们提出的增加工资，改善伙食，减少工时和不干附加活路等项条件。这样，自流井现代史上的第一次盐场工人大罢工就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大罢工之后，特支把在斗争中表现积极的工人骨干分子吸收入党，壮大了党的组织。从此，自流井盐场工人运动的烈火愈烧愈旺。

正当自流井的工人运动胜利发展的时候，重庆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三·三一”惨案。自流井特支被迫转入了地下隐蔽活动。

一九二八年二月，四川省临时省委在巴县铜罐驿举行了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全川各级党组织在二、三月春荒之际，组织各种暴动，发动群众，以造成全川总暴动的局面。为此，自流井特支召开会议，讨论决定：立即开展自流井第二次总同盟大罢工。特支还专门成立了由廖恩波、刘远翔、杨玉忠、王文甫、罗世良等五人组成的罢工委员会来具体领导这场斗争。二月中旬，自流井盐工第二次大罢工开始。这次罢工斗争，前后坚持了十八天之久。在广大工人、小手工业者、店员工人和青年学生的罢工、罢市、罢课等强大力量的支持下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但是，由于廖恩波等人在工人运动中的频繁活动，引起敌人的极大恐惧。反动当局对廖恩波等人发出通缉令。悬赏大洋一千元捕捉廖恩波。刹时间，自流井各交通叉道，贴满了通缉布告，白色恐怖笼罩着盐都。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将廖恩波等主要负责人撤离自流井。

(三)

廖恩波离开自流井以后，受中共四川执行委员会的派遣，辗转于川南、川西一带地区，传达省委的指示精神，检查各地党组织的发展情况。

当时，正值成都的“二·一六事件”之后，在四川国民党反动军阀的大屠杀下，党的工作条件更加艰苦，活动经费也成问题。而对这种逆境，廖恩波首先想到的是党的事业和同志们的生活。于是，他决定回家，把家里仅有的十几亩薄田卖掉，充作党的活动经费。最初，母亲误认为儿子在外面不务正业，生气的骂他是“不肖之子。”后来，经廖恩波耐心说明开导之后，母亲点头同意，凑足了六十块大洋^①。这期间，廖恩波的生活也很困难，但他还是尽力帮助比自己更困难的同志。他常说：“我是个乐天派，生活上艰苦点，但精神上是非常愉快的。应该看到，我们目前虽然困难很多，但前途是光明的，而且是有希望的。”^②对战胜困难和赢得革命胜利充满了信心。

一九二八年三月，省执委遭到敌人的破坏后，召集了一次非常会议，决定增大川西特委的权限，受省执委指挥，代行省执委职权，以便加强和统一领导川西地区二十余县党的工作。于是，省委调廖恩波担任特委的组织工作^③。在特委工作期间，廖恩波经常深入农村、工厂和学校等基层单位，找党员谈

①访问廖协群谈话记录（1982年3月14日）。

②张特瑜：《我和廖恩波最后盘桓的日子》（1981年）。

③《四川现代革命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6期。

心，发展党的组织，帮助和指导基层党组织总结工作经验，开展革命活动，使川西地区党的组织工作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

正在这时，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了党中央的领导机关，中央派余乃文来川传达全国举行武装暴动的指示。廖恩波执行了这个指示。一九三〇年七月，四川省在江津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省军支联席会议》，决定首先发动合川、新津、新汉（新都、广汉）、自贡等地四大兵暴，以八月底为期，并命令各路不得观望等等。八月底，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根据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决定将党、团、工会的各级组织合并为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以配合全国的总暴动。于是，四川省行委在重庆宣布正式成立。这时，川西特委也奉省委的指示通知，合并组成为川西行动委员会。川西行委由张春帆（苏雁秋，省委委员）任主席，廖恩波任组织部长。川西行委刚成立，就又接到省行委的紧急指令：限期在八月份内，发动广汉驻军^①的士兵暴动，并加强对广汉附近等县的工作，以配合江津、荣威（荣县、威远）、梁达（梁山、达县）等地的兵暴和农暴，进而组织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川西行委接到指令后，立即召开行委主要负责人的紧急会议。经过激烈讨论之后，认为马上发动没有把握，加之时间又仓促，于是决定推迟到十月份进行，同时指派廖恩波去直接领导，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②。接着，廖恩波就积极着手广汉兵变的准备工作。

^①广汉驻军系指国民党 28 军邓锡侯之较进步的第三混成旅（旅长陈离，即陈静珊）。

^②《廖恩波档案》第 1276 号。

一九三〇年十月三十五日晚上十一时，广汉中学的钟声敲响，兵变爆发了。但四、五天之后，广汉兵变就在国民党二十八军邓锡侯、二十九军田頌尧部的联合镇压和反动势力在内部的破坏下，遭到了失败（广汉兵变又称“汉州兵变”，当地人习惯上叫“二五兵变”）。

广汉兵变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疯狂地反扑，在广汉、成都等地残酷的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一时，白色恐怖笼罩了川西地区。廖恩波、陈翰屏等已经暴露了的行委负责人，不能再继续留在川西工作了。于是，他们撤离到华阳县，研究了兵变后的形势，为了避免意外发生，决定分散隐蔽活动。廖恩波、陈翰屏到重庆向省行委汇报工作，接受指示。廖恩波怀着沉痛的心情，化妆从华阳县出发，沿岷江而下，经嘉定、叙府秘密到达重庆。根据党的指示，暂时回内江家乡，进行隐蔽活动。

廖恩波只身返回家乡后，目睹蔗农啼饥号寒的惨状，内心深为悯痛和愤恨。那时的内江农村，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民都种甘蔗，他们不但受官府、军阀的野蛮掠夺，而且还受到糖坊老板的苛刻压榨，终年辛勤劳动，到头来却是穿襟襟挂绶绶，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为此，廖恩波在和内江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决定把蔗农组织起来，和糖坊老板作斗争。农历腊月的一天，廖恩波冒着严寒，在凌家场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地下党员和接近党组织的革命群众近二十多人^①。会议讨论了把贫苦蔗农组织起来，抱成一团，参加“青山帮”，领

^①高伯华、高允斌老人给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复信（1982年8月16日）。

导他们斗争的问题。会后，“青山帮”在东乡、一四滩和永兴庙一带，开展了一场反对糖坊老板的斗争，并且取得了一定成绩。这一斗争，在内江的农运史上影响较大。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一九三〇年底，省行委召集主席团会议，传达讨论了长江局的指示。会议认为党、团合并组织，在事实上是取消了党的工作，决定将党、团由上而下开始划分。随即，撤销了四川省行委，恢复了四川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日常工作。当时，由于刘湘的二十一军组织“清共委员会”，大量利用叛徒作特务，破坏我地下党组织，使省委遭到破坏，党员人数大大减少，省委机关难以在重庆继续战斗下去。于是，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底迁到成都。那时，省委领导干部很缺乏，省委书记程秉渊（程子健）还兼任组织部主任。为了加强省委的领导工作，五月间，廖恩波调至成都担任了省委组织部主任^①。他常常冒着严重的白色恐怖，奔波各地，跋山涉水，巡视工作，为恢复和重建全川党的组织工作，历尽辛苦。

为了加强党的建设，省委决定分期分批地轮训全川各地的党员干部，廖恩波和省委书记罗世文、军委书记程秉渊以及组织部秘书邹风平等亲自讲课。结合形势学习中央文件。每期三至五人，共办了八十多班。这对全川党员干部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起了重大作用。另外，在省委还组织了学习小组（当时叫列宁小组），廖恩波和罗世文、邹风平编为一组，他们认真学习理论，使这个小组成为省委的模范小组。省委和地方党组织在他们的带领下，为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更加努力学习革

^① 《中共四川省委员会组织史资料》，载《四川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1期。

命理论，提高政治思想水平。

一九三三年夏，四川军阀“二刘战争”结束后，形成刘湘独霸四川的局面。随着，刘湘把他的指挥机构从重庆搬到了成都。这样一来，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地威胁着省委。而在这之前，一九三二年五月，省委宣传部主任张春帆已奉中央通知去上海，一九三三年一月，省委军委书记程秉渊又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留中央军委工作）。这样，廖恩波又兼任了省军委书记。当时，省委主要领导人就只有廖恩波和省委书记罗世文及省委秘书长史伯康。面对这种严重的形势，为了使全省地下党组织适应这种恶劣环境和保持战斗力，避免遭受敌人的破坏和摧残。廖恩波特在成都主持召开了一次省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具体分析了四川的斗争形势和实际情况，代表省委宣布了关于撤销川东、川南和川西三个特委组织，建立梁山（梁山、万县）、巴县、泸县、宜宾、内江、南充、三台、安绵（安县、绵竹）、成华（成都、华县）九个中心县委的决定^①，这是符合当时四川实际情况的。

一九三三年八月，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受党中央委派赴川陕苏区协助红四方面军工作。四川省委领导机构又重新作了安排和部署，廖恩波接任省委书记^②。

（四）

一九三三年十月，廖恩波接党中央通知，前往江西中央苏

^①马质彬给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复信（1982年6月17日）。

^②《廖恩波档案》第1276号。

区，向党中央汇报四川的工作。临行前，他主持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交待和布置了省委的工作。并且，语重心长地勉励大家，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同心协力，坚持斗争到底。然后，他辞别了患难与共的战友，离开了四川，历尽艰辛，于年底到达江西瑞金。

一九三四年一月，廖恩波作为白区四川省委的代表参加了在江西瑞金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①，接着又参加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②。随后，便留在中央机关工作。

当时，正是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军事“围剿”和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时期。苏区的物质供应十分困难和紧张，尤其是粮食、食盐、医药品等。在这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反革命“围剿”，克服红军在反“围剿”战斗中的财政困难。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红色中华》机关报于一九三四年三月，特向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各机关团体，提出在四至七月内节省行政费用八十万元的号召，这个号召发出后，立即得到中央机关团体工作人员的热烈响应。中共中央机关从白区到中央苏区的外省籍工作同志联名写信给《红色中华》报。表示愿意“每天少吃二两米，不领今年热天穿的衣服，以节衣缩食的实际行动来响应《红色中华》报的节省号召。”廖恩波和陆定一、邓颖超、博古、陈云、毛泽覃、成仿吾、罗迈、潘汉年、贾拓夫等二十二名，均在这一信上签了名^③。在他们的积极带领下，中央各机关团体在四个月内共节

① 《廖恩波档案》第1276号。

② 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出版。

③ 《红色中华》第164期（1934年3月20日）。

省行政费用一百三十余万元，超过了原计划的百分之六十二。廖恩波等人的行动，充分表现了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一心为革命的崇高品德。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苏区在王明“左”的错误的危害下，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为了配合主力部队的突围，根据中央事前的布置和决定，八月间就在江西的于都、兴国、安远、信丰等十几个县，组织了中共赣南省委和赣南省军区，廖恩波奉命留下来担任赣南省军区政治部秘书^①（当时的秘书仅次于政治部主任之职），继续坚持赣南地区的游击斗争。

那时，留在中央苏区的武装力量，尚有红二十四师和第三、七、十一等独立团，加上地方政权机关工作人员和伤病号，约三、四万人。党中央交待的任务是：在苏区及其周围进行游击战争，发展和壮大地方工农武装力量，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准备将来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反击^②。

中央苏区的广大军民，在项英、陈毅、贺昌、阮啸仙等领导下，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廖恩波带领赣南省军区政治部的政工人员和文工团员们，不畏艰难险阻，翻山越岭，深入部队驻地，为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宣传演出，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他常常满怀豪情地鼓励大家：在敌军压境，敌强

① 《廖恩波自述》（1935年3月）。

② 《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载《赣南人民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资料》第12章。

我弱的不利形势下，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以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为保卫苏区和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英勇战斗，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一九三五年一月，国民党蒋介石又纠集了大批兵力，妄图在一个月內荡平留在江西的红军游击队。当时，形势十分严重。留在中央苏区的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和赣南省委、省军区等机关部队，被敌人分割包围在狭小的仁风地区，险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央分局发电报请示党中央，得到中央的回电指示：将部队化整为零，组织向外突围，在中央苏区及其周围坚持地方游击战争。

三月四日下午，廖恩波和赣南省委党政军的负责人一起，率领机关部队一千八百多人，冒着倾盆大雨，离开了仁风地区，开始向赣粤边游击根据地突围转移。当时，部队突围到达信丰、大庾境内的马岭附近，遭到五倍于我军的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的阻击。在此危急时刻，廖恩波以身作则，带领机关人员和部队战士，奋勇杀敌，打垮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攻，战斗持续了一整天。到三月六日，剩下的部队在信丰、会昌交界的金沙、罗坑、石寮、鸭婆坑一带，被粤军余汉谋的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重重包围。在弹尽粮绝、伤亡惨重的情况下，除一部分冲出重围外，大部分均壮烈牺牲，廖恩波和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独立第十六团参谋长陆如龙、中央办事处交通科长连得胜、苏维埃中央政府贸易局会昌分局采办处营业部主任王志楷等五人不幸被俘^①，落入了敌人的魔爪。

①《死刑执行枪决经过附判决书请核备文》，载国民党《驻赣第六绥靖区公报》（1935年3月）。

他们随即被押往驻信丰(原登贤县)的敌军团部。后又被押往大庾县监狱，三月十一日又被囚粵军驻赣第六绥靖区公署候审。

廖恩波被捕以后，受尽了敌人的折磨。但是，他从被捕的第一天起，就作好了至死不屈的思想准备。敌人为了从他口里捞到党和红军游击队在赣南的活动情况，对他用尽了软硬兼施的手段。诱之以高官、金钱和美女，但立即遭到廖恩波的严词拒绝。廖恩波怒不可遏地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个人的生活行动，均受党的支配。要杀就杀，没有什么可说！”^①这铿锵有力的回答，表现了廖恩波对党一片忠心。敌人又拿来笔纸，威逼他写“笔供”，廖恩波嗤之以鼻。然后，用他那戴着沉重手铐的手，毅然挥笔，慷慨激昂地写道：“我之加入中国共产党，系为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统治和废除封建剥削制度，故献身于中华民族解放运动。”^②短短的“笔供”，表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伟大胸怀和高尚的品格！这浩然正气，使敌人为之震慑。于是，只好强加罪名，以“危害民国，扰乱治安”之罪，将廖恩波判处死刑。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农历二月十七），大庾县城阴风惨惨，杀气腾腾，戒备森严。从绥靖公署通往城北门金莲山的一段二里多的公路上，敌人五步一哨，十步一岗，左右两旁，荷枪鹄立。中午十二时，一群刽子手将带铐拖镣的刘伯坚、廖恩波等五人，五花大绑，推上刑车，押往金莲山（现大余县水泥厂门口）刑场杀害^③。面对着死亡，廖恩波等人不停

^{①②}《廖恩波自述》（1935年3月）。

^③访谢松林谈话记录（1982年4月10日），谢松林系当年廖恩波牺牲时的目睹者。

地大声高呼：“打倒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激昂的呼声，响彻了章水两岸，震荡着大庾县城。廖恩波英勇就义时，年仅三十四岁。

谢祥军

魏有豪

谢祥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员战将，抗日战争中曾任抗大五分校校长，解放战争时，任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一九四六年十月牺牲于江苏涟水。

谢祥军，湖北省大悟县田铺垸人。一九一四年一月十三日出生在一个穷苦农民的家里。父亲谢平阶，为让孩子有个出头之日，勒紧裤带送谢祥军上私塾读书。后来，又添了三男二女，靠原有的一点田，再也难维持生计。父亲不得不叫他丢掉书本，下河捞鱼摸虾，或帮助种菜卖点钱，余粮糊口。

谢祥军在儿时，很喜欢看乡间演唱的“皮影子”戏，也喜欢看《封神演义》、《七侠五义》、《水浒》之类的书籍。他崇拜那些仗义疏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绿林好汉，仰慕那些打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梁山英雄，也喜欢那些惩恶扬善的神人异兽。他还模仿着做了一个“独角龙”的怪兽皮影，挂在自己的床头边，盼望着有这种“狠人”出世，惩处人间邪恶。

在他刚刚成年的时候，谢祥军凭着自己的力气，当了一名“挑脚伕”。他走南闯北，耳闻目睹了一些红军和游击队打土豪、斗劣绅、开仓放粮，扶困济贫的事迹，认定这就是自己心里崇拜的英雄。他主动接近红军，红军也乐于同他做些小生意。从此，谢祥军依旧是挑扁担东奔西走，但他再也不只是贩

卖油、盐、酱菜，而是增加了油光纸、擦枪油、手电池等红军部队短缺的物资。

一九三〇年春，夏店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织了赤卫军。谢祥军搁下扁担，邀集谢家金、谢祥胜等八人参加了赤卫军。

在赤卫军里，他立场坚定，敢于斗争。塆间的谢家庭是个屠夫，红军来了以后，他跑到白区，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干了很多坏事。一天夜里，他偷偷地从白区跑回来探听红军消息。谢祥军发现后，当即报告了赤卫军指挥部。赤卫军连夜包围了谢家庭的家，将他镇压。谢祥军办事认真，成绩突出，多次受到赤卫军指挥部表扬，是赤卫军里一名年轻的积极分子。

一九三一年夏，建立了陂孝北县^①苏维埃政府。县苏维埃政府设了一个军事指挥部，下辖八个游击队。谢祥军所在的赤卫军编入了第八游击队。五月，陂孝北县少共书记谢廷畅介绍谢祥军加入了共青团。以后，游击队合编，组成陂孝北县独立团。谢祥军在独立团第三营第八连当班长。

一九三二年夏，鄂豫皖中央分局负责人张国焘被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错误地估计了敌我力量。认为国民党反动军队已濒于坍台，只不过是“偏师”，红军的主要任务是与帝国主义直接进行武装斗争，提出了“打到武汉过中秋”的错误口号。陂孝北县独立团被拉去攻打花园。部队走到土地岭，天刚蒙蒙亮，突遭敌人埋伏。团政委临阵叛逃，部队损失严重。此后，独立团编进了红四军第十二师。谢

^①“陂孝北”系指黄陂县，孝感县北部交界地区，因其位于京汉铁路东侧、濒临根据地中心，战略地位重要，鄂豫皖中央分局于一九三一年夏单独设立于陂孝北县。一九三四年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以后，陂孝北县也就不复存在了。

祥军担任了三十六团团部通讯排排长。

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谢祥军来不及同亲人告别，随军离开了家乡，经陕西、翻巴山、进四川，经历了建立与扩大川陕根据地的多次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四川军阀的数次围攻。他历任红军连长、营长、团长等职。一九三五年，红四方面军又撤离川陕根据地，经历了千难万险，六月在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毛儿盖会议后，部队进行了混编。原一方面军的红九军团编进红四方面军，改称三十二军。谢祥军调任三十二军一个小师的师长。一次战斗中，他的腿部负重伤。由于缺乏医药，伤口感染溃烂，生命受到威胁。军长罗炳辉看到他那红肿的大腿，心里十分难受。为了保全他的生命，罗炳辉曾下令要医生锯掉那支伤腿。谢祥军知道后找到罗炳辉说：“我是一个战士，没有腿就不能上战场。我宁可不要生命，也不能不上战场。锯腿，我不干。”他还苦苦地哀求医生，无论如何也不能锯腿。这种坚强的战斗意志，深深地感动了罗炳辉和为他治伤的医生。医生们千方百计寻找草药，为他洗伤口，敷肿腿，终于使那支腿保留下来。

一九三七年秋，谢祥军被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六队学习。半年里，既学习了政治，也学习了军事。抗大毕业后，谢祥军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奔赴抗日斗争的最前线。

一九三九年秋，谢祥军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教导大队任副大队长。大队长由指挥部参谋长赖传珠兼任。教导大队随指挥部活动在京浦铁路沿线安徽的定远、东汤池、大马池一带。其主要任务一方面是学习，另一方面是开展反顽斗争和剿匪。每临战斗，谢祥军都是身先士卒，英勇、顽强、果断、利索。指挥部多次表扬他作战勇敢。

一九四〇年初，江北指挥部教导大队与五大队教导队合并，成立军政干部学校。谢祥军任教育长，并兼任茶砣镇警备司令。这一年，顽固派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以十万之众企图一举歼灭新四军苏中部队，环境险恶、条件艰苦，办校十分困难。谢祥军既要负责学员的训练，还要对付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围攻，工作担子很重。谢祥军率领军政干校的学员队在淮南的天长、六合一带有力地配合主力部队，粉碎了敌人的围攻，使日伪军闻风丧胆。谢祥军还很注意茶砣的地方工作，同地方党政干部、群众的关系处理得很好。他关心群众疾苦，帮助地方党政机关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深得茶砣的地方干部、群众的拥护。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陈毅率新四军江南部队北渡，苏南、江北两个指挥部合并。皖北、苏北的两个干部学校的一部分合并，在淮南组建成立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陈毅兼任校长。副校长是赖传珠和冯定。谢祥军任教育长。抗大五分校学员有九个大队，共两千多人。五分校除培训干部的任务外，还担负着监视海港敌人军舰的任务。

一九四一年七月，敌伪开始对盐城进行大“扫荡”，我军主力被迫撤出盐城。敌寇的进攻更加紧张与疯狂。“清乡”与“扫荡”普遍于整个华中敌后，平均每半个月各个地区有一次“扫荡”，最频繁的时候一星期一次。为适应斗争环境，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部队进行了整编、精简。抗大五分校也一分为二，一部分为抗大九分校，一部分为抗大五分校。谢祥军仍任抗大五分校教育长。其间，主力部队到了淮南，抗大五分校留在盐浦。参谋长赖传珠很器重谢祥军，把他带到了淮南，任新四军军部特务团团长。

一九四四年秋，谢祥军又调到新四军第三师，任抗大五分

校校长，直至抗战胜利。其间，第三师的主力部队到东台以北去了，后方只有五分校的四个学员队，其中还有一个女学员队。一天，日伪来“扫荡”，情况异常紧急。谢祥军临危不乱，组织学员队乘夜里突围。不料，女生队在突围中走错了方向，被伪军截击抢走了。谢祥军听后急了，当即命令警卫连不惜任何代价要抢回女生队，并由他带着警卫连迅猛向伪军追击。结果，击毙伪军数名，俘虏数名，抢回了女生队。经查点，女生队一人未少，只一人腿部受伤。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谢祥军被分配到华中军区第五军分区任司令员。一九四六年六月华中野战军扩充，以华中军区第五军分区的武装及投诚的赵云祥部组成第十纵队。谢祥军任纵队司令员，兼任第五军分区司令员。

一九四六年七月，第十纵队刚编成不久，就碰上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大举进攻。根据华中野战军总部的部署，谢祥军司令员率领第十纵队主力，在第二军分区武装的配合下，历时一个半月，成功地粉碎了敌人在苏中地区的进攻。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至十一月一日，华中野战军主力在淤黄河两岸组织了涟水保卫战。涟水保卫战开始时，第十纵队刚刚结束苏中地区的战斗不久。野战军总部没有交给十纵队担任什么主要任务，只要了两个团参加战斗，并归兄弟纵队指挥。谢祥军未能参加战斗，总觉得心里不安。

十月下旬的一天，谢祥军听到涟水保卫战的第一次阻击任务胜利结束，怀着同参战者一样的喜悦心情，前往阵地看望参战的干部和战士。当他来到前沿阵地指挥所时，指挥所内正在开会研究下次阻击战的方案和部署。为了不影响会议，他站在指挥所外面，拿起望远镜察看黄河对岸的敌情。此时，第十纵

队作战处副处长钟玉祥看到司令员站在门前。他赶忙跑出来，大声喊道：“司令员，这里不能站，很……”，当“危险”二字还未喊出来，敌人的一颗冷弹射来了。谢祥军倒在指挥所门口……。

谢祥军牺牲后，遗体由地下党安埋在涟水附近的板桥，后迁往芦浦。全国解放后，南京军区要将他的棺槨迁往南京烈士陵园。但是，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永远纪念他，要求不要迁葬，并在阜宁城西南修建了谢祥军烈士墓。谢祥军烈士的英名，永远留在芦浦人民和全中国人民的心里！

作者附记：

本文依据、录引或参考的主要资料有：

1. 先后访问烈士的亲属钟苏安、谢祥国、谢祥连及谢祥让、谢廷畅、李进、洪学智、张明秀、杨光池等谈话记录。
2. 钟苏安(烈士之子)所藏的资料《新四军盐阜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
3. 何长工《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版)。
4.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人民出版社版)。
5. 《三野战史》(初稿)。

刘少白

樊润德

刘少白出身封建家庭，曾中晚清贡生。他顺应社会潮流，追求革命真理，于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秘密党员），历任晋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作了大量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一）

刘少白，名象庚，一八八三年六月三十日（清光绪九年农历五月二十六）出生在山西省兴县黑峪口一个破落地主的家庭中。

一八九六年，十三岁的刘少白考入县城崞山书院攻读。时值中日甲午战争后不久，刘少白听老师讲述《马关条约》签订经过，增长了对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的仇恨。

一九〇三年，刘少白去西安参加了清王朝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贡生。第二年，他进太原山西省武备学堂文科班读书，在太原上学期间，他读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对封建宗法礼教更加不满，不久因体弱退学回乡，曾力主革除旧的风俗。他反对给刚满五岁的大女儿亚雄缠足，说：“女孩子也是个人，长大了要独立生存，靠自己吃饭，你们把她的两只脚

缠成“三寸金莲”这不是故意给她加罪吗？！”^①

他的祖母去世后，他坚持不请阴阳，吃喝从简，还当着亲戚朋友的面，把家里的所有契约拿出来，在祖母的灵前边烧边说：“过去祖宗有错，不该让别人写下这么多的文约。现在，老人已经去世了，就应该让这些东​​西跟着老人走吧。这是老人的财产，我们不孝子孙，无权继承这份产业。”^②他家里常做两样饭，给老人和男孩子吃好的，媳妇、闺女和长工们吃差的。他发现后对父、母亲说：“为什么一个锅里要做两样饭？如果是肉不够吃我再去买几斤，何必要三股两样，惹人讨厌！”那一年，山西大旱。他教育家人，不要强迫佃户交租，并且把自己家里多余的粮食拿出来救济灾民。刘少白的这些事迹曾传遍兴县这个闭塞落后的偏僻小县，穷苦人称赞他“心地善良”，豪门大户则咒骂他“大逆不道”。

一九〇五年，刘少白再次离乡，考入太原府中学堂继续读书，三年后毕业，考入山西大学堂法律预科，后又转入高等科攻读。功课之余，他寻找阅读新书报，拥护同盟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辛亥年武昌首义成功，全国各地响应，刘少白在山西大学堂带头剪掉辫子，上街张贴标语，参加抗清游行。不久，清兵进军娘子关，起义军被迫撤出太原，学校停课。刘少白返回家乡，在兴县组织民团与官府斗争。他在群众中广泛宣传辛亥革命的意义，教育乡民剪发放脚，兴办女学，搞得轰轰烈烈^③。新春佳节时，他在自己的门前贴了一副对联：革

①②徐冲：《贡生——士绅——共产党员》，载《人物》1982年第1期。

③刘献珺等：《民主战士刘少白》，载198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第5版。

命非必好乱，读书岂为做官。苟延残喘的清朝知县认为这是“煽动暴乱”，下令逮捕刘少白。刘少白化装出逃，直到南北议和后，才辗转回到兴县。

一九一二年三月，刘少白被选为山西省议会议员，出席和参加了山西省临时参议会的成立大会。是年春天，经胡鄂公介绍，他加入了黎元洪创办的共和党。但他很快发现：“民国并不属于人民，共和党一点也不共和。辛亥革命只是赶跑了一个皇帝，而中国人民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①。他陷入苦闷和失望。一九一四年，三十多岁的刘少白，继续入山西大学读书。此时，他家的经济已渐衰退，为了维持生活，曾兼任阳兴中学的国文教员。就这样，他一边读书，一边教书，直到一九一八年三十六岁时，才在山西大学法科政治系毕业。

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给刘少白的思想以很大震动。这时，他在阳兴十二县联合中学任董事兼教员。他认真阅读宣传科学、民主的《新青年》等刊物，并向学生们介绍“劳工神圣”和民主、平等、自由等新思想。

一九二二年，刘少白应聘担任山西省立工业专门学校秘书长兼国文教员。他在这里执教六年，积极提倡白话文，建议学校增设新文化课，以鲁迅的作品和《新青年》上刊登的文章作为主要教材^②，给学生灌输新文化知识和民主主义思想。他还利用教课之余，为小学一至四年级学生编了一套语文课本，因内容新颖，未被当局采用。

^①刘献珺等：《民主战士刘少白》。

^②刘献珺、张友等：《刘少白生平事迹》，载《山西文史资料》第22辑。

辛亥革命后，刘少白在山西大学堂预科上学时的同级同学阎锡山，投机革命，靠左右逢源，两面三刀的手段，很快掌握了山西的军政大权。刘少白起初对阎锡山还抱有幻想，希望他能推行民主政治，但事实很快就使刘少白认清了他的真面目。当阎锡山打出“招贤纳士”的招牌，要在全省“招考县长”时，刘少白愤然应考，决心以事实戳穿阎锡山玩弄的假民主阴谋。果然，由于他对中国的政局和前途的答卷不适合阎锡山的口胃，尽管他才华出众，威望很高，仍没有被录取。刘少白的这一举动，使当时许多受阎锡山假民主蒙蔽的人对阎开始失望。此后，刘少白同阎锡山及其豢养的一帮鹰犬，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

刘少白特别关注子女们的培养教育。他的长女亚雄是兴县第一个不缠脚的女孩子，也是兴县第一个到省城读书的女学生。刘亚雄在回忆她在太原读书时的情况时说：“我父亲给我们长期订阅了《新青年》，还介绍报纸上有关苏联十月革命的文章和报道。”^①在刘少白的教育和影响下，刘亚雄在太原女师就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曾被学校当局给予记大过处分。后来，她考入北京女师大，很快就成为领导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并于一九二六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刘少白得知女儿参加女师大师生为驱逐反动校长杨荫榆事发动的学潮时，曾写信给以鼓励，并在报纸上撰文谴责反动当局对学生的镇压与迫害。“三一八”惨案后，刘亚雄被校方开除，北方局保送她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刘少白得知女儿出

^①刘亚雄：《我的学习与斗争》。

国，星夜赶到北京，痛骂反动政府“凶残暴虐，亘古未有”，一直把刘亚雄送到天津。后来，他又先后把次女竞雄，三女刘平和独子刘易成，送进了革命阵营。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全国一片白色恐怖。在山西，阎锡山指使他的爪牙，疯狂捕杀共产党人。现实斗争使刘少白进一步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翻身解放的道路。他认为女儿亚雄的路走对了，自己也要为革命尽一份力量。一次，中共山西省委负责人王瀛被特务跟踪，闯进了他的家门。他不怕担风险，把王瀛藏起来。第二天又亲自送到北营火车站，使王瀛安全脱险。他还多次掩护、救济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如朱志翰、贺毓秀、何述之等等。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一九二七年夏天，刘少白毅然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刘少白后来回顾他自己的思想转变时说：“我从科举到革命，经历过国内外许多大事变。辛亥革命失败曾使我大失所望，产生了孤高傲世之慨！但是五四运动结合了中外的革命新潮，又使我感到中国革命将有新的发展与新的阶段，这是我思想倾向的分点。于是我一面教学，一面求知，对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已逐步地领会，并有苏联革命的现实借镜，因而在教学方面就影响了学生，故以传播新思想而被黜。迨至‘四一二’事变后，革命志士惨死无数，白色恐怖甚嚣尘上，我虽身处嫌疑，犹自热情地爱护那些在地下活动和救济那些身陷囹圄的革命党人，因此而遭受危害亦不遑顾。”^①

^①刘少白：《入党自愿书》。

(二)

一九二八年，山西实力派人物温寿权出任河北省建设厅厅长。刘少白与温寿权素有交往，经温寿权推荐，刘少白担任了河北省建设厅四科科长兼温的秘书。九月间，刘少白将家属迁往北平，住在虎坊桥六十号（即现在的晋阳饭庄）。翌年春季，刘少白又应傅作义之邀，做了天津商品检验局副局长，不久升任正局长。到任之后，不少商人给他送礼行贿，他从来没有接受，他对家中人说：“我不想昧那个良心，为官要清正。”^①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取消北方局，在天津成立河北省委（亦称顺直省委），临时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是刘亚雄的爱人陈原道。刘亚雄自一九二九年冬由苏联回国后，先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此时亦调河北省委。当时，根据秘密工作的需要，河北省委急需在北平建立一处便于掩护工作的联络点，经省委领导同志慎重考虑，决定临时联络点设在虎坊桥六十号人称“刘公馆”的刘少白家里。除河北省委和北平市委的主要负责人在这里接头外，党中央给河北省委的活动经费，也都由上海先寄往刘家，再转交到党的负责人手中。由于刘少白的地位和名望，在上层人士中有许多朋友，社会名流，各界人士常在刘公馆进出，因而党的负责人混杂其间到刘公馆接头，从未引起过怀疑。收转党的活动经费，数额常在千元以上，也从未出过差错。

^①刘献琚等：《民主战士刘少白》。

同年四月，河北省委遭到破坏，省委负责人徐兰芝、陈原道和刘亚雄、蒲秋潮、田仲英等被捕。中共中央指示河北省委机关迅速由天津转往北平，决定由殷鉴主持省委工作，刘公馆继续作为省委的联络点，并把刘亚雄等人被捕的消息通知刘少白，希望他利用上层关系，设法营救被捕同志。

刘少白接到通知后，马上回北平筹集了二千元现款，又赶到天津，为营救被捕同志而奔波。他利用上层关系先找傅作义，又和天津市公安局长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取得了联系。正在这时，受党中央派遣赴北平开展情报工作的胡鄂公、杨献珍途经天津，又一次向刘少白转达了中央希望他全力营救被捕同志的意图。经刘少白继续奔走，终于使营救工作有了头绪：张学铭说：“这批人可以找保释放，但必须交纳一笔保释费。”因为这笔款子数额惊人，胡鄂公不能作主，又返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

此时，河北省委又遭破坏，省委秘书长郭亚先被捕叛变，供出了省委在北平的联络点——刘公馆。敌人当即派宪兵去刘家抓人抄家，因刘少白时在天津，敌人抓人未着，却抄走了党中央从上海刚刚寄来的一千五百元汇款和刘家的一千五百块白洋。

一九三一年四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在特科工作的陈赓处境困难，于七月间从上海转到天津。杨献珍向陈赓报告了营救徐兰芝等人的情况，决定于次日上午八时与刘少白在国民饭店会面，研究具体营救事宜。但由于接头时间阴差阳错，未能同刘少白会面，陈、杨二人又赶往北平刘公馆寻找。此时，刘公馆门外已有“蹲坑”的便衣特务监视。特务们抓走了叩门问话的杨献珍，在远处等候消息的陈赓机警地脱离了

险境。

刘少白当时并没有回北平，他在天津国民饭店按预定的接头时间没有等到陈赓和杨献珍，差人到大同公寓杨献珍的住处，听说杨已搬家离去。他感到事态严重，天津无法待，北平也不能去，只好收拾随身的物品，登上轮船避往大连。

日本侵略军统治下的大连，汉奸密探丝毫不亚于平、津。刘少白到大连后深居简出，引起了日本密探的注意。他们从他那一口地道的山西口音判断他是阎锡山派来的奸细，遂以查户口为名，对他进行了一次盘问。显然，大连也不能久住，刘少白又动身前往青岛。可是狡猾的日本密探也跟踪来到青岛。刘少白发现后，马上又返回大连，费了很大气力才摆脱了跟踪的密探。接着便马不停蹄，直奔山西大同，找到了他的同乡白雲轩^①，这才摆脱了危险。

(三)

刘少白脱险后，一直牵挂着被捕入狱的革命青年，更担心国家的存亡和民族的命运。他多次上书张学良，劝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支持青年的爱国救亡运动。他在大同住了三年，找不到正当职业，直到一九三四年冬，才接受傅作义之邀，到归绥（今呼和浩特）担任绥远省乡村教育委员会主任。

一九三五年，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我党决定争取傅作义抗日。刘少白决心利用自己合法的社会地位，为

^①白雲轩，名象锦，山西兴县人。曾留学英国，参与和领导过山西的争矿权运动，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

党争取傅作义做一些实际工作。一九三六年冬天，中共地下党组织告知刘少白，说北方局拟派刘澜涛来绥远开辟工作，希望他给予帮助。当刘澜涛带着刘亚雄的亲笔信找到刘少白时，刘少白热情接待，并通过关系将刘澜涛安排在一家报馆当编辑，以作掩护。他向刘澜涛介绍了傅作义部队高级军官的思想状况，一起商量决定选择驻扎在兴和县的孟文仲团为工作重点。这个团的副团长兼兴和县县长孟文仲，有一定的爱国心和正义感，和刘少白有点交情。刘少白亲笔致函孟文仲，把刘澜涛介绍到兴和县，在刘澜涛的教育下，孟文仲爱国热情进一步激发，准备创造条件，拉出队伍组织抗日救亡义勇军。这些活动被国民党特务侦知，蒋介石、阎锡山密令傅作义逮捕刘澜涛。刘少白在傅作义处得知这一消息，很快通知刘澜涛，并帮助他迅速离开了兴和县。

在这前后，刘少白为营救王若飞出狱，也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王若飞是一九三一年十月在包头被敌人逮捕的。捕后，他化名黄敬斋，被关押在归绥第一模范监狱。党中央对营救王若飞出狱非常关切，曾指示绥远地下党的同志要尽一切可能争取作傅作义的工作，尽快释放王若飞。地下党组织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刘少白。刘少白多次和傅作义洽谈，劝他释放“黄敬斋”，并帮助释放自己在北平虎坊桥刘公馆事件中被敌人抓去的侄子刘武雄。傅作义表示：“刘武雄的出狱一案，可以办理。黄敬斋的出狱事关重大，实难草率从命。”^①刘少白见他一人说服不了傅作义，便采用动员社会舆论，在上层人士中广泛游说的办法，给傅作义施加压力，还把消息通知了远在河北定县的王

^①徐冲：《黄生——士绅——共产党员》。

若飞的舅父黄齐生。黄齐生赶到绥远，刘少白引他去见傅作义陈述一切。傅作义回答说：“只要他答应出狱以后留在绥远给我们办事，即可释放。”王若飞拒绝了傅作义的要求，双方达不成协议，因而使营救工作长时间地给搁了起来。

这期间，刘少白经常去狱中探望王若飞，又不断把王若飞给傅作义的申述信件传递给傅作义。王若飞给傅作义的信件很多，而且篇幅很长，其中重要的有《关于国共两党优劣势之比较》、《劝傅作义抗战书》、《进步论》等。王若飞在这些信件中，无情地揭露国民党南京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反动罪行，希望傅作义选择坚持抗日的光明大道，和共产党一起奋斗，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刘少白对王若飞的革命气节和高尚品德十分敬佩。他每次去监牢探望，王若飞总是给他讲解革命理论，分析时局趋势，指出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使他在思想上有很大的提高，开始产生了加入共产党的愿望。

一九三六年夏天，王若飞被押转太原陆军监狱。经薄一波等人和阎锡山多次协商，终于逼使阎锡山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同意将王若飞连同在押的三百多名政治犯，分批找保释放。

王若飞出狱以后，和他的爱人李培芝、弟弟王景仁一起住在太原大北门街东二道巷永定路二号。这里也是党的北方局机关所在地，同住的还有廖鲁言、杨献珍等。此时，刘少白辞去了绥远省乡村教育委员会的工作，返回太原，住在新南门外满洲坟。据李培芝、王景仁回忆，刘少白经常到王家作客，一来就同党的负责人单独谈话，内容大都涉及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等问题。王若飞不止一次地对家人说：“刘老伯的女儿刘亚雄，是我党较早的经得起考验的女共产党员之一，她本人为党

作了不少工作，我是非常敬重她的。”^①刘少白的家也是革命同志经常聚会的地方，北方局和山西省委文件就在他家印刷。不久，刘少白郑重地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要求。王若飞和北方局的其他负责同志一致认为他已经具备了共产党员的条件，一九三七年八月初的一天，经王若飞、安子文介绍，刘少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②。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经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批准，刘少白作为秘密党员，不公开身分，组织关系先和北方局王若飞联系，后来到了晋西北，则直接和关向应、林枫联系^③。

(四)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少白奉党的指示返回兴县，担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兴县分会经济部长，主要任务是动员粮草，协助八路军一二〇师，为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而斗争。

为了稳定八路军驻地的物价，保障供给，调动各方面抗日救亡的积极性，晋西北区党委决定创办一个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银行，任命刘少白为银行经理。当时，办银行的困难是很多的，没有资金，没有设备，缺少技术力量。刘少白凭着他对党、对人民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愉快地挑起了这副担子。

为了筹集银行基金，刘少白在晋西北区党委的领导下，巧妙地利用阎锡山提出的“国难当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

^{①②}徐冲：《贡生——士绅——共产党员》。

^③刘献珺、张友等：《刘少白生平事迹》。

口号，假戏真做，广泛动员社会集资。他自己以身作则，首先把多年来积蓄的全部资金都拿了出来，接着，便去做地方士绅牛友兰、杨邦翰、刘训山等人的工作，要他们为抗日战争添砖搬瓦，贡献力量。这些绅士们深明大义，仅牛友兰一次就拿出二万三千块白洋、一百五十石粮食。在刘少白、牛友兰等人的带动下，兴县这个不到十万人口的偏僻小县，很快就凑足了三万多元白洋、七百多担粮食，使建立银行的基金有了保证。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召开的首次董事会上，通过了刘少白的提议：定名为兴县农民银行，行址设在兴县城内。十二月初，兴县农民银行正式开张。刘少白兴奋地提笔挥毫，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银行正屋高大的油漆柱子上，内容是：

大多数农民从此解放鼓起精神打日本

这一个银行开始营业集中财力破天荒

银行办起后，开展业务就要出钞票，而当时纸张和印刷条件都非常困难。刘少白动员大家说：“这是一项紧迫任务，刻不容缓，必须分秒必争地把票子印出来。”他和大家一起先用普通纸在自己刻写的石印版上印了一部分以应急需，随后又亲自跑到西安，在国统区买回专门印钞票的纸张和铜印板，兴县农民银行纸币正式印出来了。这种纸币虽然质量差，但币值稳定，在群众中卓有信誉。各地群众争先前来用“法币”、“阎币”^①兑换。这样一来，不仅打开了流通市场，支

^①“法币”即国民党中央银行印刷的钞票，“阎币”即山西省银行印刷的钞票。

援了抗日战争，而且吸收了外埠资本，扩大了银行基金。

为了学习陕甘宁边区光华银行的创办经验，刘少白于一九三八年夏，专程到延安取经。在延安，他受到王若飞（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热情接待，王若飞还带领他分别会见了毛泽东、刘少奇、陈云、林伯渠等。党中央领导同志认真听取了他的汇报，对他的工作给以嘉勉，并指示晋西北区党委尽力帮助他解决工作中的困难。这一切给刘少白以极大的鼓舞。返回兴县后，他以更加饱满的激情，投入到党交给他的办好银行、支援抗战的斗争中去。

刘少白经常教育工作人员：银行的钱要用到最需要的地方，首先要保证八路军等抗日武装的军需急用。武汉失守后，在日本的诱降政策下，阎锡山反共气焰越来越嚣张，下令取消“动委会”，不给八路军和新军补充给养，扬言要在晋西北“困死八路军、饿死八路军、赶走八路军。”这时，刘少白领导兴县农民银行，给驻扎在兴县、岚县一带的八路军和各抗日新军支援了一大批饷银。一九三九年夏，由罗瑞卿、成仿吾带领的抗大和华北联合大学师生共五千余人路经兴县作短期整训，阎锡山密令赵承绶不准卖给抗大和联大粮食，企图要把抗大和华北联大置于死地。刘少白得悉，不顾反动派的干涉，以兴县农民银行的名义，购买了一批粮食，运到兴县城内，然后由抗大和华北联大学员背回所在地，帮助抗大、华北联大学员解决了休整期间粮食和通过同蒲路封锁线，开赴晋察冀根据地所用的每人七天的干粮。阎锡山闻讯大发雷霆，他立即指使赵承绶派兵“询查究办”。对此，刘少白早有准备，他以银行业务所需把事情搪塞过去，帐面上也没有丝毫破绽。

兴县农民银行除保证八路军等各抗日武装部队的需要外，

还根据刘少白的倡议，向农民发放农业贷款，刺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了使银行的货币加速流通和周转，兴县农民银行又拨出款项，在全县较大的集镇设立推进社（后来改为供销合作社），使持有限钞票的人，钱有花处，货有买处、币有兑处。

兴县农民银行的专职人员不多，刘少白既是经理，又是工作人员。银行开张之初，他就宣布了一条纪律：一切体现从简，除财会、出纳、保管设立专人外，其它工作均由大家分担。银行每天结算帐目，往往熬到深夜，他已年过半百，仍同大家一起作息。银行初建立时，他和大家一样，每人每月只有两月伙食费。后来，一般工作人员月薪提到十二元，上级规定他的月薪为十五元，可是他坚决不领这份享受，坚持和大家过一样的生活、领一样的薪水。刘少白还给银行订了一条规矩：公家的钱私人不准动用，违犯者一律追究查办。一次，他带人去西安购买印刷机，买了一条香烟，半斤茶叶招待了客人。回兴县后，随行人员将这笔钱作为银行的招待费报销了。刘少白知道以后，立即要会计把单据抽出来，他说：“这笔钱应该由我出。”^①

刘少白除集中精力抓好银行工作外，还十分注意军队和地方干部的思想建设。在他的倡导下，兴县农民银行开办了新运书社，专门销售延安出版的各种书刊。为适应战争年代干部多在前方，流动性大的特点，他又指示书店工作人员开展邮寄业务，晋西北区党委民运部长罗贵波，就是在前线收到新运书社寄给他渴望已久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的。

一九三九年冬，阎锡山制造的反共摩擦愈演愈烈。为了

^①牛何之：《刘少白与兴县农民银行》，载《山西文史资料》第25辑。

预防万一，刘少白决定将银行转移到白龙山下的安沟村。到安沟村以后，他仍然放心不下，又亲自到黄河边勘察地形，准备一旦兴县情况危急，便组织力量将银行搬往陕北根据地。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一支顽军从罗峪口北上，朝安沟村方向开进，银行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他当机立断，雇了一只小船飞渡黄河，向八路军河防部队报告了情况，河防部队当即派出一连兵力，截阻并歼灭了那股顽军，保护了银行的安全。“晋西事变”被平息后，形势全面好转，银行机关和所有财物，又搬回兴县城。

(五)

一九四二年五月，刘少白带领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和他的三女刘平、幼子刘易成以及长女刘亚雄的孩子刘纪原，离开晋西北去延安。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整天叫嚷要进攻延安，许多老朋友担心途中安全，劝刘少白不要带子女外孙。刘少白说：“我一定要趁这次机会亲自把孩子们送到延安，去接受革命的教育和锻炼。我现在虽然年近花甲，但身板骨还挺硬棒，家里不需要人照顾。况且孩子们年岁都小，留在家里也无用，把他们送到革命队伍我才放心哩。”

参观团五月二十日到延安，受到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设宴款待他们，晋绥分局代书记林枫受党中央委托，到参观团驻地看望他们，贺龙、续范亭把他们接到枣园畅谈，《解放日报》还专文介绍了参观团团长、副团长的简历和事迹，使大家深受感动。按照中央的安排，他们参观了边区参议会大礼堂、抗日军政大学、鲁

迅艺术学院、中央民族学院、中央医院、和平医院、难民工厂、日本反战工农学校、《解放日报》社和高等法院监狱等，深深为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革命圣地延安的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所鼓舞。延水河畔，他们看到了宋代诗人范仲淹的遗迹，不禁想起了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刘少白激动地说：“这就是今天延安的写照！”

在王若飞、杨尚昆、林枫等受中共中央委托召集的座谈会上，刘少白畅谈了参观感受说：“此次来延，印象均佳。尤其是‘三三制’的实施及整顿‘三风’的学习，使我们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看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苦干、硬干的作风，从没有办法中想出办法的伟大力量——中国有这种力量，共产党有这种信心，中国是不会灭亡的，共产党是有前途的。”^①

七月十一日下午，毛泽东、朱德、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等亲临参观团驻地，访晤全体成员。毛泽东向大家讲解了国际国内的形势以及“三三制”、“减租减息”等方面的政策，号召大家为夺取抗战胜利贡献力量。刘少白这次见到毛泽东，心情格外激动，不仅是因为他聆听了一次催人奋起的讲话，还因为毛泽东对他子孙的关怀。原来，他把刘平等三个幼童带到延安，经与多方联系，均因学校住房紧张而难以收留。王若飞将情况反映给毛泽东，毛主席当即回答：“没有窑洞可以再挖。刘老先生的孩子一定要收下！”就这样，在毛泽东的直接过问下，三个孩子才分别进了保育小学和抗属子弟学校。

^①牛旭光：《记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访问延安》载《大同文史资料》1982年第4辑。

五十五天的参观就要结束了，刘少白起草了《晋西北士绅参观团留别延安各界书》，对中国共产党、对延安军民表示无限的热爱和敬仰。文中写到：“延安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我们此次来延安参观，将近两个月之久。延安各界对我们热烈欢迎与亲密款待，使我们万分的感动。尤其特殊的是对我们晋西北年老的士绅，不远千里而来，更加敬重，这一点使我们荣幸之余，转增抱愧！范文正公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我们且不去追怀古人，而马上想到今天的延安，真有这样的人物毛主席了。”^①

刘少白从延安返回兴县不久，一九四二年十月，又西渡黄河到陕北呼家庄，参加晋西北临时参议会会议（后改为晋绥临时参议会）。这次会上，林枫被选为临时参议会议长，刘少白和牛荫冠被选为副议长。刘少白在就职大会上说：“我只知有正义，不知有地位。一切为了国家和民族，一切为了团结抗战。只有为公，不能为私。”^②

在这届晋西北临时参议会上，讨论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粉碎敌伪顽封锁，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等问题。会后，刘少白带头上山开荒地。他老当益壮，精神焕发，每天开荒一分半到二分，比规定的任务几乎超过一倍。为了发展经济，刘少白根据晋西北的气候和土质，积极倡导广种棉花。晋绥边区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仅兴县一县，棉花种植面积发展到三万五千亩，年产皮棉达六七十万斤。随着棉花产量的增

① 《晋西北士绅参观团留别延安各界书》，发表于1942年7月20日《解放日报》。

② 刘少白：《在晋西北临时参议会会议上的讲话》，载《晋西北临时参议会会刊》。

长，刘少白和牛友兰等人在兴县城关创办了蔚汾纺织厂（后改为晋西北纺织厂），从外地买回织布机，聘请纺织技师，开展了纺纱织布运动。刘少白和他的老伴，每天跟着学习纺织。

“临参会”号召所有党政军机关都要紧缩编制，提倡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一个钱当两个钱使用。刘少白自动提出：不要马夫，不要警卫员，也不要勤务员，一切杂务琐事，都靠自己动手去完成。周围的同志见他年事已高，身边又没有一个子女照应，不同意裁掉他的工务人员。他和蔼地笑着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里边的奥妙可深哩。”“我自己动手，打扫卫生，不仅能锻炼身体，而且还能长知识。你们可不敢小看这件事啊！”^①

一九四五年六月下旬，刘少白第三次去延安，参加全国解放区代表大会筹备会。筹备会的主任是周恩来，刘少白是副主任之一。他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八月十五日晚上，当王世英把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告诉他时，他高兴得忘却疲劳，和王世英畅谈了一整夜。他说：“自古以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本来就是非正义战争，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竭力反对。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军，不仅是全中国人民，而且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希望所在。抗日战争是正义战争，正义的事业是任何力量摧不垮、战不胜的。”^②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不久，党中央召集延安各界人士座谈“五四指示”，

①刘献珺、张友等：《刘少白生平事迹》。

②徐冲：《贡生——士绅——共产党员》。

毛泽东在讲话之后，对刘少白说：“中央决定实行土地改革，你是共产党员，回去以后，可以将你家多余的土地献给农民，起个带头作用。”^①刘少白欣然允诺。后来返回兴县，他马上动员其弟刘象坤，将自家的四百五十亩土地、一处四合院子和百余株树木全部献出来，交给政府处理。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三日，《晋绥日报》头版头条以《刘副议长及其胞弟向农民献出土地房屋》为题报道说：“兴县县政府接获刘老先生献出的土地和房屋，即呈报边区行署，经行署政务会议通过接收，给予表扬。”

刘少白这一顺乎历史潮流、符合人民意愿的革命行动，却遭到当时在晋绥土改运动中竭力推行“左”倾错误的康生等人的诬蔑和攻击。在兴县石楞则召开的土改工作碰头会上，康生竟指名道姓地说：“刘少白献地是搞假开明，是收买群众。他的这种做法在重庆还差不多，在我们这里怎么能行得通？”^②紧接着，一场场灾祸朝刘少白兄弟接踵袭来。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六、二十七日两天，土改工作团在黑峪口集中八个村的群众，联合斗争刘象坤；不久，工作团又把刘少白从“临参会”武装押送回黑峪口，于九月二十一日调集数千人进行批斗，当场宣布撤销刘少白的临时参议会副议长的职务，并抄收了刘少白的家。

毛泽东看到《晋绥日报》有关斗争刘少白的报道，非常生气，指示晋绥分局马上派人到延安汇报究竟。毛泽东严肃地对晋绥分局派到延安来的同志说：“你们犯了错误，刘老先生是不该斗的，回去赶快向他道歉。”^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一九

①刘献珺等：《民主战士刘少白》。

②根据刘武雄、孙高柱等人的回忆。

③徐冲：《贡生——士绅——共产党员》。

四八年初，晋绥分局给刘少白平了反、恢复了他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的职务，全部退还了从他家抄走的东西。

刘少白在土改中被错斗，身受委屈，心无怨尤，对党忠诚不渝，平反以后，更感到党的伟大。一九四八年八月，中央邀请他去河北省石家庄参加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他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但因晋绥通知他晚了一些，赶到石家庄时，大会已经闭幕了。

刘少白在华北等候中央指示期间，九月十三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着重汇报了自己的思想情况，陈述了对晋绥土改中一些问题的看法。毛泽东在十月三十日复函刘少白，针对他信中指出的土改中的问题说：“我们的工作是有错误的。好在现已一般地纠正，并正在继续纠正中。”“情形既已明白，则事情好办，你也就可以安心了。”^①

党的领导人坦率检查工作中的错误，并且着力领导全党予以纠正，这种无产阶级的胸怀和气魄，使刘少白进一步认识到，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不可战胜的。感慨之余，又觉得自己前信写得有点孟浪唐突，遂于十一月三日又给毛泽东写了一信，谈了自己的认识与感想。信的内容是：

敬爱的毛主席同志：

我前次给您写的那封信，在此两三个月的读书及其他领悟中，觉得我那封信是有些孟浪了！那就是直率陈情，而未顾及全面，也就是偏于自我意识，而忽视社会存在。

^①毛泽东给刘少白的手书存在刘少白的次女刘竟雄处。

在十月三十日接读了您的手复，在短短的教语中已经概述了全面问题，并给了我个人的安慰！这封手复的信件，就我的历史观点看，是一件无比荣幸的珍品。

我又和彭真同志及安子文的谈话，对于党的认识与无产阶级观点，也进了一步。这样我的问题，就自信为解决了；那就撇开往事，力追后尘。

正如古人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晚节未境之难，我之谓也！

谨此再达，藉以告慰，敬祝健康！

刘少白恭启

一九四九年九月，刘少白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十月一日，他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盛典。

建国初期，刘少白在太原担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看到自己向往、追求，并且为之奋斗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诞生，刘少白心情无比振奋。他虽已年近古稀，但仍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辛勤工作。一九五五年，他根据山西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搞好水土保持和尽快根治黄河的建议。他说：“搞好水土保持工作，不仅关系到山西的农业建设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控制黄河泥沙下降，变害河为利河的大问题。”“要让黄河流碧水，首先要让赤地变青山。没有满山绿，就不会有黄河清。山西沿黄河一带搞好水土保持的出路，就是要多栽树、广种草。”^①一九五八年他迁往

^①刘献珺、张友等：《刘少白生平事迹》。

北京定居以后，仍不忘家乡建设，曾两次给兴县捐款二千四百元，资助家乡人民开展水土保持工作，搞好山区社会主义建设^①。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刘少白这位年愈八十的老翁也不放过，给他罗织罪名，进行迫害；他的大女儿亚雄、二女儿竞雄、二女婿安子文、儿子易成，以至小外孙纪原，或被投进监牢，或被关进“牛棚”，或在本单位挨批斗，均无一能够幸免。刘少白对此忿忿不平，郁郁难解，但他始终没有动摇对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一天，他拄着拐杖，冲出家门，口里喃喃地说：“我要见毛主席，我要找周总理，我要反映情况……。”可是没走多远，就晕倒在马路上。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晚，刘少白含冤病逝，终年八十六岁。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指示有关部门给刘少白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党对他一生为革命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①兴县黑峪口党支部所存档案资料。

胡 锡 奎

中共湖北省孝感地、市委

《胡锡奎传记》编写组*

(一)

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七日，胡锡奎出生于湖北省孝感县（今改为市）城关北门内正街的一个书香人家。他的父亲胡延池，原是清朝的秀才廪生，后因家道中落，才教书和做小百货生意。

胡锡奎在家乡读完小学、中学。十八岁时，上了汉口法文学堂。这时，他开始有了自己的追求与理想：念完书，当个铁路局的职员，或者中小学的教师，自食其力，自由自在。可是，父亲因家境所迫，要他辍学回家经营小百货铺。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一年，他在家做了七年生意。在那种尔虞我诈的交易场中，他对旧商人的一套越来越不满，常与父亲闹别扭。就是坐在店铺里，也无心照料生意。只要父亲不在身边，他就拿出社会科学书籍翻阅。

*编写组成员有王永俊、郭农声、郭金云、梁柏青、吴牧、喻先堂、袁琳、贺文德。

一九一六年，他二十岁时，在父母主持下，与当地前清秀才郭秀夫的女儿郭雁勋成了亲。

一九二二年，胡锡奎终于挣脱了父亲的羁绊，到汉口谏家矶机器厂谋到一个小学教员的职业。那时他的舅弟郭树勋（现名郭述申）正在武昌读书，常常把自己订的《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借给他看。他从阅读这些革命书刊中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九二三年春发生的“二七”惨案，对胡锡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①。

不久，他到武昌高师教育系当了旁听生，利用暑假，与郭树勋、林宗汉、屠以芳等从外地回乡度假的同学，筹办“孝感暑期学校”，并在省城《江声日报》副刊上编写了两期暑期学校专辑，向青年、向社会宣传革命道理。一九二四年，他又与郭树勋、杨玉清等人在孝感编辑油印小报，抨击时事，宣传群众。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后，胡锡奎于六月初回到孝感，找到暑期学校的师生，商定采取行动，声援上海工人。此后的一天，胡锡奎、郭树勋等带领近千名青年学生及市民，走上街头，由分司街到天灯街，然后到大东门，朝英国教堂涌去。一路上，“打倒帝国主义”、“为死难同胞报仇”、“声援五卅惨案的受害者”、“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出去”的口号声此起彼伏^②。

同年夏，胡锡奎考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九月，他加入共

①胡锡奎：《自传》（1956年2月13日），原件存中央组织部。

②中共孝感市委党史办：《传播革命思想阵地——孝感暑期学校》（未刊稿），1982年11月7日。

产主义青年团。十二月，经陈君起、曹壮父介绍，由团转党。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他积极从事学生运动，并参加《前进报》的编辑出版工作。军阀孙传芳把胡锡奎列入了“黑名单”，准备下令逮捕他，经党组织安排，他火速离开南京转移到上海。中央决定送他到苏联学习。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胡锡奎到莫斯科，入中山大学第二期第八班，后来转到第六班。他学习刻苦，即便是节假日，也常常待在家里读书^①。

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的兹维尼果罗德镇召开。胡锡奎参加了这次代表会议，并在大会组织委员会工作^②。大会结束后，胡锡奎回国到达上海，在中央组织部任地下交通，负责迎送上海到莫斯科之间的来往人员。

一九二九年二月，胡锡奎调往顺直省委宣传部工作。在部长陈潭秋的带领下，他负责编辑《北方红旗》、《出路》、《火线》等省委机关刊物。

一九三〇年初，胡锡奎调任北平市委书记。当时的北平，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市委、市军委、工会、共青团等机关多次遭到破坏，先后被捕的同志达六七百人。胡锡奎到任后，坚持白色恐怖中的地下斗争，很快恢复和建立了一些基层支部与进步团体，举行过多次示威游行，使北平革命运动开始复兴^③。

四月的一天黄昏，胡锡奎到银闸胡同一个联络点接关系，筹

①访问刘亚雄谈话记录（1984年11月2日）。

②李维汉：《回顾党的六大前后》，《中共党史资料》第10期。

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党史研究小组编：《中共北京地下党斗争史》，北京出版社出版。

备“五一”纪念活动。走进门后，发现屋里坐着两个陌生人，他预感到联络点出了事，掉头就走。两个陌生人窜起把他拦住，问他是什么人，到这里干什么。胡锡奎报了个假名，故意吞吞吐吐地说：“我见这家房门未关，就随便进来看看。”两个便衣朝胡锡奎打量了一眼，只见他穿着一件旧长褂子，又脏又破，头发、胡子乱糟糟的，神色并不惊慌。于是就认定他是小偷，把他抓到了附近的缉察队关了一夜，第二天释放了。

五月，组织上调胡锡奎任天津市委代理书记。一九三一年春，又调任唐山市委代理书记。后来，任省委巡视员，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二)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八日，胡锡奎在北平被捕，先关在一个宪兵中队，后转到设在北平鼓楼后门桥北帽儿胡同的东北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开始审讯时，胡锡奎什么也不承认。法官从桌上拿起一摞纸，抽出一张扔过来，胡锡奎捡起一看，原来是他前不久交给河北省委军委的一份用八行信纸写的亲笔报告。这一下，他明白了，党内出了叛徒。他感到自己的身分难以掩饰下去，当堂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敌人以为他屈服了，接连向他提了五个问题，他都拒不答复，并斥责道：“你们有什么权利问我？！”敌人恼羞成怒，把他打倒在地。他蔑视地说：“我死都不怕，还怕你们打！”^①此后，他就以一个公开共产党员的身分，在狱中长期坚持斗争。

^①访问刘聚奎谈话记录（1979年2月13日）。

果真象胡锡奎所猜测的那样，党内出了叛徒：省委军委书记廖化平和省委秘书长郭亚先叛变投敌，向敌人出卖了党的组织和同志。一时间，宪兵、警察倾巢出动，四处搜捕。省委书记殷鉴及其他负责同志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等相继被捕，四百多人被投进了东北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审讯，是对难友们严峻考验的第一关。狡猾的敌人让老叛徒李天明充当法官，叫新叛徒廖化平、郭亚先在一旁陪审，使得难友们无法掩饰自己的身分与活动。然后敌人再用酷刑与死亡来威胁，用名利与地位来引诱。一些革命意志薄弱的人经不住这几招，投敌了，叛变了，过堂后再不回到监房里来了。最初几天，监狱里竟然出现了一股叛变的逆流。

在这危难关头，胡锡奎心情沉重而愤怒。同一号子的薄一波主动与他联系，秘密商议如何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和形势教育，迅速把这股叛变逆流压下去。他们一方面宣传殷鉴等同志在敌人审讯中坚贞不屈的斗争事迹；另一方面利用被捕前从报上得到的消息，如红军活捉了国民党师长张辉瓒，粉碎了蒋介石的军事“围剿”等，向难友们宣传革命大好形势，以坚定大家的斗争信念。

一天晚上，敌人突然提审胡锡奎。法官气冲冲地吼道：“这还得了！你在外边闹还不算，到了监狱还作政治报告？”胡锡奎矢口否认。法官更是暴跳如雷，指着他说：“你，你敢不敢划押？要是有人作证，就揍你两百军棍。”“敢！”胡锡奎面不改色的回答。敌人把叛徒于振邦叫来对质，然后连连喝道：“打！”^①胡锡奎被打得昏迷过去。但他始终咬紧牙，没

^①胡锡奎：《从入狱到出狱对付敌人审讯的情况》（1965年12月5日），未刊。

有吐一个字。刑后，在架回牢房的路上，他高声喊道：“于振邦咬我了！于振邦咬我了！”想让难友们知道监狱里又出了叛徒。回到监房，难友们一起围上来照料他。薄一波手头还有两块钱，赶快托人买来烧酒和黄表纸，细心地为他调治棍伤。

由于殷鉴、薄一波、胡锡奎等同志的英勇斗争，叛变逆流终于压下去了。当初抓来的四百余人，有的被释放，有的转监了，最后剩下胡锡奎等二十九人还关押在这里，等待着宣判。

九月中旬的一天，监狱当局把胡锡奎等二十九人押上囚车，送到海陆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军法处，继续审讯，结果胡锡奎被判处十四年徒刑，随后押到草岚子胡同的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这是一座以对共产党人进行精神摧残为主的法西斯监狱。敌人利用“审查”、“传教”，强迫写“反省”文章等手段，实行长期的“攻心战”，企图诱迫共产党人叛变自首。

为了坚持长期的监狱斗争，经过秘密串联酝酿，狱中成立了党的支部干事会（支部委员会），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殷鉴、薄一波等，先后任过狱中党支部书记。胡锡奎作为一名支委，始终自觉地站在斗争的前列。他与杨献珍负责编辑狱中党支部创办的秘密刊物《红十月》，给难友讲解政治经济学，并积极参加对国内国外政治事件的讨论，还常常坐在铁窗下面，戴着沉重的铁镣，临摩碑帖，练习毛笔字。

敌人在一系列诱降伎俩破产之后，于一九三三年宣布对犯人每六个月“审查”一次，凡是反省自首的都予释放；连续三次“审查”仍不反省者，一律枪毙。

年底，第一次“审查”结束了，狱中的“重要分子”没有一个叛变自首的。敌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借口胡锡奎等在狱中

闹事，把胡锡奎、刘聚奎等四人押到军法处去枪毙，妄图以此来恐吓狱中难友。难友们却正告监狱当局：如果胡锡奎等人遭到杀害，他们将以集体绝食表示抗议。被押到军法处的四人中，有两个人经不起考验，自首了；胡锡奎始终坚贞不屈，并帮助正在病中的刘聚奎坚定起来，保持了无产阶级气节。刘聚奎事后回顾这段经历时说：“我的政治生命，是胡锡奎给了我一半的。”^①

敌人没有枪毙他们两人。关押了几个月后，又把他们押回到草岚子监狱。

长期的监禁生活，使难友们的身体受到极大摧残。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狱中党支部为了争取改善狱中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迎接今后更艰巨的斗争任务，决定组织一次绝食斗争。胡锡奎尽管受刑最多，身体很虚弱，但他谢绝了同志们的劝阻，毫不犹豫地参加了绝食。绝食坚持了七天，监狱当局才被迫答应难友们提出的基本条件：少数重病号下镣，轻病号换上三斤重的轻镣；监房门早开晚闭，政治犯可以在各监房自由走动；改善伙食；每周洗澡一次；允许自由订阅国民党区域公开出版的书报^②。

一九三五年春，敌人派宪兵三团的几个特务打进监狱中，掌握了狱中党支部的一些活动情况，列出薄一波、胡锡奎等十二人的名单，上报国民党中央，准备处以死刑。十二位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毫无惧色。他们马上同支部其他同志一起，对狱

^①访问刘聚奎谈话记录（1979年2月13日）。

^②胡锡奎：《在北京的一场持久、紧张、顽强的监狱斗争》，载1961年10月6日《北京日报》。

中今后的组织与斗争进行了妥善安排，作好牺牲的准备。后来，由于“何梅协定”的出笼，宪兵三团仓促撤出华北，十二人的死刑才没有来得及执行。

一九三六年春，刘少奇来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他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斗争需要，作出了营救被监禁在草岚子监狱中的我党重要干部出狱的建议，呈报中央，得到批准。这年秋天，殷鉴、薄一波等五十二个同志，执行中央指示，经党组织营救，采取应付敌人的策略手段，分批陆续出狱了。十月十六日下午，胡锡奎与朱则民、唐方雷一起，迈步走出草岚子监狱，结束了坚持斗争达五年之久的铁窗生涯。

过了两天，北方局派人来联系，胡锡奎接上组织关系，打算先请假回家看看，然后再到北方局去工作。

(三)

一九三六年秋天，胡锡奎到武昌王臣街舅兄郭汉勋家，休息了两天，便回到阔别十年之久的孝感与妻儿团聚。

西安事变以后，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新的斗争任务召唤胡锡奎尽快回到岗位上去。他把自己要走的想法告诉了家人，并得到舅兄郭汉勋的支持，然后毅然北上。途经武汉，他对大女儿胡昌明说：“我对不起你母亲，对不起你。但我不能不走，有国才能有家，将来会对得起你们的。”他一再叮嘱女儿：“好好照顾妈妈，好好招呼弟弟。”^①

一九三七年三月，胡锡奎到河南开封论时女中寻找共产党

^①访问胡锡奎长女胡昌明谈话记录（1984年7月11日）。

员刘子久。由于关系暴露，情况有变，他又到太原找薄一波。相见之后，薄一波建议他利用在南京和嘉定等地朋友的关系，开辟一条工作路线。胡锡奎遂掉头东去，先到南京，后到嘉定，通过一个朋友的关系，在嘉定县教育局当了名职员，并在县中学教国文。因为“局面很小”，工作没有展开。当年五月，安子文来信通知他返回北平。十二月，胡锡奎担任中共京东特委书记。省委交代的任务是动员所辖平原地区的人力物力，支援李运昌领导的冀热边特委，在长城内外发动游击战争。他化装成游学先生，在唐山稻地镇太康书店，与地下党负责人接上头，很快组成了京东特委。这时期，他往来于丰润、乐亭、昌黎、卢龙、滦县等地开展工作。不到三个月，就使遭到严重破坏的冀东各地党组织迅速恢复，党员由一百多人发展到三百余人^①。

一九三八年五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在冀东组织一次全民性的抗日大暴动，并决定将冀热边特委、京东特委及唐山工委合并为冀热边特委。胡锡奎任特委书记兼冀东抗日联军政治部主任，李运昌任司令员。六月下旬，胡锡奎、李运昌分别在滦县大门庄和丰润腰带山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②，为暴动准备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骨干。

这时，胡锡奎住在大门庄地下交通张振宇家的地瓜窖里。训练班的教室选在庄子最东头的地下党员李永春的家里。李家开着油榨坊，来往生人不会引人注意。训练班学员有农村地下

^①访问马辉之谈话记录（1984年11月30日）。

^②李运昌：《冀东武装大暴动与胡锡奎同志》，载《迁西县革命回忆录·气壮山河》。

党的骨干和抗日积极分子，有滦县简师和省立师范的进步学生，共二十余人。每晚上课，学员三个两个分头来，来了就讲，讲了就走。胡锡奎讲抗日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结合分析冀东所处的地理环境、今后的斗争任务及完成任务的方法，还提出暴动要注意的事项。李润民讲军事课，主要是讲游击战术等普通军事常识。这个训练班虽然只办了五天，但效果很好。结束时，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渴望即刻奔向杀敌战场。

六月下旬，冀热边特委决定，由李运昌以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冀东分会主任身分，在田家湾子举行军事会议^①，还有抗日友军洪麟阁、杨十三及高志远部代表参加。会议决定七月十六日起义，并规定起义纲领和起义军名称、番号。起义军分三路，第二路由李运昌、胡锡奎直接指挥。

这时，我党中央将宋时轮与邓华两支队合并组成八路军四纵队，兵分两路，挺进冀东，打击日寇，策应暴动。冀中、平西等兄弟游击队也准备配合出击，牵制敌军。

不料，起义日期泄露了，日伪准备收缴民枪，血腥弹压。胡锡奎、李运昌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提前起义。

七月六日，滦县高培之、李润民等在齐集北港举起义旗，打响了冀东暴动的第一枪。七月七日，李运昌在新庄、铁厂、王官营、新集宣布起义响应，在腰带山插上了红旗。紧接着，洪麟阁、杨十三部在遵化暴动，高志远、陈宇寰部在冀东南暴动，还出现了卢龙师范学校校长高敬之等带领农民骂开城门的

^①李运昌：《冀东抗日大暴动》，载迁西县革命回忆录《动地凯歌》。

奇迹。七月十八日，开滦七千矿工也奋起响应。冀东二十二县，参加大暴动的有二十多万人^①。

暴动期间，冀热边特委和抗日联军司令部设在迁安县西庄村，胡锡奎领导政治部配合军事行动，宣传发动群众，收集民枪，征集粮草，建立抗日政权。他还亲自起草冀东抗日联军司令部、政治部的布告，以李云长、王瑞清（即李运昌、胡锡奎二人的化名）署名发布。他身体力行，抓部队思想教育和纪律检查。起义部队纪律严明，斗志旺盛。

八月，八路军四纵队与冀东抗日联军胜利会师。九月，胡锡奎、李运昌、李楚离与邓华等联合举行了著名的铁厂会议，准备成立冀热辽军区，分遣部队建立抗日根据地，成立统一的政权机构。但由于领导意见不一致，最后决定只留下三个支队（共数百人）坚持冀东斗争，将扩大的部队随第四纵队转到平西整训。因途中遭敌袭击和组织工作、思想工作不细致，大部溃散，除少数人随第四纵队到达平西外，一部返回冀东，根据地也因之大为缩小^②。胡锡奎返回冀东后接到上级指示，回到了天津。

轰轰烈烈的冀东全民抗日大暴动，虽然遭到挫折，但对以后冀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准备了干部，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四）

一九三九年春，党中央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派彭

①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学提纲》，中央党校出版社1984年版。

②《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第263页。

真、肖克等同志到晋察冀边区加强对抗战的领导。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将原河北省委改组为冀热察区党委，并于三月召开了区党委代表会议，胡锡奎、李运昌等人参加了会议。会后，胡锡奎又留在平西接受了三个月的短训。短训结束后，党组织派他去晋察冀区党委工作。他和马辉之十二岁的儿子扮成逃荒的父子，离开了平西，于是年夏末，到达边区首府阜平县。八月，胡锡奎担任晋察冀区党委（一九四一年后改称北岳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后来又担任了晋察冀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①。在晋察冀的六年里，他紧密配合党的中心，主办北岳区党委党刊《战线》。在反“扫荡”的日子里，部队有时轻装，分散活动。胡锡奎带领宣传机关，把行李放在骡驮上，人背着钢板、油印机行军。他强调说：“我们宣传战士要有与印刷工具共存亡的决心，行李可丢，钢板、油印机可不能丢啊！”为了保证同志们能及时看到区党委的小报，他以身作则，常常利用行军中短暂的休息时间进行撰稿、刻蜡版和印刷。他撰写的《一切为了反扫荡战争的彻底胜利而斗争》、《必须加强支部教育工作》、《全面展开反扫荡的思想宣传战》等重要文章，对鼓舞军民完成党的任务作用甚大。由于胡锡奎等人的努力工作，《战线》成了反“扫荡”中的一面旗帜和战鼓。晋察冀边区在一九四一年秋季残酷的反“扫荡”中，阜平一万多名党员，没有人投敌；边区委托群众坚壁数万枚银元，也没有损失^②；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等无数抗敌英雄大量涌现，这些都是与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分不开的。

^{①②}访问郑天翔谈话记录（1984年11月9日）。

胡锡奎在中央分局和区党委领导下，配合晋察冀八路军针对华北日寇的“治安强化运动”，组织了三次强大的政治攻势。每次都动员了几十支武装宣传队，散发了上万件宣传品。他们在敌占区演戏、唱歌，向碉堡喊话，散发传单，张贴漫画，还把“保卫边区，保卫家乡，保卫秋收”等巨幅标语，张贴在保定的大街上和伪河北省政府的“布告栏”里。敌人无可奈何，一再哀叹：“这不见面的仗没法打！”^①

胡锡奎在边区的六年中，做了大量理论工作。除了主办党刊《战线》之外，还先后创办了《半月时事》、《工作通讯》和《学习副刊》等刊物。他经常亲自为这些刊物写稿，仅《战线》上的个人署名的文章就达六十余篇。他还在《边政导报》、《新长城》等边区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内容涉及民主政权、地方武装、支部教育、统一战线以及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

胡锡奎对待宣传工作的态度非常严谨。有一次审稿发现文中有“边区军民一年内拔掉二千九百九十三三个敌伪据点”的说法，他立即挂电话向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询问，同时派通信员找文稿作者郑天翔来核实，聂荣臻回电证实一年内拔掉的敌伪据点是二百九十三，不是二千九百九十三。胡锡奎这种老实而严谨的作风给郑天翔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胡锡奎还善于从群众中发现好的苗头，然后加以提高，再在群众中推广。一九四四年冬天，他在阜平县看了高街村群众自编自演的《穷人乐》，认为这个戏好，真实而生动地反映

^①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文件：《一九四三年秋季北岳区反“扫荡”中政治攻势总结》（1944年4月），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了边区农民群众解放前后的生活和斗争，是群众戏剧发展的方向^①。于是，他立即组织边区剧团，到高街村去辅导提高。不久，高街村剧团到分局机关所在地史家寨演出这个戏，受到分局领导的高度赞扬。

胡锡奎有个座右铭：一边战斗，一边工作，一边学习^②。平时，他十分注重从革命理论中提高思想水平。他到宣传部后，设法找来了《联共（布）党史》和《论持久战》等书籍，反复学习思考。白天工作太忙，他便抽晚上时间学习，有时睡到半夜，又爬起来燃灯攻读。

他不仅自己刻苦钻研，还经常鼓励干部、战士坚持学习。他根据党中央指示主持制定了干部学习制度，规定每天学习两小时。他一再强调：“能睡觉的地方就能学习”^③，“能拿枪就能拿书”^④。由于他和刘澜涛等领导人的倡导和推动，北岳区在职干部的学习蔚然成风，进步很快。一九四二年六月底区党委对百余名县级干部进行了一次临时测验，结果取得了每人平均七十六分的好成绩。一大批刚刚参加革命的青年，从他那里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启蒙教育。

一九四〇年八月，边区《双十纲领》经中央批准公布，胡锡奎为学习宣传《双十纲领》连续发表了《建设各级民意机关在晋察冀边区》、《论民主政权中的斗争》、《加强边区县级选举运动》、《胜利地完成边区参议会选举的伟大意义和任

① 《中国现代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79 页。

② 胡锡奎：《一年来宣传工作的检查和目前党的中心任务》（1943 年 8 月）。

③④ 胡锡奎：《怎样改造我们的学习》（1943 年 4 月）。

务》等文章。他动员党内外宣传部门，对《纲领》的内容逐条加以说明和解释；组织边区宣传机构和文艺团体，通过各种形式宣传《纲领》；根据地许多村庄的街心墙壁，纷纷写上《纲领》原文，使《纲领》为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所了解。

在边区整风运动中，胡锡奎发表了《论整顿三风在领导工作上的地位》等文章，作了《怎样改造我们的学习》、《关于反法西斯讨论中的几个问题》等报告，对提高党员干部的认识，推动边区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四四年，在分局党委的直接领导下，胡锡奎和邓拓主持了《毛泽东选集》晋察冀版的编辑出版工作。编辑选集的具体事项虽委托给《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胡锡奎还是亲自核对邓拓搜集到的二十九篇毛泽东著作和注释^①，分为政治、军事、经济、整风等五卷，于五月印刷出版。六月间，胡锡奎兼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在他的主持下，报纸分别于七月一日和九月二十六日两次报道了出版《毛泽东选集》的消息，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列主义，无论党内外都有深刻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必要。

晋察冀版《毛泽东选集》初版发行后，远不能满足广大干部群众的需要。于是，从十月开始，筹划再版。胡锡奎领导并具体组织了这些工作。再版扩充为六卷，内容较初版丰富。胡锡奎搜集、核对了大部分著作，编定了目录，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前完成了发稿、制版工作^②。此时，中央局调他去热河，他

①薄一波、程子华、刘澜涛、聂真：《深切怀念党的忠诚战士胡锡奎同志》，载1980年4月3日《人民日报》。

②访问曹裕民谈话记录（1984年7月8日）。

才把装帧、印刷事项转交给邓拓完成。一九四七年七月，这部《毛泽东选集》正式出版，许多解放区都翻印了，这是我们目前知道的第一部《毛泽东选集》。胡锡奎、邓拓等为传播毛泽东思想作出了贡献。

（五）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党中央迅速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指出当时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完全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发展和控制东北。”为了实现这一重大战略意图，中央决定立即从山东、陕甘宁和晋察冀等地抽调主力部队和大批党政军干部去开辟东北和热、察两省。

九月二十日，晋察冀中央局任命胡锡奎为热河省委书记。他立即在省军区司令员段苏权的武装护送下，赶到了热河省首府承德。九月底，他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省委会议，成立了中共热河省委，同时组建了热河省军区，胡锡奎任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委。经过两、三个月的工作，各地、县（旗）党组织先后恢复，发展党员一万余人。十月十四日，临时省政府组建以后，又开始筹备第一届热河省人民代表大会，亲自起草省委提交代表大会讨论的《热河省目前施政纲领》。筹备工作大体就绪之后，他与赵毅敏联名向党中央作了报告。党中央、毛泽东很快作了批复，同意他们报告中所请各项^①，同时决定再给热

^①胡锡奎、赵毅敏：《热河情况的报告》1945年10月22日；毛主席批示的《中央对胡锡奎、赵毅敏关于热河工作的报告的复示》1945年10月28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河增派干部两百名。十一月一日至十三日，代表大会在承德召开。大会通过了施政纲领，产生了热河省人民政府。接着，全省各县（旗）、区、村民主政府相继产生。

省人民代表大会以后，胡锡奎多次去承德第一区和农村了解情况，摸索发动群众的经验。办法终于找到了，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清算复仇运动，提出“有冤伸冤，有仇报仇”的口号，引导群众向汉奸、特务、恶霸清算十三年的苦仇。党内有一部分同志批评清算复仇运动是“左倾过火行为”，担心影响国共两党关系。胡锡奎基于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始终认为热河省委的作法是正确的。他在冀热辽中央分局程子华、黄火青等同志的支持下，坚定地领导了这场运动。十一月二十五日，他主持起草了《省委关于热河发动群众的指示》，要求清算复仇运动告一段落以后，立即转入减租减息阶段，让群众在运动中得到一些看得见的利益。他强调要把运动与宣传省施政纲领联系起来，并在运动中发展优秀分子入党。指示下达之后，运动掀起了高潮。于是，报告会、斗争控诉会和群众骨干训练班遍布城乡。近千名汉奸、特务、伪警向人民低头认罪，上百万群众参加了斗争。

由于充分发动了群众，运动进展顺利，取得很大成绩，将敌伪反动残余势力镇压下去了，使受迫害的人民群众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社会地位上真正翻身得解放。

毛泽东赞扬了热河省委的作法，并决定将热河省委的指示批转到东北各地。他指出：“最近热河省委发动群众斗争的指示，可以应用于东北。”^①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79页注释^②。

清算复仇运动展开以后，广大农民群众不满足于减租减息，纷纷发出了“把土地弄过来”的强烈呼声。胡锡奎满腔热情地支持农民群众。一九四六年三月，他主持召开省委高干会议，提出“将土地高度集中走向分散”去代替减租减息的主张。会上的争论不大，会下的交锋却十分激烈。由于认识上不统一，因而有些人在执行中也表现了怀疑与迟缓。恰值此时，传来了薄一波在延安听到毛泽东、刘少奇赞扬冀中农民推平（即平分）土地的消息，分局也作出了同意“分散土地”的决定，胡锡奎又一次得到党中央的支持。“分散土地”方针是针对国内阶级矛盾的新变化和热河土地高度集中的特点提出来的，实际上是热河土改的初期形式。从清算复仇发展到土地改革，胡锡奎提出并坚持了正确的意见^①。

“分散土地”的主张，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部分要求，在短短一、二个月时间内，就从地主手中夺回了四十八万多亩土地。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以胡锡奎为首的热河省委，坚决迅速地贯彻这一指示，并结合热河的实际，由胡锡奎主持起草了《热河省委关于贯彻中央土地问题指示的指示》，于六月六日印发全省。省委指示中就贯彻中央精神提出了具体措施，还对确保贫雇农利益，颁发“地契红照”和教育农民等问题，作了规定。经过胡锡奎等人半年的艰苦努力，各方面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涌现出许多积极分子，改造了部分街村政权，在相当一部分城镇树立起工农群众的优势，使党真正扎根于热河人民

^①访问黄火青谈话记录（1984年11月25日）。

之中。为此，中央又一次赞扬了热河的做法并批转各解放区参考。

六月下旬，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八月二十六日，人民解放军奉命主动从承德撤退。八月下旬，胡锡奎随分局转移到赤峰、林西一带，担任热辽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战争频繁，环境艰苦，加之鼠疫猖獗，他将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一头扎进北票县农村，摸索和总结经验，继续领导热北、热中和热辽地区的土改工作。

北票县蟒牛河东边的村庄，盘踞着一股大地主支持的民团武装，土改工作团在那里无法立足。土改工作团根据胡锡奎的指示，深入该地，认真调查研究。随即派遣蒙古十一支队和北票县支队配合河西翻身农民一千五百余人，浩浩荡荡开到河东。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贫雇农和贫雇农交朋友，算地主剥削帐，谈家史、村史，用河西活生生的事实，来提高河东群众的阶级觉悟，使大家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是“刮民党”，是“二满洲”，蒋介石是大地主的总后台，只有打倒大地主，穷人才能彻底翻身，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样，河东、河西穷人心连心，团结到一块了。河东群众接受了意见，拆掉了碉堡，还提出了奸细、土匪的“眼线”，帮助政府镇压了河东最坏的地主，彻底挖掘了这个国民党反革命根子，使土地改革运动在河东村庄得以顺利开展起来。

一九四七年七月，胡锡奎在平山向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介绍了热河的经验。

热河是一个蒙、汉、回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胡锡奎很注意民族团结工作。他曾专程到赤峰地区进行调查，并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三日将调查材料向党中央作了汇报。材料分析了当时蒙

古上层人物的政治态度，揭露了东蒙自治政府少数人假自治之名，企图分裂祖国统一的阴谋，建议中央派云泽去热河领导内蒙古人民的革命斗争^①。根据中央的指示，是年三月三十日至四月四日，在承德召开了一次东西蒙古自治会议（史称“四三”会议）。在冀热辽中央分局领导下，胡锡奎参加了会议，并带领干部热情为会议服务。“四三”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打开了民族统战工作的新局面。东蒙上层人物贺子章（蒙名清卓力克图），以前常与热北民主政权闹摩擦；这次会议后，不仅摩擦消停，他还同意将自己掌握的军队改编为朱德骑兵师，在锦州战役中立下战功。

在热河的三年中，胡锡奎还兼任冀热辽分局社会部部长职务。为在热河境内剿匪、禁烟（鸦片），作了大量工作。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旬，人民解放军攻打锦州，胡锡奎参加了这次战斗。锦州解放后，他被任命为辽西省委书记^②。不久，他又接到组织上新的安排，踏上了新的征途。

（六）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胡锡奎到达河北省平山县，就任华北党校副校长。不久，中央决定将华北党校改为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由刘澜涛任校长，胡锡奎任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

华北革大根据中央“敞开门办学，来者不拒，大量吸收与严

^①胡锡奎：《关于东蒙问题胡锡奎同志给中央、中央局、东北局的报告》（1946年3月3日）。

^②《中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任命书》（1948年12月26日）。

肃改造知识分子”的指示，分别在北平、天津、张家口等地招收学员一万二千余人，绝大部分是失学、失业青年，也包括一部分成分较为复杂的旧知识分子。学校分成四个部和一所天津分校。胡锡奎坚持把革命大学作为“思想战场”来办，结合学生思想实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教育内容。学校领导多次请朱德、董必武、彭真、薄一波等给学员上大课，收到显著效果。一九四九年七月，革大第一期培训结束，青年团员发展了四千多人，共产党员发展了二百人。一些旧职人员通过学习也转变了思想，改造成成为有用之才。革命大学通过两期培训，二万五千余名干部满怀豪情踏上了南下征途。建国后，他们大都成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骨干。

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在刘澜涛、胡锡奎起草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教育情况及其主要经验》的总结报告上批示：“我认为这个总结里所说的方针和方法是正确的，文件本身也是写得好的。”并指示将此件批转各地，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以资传播和仿效^①。从此，革命大学这类无产阶级新型干部学校，相继出现在东北、华东、中南各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培养财经、政法、外交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和高等学校马列主义理论课的师资。一九五〇年二月，中央选派胡锡奎任该校党组书记兼副校长，协助校长吴玉章工作。十月三日，人民大学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并作了重要指示。

^①刘澜涛、胡锡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教育情况及其主要的经验》以及毛主席对此报告的批示，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人民大学除吸收青年学生入学外，并大量招收工人和干部入学。开课不久，发现少数同志听不懂课，有的甚至跑出了课堂。胡锡奎立即与吴老商量，决定创办文化补习班。他对一位系主任说：“你到各系招生去，要把他们带到粘花寺，可不能把他们推置于大学门外啊！”广告一贴，很快就招了七个班、两百余人。工农学员热泪盈眶，衷心感谢学校的关怀。一九五二年，人民大学又在此基础上，特设了预科班和工农速成中学，为文化低的工农学生升入本科、专科创造了条件。全国著名劳动模范郝建秀、战斗英雄郭俊卿等，都得到了在人民大学深造的机会，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吴玉章、胡锡奎和全体师生员工的努力下，人民大学在各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并摸索了一些可贵的经验。一九五四年四月，高教部主持召开了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向全国推广了人民大学的办学经验，并且肯定这些经验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建设与改革有普遍的实际的指导意义^①。高教部副部长杨秀峰在这次总结会上，还对胡锡奎的工作作风给予了“虚心、诚恳、负责”的六字评价。

由于吴老很重视政治理论课，胡锡奎在办学时，始终把培养马列主义理论人才作为一项主要任务。他根据中央决定，要求各系学生第一期都要上好四门理论课程：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和哲学，并经常找这四个教研室的主任、副主任研究工作。每次开会，他常常先向他

^①胡锡奎：《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的情况与目前的主要任务》（1954年6月5日），载《教学与研究》1954年第七号。

们传达一些党中央开会的精神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的讲话，从政治上给予关心和培养。由于胡锡奎对这四个政治理论教研室的特殊重视，因此，同志们称这四个教研室是“四大名旦”^①。党的“八大”以后，根据国家建设的发展形势，胡锡奎又主持创办了政治理论、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法学等新的专业，使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体制逐步趋向完备，以适应社会经济建设的需要。

人民大学是一所正规大学，然而初创时期，仅有教师五十多人，在数量上质量上均感不足，远远不能适应教学的需要。政治理论课不得不仍然采取“上大课”的办法进行，许多专业课缺少教师，甚至没有教师。胡锡奎根据吴玉章的意见，一方面注意充分发挥原有教师的骨干作用；另一方面采取从干部中选拔、研究生中培养、社会招贤、师资进修等多种办法和途径，不拘一格地选拔和培养教师。他还利用当时特殊条件，发挥苏联专家“工作母机”的作用，首先让青年教师听苏联专家的课，然后鼓励他们大胆登上讲台。胡锡奎根据吴玉章的指示，以战略眼光，认真办起了马列主义研究生班和高校师资进修班，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毕业生，不但补充了人民大学的教师队伍，也支援了全国许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关。

在培养教师专业人才上，胡锡奎不仅注意数量，尤其注重质量，强调要提高教师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他主持开办夜大学和暑期培训班，亲自作辅导报告，使未系统学习过政治理论四门课的教师全部补了课，最后还颁发了结业证书。一九五三年，人民大学在天津市举办了一期厂

^①胡华：《回忆胡锡奎二三事》（1985年6月）。

长、经理训练班，工业经济系的一位青年教师课讲得很出色，天津市市长黄火青特地打电话把这件事告诉胡锡奎。胡锡奎当天赶赴天津，参加训练班的结业典礼，夸奖这位青年教师是教学工作中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模范。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人民大学一支千余人的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茁壮成长起来，为后来学校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胡锡奎重视教学要联系实际。他说，我们不仅要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到实际部门参观学习，进行锻炼，尤其在教学内容上要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各门课要逐年增加中国方面的实际需要的理论内容。他首先组织力量，指导各教研室编写了结合中国情况的理论联系实际《教学大纲》，使教师教学有所遵循。他还带领教师陆续写出了《哲学原理》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几百万字的教科书。由于他的重视，到一九五六年，人民大学就编写出了具有中国特点的教材大纲、讲义、参考资料达五千四百多种，发行八百六十万册^①。除保证本校的教学需要外，还向全国各地大量发行，在教学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五三年召开人民大学第二次党代会，提出各种工作要面向教学和科学研究。胡锡奎兼任教务部长，直接抓教学和科研。一九五六年春，胡锡奎亲自带领青年教师前往上海、天津等地，进行长达两个月的社会调查，了解国家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情况。他们访问了统战部、工商联、妇联、工会等有关人士，找有代表性的资本家荣毅仁、郭林爽和工人代表座谈，并深入永安市场、塘沽久大公司进行实地考察，收集了大量第一

^①胡锡奎：《中国人民大学介绍》（1956年1月26日）。

手资料。回京后，写出了五万余字的题为《关于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与阶级斗争》的论文。他认为，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用赎买的方式“剥夺剥夺者”的设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种企业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的办法，在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舞台上，确实展开了一个新的序幕”^①。当年五月，人民大学第六届科学讨论会上，胡锡奎宣读了这篇论文后，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论文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后，《人民日报》作了转载，苏联也翻译出版了。一位大学副校长，年逾花甲，带头搞社会调查并写出论文，在当时还是一件新事。高教部负责人在一次大学校长会上说：“胡锡奎同志打了第一炮，亲自搞调查研究、科学研究，你们怎么办？”^②

胡锡奎为了推动科学研究和交流教学经验，尤其重视编辑、出版综合性学术月刊《教学与研究》。他亲自指导出版工作，每期他都要亲自审阅清样，凡是重要文章，几乎篇篇过目，有的还亲自修改。他既强调政治性文章与中央宣传口径必须保持一致，又主张学术性文章允许自由讨论，以理服人。在一九五九年的学术讨论会上，政治经济系的一位青年教师宣读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内部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及其特点》的论文，在当时“左”倾思潮的影响下，这篇论文被认为是“邪说和谬论”，学报不敢发表。副主编请示了胡锡奎，他听后严肃地说：“怎么不能发表？百家争鸣嘛！”事隔二十年以后，

①胡锡奎：《关于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与阶级斗争》，载《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10期。

②访问张井平谈话记录（1984年6月15日）。

在一九七九年的《国家经济研究》上肯定了这一研究成果，说它在“四化”建设中有一定的先导作用。由于胡锡奎的重视和大家的努力，《教学与研究》发行量达二万二千余册，行销全国，成为大、中学教师、理论工作者和科学工作人员喜爱的读物。

胡锡奎为了学习外国教育经验，提高自己的领导水平，推进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还孜孜不倦地学习俄文。他常常是每天早五点钟亮灯起床，开始练单词。由于年事已高，一个单词往往要读十几遍。但他刻苦用功，持之以恒，终于“能用俄文浏览普通书报”^①。

胡锡奎非常珍惜时间，注意工作效率。人民大学居住分散，他常利用坐车找人谈话的时间在车上打盹作为白天的休息。晚上，他经常伏案工作到深夜，或批阅文件，或审阅校刊与周刊的清样，发现了什么问题，常常是当夜处理。他常对编辑人员说：“办事情要谨慎小心，一不小心，出了差错，整个报纸就要报废啊！”

胡锡奎在人民大学十三年，协助吴玉章校长，主持具体工作，对于人民大学的创办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到一九六三年止，人民大学为我们党和国家培养了理论干部和建设人才达五万余人，仅研究生就有四千七百多人。人民大学举办的函授大学就为中央机关和北京市机关培养本、专科毕业生达一万九千余人^②。当然，胡锡奎在工作中也有过某些失误，但他是一位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他勇于承担责任，善于和同志们一起改正错误。

^①胡锡奎：《自传》（1956年2月）。

^②《人民大学1950—1979年各类毕业生统计表》。

一九六三年九月，胡锡奎调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宣传。他一到职就不辞劳苦，奔赴西北高原，深入甘肃、新疆等地进行实地考察。这时，他已年近古稀，体质较差，难以适应变化多端的高原气候，途中多次病倒，然而还是坚持工作。他到西北为时不长，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等方面，付出了很多心血。一九六五年十月，他还深入到陕西三原县新庄公社土官大队蹲点，化名胡子清，与基层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坚持同吃、同住、同劳动。尤其感人的是，他到西北局后，还不负北京市委的委托，挤出时间，与助手一起，善始善终地完成了《中共北京地下党斗争史》的编写工作，“用党的精神，烈士的鲜血教育后一代^①。”

(七)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打倒刘少奇及一大批领导干部，泡制了震惊中外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大冤案。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晚，在北京市委招待所里，一群“红卫兵”对胡锡奎进行围攻，诬陷他在草岚子监狱的出狱是叛徒行为。胡锡奎毫不含糊地回答：“是领导决定，集体执行，我们大家是一致行动，不是哪个个人搞的事情，就不能说哪个人是叛徒，出狱后也没有这个行动。”他正告这些人：“这个问题要很好地考虑一下，把这一大批人打成叛徒，主席可以和叛徒一起开会吗？”^②与此同时，胡锡奎主持编写的那本《中共

^①在人民大学党委座谈会上汪幼樵谈话记录（1984年7月3日）。

^②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誓保江山战斗队：《提审记录》，1966年11月30日。

北京地下党斗争史》，也被打成毒草。胡锡奎对此明确表示：这本书有什么问题，除我作检查外，其他写作的同志可以进行正面教育，不作追查，一切错误由我负责^①。有段时间，某些人把矛头对准吴玉章，胡锡奎主动站出来说：“吴玉章是校长，党委书记是我，学校的事主要是我的责任，他没有责任”^②。他一次又一次地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表现了爱护老一辈和关怀新一代的崇高品德。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当审问人硬诬他是叛徒时，他怒不可遏，脱口而出：“王通才真是叛徒”^③。王通原是陈伯达在草岚子监狱中的化名。由于这一大胆的揭发，“四人帮”又给胡锡奎扣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并将他投进监狱。

胡锡奎又开始了铁窗生活。由于精神与肉体的折磨，他在草岚子监狱中得下的胃病复发了，多次大咯血，很长时间都得不到治疗。直到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因急性胃穿孔休克，才被送到犯人医院，医生诊断为早期胃癌。

一九六九年冬，胡锡奎被“下放”在陕西省蒲城县的爱人石水，突然接到胡锡奎病重的通知，石水带着受株连的儿女，赶到北京看望。一见面，胡锡奎就告诉妻子和女儿：“我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把个人的得失置之度外，几十年来，我的工作中也难免有缺点和错误，但是我对党忠实，知错必改。所以你们可以相信，我的一生始终是由一条红线贯穿着的！”^④

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三日，胡锡奎在监狱的病床上停止了

①胡锡奎：《从入狱到出狱对付敌人审讯的情况》（1967年3月12日）。

②③人民大学党委座谈会上张腾霄谈话记录（1984年7月3日）。

④访问胡锡奎子女谈话记录（1979年2月4日）。

封面设计：王艺光

统一书号：11094·197

定 价： 3.25 元